

目 录

第一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及国共两党的方针	(1)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形势与美苏对华政策	(1)
一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1)
二 美苏的世界战略及其对华政策.....	(5)
第二节 战后国内形势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11)
一 战后国内的基本形势	(11)
二 国民党的方针	(18)
三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20)
第二章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	(24)
第一节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力争实现国内和平	(24)
一 重庆谈判的达成	(24)
二 重庆谈判的经过及《双十协定》的签订	(28)
三 重庆谈判的重要意义	(38)
第二节 反击国民党军向上党地区的进攻，配合重庆谈 判	(40)
一 上党战役前的形势	(40)
二 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反击阎锡山部 入侵上党的方针、部署	(43)
三 上党战役经过	(47)
四 上党战役的意义和作战基本经验	(53)
第三章 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调整战略 部署	(56)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 针的确立	(56)

一	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历史背景	(56)
二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形成	(61)
第二节	贯彻新的战略方针，调整战略部署	(71)
一	抽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部，先机控制东北	(71)
二	新四军主力北移	(79)
三	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 在桐柏山地区胜利会师	(83)
第四章	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组建野战兵团	(86)
第一节	中共中央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	(86)
第二节	编组野战兵团，健全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 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90)
一	组建野战兵团，加强地方部队建设	(91)
二	加强民兵建设	(118)
三	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政治工作	(124)
第三节	特种兵和军事院校的建设	(126)
一	特种兵的建设	(126)
二	军事院校的建设	(131)
第五章	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实现国内和平	(135)
第一节	国民党以受降为名，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大举 进攻	(135)
一	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136)
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方针、 部署	(144)
第二节	晋冀鲁豫军区举行邯郸战役，打退国民党军沿 平汉路的进攻	(149)
一	国民党军统帅部企图以第11战区孙连仲部打通 平汉路	(149)

二	晋冀鲁豫军区决心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 保卫解放区，掩护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	(150)
三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经过.....	(155)
四	邯郸战役的意义、影响及主要作战经验.....	(163)
第三节	晋察冀、晋绥军区举行绥远战役，反击傅作义 部东犯.....	(166)
一	绥远地区概况.....	(166)
二	国民党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向绥远、察哈尔解放 区大举进攻，企图控制平绥路，夺取张家口	(167)
三	中共中央军委决心集中晋察冀、晋绥军区主力举 行绥远战役，歼灭傅作义部主力，收复归绥，解 放绥远全境.....	(168)
四	绥远战役经过.....	(172)
五	绥远战役的战果及主要经验教训.....	(183)
第四节	新四军和山东军区举行津浦路（徐济段）战 役，挫败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185)
一	山东、华中解放区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军进攻山 东和华中解放区的企图和部署.....	(185)
二	截断津浦路，坚决阻止国民党军由徐州北上	(186)
三	津浦路（徐济段）战役作战经过.....	(191)
四	津浦路（徐济段）战役的战果、作用及主要经验	(197)
第五节	同蒲路南段、北宁路榆锦段作战和承德保卫战	(198)
一	同蒲路南段作战.....	(198)
二	北宁路榆锦段作战.....	(203)

三	承德保卫战·····	(211)
第六章	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斗争·····	(216)
第一节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	(216)
一	停战协定的签订·····	(216)
二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协议·····	(236)
三	整军方案的签订及其实施情况·····	(247)
第二节	国民党肆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	(257)
一	国民党制造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 ·····	(257)
二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对政 协协议的否定·····	(259)
三	国民党违约进攻东北，以蚕食手段进攻关内解放 区·····	(264)
第三节	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的斗争·····	(271)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力争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 ·····	(271)
二	东北民主联军抗击国民党军沿北宁路的进攻 ·····	(273)
三	进行以四平地区为中心的保卫战，促进东北停战 谈判·····	(275)
四	东北休战 15 天，国共双方继续谈判 ·····	(291)
第四节	关内各解放区军民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	(293)
一	关内各解放区开展反蚕食斗争·····	(293)
二	中原地区的谈判斗争·····	(306)
三	华南地区的斗争·····	(310)
第七章	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314)
第一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与方针 ·····	(314)
第二节	全面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	(322)

一	部队精简整编·····	(322)
二	开展军事练兵运动·····	(338)
三	建立和健全各级后勤保障体制·····	(342)
四	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军工生产·····	(344)
五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345)
第三节	加强解放区建设，巩固战略后方·····	(352)
一	在关内新老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 生产运动·····	(352)
二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363)
第四节	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 ·····	(369)
一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民党军工作的方 针、政策·····	(369)
二	广泛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国民党军工 作·····	(374)
三	开展“高树勋运动”的作用及其影响·····	(383)
本卷结语	·····	(387)
附录	中共中央军委及各军区各野战军序列·····	(396)
后记	·····	(486)

第一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及国共两党的方针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形势与美苏对华政策

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1945年9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和各国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终以战胜德、意、日而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意、日三国被打败了。德国为苏、美、英、法四国所共管，德国的领土及首都柏林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四国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处理“涉及德国全部事务”。其“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①日本为美国所“单独占领”，在东京设立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是美国当局的“谘询”机构，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日本实际上“被束缚在美帝国主义的占领体制下，已成为美国的属国”。^②意大利为盟国驻意管制委员会所管制。德、意、日三个战败国，不仅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担一切责任，并要付出巨额的战争赔款，而

^① 《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见《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363页。

^②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下册，第708页。

且领土被变更，政治上被管制。

英、法大为削弱，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头等强国。作为战前的世界老牌帝国的英国与法国，或丧失元气，或大为削弱，已从列强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英国不仅已成为美国的债务国，且在外交活动中也屈从于美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已是百孔千疮，日薄西山。而法国在大战中一度沦陷，战后经济困难，大国地位已名不符实，总统戴高乐无可奈何地提出：要“同其他大国随时随地有平等地位”，不要被别人“利用为赌注”^①。美国则从战争中崛起，在战后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其经济力急剧增长，到1944年，美国的钢产量已达8100万吨。其工业生产总额和1939年相比，提高了近两倍，战争结束时，其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60%，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和工业能力的三分之二”。^②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垄断资本攫取的利润总额达800亿美元，个别大公司在1942年所赚利润竟超过战前的100倍。美国借给外国的信用贷款，到大战结束前已近200亿美元。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已居世界的前列，军费支出由1939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800亿美元以上。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至1945年已增至1200多万人；海军舰艇吨位达380万吨，远远超过英国的150万吨而跃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它控制着日本和拉丁美洲，军事势力伸入到亚太、南亚和欧洲一些地区。由于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已具“唯我独尊”的势头。总统罗斯福曾称：“雅尔塔会议之前那几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已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苏联和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统治全球。”^③他的继任

① 1945年11月23日，戴高乐向法国制议会的讲话。

② [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页。

③ 《罗斯福正传》，第658页。

者杜鲁门正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他声称：“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际间起领袖作用”。^①美国的“领袖作用”，实际上就是执行新的奴役、扩张和侵略政策。这一形势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走向解放、自主和发展的道路上，将遇到来自美帝国主义的重重障碍。

苏联在战争中已成为主要强国，一批人民民主国家诞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如美国，但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战争后期和战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方面，工农业生产情况以1943年和战争结束时相比，电力由32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30.3亿千瓦/小时；石油由1800万吨增加到1900余万吨；煤由9300万吨增加到约1.5亿吨；钢产量由800余万吨增加到1200余万吨；各类谷物由2900余万吨增加到4700余万吨。在军事力量方面，武装力量总人数由战争前的540万人增加到1945年5月的1140万人，武器装备有80%进行了更新，坦克、自行火炮、作战飞机、军舰等均有很大发展。^②这一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成为主要强国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不仅对美国推行世界霸权起着限制作用，而且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着支持作用。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亚洲的越南北部、朝鲜北部，经过英勇战斗并在苏联的影响下，先后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成为战后世界政治

^① 杜鲁门1945年12月向美国国会递交的《特别咨文》。

^②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10、411页。

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们与苏联站在一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这是世界人民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

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成为影响世界局势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各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国家或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开辟了胜利道路，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正在兴起。

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五大强国之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解放区军民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于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 100 万平方公里，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支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老挝、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正风起云涌，成为埋葬殖民主义的新一代掘墓人。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从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造成空前的牺牲、破坏和灾难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各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影响有了扩大。人民反对战争、反对压迫、要求和平民主、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和呼声极为强烈，从而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向前发展。

以上情况表明，战后的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构成战后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图

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削弱，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种形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①

二、美苏的世界战略及其对华政策

（一）美国与苏联的世界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受惨败，英、法大为削弱，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企图以军事和经济手段控制欧洲乃至全世界。于是它的世界战略便由战前的所谓“孤立主义”变为战后向全世界扩张，即所谓“全球主义”。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成为美国维护其经济利益并进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与称霸世界的根本需要。为此，杜鲁门于1945年10月，就其“军事任务的目的”和“外交基本原则”多次发表过讲话。其要点是：在军事上，建立“能够一声令下就动员起一支强大而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并在美国以外“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以便既能“保卫美国”，也能成为美国政府主要人物“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在政治上，“帮助战败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同时，针对苏联，提出所谓“拒绝承认任何外国用武力强加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以反对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57、1163页。

人民革命。在经济上，主张“航行自由”，包括“在国境边界的河流和水路，以及在流过一个以上国家河流和水域航行的平等权利”，及“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获得全世界的原材料”的机会均等。苏联的存在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的最大障碍。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即：美国应“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①随后，杜鲁门又提出所谓“通过侵略或间接侵略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自由人民，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的谬论，美国政府宣布了以复兴欧洲、“遏制”苏联为核心的“马歇尔计划”。这样，美国在所谓反对“间接侵略”的名义下，把干涉别国内政、镇压别国人民革命定为国策。这就形成了美国决策集团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苏联为争取与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恢复与建设，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周围建立起“缓冲地区”，以便保持有利于己的态势。因此，针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便由战时的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转为“巩固用巨大代价才赢得的胜利；保障苏维埃国家和其他爱好自由的民族免受反动势力新的侵犯；为保证持久和平创造条件。”^②苏联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进一步巩固东欧和平与安全，采取了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贸易圈。从而，东西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了。

但是，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避免立即相撞，而是把争夺与反争夺的场所，置于欧、亚等广大中间地带。这样，以

①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② 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反映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美苏之争，使“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①迅速结束，代之以“冷战”时代的开始。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战略目的，就是侵略和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反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二）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虽然把它“活动的主要中心”放在欧洲，但从其战略利益和世界战略考虑，总是把中国列为它的势力范围。

还在1943年，美国为了减少它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曾设想让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起来，并考虑援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罗斯福曾对蒙巴顿说：有5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②。1944年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项政策文件中提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和秩序”负有“首要责任”。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和美国驻华使馆，也曾力主美国在继续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要与中共合作，并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其目的：一是出于打败日本的需要；二是“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三是可以迫使“蒋委员长在政权上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这样中国就可以第一次成为我们统一的盟国。”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用共”，并言明“美国物资不得用于镇压中国内争。”^③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美国意识到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944年10至11月，美国以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以魏德迈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他

① 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② 罗斯福致蒙巴顿函（1943年11月8日），参见《十字军》第148页。

③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们实行彻底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已露端倪。

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以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达成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及苏联关于“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①的协议。这一协议虽然对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有着重要作用，但它是背着中国代表达成的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议，反映了对华政策上的强权政治。杜鲁门对这一协议欣喜不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谅解一事，使我感到宽慰。我国的军事专家曾经估计过，进攻日本至少要使美国死亡50万人，即使当时日本在亚洲的军队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的话，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美苏达成了妥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4月2日，在美国公开发表扶蒋反共谈话，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中国统一之阻碍在于“有武装的政党。”于是美国不再考虑给予中共军队“一定的军事援助”，并企图在大力从军事上加强蒋介石的同时，以允许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方式，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美国在中国取得了支配地位，就便于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以称霸世界。因此，当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便公然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9册第594—595页。

对的政府。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因而，他采取了以下政策：

1、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杜鲁门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①

2、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杜鲁门称：“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内战之争”^②

3、采用“调处”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杜鲁门先后通过赫尔利和马歇尔充当“和平使者”进行“调处”，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政府，以通过蒋介石有效地控制中国，从而既能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又能把苏联的影响完全逐出中国。

以上情况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进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样，美国“把中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的殖民企图，与正在奋起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形成了尖锐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

的矛盾，这是其对华政策必然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同时，美国大力援蒋与所谓不介入“闽墙之争”的矛盾，也造成了马歇尔的“调处”必然失败。

（三）苏联的对华政策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从其战略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出发而确定的。

当苏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苏联无暇东顾。1944年春，斯大林曾对访苏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美国在远东应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对于国共之间的解决，极感兴趣”^①。这时，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尚无积极的表示。

苏联在取得“对日作战条件”时，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其对华政策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以同意对日作战为条件，取得租借旅顺、大连为自由港，共管中长铁路等权益和外蒙古独立。加之，进驻朝鲜北部，从而使苏联取得对美国的有利地位，使美国势力不致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二是与蒋介石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换文中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其他物资上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以图尽力拉住蒋介石使其不完全倒向美国。三是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政府妥协，以避免内战。斯大林曾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②并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③企图以此“争取全面和充分实现”雅尔塔体制，^④保持远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② 〔南〕杰吉耶夫：《苏南冲突经历》，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④ 《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东的和平局面。

另一方面，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在东北，一方面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同时也以不干涉中国人民自治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力量的发展予以一定的帮助。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帮助解除在华日军武装”。^①苏美两国外长均表示两国军队都应“尽早撤离中国”。^②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大国合作、确保本国安全与美国实行妥协的产物。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革命斗争，而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立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第二节 战后国内形势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但内战的危险却严重存在。

一、战后国内的基本形势

战后的国内形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扶植下，调兵遣将，加紧向解放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辑第185页。

^② 《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6页。

区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企图在全国恢复与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

（一）国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基本力量，革命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边区及南方的15个游击根据地，军队9.2万人，有组织的党员4万人左右。到1945年9月，解放区发展为19个，面积为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5亿，县城与省会286座，行署、专署和县级政权703个；军队127万人，民兵268万人；^①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全党更加团结，党员已发展到120多万人。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系。同时，中国民主力量进一步发展。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座谈会（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以及中国妇女联谊会等民主进步的党派和团体，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主张实行“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方针。他们对战后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战前几乎控制着全中国，拥有军队170万人^②。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担负着正面战场抗击日军主力作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大部军队退缩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日本投降前夕，即1945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

^① 中共中央致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

^②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89页。

个团又 50 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 422 万余人，加上军事机关 85 万人，军事学校 16 万人，陆军总兵力共 524 万余人。^① 此外，蒋介石正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进攻解放区的先遣队。国民党在军事力量的绝对数量上虽多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但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已由抗战开始时的 18.88：1，降为 4.1：1，加上收编的 50 万伪军也仅为 4.5：1 稍强一点。

（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建设，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解放区人民称“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华北沦陷区的人民说：“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马寅初教授在重庆发表演说时，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所努力建立的制度，也就是最接近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民主制度”。并赞美解放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是“改善农民生活的崇高思想之一种具体表现”，他希望这种政策在全国普遍地实行起来。到过延安的人，对共产党无不倍加赞誉。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享有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②

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以实施“训政”为借口，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压制民主，特务猖獗；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人民极为不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国统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际上，也普遍认为国民党政府是独裁政府。蒋介石曾哀叹说：“在美国人的脑

^① 参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45 年 7 月陆军整理计划。

^② 《白皮书》附件第 47，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一辑第 590 页。

筋中间”，已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①

· 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情景，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思。因此，当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时，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与各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和呼吁书，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反对内战与一党专政。

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8月15日发表紧急呼吁书，提出：“我们坚决地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呼吁书还提出了包括全国实行普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政府，中央与地方均权，废除战时统治，救济收复区人民生活，扶助人民复业，政府停止征兵等内容的10条主张。中国第三党（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于1945年9月，在对时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当政十八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②

① 《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565页。

②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于1945年9月发表了《对时局的严重献言》，表达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现在，抗战胜利了，法西斯已经溃败，民主的潮流正以排山倒海的势力激荡于世界，而盟邦的团结也日益巩固，这正是我们从事建设民主化工业化新中国的一个伟大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和平团结，需要民主统一，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经济建设，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与文化水准。这是经济界历尽苦难后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反之，任何妨害民主和平的行为，都非我们经济界所愿见，也一定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所反对的。”^①并提出了9项主张。要求：一切国事，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停止抽调壮丁，安定工商界人员；没收敌伪财产，救济失业工人，解救工商业的危机等。中国妇女友谊会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称：“我们妇女，在抗战中已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我们有权利要求在战后享受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不愿在抗日胜利后，再有任何战祸发生，削弱建国的力量，和使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再充当屠杀自己同胞的凶手，或在自己同胞的枪炮下牺牲，我们怎能容忍在已获得和平后，还被抛进贫困、饥寒、死亡、压迫里。”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必须警惕那些企图独占抗战成果的人们发动内战的阴谋，并且应该用全力加以反对和制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了《告国人书》，声明：“在全国人民殷切待望，时机迫切的今天，本会敢诚恳地提出处理国事的三大目标，曰团结，曰民主，曰和平。这是全国人民所祈望的目标”。“紧急的时机不应放过，人民的愿望不应无视，国家的大计不应拖延”。“现在战争结束了，但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生的功成事毕，而是中国人民开始跨进了创造光明的民族事业的第一道门”。^②

^①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2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9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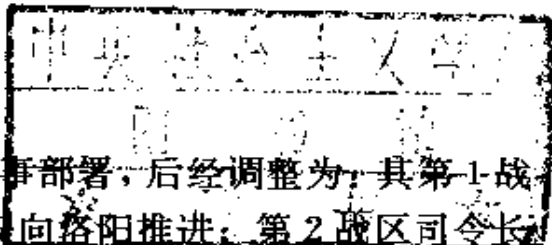
昆明、成都等地的各界人士 876 人，于 1945 年 9 月 26、29 日，分别联名发表呼吁和通电，表明了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和平，不赞成内战。所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强大的社会力量。

(三) 国民党军大举向解放区推进，使内战爆发的危险日益严重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0 日，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布了对日大反攻的命令，随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调整战略区作战行动的命令。据此，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部向晋绥的日、伪军反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向晋冀鲁豫区的日、伪军反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率部向晋察冀（包括热辽边）地区的日、伪军反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代政治委员饶漱石率部向华中地区及江南皖浙等地的日、伪军反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黎玉率部向山东地区的日、伪军反攻；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原为徐向前因病未到职）、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部向鄂豫地区的日、伪军反攻；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枫、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程子华、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等率部向东北进军；坚持华南游击战的各游击队向当面的日、伪军反攻。继续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但是，蒋介石于 8 月 11 日连续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向解放区“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令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为首先抢占战略要点与交通要道，分割解放区，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于8月13日确定了新的军事部署，后经调整为：其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一部由西安向洛阳推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由晋西地区向太原推进；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率部由江西铅山向杭州推进；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部由河南南阳向郑州、开封、新乡推进；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率部由湖北恩施向武汉、宜昌、沙市推进；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率部由江西寻邬向广东汕头推进；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位兰州地区；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由湖南汝城向南昌推进；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率部由安徽立煌向徐州、海州等地推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部由西安向保定、石家庄、北平推进，其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部由西安向青岛、济南、德州推进；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部由绥远陕霸向察、绥、热三省推进；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率部由南宁向广州推进；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率部由柳州向南京、上海推进；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率部由湖南芷江向长沙、衡阳推进；任命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率部向东北推进。并确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率部由陕西汉中开往北平；广州行营主任由张发奎兼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率部由重庆进占长春。^①

美国从其“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基本企图出发，一方面，令侵华日军为国民党军坚守地盘；另一方面，派海、空军为国民党军向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等地运兵；同时，还直接出兵在塘沽、天津、上海、青岛等地登陆，为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

整个形势表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令部队大举向解放区推进，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国际上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加之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尚需时间准备，因而，尽管内

^① 参见台湾“国防部”《戡乱战史》（一），第7页、插表第1、第5。

战的危险是严重的，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条件和可能还是存在的。

二、国民党的方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将建立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国内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①

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发表了以坚持独裁专政、反共反民主为核心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奠定了其战后方针的基础。书中竭力诬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开创的抗日根据地是“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提出“不只没有侥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存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而断送了。”这些法西斯主义理论，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的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的翻版。抗战胜利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路线，蒋介石在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②这构成了国民党制定战后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蒋介石本人后来说，战后的方针，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共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③

当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一面公开连电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赴渝，“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30页。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题”。^① 企图借以争取舆论和政治上的主动；一面秘密重印《剿匪手本》^② 给各战区，进行“动员戡乱”。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动员戡乱，都是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③ 这就表明了蒋介石的和谈是假、消灭中国共产党是真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蒋介石为加紧内战准备，于1945年11月中旬，在其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其要点是：（1）提出了“戡乱”规划。蒋介石声称：“我们回想二十年来奸匪〔注：指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只要各位知道今天局势的紧急……奋发努力……那么我就敢确信最少五年最多十年，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2）确定了“剿匪”的部署与方针。蒋介石称：“将来的剿匪区域，当然要照铁道干线来划分。军令部所划的六个区域，甚为正确。”“第二收复区内之六个剿匪区，应各设一指挥机构。”关于作战方针，“我们在游击之外，不能不采用阵地战。”（3）制定了新的“剿匪”战术。蒋介石要其高级将领继续研究运用他在《剿匪手本》中提出的“碉堡战”、“纵深配置”、“侦察战”、“伏击战”、“游击战”、“山地战”、“夜战与夜行军”的战术外，并规定组织战（即保甲战）、宣传战（精神战或心理战）、补给战（交通战）、通讯战（情报战）等新的战术。（4）确定了“先关内后关外”的“剿匪”步骤。蒋介石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④ 这些均表明蒋介石内战的方针进一步确立。

① 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年8月14日）。

② 《剿匪手本》，是1933年蒋介石编的专门讲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方法的反革命的小册子。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15页。

④ 《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520—1525页。

在对外关系上，蒋介石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确定了“中美彻底合作”的方针。蒋介石以苏俄怀有“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之不可的野心”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为此，蒋介石认为必须实行“中美彻底合作”，特别是视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为其生命线。他称：美国的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① 蒋介石的所谓“中美彻底合作”方针，实际是不惜出卖主权，使中国沦为美国附庸，以换取美国援助的方针。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要坚持独裁和内战，就要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因此，“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②

三、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依据当时形势及其发展，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总路线，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党的一般纲领。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其中针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情况，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这种针锋相对的方针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真和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以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32页。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积极采取正确方针，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认为：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并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出发，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平、民主、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的指导方针。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32页。

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这一《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方针。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①

关于军事战略方针与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肃清敌伪、应付国民党军的进攻和保障实现和平民主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1）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2）编组超地方性野战兵团，并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3）调整战略部署，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4）目前的行动方针是：除个别敌伪盘据的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②同时，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只要好打，即“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③

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要“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要派大批有能力之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

① 《周恩来年谱》，第615页。

②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54页。

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中共中央并明确指出，“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①

关于对外政策，战后的美苏对华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共关系，情况极为复杂。中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1）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殖民化中国的政策”，要“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②但对在华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对美方协助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者，应坚决抗议与自卫。（2）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直接帮助我们。所以，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③（3）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某些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我们仍“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④

解决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依据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制定的上述战略方针与各项政策，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取和平发展的前途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指明了方向。

① 中共中央对党内的决定和指示（1945年8月11日、12日）。

② 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3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85页。

第二章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

第一节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力争实现国内和平

一、重庆谈判的达成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又一次提出制止内战爆发，努力促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但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际上也反对中国内战，而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还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连续三次电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国民党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进行和平谈判完全是虚伪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部，按蒋介石的意图在讨论“发动宣传攻势”时，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社长胡健中说：陈立夫（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统局”局长）提出，“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为国民党出

谋划策的派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更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①国民党的企图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就可以借此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宣布中国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重庆,就在谈判桌上向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逼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并借机加紧运兵、部署内战。对国民党这一阴谋,中共中央完全洞悉,但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团结全国人民,决定同美、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促进重庆谈判的举行。

8月14日,即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次邀请电:“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然而,就在蒋介石发出邀请电的前3天,即11日,蒋介石曾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命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收缴枪械和“擅自行动”;却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于13日、16日致电蒋介石,拒绝让第18集团军原地驻防的命令,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②要求蒋介石收回命令,承认错误。朱总司令还提出六项要求:(1)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要事先和中国共产党商量,取得一致意见。(2)中国解放区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解放区

^①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4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42页。

军民所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3) 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人投降后的工作。(4) 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5) 制止内战，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6) 立即废止一党专制，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经济改革及其它各项民主改革。^①以上各项请其早日回答。8月16日，毛泽东就蒋介石14日的邀请电复电蒋介石：“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8月20日，蒋介石第二次电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声称：“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对朱总司令所提诸项要求借口未“恪遵军令”而搁置一边，却空言“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要“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8月22日，毛泽东又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

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是必要的，争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44—1145页。

^②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1日。

实现国内和平也是可能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由于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一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他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以便医好伤疤，壮大力量，等待时机消灭我们。即使是暂时的和平，我们也要积极利用和争取。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向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护国内和平。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还决定调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选，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4日，毛泽东第三次复电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宣言》，表明了中共的基本立场。

为了统一全党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认识，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

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通知》还指出：“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①

国民党一面邀请毛泽东赴渝和平谈判，一面又不顾中国共产党所提制止内战的各项主张，在美国的帮助和日伪军接应下，迅速调动大量兵力，驰运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为名，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阻止人民军队的受降与接管，以部署其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待机进攻。国民党还发动宣传攻势，诋毁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制造毛泽东不肯去重庆谈判的舆论，企图把内战的责任嫁祸于中国共产党。同时，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8月24日，国民党政客胡适公然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②足以看出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解放区，是国民党和谈或内战的主要目标。

二、重庆谈判的经过及《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5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由重庆飞抵延安，专程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赴渝谈判。赫尔利在离渝时发表声明说：“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53—1154页。

^② 《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商谈。”^①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受到各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期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②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时局的看法和来重庆谈判的宗旨。

毛泽东亲临重庆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和世界。国内外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称颂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与胆略，赞扬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山城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社会舆论同声期望国共两党会谈的成功。《新华日报》在社论中说：“中国和世界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国内政治上军事上还存在着许多急迫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毛泽东同志来渝正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③ 重庆《大公报》，在8月29日以“毛泽东先生来了！”为题的评论中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一件大喜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以胜利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成都市《华西晚报》在评论中说，毛泽东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日本

①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8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③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评论认为，“如果对中国命运应负重大责任的国民党确具有结束一党专政与在野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我们应该以人民的力量使得这个新的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如人民所愿望的获得成功。”胡其瑞等民众在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颂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认为“毛先生之来，是关系全国命运的大事。”“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是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希望即将开始的谈判完全成功。”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重大问题多次进行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由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省主席、政学系首领）、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进行谈判。

8月29日一般性商谈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因事先无诚意，无准备，措手不及，陷于被动，除空泛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外，提出了“中国没有内战”之说，妄图否定和谈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方面以大量事实回答了国民党“没有内战”的谎言，及其反共内战的政策。蒋介石为摆脱被动局面，于当日为国民党代表拟定了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与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①

9月3日，中共代表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从国内时局的实际情况出发，将拟定的国共两党谈判方案（即中共代表提

^① 《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第14册第19页。

出的 11 条建议) 交付国民党政府代表, 主要内容是: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 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 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 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严惩汉奸, 解散伪军; 重划受降区, 中国共产党参加受降工作;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 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 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释放政治犯, 保障自由、取消不合理的禁令, 取消特务机关。^① 方案还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提出了必要办法。

9 月 4 日, 国共两党开始实质性的会谈。蒋介石将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国民党代表, 作为对中共所提会谈方案的复案。其要点是: (1) 中共军队之编组, 以 12 个师为最高限额。(2) 承认解放区的问题, 绝对行不通。(3) 拟将国防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 由各党派人士参加。(4) 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 仍然有效。^② 蒋介石对谈判的方针是: 对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一定要在“军令、政令统一”的名义下, 限制并取消其存在, 政治方面则可以作一些空头许诺, 以争取舆论。9 月 8 日, 双方再次进行谈判, 以中共代表提出的 11 项建议为基础进行讨论。国民党代表因无准备, 陷于被动, 只是空言中共的会谈方案“成见过重、矛盾尚未消除”, 特别对军队改编与解放区的处置办法感到距离甚远, 难以接受。但又提不出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周恩来一再询问下, 张群将一份国民党方面, 根据蒋介石的“谈判要点”而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交给中共代表。其要点如下: (1) 实行和平建国方针和三民主义, 均为共同必遵之目的, 民主与统一, 必须并重。(2) 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承明白表示, 甚佩。(3) 承认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 承说明“长期合作和平

^① 《重庆谈判资料》,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154—156 页。

^② 《重庆谈判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92 页。

建国”之旨，甚佩。(4)“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政府至多只能允诺对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可依其能力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5)惩治汉奸，必须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要用妥慎办法。(6)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7)武装冲突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只靠空运，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8)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自无问题。(9)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与其他党派商定；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10)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于依令编组后实施；北平行营主任不宜由中共推荐，不宜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规定。(11)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①张群建议，“双方对于理论商讨，可以告一结束，今后应讨论具体问题。”周恩来表示，将根据对方之答复，加以研究，“其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9月10日至12日，双方代表着重商讨了政治会议、国民代表大会、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及承认解放区等问题。双方说明了各自的立场。对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先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项达成协议。

15日，双方在商谈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事推选、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等问题时，各持己见，分歧很大，未获结果。19日，中共代表首先提出方案，作出让步。关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

^①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160页。

缩编的比例，赫尔利提议中共军队占 1/5，中共再让步到 1/7，如国民党缩编到 120 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 20 个师。中共代表表明愿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 个解放区之军队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部队集中于鲁、冀、察、热、晋、绥及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其省市领导人由共产党推荐充任。国民党代表表示，对中共新方案甚难考虑，请示蒋介石后决定。在 21 日会谈中；中共代表指出，“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平等的对待中共，必将引起我党的愤怒！”建议用民选办法解决解放区问题。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顽固立场，不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坚持要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军队，致使中外瞩目的两党谈判停顿不前，陷入僵局。原草拟的会谈情况公告，也未能发表。

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多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谈判之外，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会晤。

毛泽东在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庆祝大会、在国民参政会、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张治中将军等人举行的盛大宴会时，发表了演说与致词，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许多旧朋新友握手言欢，赞扬毛泽东的政治风度。国民党左派人士冯玉祥将军和覃理鸣先生等激动得热泪盈眶，为国共和谈的成功期期所望，欣喜不已。

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拜会宋庆龄，对她信守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革命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此外，几度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进行会谈，向他们介绍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与国共两党谈判的方案，表示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听取他们对国事的建议与意见，得到了民盟的支持与帮助。毛泽东与周恩来还会晤了郭沫若、章伯

钧、谭平山、罗隆基、章乃器、柳亚子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及社会贤达，增强了友谊与合作。中共代表还会见了教授、学者、文化界、产业界及妇女团体的代表，向他们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彼此交换了意见，增强了相互了解与信任。

为了争取国民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理解，减少谈判的阻力，毛泽东与周恩来还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进行了互访，宴请与会晤。会见的主要有孙科、于右任、居正、戴季陶、陈诚、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吴稚晖、吴铁城等。分别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及和平建国的主张，指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提醒国民党要认清形势，顺应时代，以人民利益为重，接受历史的教训，勿再重蹈过去十年内战的覆辙。国民党一些顽固分子，也不得不惺惺作态，愿为两党谈判的成功“尽心效力。”

毛泽东与周恩来还与一些外国人士进行了接触和会晤。先后会见了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驻华大使，就国际及中国国内形势、国共和谈的情况交换了意见，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增进了理解。与此同时，还招待与会晤了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美国国会访华团团长史奈德、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及日本反战进步作家等。中共代表还举行茶会，招待了外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感谢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和解放区的诸多援助。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三位士兵见到了周恩来，表示了对解放区与毛泽东的敬仰。随后毛泽东邀请他们作客，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三位美国士兵赞颂毛泽东“是真正的人民领袖”，表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真正的友谊。”中共代表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先后对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了谈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重大问题的立场和方针、政策，澄清了社会舆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和战场上的斗争相互配合的。蒋介石集团的和平骗局在谈判桌上被揭露以后，便在会谈之外策划内战升级，试图用武力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其在谈判桌上屈服，或者用武力捞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国民党军伙同日伪军，在粤、苏、浙、皖、鲁、晋、绥、察、冀等省纷纷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从一个旅到几个军规模的进攻，使许多从日寇手中收复的失地又告沦陷，或被国民党军所攻占，使人民武装与解放区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各路进犯，尤其是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 3 万余人，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极大的震动，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使蒋介石企图用军事冒险扭转政治局势对其不利的阴谋受到挫折。

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已引起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则趁机诬蔑“共产党没有诚意”，妄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转嫁给共产党。赫尔利也撕下调解人的假面具，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解决“很多的具体问题”，要回美国述职，借此向中共施加压力。各界人士也对谈判焦虑不安，纷纷发表声明和呼吁，要求实现国内和平，反对内战；恳望国共和谈以团结、民主、和平为目标，顺应历史潮流，接纳人民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不容许再有任何战祸发生。成都文化界 200 余名著名人士发表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指出：内战的根源是存在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废除一切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指出：“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即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³⁷ 名留美中国

学生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张澜，呼吁用和平的方法制止内战危机。加拿大加华联谊会等9个团体也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要求防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完成民主联合。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促成国共和谈成功，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和强大的社会力量。

由于蒋介石骗局的破产和军事进攻的失利，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9月27日至10月5日，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及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进行谈判。在商谈时，双方通报了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人员。共产党方面为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裴，以商谈整编的具体事项与实施。关于政协会议问题，双方意见接近，同意举行，而解放区问题仍未解决。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整理成会谈纪要，将已经达成协议的和意见接近的事项，议决发表，以解人民之渴望。将尚未达成协议的问题，留待双方继续会谈，或提交将来召开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去决定，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10月8日，双方代表就中共代表起草的《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共同认为协议结果应有最后的约束力。翌日，蒋介石仍要中国共产党改变国内的方针、政策，放弃军队与解放区，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解放区与军队这两个根本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与中共谈判代表，在风紧云沉的时局下，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43天的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包括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二）关于政治民主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

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在召开日期、国民大会代表及“五五宪法草案”^①等方面未获协议。双方同意将此问题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 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以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 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今可即行承认。

(六) 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 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准备自行办理。

(八)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九)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军队缩编为 24 个师至 20 个师的数目，并迅速将广东、浙江、苏南等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上述地区应整编的部队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方面表示愿商谈详细办法。双方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第 18 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强调政令必须

^① “五五宪法草案”，是蒋介石于 1936 年 5 月 5 日颁布的一个宪法草案。形式上采用了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主张，实质上仍是保持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宪法草案。

统一，对中共所提解决方案均未接受，双方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政府方面对中共所提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要求，允以“依法律行之”和“妥慎办理”。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政府方面对中共所提“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的要求，表示“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这个《会谈纪要》于10月12日公开发表。

10月11日，毛泽东、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重庆飞返延安，在机场受到2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作简短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存在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次日，王若飞、张治中返回重庆。周恩来、王若飞留驻重庆，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会谈。

三、重庆谈判的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的谈判，是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定，对于推动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共双方签署的《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取得的主要成果。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和全国进步势力的政治压力下终于作出了一些承诺，接受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这就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新华日报》在10月12日的社论中指出：“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日，重庆《大公报》在社评中指出：《双十协定》的正式发表，使国家的命运有极大希望，“解决现实，奔赴理想，还待大家继续努力”。“请努力向民主开步，这是毫无危险的坦途。”

《双十协定》的签订与公布，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一个监督。许多群众团体在报刊纷纷发表言论，忠告国民党当局，现在“有了要求自由的成文依据”，“尤望坐言起行，一新国人耳目”，“凡已决定的问题应立即执行”，勿再“玩弄技巧”，“贻误国事”！毛

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①

重庆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极大诚意。在内战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渝，力争和平，揭露了国民党图谋坚持独裁专制的真实面目，使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大度与诚意，对谈判的认真与负责，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谈判中，中共代表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鲜明地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等一系列重要主张与措施，并作出许多让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原则立场。《解放日报》在10月13日的社论中指出：“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为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中共代表在谈判中的极大诚意和发挥的主导作用，是推动两党谈判取得初步成功的重要因素。

通过重庆谈判，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同中外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做的大量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愈益扩大，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同情与支持，推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59页。

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①

第二节 反击国民党军向上党地区的进攻，配合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受降”为名调动军队向解放区推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遵从蒋介石的意图，以主力一部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通过对晋东南地区的占领，分割太岳、太行解放区，恢复其在山西的统治。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在上党地区一举歼灭了进攻的国民党军，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

一、上党战役前的形势

（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基本情况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全国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它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抗日根据地。这个战略区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东抵津浦路，与山东解放区相邻；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邻；南至陇海路，与中原解放区相邻。境内西部有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东部为冀鲁大平原。平汉铁路贯穿解放区中央，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

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抗战胜利时，已控制了80多个城市，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原来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并成立了统一的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以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58页。

放区经过抗战锻炼和减租减息等运动，人民已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封建势力已大为削弱，建立有较健全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对日伪大反攻中所解放的新区，正在进行建立政权、肃清汉奸等工作。

为适应斗争需要，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全区军队近30万人，民兵已发展到40万人左右。在抗日战争后期，这个区的主力部队均分散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各根据地作基干团，进行游击战，对日大反攻开始后，才逐步集中作战，但编制仍不充实，多数的团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区仅有6门山炮；半数的团仅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数挺；半数的团则没有重火器；新参军的战士多使用刀矛，弹药奇缺，不少的步枪只有子弹数发。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下，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大批军队，以受降为名，向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推进，企图先取平津，继夺东北，控制各大城市和交通线，然后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晋冀鲁豫区的任务是：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该区的进攻，阻止或迟滞其沿同蒲路、平汉路北上的行动，以协同友邻打破国民党迅速进占平津的企图；同时，继续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据点，控制铁路线，继续扩大解放区。

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8月10日开始对日大反攻。其中太岳主力在平遥、介休地区作战，太行主力在沁县、武乡地区作战，冀鲁豫主力在开封、新乡地区作战，冀南主力在平汉路东侧作战。至8月25日，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约30个城市，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创造

了广阔而有利的战场。

（二）阎锡山调集重兵抢占上党

上党地区是指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等 10 余县。战国时期，韩国在这里设置上党郡，故名。这里东据太行，西临太岳，清漳、浊漳、沁水紫流其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 月，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部撤离晋东南，上党地区相继沦陷。后来，经过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才在这里的山区逐步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当时的上党地区，分属太行、太岳两行政区管辖，统归晋冀鲁豫边区领导。

偏安于晋西一隅的国民党军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时时刻刻都想把上党地区控制在他的手中。1943 年他勾结日军，派出梁培璜的第 61 军和史泽波的第 19 军在浮山一带，开辟所谓“汾东政权”，企图把那里的八路军和人民政权赶走，建立他自己的立足点，并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夺取上党地区。1945 年初，日本侵略军的失败已看出端倪，2 月中旬，阎锡山召开“同志会”第四次基干会议，研究和部署在抗战结束后抢夺胜利果实问题。随后，派第 7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任汾东领导小组主任之职，坐镇汾东，积极为抢占上党做准备。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准备无条件投降。阎锡山根据蒋介石 8 月 10 日的命令，决定以第 8 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主力分两个梯队抢占太原；以第 13 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率 2 个军抢占临汾、运城；以第 7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抢占上党。后因赵承绶要赴太原与日军联系，组织开设前进指挥所，抢占上党地区的任务乃由第 19 军军长史泽波执行。

8 月 11 日，史泽波率第 19 军暂编第 37 师（师长杨文采）、第 68 师（师长郭天辛），附第 69 师（师长赵向斗因病由周建祉代）、暂编第 38 师（副师长徐其昌）、第 2 挺进纵队（司令白映蟾），以

及第5行政区所属保安第5、第9团等部，共1.7万余人，由浮山县东张一带出发，至8月23日，占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地方人民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

阎锡山部侵入上党6城后，一面着手建立政权，一面增修工事，加强守备，以暂编第37师、第68师（欠1个营）、第69师（欠1个营）约1.1万人守备长治；以暂编第38师第1团及地方团队一部守备襄垣；以暂编第38师（欠第1团）附保安第5团一部守备屯留；以挺进第2纵队守备长子；以保安第5团主力及第69师第205团1个营守备壶关；以第68师第203团1个营守备潞城^①。企图巩固其对上党盆地的占领，并相机向北延伸，打通白晋线，以实现扩占整个晋东南的计划。

对阎锡山的“接收”行动，蒋介石甚为欣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特转蒋介石电令，对该战区“收复太原及各县军事进展之速特宣示嘉奖。”^②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表面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背后却命令它的军队加紧向解放区进犯，试图以军事政治两手迫使共产党屈服。阎锡山部侵占上党地区，正是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一个步骤。

二、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反击阎锡山部入侵上党的方针、部署

对于国民党军的挑衅和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坚决予以反击。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

^① 《第2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绥靖第一年战史》第2册“长治会战作战经过概要”。

^② 《第2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绥靖第一年战史》第1册《第一篇总说》。

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斗争作了如下部署：“（一）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二分区协助赵尔陆部夺取正太铁路，重点置于祁县、太谷段。七、八两分区继续向道清路^①进击，消灭伪顽造成配合冀鲁平原主力包围新乡。（二）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三）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以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适当基干兵团，拔除平原根据地内敌伪据点，逼敌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8月28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锡山进入长治部队”。重庆谈判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力争和平，一方面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军事进犯，以自卫战争配合谈判，争取和平。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晋冀鲁豫军区对反击国民党军阎锡山部进行了认真准备。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自8月25日由延安飞返太行后，立即了解情况，分析敌情，讨论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解放区问题。

此时，晋冀鲁豫解放区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阎锡山部入侵战略要地上党，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犹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背部插上了一把刀子；全区10余万日伪军还盘踞着主要公路沿线的100多个城镇，继续抗拒八路军，准备接应国民党军北上；向华北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其先头部队第1战区胡宗南的2个

^① 道清路，指河南道口（今清县）至清化（今博爱）的铁路线。

军经风陵渡已进抵运城以南；第11战区孙连仲的3个军经豫西向郑州集中，正准备向北推进。因此，阎锡山部侵占上党，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迅速消灭，待国民党军主力北上时，将腹背受敌。中共中央军委赋予晋冀鲁豫区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沿同蒲、平汉方向的进攻。特别是平汉铁路是南北交通干线，可能成为进攻的主攻方向，更应加强对平汉线的控制。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之后，决心集中力量先消灭上党之敌，而后视情况将主力转到平汉线或同蒲线，以粉碎北上国民党军的进攻。8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向中央报告了全区的作战部署，其要点是：（1）决定集中太行主力、太岳部队及冀南部队共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进犯上党之敌。（2）冀鲁豫部队留一部继续在延津、封丘地区活动，威胁开封，破坏陇海铁路，以主力部队转向平汉线，扫清新乡以北平汉线两侧之国民党军。（3）估计完成上述任务需要1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会同冀鲁豫主力及太行部队控制平汉路更长一段，相机夺取新乡或迎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太岳部队加紧同蒲路的破路。上党战役完成后，太岳主力转向同蒲线。

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和巩固根据地，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各地区领导干部，实行前方后方的分工，以战争为中心，前后兼顾，大力动员人民参战，扩大主力部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协同军队破坏铁路交通线，以迟滞国民党军北上。

8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9月4日又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

9月初，在刘伯承、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上党战役作了具体部署。根据阎锡山第19军等部孤军深入、分散守备的弱点，以及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的兵力、装备等情况，确定采取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援兵，力求在运动中歼其主力，而后再攻取长治的作战方针。在兵力的部署使用上，确定在逐个夺取外围各城时，轮流以主力兵团一部担任攻城任务，以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许外围各城守军向长治集中，而以其余主力兵团集结于机动位置，准备歼击长治援兵。为防止第19军史泽波部向北打通白晋线，决定先从北面打起。

为打好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认真进行了战前准备：(1)为适应作战需要，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参战部队组成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冀南纵队。太行纵队下辖第2支队（第13、第30、第31团）、第3支队（决死第9、第14团、警卫团）、第4支队（第769、第34、第51团），共9个团；太岳纵队下辖第25、第38、第772、第17、第20团和士敏县独立团，共6个团；冀南纵队下辖第1、第11、第22、第23、第25团，共5个团。^①此外，还以第17师（1945年7月起义的国民党军第38军第17师）和太行、太岳军区之韦杰支队（第5、第41团）、石志本、于一川支队（第32、第37、第46团和长子独立团）及5个县独立营配合主力参战。总计参战兵力3.1万余人。各部队准备在战役进行中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和边以俘虏之人员、装备补充自己。(2)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号召解放区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还亲自到虎亭、下良一带看望准备参战的太行部队，并对两个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部队知道毛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都为

^① 《上党战役我参战部队实力统计》（1945年9月），见第二野战军《资料选编》第一卷第27—28页。

毛主席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①

(3) 开展了战前练兵。9月1日，太行军区一部和第17师解放了位于长治北面的襄垣县城后，军区立即总结了襄垣战斗经验。9月5日，发出了战术指示，对攻城战斗准备、接敌运动、登城战斗、登城成功后的发展进攻等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并在襄垣城进行实弹演习，研究了攻城和巷战的经验。(4) 组织地方政府以专、县级领导为首的后方指挥部和动员5万多民兵、自卫队参战和支前。其中许多民兵组成营（连）担负作战任务，自卫队则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担负战勤任务，许多妇女、儿童则为参战部队做鞋磨面、站岗放哨，担负后方支援任务。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不但鼓舞了参战部队士气，增强了战斗力，而且还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和后方的安全。

三、上党战役经过

(一) 战役第一阶段：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

1945年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作战字第一号命令》，第一步计划先夺取位于长治西北面的屯留，吸引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公路上以运动战消灭之。具体的作战部署：以太行部队攻击屯留及上村据点，吸引长治之敌来援；以太岳纵队进至屯留以南之李坊村、北常村，准备于长治阎军向屯留增援时，向长屯路上之双塔、崔邵村段出击；以冀南纵队进至长治西北之南岗上（不跨白晋铁路），于长治阎军出援时，向长屯路上之崔邵村、禄村段出击；以韦杰指挥第5、第41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为独立第1支队，战斗开始前隐蔽集结于老顶山东侧后斜面，准备尾击由长治出援之敌；以石志本、韩卫民、黎锡福、邓仕俊指挥第32、第37、第46团、长子独立团及4个独立营为独

^① 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见《刘邓大军征战记》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立第2支队，监视长子、草房各据点之敌，并准备以主力投入歼击长治援兵的作战；以鲁瑞林指挥潞城独立营及人民武装为独立第3支队，监视潞城之敌，并准备打击其出援部队；对壶关敌人则仅以地方人民武装围困。

9月10日晨2时，太行纵队向屯留之暂编第38师发起攻击。长治守军出动6000余人于11、12日两次试图向屯留增援，因畏惧被歼，故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12日，太行纵队攻克屯留，全歼暂编第38师第2团和保安第5团一部，暂编第38师副师长徐其昌只身逃脱。

9月13日夜，刘、邓以太岳纵队攻长子，以太行、冀南两纵队隐蔽于长治、长子公路以北，以独立第2支队隐蔽于该公路以南，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国民党军。但长治守军不敢出援。打援意图又未实现。刘伯承、邓小平当即决定暂时放弃吸打援敌的计划，令各部迅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长治守军。9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歼灭第68师第203团1个营；9月19日，太行部队攻克壶关，全歼保安第5团；同日，太岳纵队攻克长子，歼灭挺进第2纵队2000余人。至此，连同9月1日进行的襄垣战斗，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取得连克5城、歼守军7000余人的胜利。

（二）战役第二阶段：围攻长治，迎歼援军

上党战役发起后，阎锡山深感该方面兵力薄弱，9月15日决定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军（辖暂编第40、第46、第47师）、第83军（辖暂编第49、暂编第50师、第66师），附炮兵两个团，火炮24门，另省防军一部（省防第3军第8师及省防军第2军第5师第13团），组成援军集团，向长治增援，企图配合守军相机歼灭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于上党地区。

因上党方面告急，彭毓斌率第23、第83军及炮兵部队，经集结补充弹药、给养后，由祁县东观镇经白晋铁路先行南下，省防军由省防第3军军长杨诚率领随后跟进。这时的白晋铁路还能通至沁县。彭毓斌率领第83军乘火车向沁县前进，第23军则分成

左右两个纵队沿白晋路两侧徒步行进。时值晚秋，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洪常发，不但徒步受阻，就连火车也不时发生故障。下级军官和士兵没有雨具，整天泡在泥水中，而且士兵除带自己的弹药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一部分，负荷量很重^①。他们“行进十分艰难，计每日行程仅十余公里，又因给养无法携带，必须沿途购买……，到处人物皆空，给养无法补充”，^②在食宿交困的情况下，官兵士气低落，怨声载道。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连续攻克长治外围各城后，决心集中兵力乘胜夺取长治城。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日军侵华期间第36师团的驻地，是个重点设防的城市，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国民党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主力3个师据守，其兵力部署：以第69师防守东城，第68师防守西城，保安第9团防守北城，暂编第37师防守南城。时值连日倾盆大雨，地面泥泞，爬城不便，对于缺乏炮兵的攻城部队，要攻下长治，比攻取外围5城困难得多。但是如果不能迅速攻下长治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久留上党，则平汉、同蒲的大门洞开，国民党军主力将长驱直入平津，战略上对八路军极为不利。9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出了《作战字第五号命令》，指出：我决以勇猛速决的动作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敌。决定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歼灭之。攻城的具体部署：以冀南部队并指挥潞城独立团进攻东关至南关段，入城后则消灭沿东城墙长方形内之敌军；太行部队（缺第2支队，另附石志本、于一川支队），进攻长治南关，入城后则消灭西南隅方形内之敌军；太岳部队进攻长子门至北关段，入城后则消灭西北隅方

① 曹近谦、翟品三：《上党战役阎锡山援军覆没记》，载《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54—55页。

② 《第2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绥靖第一年战史》第二册，“长治会战作战经过概要”。

形内之敌军。命令还规定，各部队于9月23日前，首先消灭长治城外各据点之敌，24日22时正式攻城。

9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开始合围长治城。各部队克服连日阴雨的困难，持续向守军攻击，至9月24日，占领城关据点多处，但史泽波指挥所属拼命顽抗。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一）阎顽之四十九师、六六师、五十师于二十二日由子洪镇南进，计二十四日可抵沁县城。该顽增援上党固守，或是救出十九军、六十一军残部出险，其企图尚不明。（二）提议仍以一部积极围攻长治，主力部署于虢亭、夏店、屯留地区，乘其在运动中首先消灭阎之增援部队，被困于长治之敌亦可消灭。”

为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部队继续进行攻击，并不断扩大攻城声势，以加剧长治守军的呼救，促其催援军继续南下，以便创造歼灭援军的有利条件。

由彭毓斌率领的援军，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26日到达沁县。稍事整顿后，以第83军为第一梯团，以第23军为第二梯团，沿白晋线两侧地区继续往长治方向开进。

刘伯承、邓小平判明彭毓斌部的行动企图后，于9月28日下达了《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决心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法，将援军歼灭于常隆、上村镇地区，同时准备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具体部署：以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死队第1旅全部及石（志本）于（一川）支队继续积极佯攻长治，吸引第83军向长治急援；以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2支队（缺第30团）、第4支队及第17师为打援部队之右翼队，于29日11时集结于北村、中村、南村、上下葛家庄一带，在援军先头部队进至上村镇时，由东向上村镇至吴家庄段进行攻击；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第386旅及太行第3支队为打援之左翼队，于29日10时前进至屯留以北之前后董庄、姜家庄、栗村地域集结，于援敌先头进至上村镇及右翼部队投入战斗后，向铺草沟、常隆镇及其以北地带实

施突击；以第30团为独立支队，隐蔽集结于襄垣以西之南田章、北田章地域，当援敌后尾超过夏店时，由北尾击南援之敌。总计打援兵力约2万人。

担任打援任务的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冒着滂沱大雨兼程北进，按时到达指定地区集结待命。

从虢亭到长治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旧时从太原到上党的大道，通过虢亭以南老爷岭、磨盘脑之间的关上村，经余吾镇、屯留到长治；另一条是新修的白晋线，在老爷岭、磨盘脑以东，由虢亭经夏店、常隆、上村到长治。彭毓斌原计划到虢亭后继续沿白晋线南下长治，但他怕在白晋路两旁遭到伏击，加之从沁县至虢亭又耽误了路程，而阎锡山一再来电催促迅速南进，9月30日临时决定离开白晋线，从虢亭渡过漳河，沿虢亭至屯留的大道直趋长治。他认为这样就能“以山为依托，既保险路程又短。”^①

刘伯承、邓小平获悉彭部改变南进路线后，立即变更部署，将打援部队主力向虢屯公路两侧转移，改以第17师及独立支队尾击援军。

10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打援主力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与援敌遭遇。刘、邓当即决定主动放弃老爷岭阵地，诱其继续前进，令打援主力向援敌两侧迂回。右翼太行第2、第4支队向磨盘脑、王家渠进击；左翼太岳纵队第386旅和太行第3支队向老爷岭、顺坡上进击；同时，令尾敌前进之第17师和独立支队向南展开攻击，将彭毓斌部合围于老爷岭、西洼、磨盘脑、榆林地区。

彭毓斌发现被围后，即令部队停止前进，就近占领阵地，组织防御。以第83军3个师在磨盘脑、老爷岭之间的关上村占领阵地；以第23军之暂编第47师附暂编第40师第2团占领第83军

^① 曹近谦、翟品三：《上党战役阎锡山援军覆没记》，载《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56页。

右翼的老爷岭；以第23军之暂编第46师占领第83军左翼的磨盘脑；暂编第40师第3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麁亭方向的警戒。彭毓斌一面令进入阵地的部队加紧构筑工事，严密防守，待机出击；一面连电阎锡山再派兵增援。阎锡山即令正在南下的省防第3军加速前进，增援彭毓斌部。

被包围于关上的国民党援军，恃其机枪多，炮兵强，火力猛，又控制着磨盘脑、老爷岭几个制高点，拼命顽抗。打援部队多次攻击未果。为避开彭部火力优势，各部队主要利用夜间，凭手榴弹、刺刀向国民党军占领的要点突击，白天则组织兵力火力抗击敌人的反扑，并借此消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和弹药。太岳纵队第20团还机智地从老爷岭一侧迂回，抢占两个山梁，切断了山上守军同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占领了北山水源。

经过数天激战，援敌部分被歼，被迫步步收缩，最后猬集在磨盘脑、老爷岭及关上地区。他们携带的给养，已消耗殆尽，整个部队被困在山上，既缺粮，又缺水，饥疲不堪，军心动摇，已陷于既不能南援又不能固守的困境。这时，刘、邓查明彭毓斌所率援敌连同随后跟进的省防军在内共2万多人，与打援兵力相当。为加强打援部队的兵力，刘、邓乃下令从围困长治的部队中，调冀南纵队（6000人）作为后续力量，投入打援战斗，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城。并令冀南纵队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增加援敌的动摇。为避免彭毓斌部作困兽之斗，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即在北面敞开一个口子，虚留生路，争取在运动中歼灭之。乃令第17师及独立支队分别协同左翼与右翼部队，猛攻守军阵地两翼的制高点磨盘脑与老爷岭主峰，迫其脱离阵地北逃。

10月5日，左翼部队攻克老爷岭主峰，守敌于夜间向北突围。由太岳纵队第20、第25团组成的一支迂回部队已提前抢占了麁亭以北土落村附近的制高点，堵住了突围之敌北逃退路，打援部队主力则沿麁屯公路及两侧进行跟踪追击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彭部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由省防军第3军军长杨诚率领

的 5000 余人，从沁县匆匆赶来，未及参战，即被溃军冲散，官兵各不相顾，夺路而逃。除 2000 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援军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第 23 军军长孙福麟、第 83 军军长许鸿林只身逃脱，暂编第 40 师师长武世权率残部逃回沁县，炮兵司令胡三余、暂编第 46 师师长郭溶、第 66 师师长李佩膺、暂编第 49 师师长张宏等大批官兵被俘。

（三）战役第三阶段：追歼长治突围之国民党军

彭毓斌率领的援军集团被歼后，阎锡山令被困在长治的史泽波立即率部突围，撤回临汾。

10 月 8 日黄昏，史泽波率部分左、中、右三路乘夜暗从长治向西突围，企图横穿太岳根据地，经浮山逃回临汾。

为全歼长治突围之第 19 军，刘伯承、邓小平除令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急令太岳纵队从虢亭地区直出沁水之马壁，控制沁河，进行兜击。太岳纵队接到命令后，即以第 772 团经后沟、良马镇，在马壁村控制沁水，截击第 19 军的先头；纵队主力则经郭庄直插将军岭、桃川地区。太岳地区的人民武装得知长治之国民党军突围西逃后，也在沿途进行截击。各部队在“拼命抓住敌人”的号召下，忍受饥疲，日夜奔驰，终于 10 月 12 日在沁河以东之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截住了逃窜的史泽波部。下午 3 时，太岳纵队等部发起总攻，6 时即结束战斗。从长治突围的万余人马，除少数先头部队西逃外，其余全部被歼，第 19 军军长史泽波、第 68 师师长郭天辛、暂编第 37 师师长杨文采等被俘。

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 3.5 万余人，其中生俘 3.1 万余人，缴获山炮 24 门，机枪 2000 余挺，长短枪 1.6 万余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伤亡 4000 余人。

四、上党战役的意义和作战基本经验

上党战役是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战役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起

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17日，即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第5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在上党战役中，重创了阎锡山的实力，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阎锡山数年来在晋西培植起来的所谓“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中，被歼3万余人，约“占其总兵力三十五个师九万人的三分之一”。^①有人讥刺阎锡山：“上党一战，实力损失一半。”上党战役后，阎军不敢再犯晋东南，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得到进一步巩固，使军区主力能集中兵力对付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上党战役的胜利，大量补充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装备与兵员，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上党战役后，军区进一步补充与整编了野战兵团，编成了第1、第2、第3、第4纵队，并以上党战役缴获之火炮组建了炮兵部队，使全区部队向正规兵团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从而加速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打的第一个歼灭战。在战役中，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经30余天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部歼灭。基本经验是：首先，在全区军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使广大军民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所持的基本立场，牢固树立敢于

^① 中共中央致重庆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10月16日）。

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坚持以军事斗争配合谈判斗争，以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样，就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形成了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次，坚决贯彻毛泽东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通过巧妙的机动兵力，充分发挥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作用，确保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优势，并利用夺城打援、围城打援、迫敌突围等手段，争取歼敌于运动中。第三，边打边建，边打边练，边打边补，以战教战，使人民军队越打越强。第四，“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县书、专员、县长均亲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①，使参战部队的给养得到保障，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输迅速，这是取得上党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在其“国防部”编纂的《戡乱战史》中，在总结“上党作战”中记述：“上党为晋冀边之锁钥”，“战略之价值甚大”，阎锡山部没能把上党抢到手，“即予匪回窜平汉之机，使华北、华中陷于分离，国军之北上受降，大受阻挠；而黄河以北晋、冀、豫地区之匪，自此连成一片，获得兵力运用之自由，使我豫东、鲁西时受威胁，晋南、豫北无法开展，影响尔后作战，实至深钜。”在检讨上党作战失败的原因时说：“是役我军之失败，实因匪众绝对优势，兵力彻底集中，组织严密，情报灵活，地形熟悉，惯于设伏，故能遂行其各个击破之企图。反之，我军情报不灵，协同欠佳，尤以史军兵力部署过于分散，而对控制部队又未能灵活运用，以致外围据点遭受匪军攻击，即无法出击或增援，处处形成孤军应战，被敌各个击破。赴援部队之行军，对搜索警戒过于疏忽，于山地作战之要领，亦未能把握，故中途遭匪袭击，部队犹多在集结状态中，仓促应战，无法发挥战力，以致陷于挫败。”^②

^①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上党战役给各区的通报（1945年10月15日）。

^② 台湾“国防部”《戡乱战史》第11页。

第三章 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调整战略部署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历史背景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中旬确定了全党全军的任务，即：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财，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猛力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将来阶段，国民党军可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军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根据这一任务，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军民不仅必须占领同蒲路北段、平绥路东段、北宁路、平汉路北段、陇海路东段、正太路、津浦路、胶济路等10余条铁路，还要求：华中局“发动上海市民及近郊游击队实行武装起义，解除伪军伪警武装，占领上海，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晋察冀解放区应迅速布置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地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这些城市。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拒绝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受降。在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同时，企图以军事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想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因此，国内时局

出现了新的情况，面临着实现国内和平和爆发内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共中央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得不考虑改变上述“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战略部署，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这些新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以后，以受降为名，调兵遣将，抢占地盘，收缴日伪资财，收编伪军，并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加紧内战准备，其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依据中苏条约对其有利的规定，出兵占领全东北。据此，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以下步骤：首先，与日伪合流，将伪军收编为“国军”，从1945年8月至11月，将几十万伪军委以第1、第2、第3、第4、第5、第6路军等番号，使之成为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力量。同时令华北、山东地区的日本侵略军约26万人继续保持武装，以“护路队”等名义，抗拒人民军队的受降。其次，在美国海、空军的大力援助和日伪军的接应下，积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接管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宣称：美国第10、第14航空队空运国民党军队接管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这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再次，国民党军按照1945年8月13日的既定部署，由陕西、豫西、晋西、绥西、湖南、广西、安徽等地，于8、9月间，分多路陆续向解放区推进。在华东地区，第10、第11战区部队已进驻蚌埠、徐州、浦口、济南和青岛等地，控制了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企图分割华东解放区。在华北地区，第2战区以7个军分别向晋东南、晋中、晋北发动进攻，企图隔断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第1战区和第11战区在洛阳、郑州、新乡等地集中10余个军，结合日伪军一部沿平汉线、道清线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先后占领封邱、延津、原武、武陟、获嘉、辉县、汤阴等城。第12战区纠集6个军进攻绥东地区，先后占领归绥、集宁、丰镇、兴和、尚义、陶林、凉城等地，进而沿平绥路东进，逼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

家口。中原地区，第5战区以其5个军沿平汉路两侧进犯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并在第6战区配合下，包围了鄂豫等解放区。华中地区，第3战区以其5个军和桂系一部，向苏浙、皖江解放区大举进攻，先后占领江苏海门，浙江的德清、武康和皖东地区之铜城、裕溪口、襄安等城镇。华南地区，第7、第9战区以其3个军向广东东江纵队和粤赣边之八路军南下支队发动进攻，并占领东江以北解放区。此外，蒋介石集团妄图独占东北，向东北加紧调动军队，以便在苏军撤出之后，全部接管东北，从而在战略上形成对关内解放区的南北夹击之势。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华北和南方各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各不相同。抗日战争结束时，华北、华东地区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和华中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经过对日反攻作战，人民革命武装有很大发展。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总兵力已达60万人，民兵103万人，解放区面积已达30.5万平方公里，已具有较好的基础。^①发展较大也较巩固的是晋察冀解放区，不仅据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分地区，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基地，且拥有30余万人民武装和90余万基干民兵。

但是，位于南方各解放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尚未得到广泛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其中鄂豫地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仅有兵力4万人，河南军区王树声部仅有兵力1.8万人，华南广大地区仅有兵力2.7万余人。华中地区的皖中解放区仅有兵力约2万人。这些地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形势下，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纷纷将有关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945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新

^①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实力及解放区面积、人口、政权情况的统计》（1945年9月26日）。

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先后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国内蒋军必四上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我目前全力是抢武器资财，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处于蒋大我小之环境，自己力量分散，……我们当前困难很大。”8月13日和23日，位于河南嵩山地区之王树声部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河南工作是有很大困难与艰苦”；“农村城市的破坏，生产力大减，这影响广大人民与我军生活”；部队无法补充，“现我主力团都是3个连至5个连的小团编制。”8月24日，已进入湘粤赣边之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王首道部，亦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军第7、第9战区之“剿共”，使我行动非常困难，到广东五岭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我们集中的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20天可到达湘鄂边。”8月13日，坚持华中地区斗争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饶漱石等致电中共中央：“我们经过整晚反复考虑，一致认为如果八路军不能南下增援，江南部队又决不退回江北，仅靠江北现有力量，完成占领津浦路东及长江以北一切城市……是颇感困难的”。并建议：“从江南调回两个旅到江北。”9月2日，张、饶等又致电中共中央：“如果皖东反顽战役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或国共谈判对我有利，则巢（县）、芜（湖）地区的坚持是可能的。但我们同时估计到严重形势到来的可能，因此，7师地区（皖中）又应作大部主力转移参战，及部分主力配合地方坚持，极其困难时向大别山挺进。”

上述基本情况表明：欲保卫南方各解放区，必须依托华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支援中原和华中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同时，华北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要抢占东北，势必夺取华北。因此，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便成为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要目标。

东北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国民党蒋介石所丢失，至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它要很快控制东北比较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同日

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至 1945 年 8、9 月间，配合苏联红军迅速进占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延吉、沈阳等 57 个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9 月中旬，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由周保中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并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北安、牡丹江、吉林等地分设了自卫军指挥部。部队发展到 4.8 万余人。随后，自卫军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恢复共产党组织，建立地方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次，东北的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北三省拥有 120 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和 3400 余万人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 9 省。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据抗日战争后期有关资料统计，铁矿蕴藏量为 38 亿吨，煤的蕴藏量为 228 亿吨，煤产量占全国的 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 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 90% 以上。各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的矿藏，质量好而且储量可观。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 1.4 万余公里，公路 10 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 1/2，其密度居全国之首。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 3273 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 55%，出产 50 种以上的农作物，粮谷年产量达 2000 万吨，大豆产量居全国之冠，加之林业资源遍布延绵起伏的长白山和兴安岭，故东北素有“谷仓”、“林海”之称。在地理位置上，东北背靠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并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些情况说明，东北地区无论政治、经济状况或地理位置，均处于优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能控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不仅便于生长和积蓄力量，粉碎国民党占领东北的企图，而且还可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对于支援与配合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表明：东北地区条件较好，又没有国民党军队，苏军进入东北后仅占领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而广大地区多为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国民党的势力也比较薄弱，其大量军队在短期内难以到达。因此，争取东北实为难得的有利时机。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浙东、苏南、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鄂豫、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依据这些新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原定的“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方针已无实现可能，只能“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5年8月22日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了《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方针”，“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巩固解放区”，各党委各军区应“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开始酝酿和准备将分散于广东至河南的一些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逐步撤离南方，集中力量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两省，并巩固华北与山东解放区，坚持华中解放区。

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形成

中共中央对撤出南方几个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纵队和全力争取东北问题，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酝酿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关于撤出南方几个根据地问题，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重庆谈判中“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要看看。这些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只有作此让步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赢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

时，中共中央估计到国民党统治中心将由重庆移返南京，南方各解放区必然会遇到更大的军事压力，国民党也将进一步寻找扩大内战的借口。正如毛泽东从重庆返延安后所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让出南方一些解放区非常可惜，但以让出为好。“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们的床旁边，或者在他们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①

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统一，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致电华中局：“全国内战危险虽然极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到江北的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华中局关于江南主力迅速北撤时，留一部主力及地方兵团（约1.4万人）坚持江南斗争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浙东与皖南部队及党政应全部转移（只留秘密工作者），留一部坚持有被消灭危险。苏南部队如要转移，第一步转移主力，第二步亦需全部转移。”此外，中共中央还于9月7日和11日，分别致电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要他们在目前处境困难情况下，迅速与新四军第五师靠拢。中共中央关于主动撤出南方一些解放区的决策，除为和谈作出让步外，着眼点是集中兵力，摆脱被动，以利应付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

关于争取东北，在抗日战争末期，中共中央就有所考虑。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作结论时即指出：“东北四省极为重要，有可能在我们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就有了胜利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领导，必须预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59—1160页。

“没有预见，没有领导，没有胜利，没有一切。”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为开展对日的大反攻，开辟东北根据地，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晋绥、晋察冀、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立即派部队进入东北。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为了先机控制东北，决定派部队参加东北地区的对日反攻。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吉林进发。”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指示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分局：除吕正操、张学思所部仍就地执行当前任务外，“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抽调9个团开赴东北，并于8月20日向晋察冀中央局和山东、晋绥分局发出指示：“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2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1个团，冀中调1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北三省”；“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

中共中央在发出上述一系列指示的同时，考虑到东北地区由于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和苏联根据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对于派部队开赴东北，能否顺利达成？能否得到苏军支持和同情？能否很快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目的？尚待进一步观察。正如毛泽东于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的：“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派干部去是正确的，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有可能不能去。”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红军占领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是可以去，必

须去”。“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作”。同日，中共中央又决定，除晋绥军区部队 3 个团因晋绥战事频繁仍留原地执行任务外，其余晋察冀、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已确定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迅即向东北开进，并派出人员深入东北作实际侦察，与苏联红军进行洽谈，为部队开进东北创造良好条件。

遵照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已确定进军东北的各部队，即陆续向东北挺进。8 月中旬，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以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进入东北的部队分编为东、中、西三路进军的先遣部队。17 日，各路军在李运昌指挥下开始向东北进发：东路部队以第 16 军分区之第 12、第 18 团合计近 2000 人，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下，从冀东抚宁地区出发，先后配合苏联红军攻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9 月初进抵沈阳，曾克林任沈阳卫戍司令，唐凯任政治委员。中路部队以第 15 军分区之第 11 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后改编为第 51 团）共 2800 余人编成，在分区司令员赵文晋率领下，从喜峰口出发，经平泉于 9 月初抵达热河的赤峰。西路部队由第 14 军分区之第 13 团和北进支队约 2000 余人组成，在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下，自蓟县地区出发，经兴隆奔赴承德，于 9 月初到达热辽边之围场。9 月 6 日，中央军委命令：“请冀东李运昌组织一个千人以内的侦察支队，附三个电台，派得力干部率领，深入辽宁境内之黑山、辽中、辽阳、康平、清源、岫岩地域，侦察军事与社会情况，特别是苏军未到之地区，并将所得情况随时电告。”9 月 2 日，由山东滨海支队为主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辖第 1、第 2 支队共 3500 人），在司令员万毅率领下，由山东胶县向黄县开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于 9 月 23 日到达黄县柰家口子渡口，尔后分批海运东北。在东北挺进纵队开进的同时，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为了解东北的社会政治情况及登陆场所，派出吕其恩、邹大鹏率一个连 100 余人，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侦察，并将侦察情况于 9 月上旬报告了中央。9 月 6 日，陕甘宁解

放区由张秀山率领的干部 800 余人，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 1 旅、教导第 2 旅各 1 个团，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与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领的干部团会合，总计 3000 余人，随即向东北开进，于 11 月到达锦州。9 月 7 日，冀中军区第 31 团 1500 余人，在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下，由冀中向东北开进。

从 1945 年 8 月中旬到 9 月上旬，八路军、新四军向热河和东北开进的部队已达 1 万余人，从而初步查明了东北的情况，为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并为派遣大批部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为了争取东北苏联红军的支持和同情，通过与苏军的联络，取得了苏军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的一定帮助。9 月 14 日，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随同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曾克林有关东北情况的汇报；朱德总司令和贝鲁罗索夫中校进行了交谈。贝鲁罗索夫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以下几点意见：“蒋介石军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介石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朱总司令当即复信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表示尊重苏联红军意见，将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等地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撤出红军占领地区，同时指出：八路军于抗日战争中在热河、辽宁部分地区创建的根据地，请允许八路军仍留原地。苏军对此表示赞同。

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根据曾克林、李运昌、邹大鹏等部所反映的情况以及朱德总司令和贝鲁罗索夫交谈后达成的谅解，分别于 1945 年 9 月中旬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各

战略区领导人通报了如下情况：

大连地区：“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在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

热河地区：苏联红军官兵在山海关为李运昌部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李部向苏军提出：“准备在热河成立行政公署、专署及军区等，红军答应尊重我之政权及领导机关”，“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之部队均可登陆。”

沈阳地区：“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曾克林部现已发展 2 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 4 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 4000 人，并改编保安部队万余人”；“原在东北作苦工之我八路军被俘人员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部）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由于中苏条约规定，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各省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上的义务，苏联将采取放任态度并给予同情；国民党在东北与热察两省基础薄弱，现在陆路不通，海路和空中运输困难，所以东北的局势对中共发展极为有利，是“千载一时之机”。据此，中共中央进一步确立了“坚决争取东北”和发展东北的决心，并于 9 月 15 日指示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

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争取东北的决心确立以后，于9月中旬一连4次作出相关决定，并分别向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增派部队开赴东北。10日，毛泽东指示山东、冀鲁豫和晋察冀三区：除原定几个团外，“最好能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万一到热后不及或不可能开入，也可留在热河工作。热察两省极为重要，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干部除由延安派去之一千二百人外，还应由其他各区及边区外县抽调东北籍干部继续调回东北。”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进军东北，并指示山东分局：“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该指示还强调：“我军进入东北活动，一律不事声张”，“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15日，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派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工作，并于同日指示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晋察冀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指示最后强调：“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17日，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刘转连、晏福生、文年生、张启龙等率领的由陕甘

守边区挺进江南的南下第二支队（辖警1旅、第359旅一部和由中央机关与中央党校抽调的干部队，总计6000余人），停止南下，挥师北进。该部队此时已进入河南新安县境，在接到中央的命令后于9月下旬开始向东北挺进。

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准备后所确立的撤离南方几个解放区，全力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两省，保卫华北、华中的决心，标志着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已初步形成。

9月17日，中共中央拟订了“关于力争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部署”，并将这一计划与部署电告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内容是：

“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我们有以下意见，请考虑示复。

1、冀察晋军区（除冀东外）的现有力量，只能对付傅作义及将来北平方面对于张家口的威胁及巩固现有地区，不能再有大的力量加强与保障热河和冀东，更无力进入东北。

2、为了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和冀东，对付平、津、唐山一带将来顽军对于热河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至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

3、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

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

4、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

5、我们已决再从延安派一千三百个干部到东北，并将炮兵学校（约一千人）开到东北去。但延安各机关学校，如果只留领导机关在延，其余全部出动的话，尚可派出各种干部四、五千人，这些干部可大批派到冀热辽去工作。但中央书记处现只留三人，如果中央再派人出去（现洛甫、康生、高岗、富春均迫切要求去），则政治局留延者也是少数。但为了工作，许多人是应出去工作的，是否可以组织一特殊的中央领导机关主持全局。”毛泽东与周恩来复电赞同中央意见。

9月19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决策，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指示，并立即下发各中央局。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正式确立。其内容是：

“一、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

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1) 晋察冀（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2) 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3) 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4) 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5) 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内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6)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7) 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中共中央所确立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着眼点是在内战危险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力求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两省，主动撤出南方的一些解放区，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摆脱被动。这一英明而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这一方针是对中共“七大”关于争取东北决策的继续，是毛泽东关于“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一基

本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贯彻。集中力量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辽阔的土地、发达的工业、方便的交通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将东北建设成为主要的战略基地，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军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形成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有利态势。这不仅可以打破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对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包围的局面，而且可以使东北成为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重要基地。

其次，取得了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主动地位。中共代表在重庆和平谈判中，主动提出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国内和平的极大诚意，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人民军队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再次，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大批主力部队将迅速北移，在南方，将分散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兵力集中到长江以北，这就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避免了江南各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局面，从而加强了华北、华东与中原各解放区的力量，使山东、晋冀鲁豫解放区和陕甘宁、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紧密相联，互为依托，并以东北解放区为强大战略基地。这一新的战略布局，为推迟和应付全面内战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第二节 贯彻新的战略方针，调整战略部署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及时而果断的调整全军的战略部署，对各战略区的人民军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动与调整，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部署，迅速转变为既有利于向南防御国民党军任何可能的进攻，又利于保障向东北及热察地区发展的战略态势。

一、抽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部，先机控制东北

自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以后，为不失时机先机控制东北，各解放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向东北增调部队和干部，以加速争取与发展东北的步伐。

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有力的开展工作，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18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抵达沈阳，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并立即开展工作。中共中央除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去东北工作外，相继派遣去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上，再进而夺取和控制南满路沿线各大城市。”须从速成立北满、东满指挥机关，尽早开展工作。

邓华到沈阳后，接替曾克林担任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司令。10月初，组建东满临时指挥部，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军区部队。为了加强对东北已经控制地区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张学思为辽宁省政府主席，朱其文为副主席；白希清为沈阳市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阎宝航为辽北省政府主席；李延禄为合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为嫩江省政府主席。由苏军占领的大连市亦于10月成立市政府，民主人士迟子洋任市长，中共干部担任了大连市公安局等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同时，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部分省市的组织机构，有辽宁工委，陶铸任书记，白坚任副书记；辽北省工委，黎文任书记，顾卓新任副书记；沈阳市委，孔原任书记；安东

(丹东)省委,黄春圃(江华)任书记,刘澜波任副书记;吉林省工委,张启龙任书记,伍晋南任副书记;长春市委,石磊任书记;合江省委,张松任书记;松江省工委,王友任书记;嫩江省工委,刘锡五任书记,朱光任副书记。

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东北人民军队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决定由关内诸解放区陆续进入东北的部队和由东北原抗日联军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第一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1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沈阳正式成立。

自1945年8月开始,由关内解放区奉命调往东北的部队有:

晋察冀军区先期向东北开进的部队,除一部留热河外,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5个团和1个支队,该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2个团,合计4900余人到达锦州、沈阳、本溪地区。由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第31团1500余人于10月上旬到达锦州。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肖华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是进入东北部队的主力。该部分批起程,海陆并进,以海路为主,任务繁重而紧迫。为有效的实施海路运输,由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组成海运指挥部,动员汽船30余只、帆船140余只进行运兵。为了打通海路,消灭和驱逐了烟台附近崆峒岛和蓬莱以北长山列岛上的伪军,还派出部队迅速占领了濒临辽东半岛的外长山列岛,控制了渤海海峡,并在沿途砣矶等若干岛屿设立了兵站,聚草存粮,保障了海运畅通与军需供应。为了掌握辽东半岛和部队登陆地区的情况,中共胶东区党委派人携带电台渡海进入大连地区,将所获情报及时报告了中共中央与山东军区。胶东军区还派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率领4个连队乘汽船

侦察了天津以南海面和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于塘沽、大沽登陆及渤海湾内守军的布防情况，为部队渡海北上，防敌攻击，制定海运计划提供了依据。山东渡海部队选定胶东半岛的龙口和莱家两个渡口出海，在辽东半岛的大连老虎滩及新金县貔子窝（今皮口）与庄河等地登陆。

山东军区主力陆续挺进东北的部队计有：由滨海支队和胶东军区一部编成的东北挺进纵队，以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支队4个团3500人，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地区。肖华率领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及直属部队约1000人，在大连老虎滩登陆，10月初抵达安东。山东军区第5师和第6师各两个团约10000人，在第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的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24日全部进驻营口地区。山东军区第7师在师长兼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率领下，经陆路抵达冀东，10月下旬进驻山海关地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渤海军区3个团（时称刘其人师）进至河北省古北口地区，随后到达东北。以上杨国夫与刘其人部共计6个团连同黄荣海率领的1个营在内，共12000余人。山东军区第2师7500余人，在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的率领下，从海路进入辽东半岛，11月上旬抵达沈阳以南的庄河与鞍山地区。山东军区第1师7500余人，在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的率领下，于11月中旬从陆路抵达辽西锦州地区。山东军区第3师8300余人，鲁中警备第3旅4000人，分别在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警备第3旅旅长胡奇才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亦称田松支队，该支队系1944年郑道济领导的威海伪海军起义部队编成）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从海路到达辽东半岛，11月中旬转赴牡丹江地区。罗荣桓接到赴东北的任职命令以后，11月上旬率军区机关人员及特务团1个营，乘汽船在辽东半岛貔子窝登陆，然后乘火车到达辽阳，13

日抵达沈阳。先后挺进东北的还有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4000人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别进驻安东及沈阳地区。自1945年9月至1946年初，山东军区奉命进入东北的部队，共有8个师（旅），3个支队，合计6万余人。

由华中解放区开赴东北的新四军第3师，在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兼参谋长）的率领下，于1945年9月28日，从江苏省淮安出发，由陆路经鲁南、冀中、冀东北进，于11月下旬抵达锦州地区。该师下辖第7旅6900余人，第8旅7000余人，第10旅8000余人，独立旅6000人，另有师直属特务第1、第2、第3团共7100余人，全师总兵力35000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往东北的部队，有第359旅副政治委员晏福生、参谋长刘转连率领的3000余人，于1945年10月底到达本溪与抚顺地区。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第32团600余人，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1旅与教导第2旅各1个团及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该旅一部3000余人，于11月底到达热河，编入热辽纵队，以后纵队司令员黄永胜率部到达锦州。由陕甘宁边区进入东北的还有延安总部直属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等，合计2000余人，于12月底先后到达通化市。另外，冀鲁豫军区第21团1500余人亦相继进入东北。以上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合计11万人。

从关内各解放区派往东北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一百个团的各级干部），亦陆续抵达东北。总计进入东北地区的部队与各类干部共13万人。

各部队在开进途中，克服重重困难，争分夺秒，不失时机地向东北挺进。从陆路开进的部队，不怕刮风下雨，不畏道路泥泞，在雨具缺乏、衣服单薄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疲劳，兼程北进。新四军第3师从江苏出发，长途跋涉，历时两月，跨越鲁、冀、热、辽数省，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从水

路开进的部队，不怕风大浪险，克服木船颠簸、晕船呕吐等困难，昼夜不停地与风浪搏斗，较好地完成了进军任务。山东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地方政府，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部队北上沿途和渡口，安排了食宿，指定了向导，设立了开水站、鼓动棚，做到有接有送，有力地保证了北上任务的完成。

各部队进入东北以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难。日本投降后，东北日伪军尚未全部解除武装，不少宪兵、警察依然存在，散兵土匪蜂起作乱；国民党抢占“接收”，收编伪匪；一些群众受奴化教育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人地生疏，互不熟悉，武器与人员亟待补充。如来自山东军区的6万余人，携带枪炮仅有2万多件，到达东北前后，又逢榆关失守，锦州告急，困难重重。有的部队在报告中说，部队遇到“七无”：无地方党的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府，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在南满和北满的几个新部队，各有一两万人，他们虽然装备较好，但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健全的政治工作，部队很不稳固。总部机关组建不久，工作效率不高，通信联络不畅，后勤工作更是头绪纷繁，新老部队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

鉴于以上情况，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原在东北的人民自卫军除少数调往北满、东满地区开辟根据地外，多数部队集结在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与西满地区。他们一面搜集武器，补充装备，一面接管城乡、平息叛乱，组建政权。东北人民自治军为加强部队建设，健全军队体制，增强部队团结，扩大人民武装和开辟东北根据地，于1945年11、12月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10个军区，其编制序列如下：

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下辖第27旅、第30旅、第32旅及炮兵旅，约30000人。不久，该军区调归晋察冀军区之冀热辽军区建制。

辽东军区，1945年9月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所率军区

机关及直属队一部到达安东以后，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11月改编为辽东军区。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2纵队，该纵队于1945年11月由原山东军区第6师改编而成，辖第1、第2旅；第3纵队，由原山东军区第5师改编而成，辖第11、第12支队。军区直属部队有：第1支队（由山东蓬莱独立营和山东军区警卫团第1营组成）；第2支队（亦称通化支队，由第3纵队一个连与冀热辽军区一部组成）；第3支队（由安东保安司令部与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团团部及第1营组成）；宽甸警备司令部（由安东军区警卫团一部扩编而成）。全军区共计36400人。1946年1月，辽东军区改为南满军区，部队作了相应调整，将第2、第3纵队合编为第4纵队；原山东军区第3师、鲁中警备第3旅与第16军分区第21、第23旅合编为第3纵队。

辽宁军区，1945年11月底由沈阳保安司令部一部在本溪组建。由张学思任司令员，白坚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3旅（由原晋绥军区第32团扩建而成）；第1军分区（由保安第4旅1个团于11月组成平原军分区，后改称第1军分区）；以海城为中心建立的第2军分区；以抚顺为中心建立的第3军分区以及军区警卫团。全军区共计16000人。

辽西军区，于1945年12月，由沈阳撤出之原辽宁保安司令部一部与公安大队等组建而成。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1旅，工人纵队及第1、第2、第5军分区。全军区共计10000余人。

辽北军区，1945年11月，以梨树地区为中心组建而成。倪志亮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46团及西安（今东辽县）、西丰、海龙、梨树县4个县大队，共计10000余人。

吉林（东满）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长春地区。由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下辖：东北挺进纵队，辖第1、第2支队。周保中部（原东北人民自卫军），辖吉林地区王效明、袁任远部5个保安团；吉东地区姜信泰部8个保安团；吉林、长春、公

主岭、怀德、伊通、德惠地区 10 个保安团。洮东军区，辖洮南、扶余、泰来、安广、洮安县 5 个县大队。全军区共计 38000 人。

松江军区，1945 年 11 月组建于哈尔滨市。由卢东生任司令员，卢牺牲后，由聂鹤亭接任司令员，张秀山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1 军分区（哈东军分区）；第 2 军分区（哈南军分区），由东满临时指挥部第 3 支队组建；第 3 军分区（哈西军分区）；第 4 军分区（哈北军分区）；第 5 军分区（牡丹江军分区）。全军区共计 14000 余人。

嫩江军区，1945 年 11 月组建于齐齐哈尔。由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1 军分区（泰来军分区）；第 2 军分区（讷河军分区）；第 3 军分区（警卫第 1 旅兼）；第 4 军分区（警卫第 2 旅兼）以及洮南、扶余、安广 3 个支队和铁路局护路队。全军区共计 8500 余人。

北安军区，1945 年 11 月组建于黑龙江的北安。由叶长庚任司令员。下辖：第 1 支队（以绥化保安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第 2 支队（以海伦保安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第 3 支队（以北安保安团为基础扩编而成）。全军区共计 8000 余人。

三江军区，1945 年 12 月，由原冀中军区部队一个连队为主在佳木斯扩建而成。由孙景宇任司令员，李范五任政治委员。下辖：特务团、新兵团。共计 2000 余人。另外还收编了散兵游勇和伪军约 7000 余人。

东北人民自治军，除设立上述军区以外，直属总部的部队计有：原山东军区第 1 师、第 2 师、第 3 师、第 7 师、鲁中警备第 3 旅；第 25 旅（由原冀鲁豫军区第 21 团于沈阳以西地区扩编而成）；第 359 旅（由原陕甘宁边区第 359 旅一部，于本溪、抚顺地区扩编而成）；新四军第 3 师，下辖第 7 旅、第 8 旅、第 10 旅、独立旅；第 16 军分区，辖第 21 旅、第 23 旅、第 24 旅、沈阳保安旅等部。随后，第 16 军分区所属各旅分别编入第 3 纵队、东北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 3 师，实行新老部队结合，从而增强了部队团

结，巩固与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45年12月，东北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当局通过向东北苏联红军交涉，使苏军承诺延期1个月撤离东北，并保证将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国民党接收；国民党军继11月中旬占领山海关之后，又以重兵向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占领锦州、义县等城，使东北战局日趋紧张；被东北人民自治军收编的伪军与地方团队，在隐藏于内部的特务、坏分子煽动下，一部发生动摇，先后叛变的有：吉林地区1万余人，合江5000余人，黑龙江3000余人，牡丹江3000余人，松江1万余人，辽北1000余人，嫩江3000余人，热辽地区叛变的也为数不少，合计4万余人，并占据了西满、北满的部分县城。鉴于这种状况，东北人民自治军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除集中主要兵力于阜新、黑山地区抗击国民党军以外，其他部队迅速分散到北满、西满与东满，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奸除霸，改造政权，发动群众，扩大部队，为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设为“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和“后方总部”（简称后总）。林彪率“前总”赴辽西前线指挥作战。此时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27万人。

二、新四军主力北移

（一）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撤苏北与皖东

位于华中长江以南地区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分布于苏、浙、皖等广大地区，坚持敌后斗争，为抗击日寇建立了丰功伟绩。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继续推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对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等部实行封锁、包围和进攻，妄图加以消灭，以除心腹之患。鉴于此情，八路军与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华中江南的大部分解放区进行撤离，将部队撤往江北，或向中心根据地转移，使兵力相对集中，以利于国共谈判，争取和平，摆脱困境，免遭更大

的损失。

中共中央军委为调整华中地区的战略部署，迅速实行国共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所允诺的让步，命令新四军江南部队（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等解放区的军队），撤往长江以北。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提出，且有好影响。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当着民枪存在），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速向山东开进，以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9月22日，中共华中局给各区党委就江南部队准备撤退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我军从江南撤退要在党内外作深入的动员与解释，说明我军主动转移江北，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避免内战，亦为我党我军向北发展所必须。同日，华中局对撤退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与安排。新四军江南部队于1945年10月1日发表了《告全体民众书》，宣慰乡亲，阐明因由，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以人民利益为重，切勿挟私报复，残害爱国同胞。新四军发言人亦对此发表了声明，指出：自江南沦陷以后，新四军深入敌后与日伪作战，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几百万国民，实行了民主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围攻了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等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与团结，不在这些大城市与国民党竞争受降，并将江南部队撤到江北，这种光明磊落的精神，定为全国人民所理解；为了和平、民主、团结，我军不能不满怀痛苦，向几百万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希望加强团结，保护已经获得的民主与经济权利；要求国民党当局，保证我复员士兵，受伤人员，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民众的安全，保证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设施与民主权益，保证撤退地区的中共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人士的合法地位。

9月下旬至10月，位于长江以南，临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域

的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在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指挥下，分批撤往长江以北。北撤的部队有：

第1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辖第1、第2、第3支队）和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辖第7、第8、第9支队与特务团），在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亲自率领下于10月上旬由苏南渡江北撤。

第2纵队（亦称浙东游击纵队，辖第1、第2旅与第3、第4、第5支队），在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率领下，9月30日北渡杭州湾，在海盐、澉浦冲破国民党军的截击后，继续北进。

第4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辖第10、第11、第12支队），在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下，自浙江省富春江进至苏南，10月中旬渡江北上。其中一部于15日夜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事件，第4纵队政治委员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身亡。

此外，苏浙军区第1军分区、第2军分区部队各一部，亦随同主力部队北撤。

上述北移部队，合计约7万人，分别由浙东、浙西、苏南、皖南撤退到长江以北的皖东、苏中、苏北地区，有的部队继续北移山东。部队在北撤过程中，屡遭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的阻击、追击和围攻。如新四军第2纵队撤退之前，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即致电该地区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陈沛，告知本部奉命北移，呼吁遵守协议，停止内战，请其派兵接防。在转移途中，所到之处，亦均通知当地国民党驻军，请予便利通过。但是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军，竟然出动了3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第2纵队猛烈进攻。当该纵队撤至澉浦以后，又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企图聚歼该部。第2纵队奋起抗击，激战16小时，突出重围，继续北上，双方伤亡甚重，殊为痛心！

长江以南主力部队撤往江北以后，留下了少数地方武装坚持

斗争，以保护当地群众与地方干部，隐蔽的进行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摧残与蹂躏。苏浙军区将留在原地的干部组成苏浙皖新四军留守处（兼中共苏浙皖工作委员会），由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熊兆仁任留守处司令员兼工委书记，下辖茅山、太融、郎广、浙西等四个分工委，继续组织民众，开展工作，坚持斗争。

位于皖中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兼皖江军区），亦于10月中旬自巢湖地区北移至津浦路以东之来安地区。

（二）新四军军部率部分主力北移山东，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

自1945年9月开始，山东军区主力部队6万余人陆续挺进东北以后，具有战略地位的山东解放区，亟需增强兵力，以期巩固与发展。为调整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着令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领“苏北、皖中主力应即速向山东开进”。自10月开始，先后由华中调往山东根据地的部队有：

新四军第2师第4旅（辖第10、第11、第12团）、第5旅（辖第13、第14、第15团），在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领下，于11月到达鲁南峰县地区。该师的第6旅与两个军分区的部队，仍留在淮南地区坚持斗争。

新四军第7师第19旅（辖第55、第56、第57团）、皖南支队、含和支队、沿江支队，在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等率领下，于11月抵达鲁南。以后皖南支队改编为第20旅，含和支队与沿江支队合编为第21旅。

北调山东的部队还有新四军第4师第9旅（辖第25、第26、第27团）、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辖第1、第2团）。以上两个旅于11月分别由淮北、苏中抵达鲁南峰县等地区。

由江南撤至江北的苏浙军区部队第2、第4纵队，于11月中旬在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下，继续北移山东。随后，新四军军部也进驻鲁南临沂。上述部队调往山东以后，成为山东军区野战部队的组成部分。

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可与山东军区合并，但对外名义不取消，山东野战军须另成立指挥机构。”12月1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成立，由陈毅、张云逸、黎玉、饶漱石、舒同为华东局常委会委员，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在华中地区另设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194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兼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舒同任山东军区与新四军军部政治部主任。随后，又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袁仲贤为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唐亮为山东军区与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以后，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地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武装力量，这不仅使两个地区的兵力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也使两个地区的作战更能有效的实施战略配合。

三、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

在鄂豫皖地区，长期坚持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5师（兼鄂豫皖军区），在日本投降以后，遭受国民党军20多个师的包围，处境非常窘困。为改变不利态势，新四军第5师师部由大悟山转移至四望山地区，指挥全区部队为反对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反对内战而斗争。

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13旅（辖第37、第38、第39团、特务团和教导团）；第1军分区（辖教导团、第42团和3个指挥部、4个总队）；第2军分区（辖教导团、独立第5团、应北独立团和4个指挥部、2个总队）；第3军分区（辖教导团、自卫第3团、第45团、江北独立团和4个指挥部、3个总队、2个支队）；第4军分区（辖挺进第1、第3团和5个总队）；第5军分区（辖教导团、第43、第44团和5个总队）；第6

军分区（辖教导团、独立第25团和4个总队）；豫中军分区（辖挺进第2、第4团，第7、第15团，嵯峨独立团、西平独立团和2个支队）；鄂皖指挥部（辖挺进第18团和3个指挥部、6个总队）；鄂南军分区（由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南地区组建的东军分区、西军分区和湘北军分区组成，辖第40、第41团和1个教导队、10个总队）。全区总兵力4万余人。

在日本投降前夕，八路军南下支队约5000人（1945年3月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率领下，于1945年8月进至湘粤边境以后，遭受国民党军第7、第9战区部队的围堵与追击，难以立足与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该部：“你们目前处境异常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第5师靠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南下支队于8月底9月初起程北返，向鄂豫皖边区李先念部靠拢。

在嵩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的河南军区部队1.8万余人，在日本投降以后，受到国民党军第11、第1战区部队的包围与进犯，局势日趋严重，难以在豫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945年9月10日、11日，中共中央两次指示河南军区党委：“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各种困难。”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河南军区部队，在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的率领下，于9月下旬，开始向以桐柏山为中心的鄂豫边解放区转移，与新四军第5师靠拢。进行转移的所属部队有：第1支队兼第1军分区（辖第3、第35团）；第2支队兼第2军分区（辖第59团）；第3支队（辖第7、第9团）；第4支队（辖第10、第12团）；第6支队；豫西支队兼伊洛军分区（辖第18团）。

上述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于1945年10月24日在湖北省枣阳以北鄂豫边之桐柏山地区胜利会师。此时，总兵力达6万余人。10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将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原局并组成中原军区。三支部队会师以后，兵力相对集中，摆脱了各自势单力薄的境地，避免了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从而集中与加强了中原解放区的兵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部分主力部队，为华东、华北解放区的部队进行自卫作战和进军东北给予了战略上的有力配合。

抗战胜利后，鉴于蒋介石集团的内战政策，中央军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 10 余万部队进军东北，在广阔而富饶的东北数省实行了战略展开，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并迅速发展成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八路军、新四军主动撤出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腹地地带的军队，移兵长江以北，不仅使江南部队摆脱了困境，保存了实力，而且缩短了战线，加强了江北解放区的有生力量，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基本阵地。这对于尔后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式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四章 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组建野战兵团

第一节 中共中央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历来十分重视在历史条件、革命任务、作战对象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转变，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确立相应的作战形式，调整军事体制和编制。所谓军事战略转变，是指由这一战争进入另一战争，或由这一战争阶段进入另一战争阶段时，所作的军事战略上的改变。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①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还论述了抗日战争进行持久作战的三个阶段和军事战略上采取的三种作战形式：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作战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此阶段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以上所说的军事战略转变，主要是指作战方针、作战形式的转变。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抗日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的形势，适时地提出了“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①为实施全面反攻作准备。1945年8月，由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②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为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各地区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而定。”从而提出了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措施。

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

^①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四军等部立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尽力夺取和控制交通要道，主力转向夺取中小城镇。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各地区迅速编组野战兵团，《指示》指出：“（1）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其余则编为地方兵团；（2）野战兵团应编为三三制的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再加以重机枪排（如无重机枪时可改为步兵连，每连三排，每排四班，即三步枪班，一火力班），每连新增宣传员二人”，“每连不超过一百四十二人，每旅不超过七千人。以三至五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在华中、华东、山东已编成师者，则为三至五个师为一个纵队），各纵队和各旅番号，暂由各战区自定，报告军委；（3）野战兵团装备，各地区就已有兵器，按下列标准装备之：每连步枪不少于九十支，轻机枪不少于三挺，掷弹筒不少于三个。每团配属一个机炮连（迫炮四，重机三），每旅一山炮连；（4）地方兵团仍归军区管制，其编制由各地酌定，其人数比例，不得少于全区军队五分之二。各军区并分别担负各野战兵团之兵员与物资的补充。为此各地区在人民可能负担的条件下，应迅速动员新兵入伍，其数约为各区现有兵员的三分之一，于本年底前完成。各区脱离生产之兵员，最高不超过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各地民兵及自卫军则须大力尽量发展。”

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最后反攻阶段的时间短促，故未能全面地实现由抗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

日本投降以后，在蒋介石集团积极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蓄谋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的任务、作战对象和人民军队力量的变化，及时作出了继续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即开始由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向运动战为主的正规战实施全面的过渡。从军事体制、军队编组、作战指挥、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着力调整，以便有效地集中优势兵力，抗击国民党

军的大规模进攻。

毛泽东指出：“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①。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说明，运动战作为正规战的一种，正规兵团是其首要条件。同时，运动战又是一种流动性较强、作战线不稳固的正规战。因此，执行超越原在地区实施运动作战的正规兵团，亦称野战兵团或机动兵团。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运动战的主要任务。为适应军事战略转变，调整部队的总体结构及指挥体制已属必要。

9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对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指示》指出：在10月至12月3个月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应争取补充与扩大数十万人。各战略区都应整编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其数量应占本区脱离生产兵力的3/5到2/3，将其编组为旅和纵队，使其能够实行极大的机动，即是说，能脱离本战略区到其它区域作战。这些机动兵团须配备政治、军事上坚强的干部，必须改变过去各区党委、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或由主力部队的政治委员兼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制度。同时也要改变主力部队首长和司、政、供、卫机关兼军区、军分区首长及其机关的制度，而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加以分开，即区党委、地委书记不再兼任机动兵团的政治委员，或机动兵团的政治委员不再兼任地方党委的书记。各机动兵团，须组织自己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与卫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机关。这类机动兵团须直接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不隶属当地军区的建制，但主力部队的人员补充仍由原属区域军政机关负责。所有未编入机动兵团的地方部队均由军区、军分区指挥，区党委和地委书记仍应兼各军区及军分区政治委员，以保持一元化的领导。

中共中央在日本投降后，中国面临重大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作出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决策，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编制体制上的调整，适应了斗争形势的需要。面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实行以正规兵团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既便于主力兵团的机动，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求，又加强了地方军和民兵的领导与建设，使传统的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完善，使野战兵团的后方建设、物资补给、兵员补充仍然具有可靠的保障。同时，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赖以取胜的优化组合，它将增强正规作战的能力，充分发挥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巨大作用。其次，用打运动战为主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军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行动，这对于实行战役和战斗上的进攻与速决，适时集中优势兵力，打不同规模的歼灭战，充分发挥指挥员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作战形式的转变，也带动了作战指挥、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及战斗作风的相应变化，使部队逐步克服游击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现象，对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促进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编组野战兵团，健全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军事斗争的需要，1945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选。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

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同时，决定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9月2日，决定由杨立三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利于促成军事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的番号。中央军委下辖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纵队。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了调整。中央军委所辖各大单位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华中军区、晋察冀军区、东北人民自治军、中原军区和华南各游击纵队。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各战略区的部队陆续进行了整编。在保留军区、军分区继续指挥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同时，组建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即野战部队），并相应的建立了野战指挥机构。两种部队和两种指挥机构并行分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逐步健全以正规兵团为主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

一、组建野战兵团，加强地方部队建设

（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晋绥军区进行整编，晋绥野战军的组建

日本投降以后，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陕甘宁与晋绥解放区的部队及时进行了整编，调整了组织体制和指挥机构。晋绥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在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枫调往东北以后，军区领导人相继作了调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以李井泉代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并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续范亭、周士第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张

平化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加强晋绥解放区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由原晋绥军区所属主力部队编成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因病未到职），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孙志远接任）。下辖：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余秋里，辖第715、第716、第8团；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辖第714、第2、第35团；独立第2旅（由原晋绥军区第27、第36团编成），旅长许光达（兼），政治委员孙志远（兼），辖第21、第27、第36团；独立第3旅（由原晋绥军区特务团与第17团编成），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辖第17团、特务团。

晋绥野战军组建以后，位于平绥路西段与同蒲路北段地区，遂行机动作战任务。在歼灭晋绥地区拒绝投降的日伪军以后，协同晋察冀军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晋绥军区整编以后所属3个军区序列是：

吕梁军区（1945年9月组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下辖：第3军分区，司令员陈刚，政治委员秦力生；第4军分区（1945年8月组建），司令员杨秀山，政治委员刘文珍；第7军分区（1945年10月组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8军分区，司令员王长江，政治委员甘一飞；第9军分区（1945年12月组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忠学；第10军分区（1945年12月组建），司令员陈国栋；独立第4旅（1945年11月由吕梁军区部队编成），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

雁门军区（1945年9月组建），政治委员高克林（后朱明接任），副司令员许光达、孙超群。下辖：第2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傅子和；第5军分区（1945年7月组建时为塞北军分区，9月改编为第5军分区），司令员王赤军，政治委员李登瀛；第6军分区，司令员唐子奇，政治委员梁仁芥。

绥蒙军区（1945年9月组建），司令员姚喆，政治委员张达志

(后高克林接任)。下辖：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后李佐玉接任)；第11军分区(1945年9月组建)，原属雁门军区，位于绥南，以后划归绥蒙军区建制，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张毅忱；绥东军分区，司令员李甫良。

晋绥军区直属第1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总兵力约6万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以后，仍保留其原有番号，继续指挥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王世泰任代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张仲良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教导旅，1945年10月由教导第1、第2旅编成，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辖第1、第9、第5团、骑兵团及回民支队；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区)，旅长(司令员)高锦纯，政治委员张德生，辖第1、第2、第3团；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辖第771、第16、第25团；警备第3旅(兼三边警备区)，旅长(司令员)贺晋年，辖第7、第8、第9团和骑兵团；新编第11旅(由1945年10月起义的国民党军新编第11旅改编)，旅长曹又参；第385旅(兼陇东警备区)，旅长(司令员)王维舟，政治委员马文瑞，辖第4、第5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季龙。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万余人，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使命。

(二) 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组建野战纵队

随着抗日大反攻的胜利，晋冀鲁豫解放区使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4个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全区拥有2400万人口，已解放80多座城市，人民军队约30万人，民兵约40万人。该战略区与晋绥、华东、晋察冀、中原解放区互相毗邻，是国民党军争夺华北，实施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太岳、太行、冀鲁豫、冀南解放区的领导，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已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又称邯郸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

晋冀鲁豫军区，为在上党地区消灭进犯之阎锡山部，于1945年9月，将参加上党战役的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分别编为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冀南纵队。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为适应军事战略转变，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冀南、太行、太岳纵队依次编成第1、第2、第3、第4纵队，同年11月10日又组建了第6、第7纵队。晋冀鲁豫军区整编后所辖部队序列如下：

第1纵队（1945年10月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该纵队组建以后，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赴东北，后因战局变化，留在热河省作战，改属晋察冀军区建制。

第2纵队（1945年10月由冀南纵队改编），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第4旅（由冀鲁豫军区1分区第1团，冀南军区3分区永北支队、第23团编成），旅长孔庆德，政治委员刘明辉，辖第10、第11、第12团；第5旅（由冀南军区7分区第22团、5分区第27团、4分区第11团编成），旅长雷绍康，政治委员寇庆延，辖第13、第14、第15团；第6旅（由冀南军区6分区第19团、运河支队、2分区第25团编成），旅长王天祥，政治委员刘华清，辖第16、第17、第18团。

第3纵队（1945年10月由太行纵队改编），司令员陈锡联，政

治委员彭涛。下辖：第7旅（由原太行军区3分区第769团，太行军区第4支队第51团及朱德警卫团编成），旅长赵兰田，政治委员曾庆梅，辖第19、第20、第21团；第8旅（由原太行军区3分区第14团、2分区第30团、5分区第34团编成），旅长马忠全，政治委员卢南樵，辖第22、第23、第24团；第9旅（由太行军区6分区第13团、7分区林县独立团编成），旅长郑国仲，政治委员秦传厚，辖第25、第26、第27团。

第4纵队（1945年10月由太岳纵队改编），11月奉命准备调往东北，即以所属第11旅与太岳军区第23旅、第24旅（亦称独立旅）组建第8纵队。12月，第4纵队奉命仍留太岳，第11、第23、第24旅归建，撤销第8纵队番号。第4纵队司令员陈庚，政治委员谢富治。下辖：第10旅（由原第386旅改编），旅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忠（兼），辖第28、第29、第30团；第11旅（由原决死第1旅改编），旅长李成芳，政治委员刘有光，辖第31、第32、第33团；第13旅（由原第4军分区第17团、基干第2团，第3军分区第57团编成），旅长陈康，政治委员廖冠贤，辖第37、第38、第39团。

第6纵队（1945年11月由太行军区部队改编），司令员王宏坤（兼），政治委员段君毅。下辖：第16旅（由太行军区7分区第1团、5分区第41团及磁县独立团编成），旅长韦杰（兼），政治委员张国传，辖第46、第47、第48团；第17旅（由太行军区4分区第32团、黎城独立团、第52团编成），旅长石志本，政治委员何柱成，辖第49、第50、第51团；第18旅（由太行军区1分区第10团、6分区沙河独立团、5分区义勇军第5团编成），旅长肖永银，政治委员李震，辖第52、第53、第54团。

第7纵队（1945年11月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下辖：第19旅（由冀鲁豫军区1分区第2团与独立团、10分区民1团编成），旅长吴大明，政治委员谢富林，辖第55、第56、第57团；第20旅（由冀鲁豫军区8分区第5团

与独立团、11分区第9团编成)，旅长匡斌，政治委员石新安，辖第58、第59、第60团；第21旅（由冀鲁豫军区9分区新四路部队及卫河支队独立团编成），旅长况玉纯，政治委员刘振国，辖第61、第62、第63团、骑兵团。

晋冀鲁豫军区整编后所属4个军区的序列是：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弼。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申云甫；第2军分区，司令员何光宇，政治委员万里；第3军分区，司令员郭影秋，政治委员郝中士；第4军分区，司令员李静宜，政治委员赵紫阳；第5军分区，司令员朱属华，政治委员刘星；第6军分区，司令员金绍山，政治委员袁振；独立旅（1946年1月组建），旅长马宗凯。

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下辖：独立第4旅，旅长孙仁道，政治委员杨树根；第1军分区（由原冀南第7军分区改编），司令员白云，政治委员许梦侠；第2军分区（由原冀南第6军分区改编），司令员李定灼，政治委员赵一民；第3军分区（由原冀南第1、第3军分区合编），司令员张维翰，政治委员李福祥；第4军分区（由原冀南第2、第4军分区合编），司令员王蕴瑞，政治委员江明；第5军分区（系原冀南第5军分区），司令员刘福胜，政治委员陈登昆。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胡震，政治委员冷楚；第2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刘建勋；第3军分区，司令员韩卫民，政治委员于一川；第4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兼），政治委员刘毅；第5军分区，司令员崔建功，政治委员谷景生；第6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政治委员陶鲁笱。

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治委员王鹤峰。1945年12月，该军区奉命将原5个军分区改编为4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刘植岩；第2军分区，司令员张祖谅，政治委员刘尚志；第3军分区，司令员王墉，政治委员柴泽民；第4军分区（1945

年10月组建)，司令员郭庆祥，政治委员薛迅；第23旅（由太行军区3分区第9团，8分区第7团，太岳军区临汾支队编成），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车敏瞧；第24旅（亦称独立旅，1945年12月由原特务第1、第2团及第54团编成），旅长刘金轩，政治委员李耀。

隶属晋冀鲁豫军区建制的部队还有：民主建国军（1945年11月11日由邯郸战役起义之国民党新编第8军等部改编），高树勋任总司令，下辖2个军：

第1军，军长范龙章。辖第1师，师长阎济民，政治委员张杰轩；第2师，师长田树青，政治委员苏俊山。

第2军，军长乔明礼。辖第4师，师长商正夏；第5师，师长聂志超。

军区直属第17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刘威诚，辖第49、第50、第51团。

晋冀鲁豫军区共有野战军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余人，总兵力31万余人。

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本区的情况，确定了近期的主要任务是：（1）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阻止或迟滞其沿同蒲路、平汉路北上的行动，协助友邻部队打破国民党军进占平津与东北的企图；（2）迅速集中兵力，以边打边练边建的方式编组与加强野战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进一步发展地方武装与民兵；（3）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和加强人民政权，开展反奸清霸和减租运动，武装基本群众，在全区大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解放区周边敌占区的城市工作；（4）加强军队和民众的阶级教育，揭露蒋介石集团内战、独裁、卖国的阴谋，树立应付内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

（三）山东军区部队进行整编与组建野战军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与山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部署部队整编，接管城市，动员参军和派部队去

东北等各项工作。为歼灭抗拒投降的日伪军和对付国民党军的进犯，八路军山东军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领导下，决定将所属主力部队与地方基干武装，整编为山东野战部队和5个军区。

山东军区野战部队共组建8个师，其序列如下：

第1师（由滨海军区第6团、1分区第13团、莒中独立团编成），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辖第1、第2、第3团；第2师（由滨海军区2分区第4团、第23团、独立第1团编成），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4、第5、第6团；第3师（由鲁中军区第1、第2团，特务营及沂蒙地区2个独立营编成），师长王建安，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7、第8、第9团；第4师（由鲁中军区第4团、1分区第10团、3分区第12团编成），师长廖容标，政治委员王一平，辖第10、第11、第12团；第5师（由胶东军区第13、第14团、东海独立团编成），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辖第13、第14、第15团；第6师（由胶东军区第14团、西海分区独立团编成），师长聂凤智，政治委员李丙令，辖第16、第17、第18团；第7师（由渤海军区直属团、第2分区独立团、第5分区独立团、第4分区独立团1个营编成），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周贯五，辖第19、第20、第21团；第8师（由鲁南军区第3、第5团、第2分区3个基干营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辖第22、第23、第24团。

此外，山东军区所属各军区将所余部队大部，又编成警备旅，成为各军区的机动部队。即：鲁中军区部队编成3个警备旅：警备第1旅，旅长孙继先，辖第1、第2团；警备第2旅，旅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孔繁彬，辖第3、第4团；警备第3旅，旅长胡奇才，辖第5、第6团。胶东军区部队编成2个警备旅：警备第4旅，旅长刘涌，辖第7、第8团；警备第5旅，旅长贾若瑜，政治委员刘浩天，辖第9、第10团；还组建了海军支队。渤海军区部队编成2个警备旅：警备第6旅，旅长刘贤权，政治委员陈德，辖第11、

第12团；警备第7旅，旅长赵寄洲，政治委员李曼村，辖第13、第14团。鲁南军区部队编成2个警备旅：警备第8旅，旅长贺健，政治委员杨士法，辖第15、第16团；警备第9旅，旅长胡大荣，辖第17、第18团。滨海军区部队编成2个警备旅：警备第10旅，旅长赵杰，辖第19、第20团；警备第11旅，旅长覃士冕，辖第21、第22团。

山东军区直属部队还有：独立第1旅，旅长王道，辖第1、第2团；独立第2旅，旅长莫正民，辖第4、第5、第6团；独立第3旅，旅长张希贤，辖第7、第8团；独立第4旅，旅长韩寿臣，辖第10、第11团。

山东军区部队整编后，所属5个军区序列是：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林乎加；第2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王涛；第3军分区，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刘莱夫；第4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政治委员霍士廉；第5军分区，司令员陈奇。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下辖：第1军分区（兼第3团），司令员贺健，政治委员杨士法；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雄；第3军分区，司令员胡大荣；独立支队，政治委员张洪仪。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政治委员唐亮。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黎有章，政治委员王众音；第2军分区，司令员覃士冕，政治委员谷牧；第3军分区，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田海山；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兼），政治委员王维平，辖3个团。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下辖：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刘涌，政治委员仲曦东，辖2个独立团；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政治委员刘仲华，辖2个独立团；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政治委员吕明仁（代），辖2个独立团；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辖2个独立团；中海军分区，辖

独立第1团、军区特务团、军区教导团、海防支队。

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治委员李广文；第2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政治委员曾旭清；第3军分区，司令员徐云轩，政治委员李曼村，辖1个基干团；第4军分区，司令员王兆相，政治委员徐斌洲；第5军分区，司令员赵奇舟，政治委员岳拙元，辖1个基干团。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1945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各一部6万余人挺进东北；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率第2、第7师和第2、第4纵队等部北移山东；将原中共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在华中另设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要在津浦线的山东地区组建一支3至4万人的野战军，准备进行津浦战役，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因此，山东地区人民军队的建制、番号、数量与领导机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45年10月，山东军区成立津浦前线指挥部，由陈毅、黎玉统一指挥山东部队和北上进入山东的新四军部队实施津浦（徐济段）战役；1946年1月，津浦前线指挥部撤销，组建山东野战军；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地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武装力量。

1946年1月7日，山东野战军组成，由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野战军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兼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任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序列是：

第1纵队（1945年11月由原苏浙军区第2、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编成），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下辖：第1旅（由原苏浙军区第4纵队改编），旅长廖政国，政治委员阮英平，辖第1、第2、第3团；第2旅（由原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改

编)，旅长刘飞，政治委员彭林，辖第4、第5、第6团；第3旅（由原苏浙军区第2纵队改编），旅长张翼翔，政治委员何克希，辖第7、第8、第9团。

第2纵队（1945年10月，由原新四军第2师第4、第5旅和第4师第9旅于山东峄县编成），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下辖：第4旅（由原新四军第2师第4旅改编），旅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高志荣，辖第10、第11、第12团；第5旅（由原新四军第2师第5旅改编），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兼），辖第13、第14、第15团；第9旅（由原新四军第4师第9旅改编），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25、第26、第27团。

第7师（亦称第3纵队），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下辖：第19旅（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7师第19旅改编），旅长林维先，政治委员黄火星，辖第55、第56、第57团；第20旅，旅长梁金华，政治委员黄耀南，辖第58、第59、第60团；第21旅，旅长马长炎，政治委员黄先，辖第61、第62、第63团。

第8师（原山东军区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辖第22、第23、第24团。

山东野战军合计7万余人。

此时，山东军区所属5个军区又进行了整编，其序列如下：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下辖：第4师（1945年8月编成），师长廖容标，政治委员王一平；第9师（1945年11月由警备第2旅第4、第5团及警备第3旅第9团编成），师长钱钧，政治委员李耀文；独立第1旅，旅长王道；独立第4旅，旅长韩寿臣；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1旅），司令员（旅长）陈奇，政治委员林乎加；第2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政治委员王涛；第3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政治委员霍士廉。该军区共计16个团。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傅秋涛。下辖：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8旅），司令员（旅长）贺健，政治委员杨士法；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雄；第3军分区（兼警备第9

旅)，司令员（旅长）胡大荣，政治委员李青。该军区共计 5 个团。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下辖：警备第 4 旅，旅长刘涌，政治委员仲曦东；警备第 5 旅，旅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第 1 军分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得水，政治委员梁辑卿；第 2 军分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政治委员刘仲华；第 3 军分区（西海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政治委员李华；第 4 军分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该军区共计 14 个团。

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治委员景晓村。下辖：第 1 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治委员李广文；第 2 军分区（兼警备第 6 旅），司令员（旅长）肖锋，政治委员曾旭清；第 3 军分区（兼警备第 7 旅），司令员（旅长）赵寄舟，政治委员李曼村；第 4 军分区，司令员程绪润，政治委员岳拙元。该军区共计 14 个团。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下辖：警备第 10 旅，旅长张仁初，政治委员刘伟；警备第 11 旅，旅长莫正民，政治委员覃士冕；第 1 军分区，司令员黎有章，政治委员王众音；第 2 军分区，司令员王建青，政治委员谷牧；第 3 军分区，司令员王德贵，政治委员田海山。该军区共计 9 个团。

山东军区独立旅，旅长张俊升，政治委员王仲良。

以上各军区所属部队合计 20 余万人。

经过整编后的山东军区部队，主要任务是在徐州至济南一线进行机动作战，切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犯；1946 年 1 月以后，主要是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而奋斗，对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坚持自卫立场，给予坚决的回击；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参加根据地建设，以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

（四）成立华中军区，组建华中野战军

为了实施战略转变，发展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并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 1945 年 9、10 月份先后决定，在苏皖地区成立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

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由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5人组成华中分局常务委员会，以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11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曾山为华中分局常务委员。10月25日，华中军区正式成立，11月组建华中野战军。

华中军区，由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所属部队序列是：

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下辖：第1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第3、第4军分区合编），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钟民；第2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第1、第2军分区合编），司令员钟国楚，政治委员金柯；独立旅（由原第3军分区部队改编），旅长陈玉生，政治委员李干辉。苏中军区还有直属炮兵团、特务团。

淮南军区（1945年10月组建，由新建立的新四军第2师兼），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下辖：第3军分区（兼独立旅，1945年11月由原淮北军区路西军分区一部改编），司令员（旅长）罗占云，政治委员李世炎；第4军分区（兼警备第6旅），司令员（旅长）陈庆先，政治委员黄岩。

由华中军区直接管辖的军分区有：

第5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改编），司令员谢祥军，政治委员曹获秋；第6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改编），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万众一；第7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淮北军区路东军分区改编），司令员张震球，政治委员赖毅；第8军分区（1945年11月由原淮北军区路西军分区一部改编），司令员张太生，政治委员吴芝圃。

直属华中军区的部队还有：

海防总队，政治委员王治平。

解放第1军（由伪军起义的部队改编），军长钟剑魂。辖第1

师，师长廖洪学，政治委员徐楚光。

解放第2军（1945年10月由起义的伪军第18师改编），军长杜新民。辖第1旅，旅长邢剑五；第2旅，旅长李福元；第3旅，旅长韩守泽；第4旅，旅长赵汝洋。

解放第4军，军长戴心宽。辖第11师，师长戴心宽（兼）；第12师，师长彭干卿。

华中民主联军（1946年1月由起义的伪军第6路军改编，后叛变），总司令郝鹏举。辖第1、第2、第3、第4师。

华中野战军（1945年11月10日组建），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其所属部队序列如下：

第6纵队（1945年11月，由原苏浙军区第1纵队和原苏南第2军分区2个团编成），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辖第46、第48、第51、第52、第54团。

第7纵队（1945年11月，由原苏中军区新编第2旅、新编第3旅编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辖第55、第57、第59、第61、第63团。

第8纵队（1945年11月，由原苏浙军区第3纵队1个旅与原苏南第1军分区2个团编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辖第64、第66、第68、第70、第72团。

第9纵队（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4师第11、第12旅各两个团及原淮北军分区骑兵团编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辖第71、第75、第76、第77、第81团。

华中军区共有野战军4万余人，地方部队12万余人，总兵力16万余人。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与整编后的军事体制，对前后方的指挥关系做了新的调整。1945年12月27日，在给华东局、华中分局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取得决定方面的胜利，使野战军不受后方的限制，更灵活的进行机动作战，战略区域主要负责人随着野战

军行动，直接指挥作战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现实情况，还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特别是技术装备与物质补充比敌人相差很远。这就决定了我们进行正规战时，其中包括游击性甚至在一个战役中有几次转移等待退让，寻找各种有利的条件，方能取得胜利这样的情况下，战略区主要负责人随着野战军在前方时，则后方军区机关即可受前方军区指挥。”中央军委还明确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整编后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主要任务是，坚持华中，以便巩固山东，在苏皖地区控制战略要地，实施机动歼敌，配合山东野战军的津浦路作战，以阻止国民党军北犯。

(五)晋察冀军区组建野战军，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建设

晋察冀解放区，由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及辽宁省一部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所组成，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最早创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与山东、晋绥、晋冀鲁豫解放区相毗邻，是连接山东、晋冀鲁豫、晋绥和东北诸解放区的枢纽，是中共发展与控制东北诸省的重要战略基地，特别是对发展热、察两省尤为重要。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热河省是东北的屏障，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纽带，加强热河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0月，中共中央在阻止国民党进攻热河的军事部署中指出，国民党军已到北平，可能很快向古北口、承德进攻，如热河被国民党军控制，对我整个形势极为不利。因此，决定黄永胜、张秀山所率2个团和200名干部留驻热河，迅速与新建部队合编，并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准备作战。又指示文年生所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伍晋南、雷经天所率干部队及原山东军区刘其人师，取捷径驰往承德，配合热河驻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国民党军在美国海、空军的帮助

下，陆续抵达华北地区主要城市和交通沿线。计有第1战区胡宗南部、第11战区孙连仲部等共6个军近20万人。第92军占踞北平及平承铁路沿线；第94军占踞天津、唐山及津浦铁路北段地区；第13、第52军攻占山海关与北戴河车站；第16军进占北平以北的昌平、南口地区；第3军进占石家庄、正定地区。第2战区阎锡山部抢占了太原、大同及周围地区。第12战区傅作义部攻占归绥、绥东、绥南解放区，并逼近张家口。此时，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指挥下的第11、第12、第2战区的部队，连同收编的伪军在内，总兵力已达43万余人，企图包围与分割华北解放区，实现其全部占领华北的战略目标。这一形势，对晋察冀解放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日本投降后，晋察冀军区一面执行以保卫张家口为中心的热察两省战略基地的任务，一面调整战略部署，以迅速完成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在组织体制上，进行了统一整编，1945年10至11月分别编组了野战军与地方军。

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克任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任副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耿飏、曾涌泉任副参谋长，潘自力、蔡树藩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两个野战军和5个军区。

晋察冀军区为了保卫以张家口为中心的热察两省的战略基地，并应付在晋察和冀热辽两个方向国民党军的进攻，1945年11月建立了两支机动作战的野战军。

第1野战军（位于冀察晋地区），由聂荣臻兼任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下辖4个纵队：

冀晋（陈正湘）纵队（1945年8月由冀晋军区部队一部编成），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王平。下辖：第3旅（1945年8月由冀晋军区第4军分区第1团，第3军分区第12团编成），旅长马龙，政治委员傅崇碧，辖第1、第10、第12团；第4旅（1945年8月由冀晋军区第3军分区3个团编成），旅长陈仿仁，政治委

员黄文明，辖第5、第6、第11团。

冀察（郭天民）纵队（1945年10月由冀察军区部队一部编成），司令员郭天民。下辖：第6旅（由冀察军区第1军分区第3、第25、第45团及新1、新3团编成），旅长肖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16、第17、第18团；第7旅（由冀察军区第11军分区第7、第44团及第12军分区第40团编成），旅长肖文玖，辖第19、第21、第23团；第9旅（由冀察军区第13军分区第20团及新8、新9团编成），旅长熊奎，辖第25、第26团；骑兵旅（由冀察军区第19军分区3个骑兵大队编成），旅长陈宗坤。

冀察（刘道生）纵队（1945年10月由冀察军区部队一部编成），政治委员刘道生。下辖：第8旅（由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第10团、新6、新7团编成），旅长詹大南，政治委员刘国梁，辖第22、第24、第29团；第10旅（由冀察军区第11军分区新4、新5团，第13军分区新10团和第1军分区新2团编成），旅长马辉，政治委员严庆堤，辖第20、第27、第28团。

冀中（杨成武）纵队（1945年9月由冀中、冀察军区各一部编成），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兼）。下辖：第11旅（由冀中军区第7分区第22、第26、第33团编成），旅长杜文达，辖第31、第32、第33团；第12旅（由晋察冀军区第5团，第35、第48、第81团及献县支队编成），旅长贾士珍，政治委员周彪，辖第35、第36团；第13旅（由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第24、第27、第28团编成），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37、第38、第39团。另外，纵队直属团有：由冀中军区第11军分区第77团，第6军分区第32团改编的暂编第40团与第41团。

以上4个纵队的任务系协同晋绥军区部队打击国民党军傅作义和阎锡山所部的进犯。

第2野战军（位于冀热辽地区），司令员肖克（兼），政治委员罗瑞卿（兼），下辖5个纵队：

第1纵队（1945年10月由冀鲁豫军区部队编成，12月由晋

冀鲁豫野战军调属晋察冀军区), 司令员杨得志, 政治委员苏振华。下辖: 第1旅(由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第7、第6、第4团编成), 旅长杨俊生, 政治委员邓存伦, 辖第1、第2、第3团; 第2旅(由冀鲁豫军区第11军分区第10、第12团及第1军分区第3团编成), 旅长尹先炳, 政治委员戴润生, 辖第4、第5、第6团; 第3旅(由冀鲁豫军区第10军分区第20团, 第9军分区第16团及第8军分区第2团编成), 旅长李东潮, 政治委员陈云开, 辖第7、第8、第9团。

热辽(黄永胜)纵队(1945年11月, 由陕甘宁警备第1旅与第2旅各1个团、教导第2旅1个团及热河部队编成), 司令员黄永胜, 政治委员朱涤新。下辖: 第22旅(由陕甘宁警备第1旅第2团, 冀东第16军分区第18团及地方武装一部编成), 旅长欧致富, 政治委员陈志彬, 辖第64、第65、第67团; 第27旅(由陕甘宁教导第2旅第1团, 冀中第8军分区第31团及地方武装一部编成), 旅长丁盛, 政治委员韦祖珍, 辖第31、第70、第71团; 第30旅(由陕甘宁警备第2旅第1团及地方武装一部编成), 旅长张德发, 政治委员谢堂忠, 辖第60、第68、第69团; 混成旅, 旅长王衍, 政治委员李志明, 辖炮兵第1团、步兵第3团。

冀东(詹才芳)纵队(1945年12月由冀东军区部队一部编成), 司令员詹才芳。下辖: 第12旅(由冀东军区第15军分区第17、第50团及第18军分区第56团编成), 旅长任昌辉, 政治委员林茂源, 辖第17、第18、第50团; 第13旅(由冀东军区第17军分区第14、第2、第60团编成), 旅长肖全夫, 政治委员李振声, 辖第14、第2、第60团; 第14旅(由冀东军区第18军分区第57团及第16军分区第1、第16团编成), 旅长何能彬, 政治委员徐光华, 辖第1、第57、第61团。

冀晋(赵尔陆)纵队(1945年11月, 由冀晋军区和冀东军区各一部编成), 司令员赵尔陆。下辖: 第1旅(由冀晋军区第2军分区第4团及第3军分区第2、第42团编成), 旅长李湘, 政治委

员曾美，辖第1、第2、第3团；第2旅（由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第13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及冀晋军区第2军分区第6团编成），旅长黄方刚，政治委员覃国翰，辖第4、第5、第6团；第3旅（由冀东军区地方武装一部改编），旅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仁麒，辖第7、第8、第9团。

冀中（黄寿发）纵队（1945年11月由冀中军区部队一部编成），副司令员黄寿发，副政治委员帅荣。下辖：第1旅（由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第62团，第6军分区第71团及第9军分区第73团编成），旅长周仁杰，政治委员漆远渥，辖第62、第71、第73团；第2旅（由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第76团，第7军分区第81团及第8军分区独立总队编成），旅长肖新槐，政治委员张如三，辖第76、第81团及独立总队。

第2野战军的任务，系打击进犯冀热辽地区之国民党军，协同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同时配合地方军与民兵对津浦、北宁、平承等铁路线进行分段破击，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

晋察冀军区整编后，所属5个军区序列如下：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代），政治委员林铁。下辖：第6军分区，政治委员邓可运；第7军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委员张庆春；第8军分区，司令员贾士珍，政治委员周彪；第9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政治委员陈鹏；第10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治委员旷伏兆。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兼），政治委员王平。下辖：第2军分区，司令员曾美，政治委员张连奎；第3军分区，司令员李湘，政治委员黄文明；第4军分区，司令员马龙，政治委员丁莱夫；第5军分区，司令员陈仿仁，政治委员马天水。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肖应棠，政治委员杨世杰；第11军分区，司令员肖文玖，政治委员高鹏先；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治委员陆平；第13军分区，司令员熊奎，政治委员吴光；第19军分区，

司令员陈宗坤，副司令员赖富。

冀热辽军区，1945年10月划规东北解放区，11月9日，中共冀热辽分局由原属中共东北局改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冀热辽军区亦同时由东北人民自治军划规晋察冀军区。12月，冀热辽军区与晋察冀军区第2野战军指挥机关合并，司令员肖克，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第二政治委员罗瑞卿。其序列如下：

冀东军区（1945年11月改编），司令员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楚离。下辖：第14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政治委员方治平；第15军分区，司令员曹致富，政治委员杨文翰；第16军分区，司令员李道之，政治委员刘亦如；第17军分区，司令员曾辉，政治委员王世煜；第18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田心；第11旅（由第14军分区第16团、第53团、第54团编成），旅长曾雍雅，政治委员李雪瑞，辖第16、第53、第54团。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黄火青。下辖：热西军分区，司令员钟辉琨，政治委员谢明；热中军分区，司令员赵福兴，政治委员黄文；热东军分区，司令员刘兴隆，政治委员段德彰；热北军分区，司令员俞仁杰，政治委员王一伦。

晋察冀军区直属教导师，师长李湘，政治委员张明河（代）。

晋察冀军区共有9个野战纵队，26个旅，81个团，215310人；5个军区，23个军分区，104700人，总兵力30余万人，有组织的民兵约90万人。特别是野战军的建立，增强了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

（六）东北人民自治军进行整编与组建野战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关内解放区进入东北地区的人民军队，控制了大片乡村与许多重要城市。国民党为了抢占东北，1945年10月已有2个军由秦皇岛登陆。11月15日，国民党军第13军及第52军主力共5个师向山海关发起进攻。22日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凭借优势装备，长驱直入，26日占领锦州。中共中央于12月7日给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们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

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中长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编 15 万野战军，建立 20 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方针问题，要迅速加以确定，勿丧失时机；我之东北新部队，如不经休整与准备，几乎不能作战；国民党已知它接收东北的困难，独占东北已不可能，东北问题或许有和平解决希望；我们准备公开宣布彭真、陈云、林枫 3 人到东北，以便你们公开出面接洽一切，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谈判。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北距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否则不能战胜国民党军的进攻，而遭遇绝大困难甚至失败之可能；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与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与地方军，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与自卫军的工作，以便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一切军队均有确定的地区及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1945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东北局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由沈阳移驻本溪，大部分部队也开始离开城市，转入乡村创建根据地。

1946 年 1 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东北局根据形势的发展与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原有的 10 个军区改编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 4 大军区，调整了原有的军区与军分区，主力部队整编为野战军，组建了若干补充团和地方武装。整编以后，除原山东第 1 师直属民主联军总部外，其它主力部队均隶属各军区。

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总司令，肖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其所属部队的序列是：

第1师(原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民主联军直属炮兵旅,旅长贾陶。

北满军区(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下辖5个军区、1个师、1个独立旅和1个直属军分区。

直属哈北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政治委员李建平。

合江军区(1946年1月由三江军区改编),司令员方强,政治委员洛甫。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政治委员李大章。辖第2、第3支队。

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治委员张秀山。下辖:哈东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政治委员董浩然;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副政治委员何运洪。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政治委员刘锡五。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富善;第2军分区,司令员金钟,政治委员王文;第3军分区,司令员张汉承,政治委员尹士炎;第4军分区,司令员沈启贤,政治委员王建中。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治委员王鹤寿。下辖:警备第1旅,旅长蔡明,政治委员陈雷;警备第2旅,旅长张光迪,政治委员徐明;警备第3旅,旅长廖仲符,政治委员史梓明。另辖黑河军分区。

第7师(1946年2月,由原山东军区第7师、原山东刘其人师与冀热辽军区第19旅编成),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刘其人。下辖:第19旅(原冀热辽军区第19旅),旅长张鹤鸣,政治委员袁克服,辖第46、第47团;第20旅(原山东军区第7师改编),旅长刘子奇,政治委员孙正,辖第58、第59、第60团;第21旅(由刘其人师改编),旅长王兆相,政治委员陈德,辖第61、第62、第63团。

独立第2旅(1946年2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359旅改编),旅长刘转连,政治委员晏福生,辖第1、第2、第3、第4、

第5、第6团及骑兵团。

北满军区兵力约64000人。

南满军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华。下辖1个直属军分区、2个纵队、1个军区。

辽南军分区(1946年3月由原辽宁军区第1、第2军分区合编),司令员赵承金,政治委员陈一凡。

第3纵队(1946年1月由原山东军区第3师,鲁中军区警备第3旅与冀东第16军分区第21、第23旅编成),司令员程世才(兼),政治委员罗舜初(兼)。下辖:第7旅(由原山东军区第3师改编),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李伯秋,辖第19、第20、第21团;第8旅(由原冀东第16军分区第21旅改编),旅长杨树元,政治委员刘光涛,辖第22、第23、第24团;第9旅(由鲁中警备第3旅与冀东第16军分区第23旅编成),旅长宁贤文,政治委员谭开云,辖第25、第26、第27团。

第4纵队(1946年2月由原第2、第3纵队合编),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下辖:第10旅(由原第2纵队第1旅改编),旅长杜光华,政治委员李冠元,辖第28、第29、第30团;第11旅(由原第2纵队第2旅改编),旅长李福泽,政治委员李丙令,辖第31、第32、第33团;第12旅(由原第3纵队改编),旅长江燮元,政治委员潘寿才,辖第34、第35、第36团。

安东军区(1946年1月组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林一山。下辖:第3军分区,司令员王振祥,政治委员王一伦;第4军分区,司令员李弗畏,政治委员罗其南;安东市保安司令部(1946年2月组建),司令员吕其恩(兼);安东保安纵队,由安东军区兼。

南满军区兵力约110000人。

西满军区(辽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李富春、黄克诚。下辖1个师与2个军区。

第3师(1946年1月,由新四军第3师改编),师长兼政治委

员黄克诚。下辖：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郭成柱，辖第19、第20、第21团；第8旅，旅长张天云，政治委员李雪三，辖第22、第23、第24团；第10旅，旅长钟伟，政治委员王凤梧，辖第28、第29、第30团；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辖第1、第2、第3团。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田维扬，政治委员孔原；第2军分区（1946年2月军分区机关撤销，继由原冀东第16军分区第24旅直属单位重建），司令员赵东寰，政治委员杨易辰；第5军分区，司令员高体乾，政治委员傅玉田；保安第1旅，旅长马仁兴，政治委员邓东哲。

嫩南军区（1946年2月组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郭述申。下辖：第1支队（由原辽北军区第146团改编）；第2支队；第3支队。

西满军区兵力约60000人。

东满军区（1946年1月由原东满军区与辽北军区合编，2月改称为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下辖3个直属旅、2个纵队、3个军区。

第22旅（1946年2月由原山东军区第2师改编），旅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4、第5、第6团。

第23旅（1946年2月由山东军区第2师第6团与吉长县、德惠县各1个团编成），旅长贺庆积，政治委员谭甫仁，辖第64、第65、第66团。

第24旅（1946年2月由周保中部所属黄荣海团、齐连星团及永吉第1团编成），旅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彭任远，第二政治委员邓飞。

第7纵队（1946年1月由东北挺进纵队改编），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周赤萍。下辖：第19旅（由原1支队改编），旅长彭景文，政治委员钟民，辖第55、第56、第57团；第20旅（由原第2支队改编），旅长管松涛，政治委员何善远，辖第58、第59、第

60 团。

吉黑纵队，司令员曹里怀，政治委员郭峰。

吉东军区（1946年2月组建），司令员姜信泰，政治委员唐天际。下辖：警备第1旅（1946年3月由朝鲜义勇军为骨干组建），旅长金光侠，政治委员谢扶民（兼）；警备第2旅（1946年2月由第25旅改编），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袁克服。

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政治委员吴溉之。下辖：杨靖宇支队（1946年2月由原通化支队改编），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刘西元；李红光支队，司令员金明。

辽北军区，司令员万毅（兼），政治委员周赤萍（兼）。下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王叙坤，政治委员东平；第2军分区，司令员刘杰，政治委员李砥平。

东满军区兵力约67000人。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32万人，已成为抗衡国民党军蓄意独占东北的强大力量。

（七）成立中原军区和编组野战纵队

1945年10月24日，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鄂豫边境桐柏山地区胜利会师。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任中原局常务委员，郑位三代理书记，李先念任副书记。同时组成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为加强机动作战能力，于1945年11月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并建立野战纵队。整编后部队序列如下：

第1纵队（由河南军区部队编成），司令员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下辖：第1旅，旅长皮定钧，政治委员徐子荣，辖第1、第2、第3团；第2旅，旅长张才干，政治委员刘健挺，辖第4、第5、第6团；第3旅，旅长刘昌毅，政治委员张力雄，辖

第7、第8、第9团。全纵队共计9个团。

第2纵队（由新四军第5师主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编成），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下辖：第13旅，旅长吴世安，政治委员周志刚，辖第37、第38、第39团；第14旅，旅长程耀德（兼），政治委员杨焕民，辖第40、第41、第42团；第15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汤成功，辖第43、第44、第45团；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辖第717、第718、第719团。全纵队共计12个团。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建设，中原军区设立了3个军区：

江汉军区（1945年8月由原第3、第5军分区编成。11月原第2军分区划归该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郑绍文。下辖独立第1旅，该旅领导由江汉军区领导成员分别兼任。

鄂东军区（1945年9月组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下辖独立第2旅，旅长吴诚忠，政治委员张体学（兼）。

河南军区（1945年10月，由原第4、第6军分区及豫中军分区编成），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刘子久。下辖独立第3旅，旅长陈先瑞（兼），政治委员傅忠海。

整编以后，中原军区野战纵队与地方武装各3万余人，总兵力6万余人，使豫、鄂、湘、赣地区的部队完成了兵力集中和统一指挥，机动作战的能力大为增强。中原军区成立以后，在以鄂豫边桐柏为中心的解放区，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5至6个军的兵力，对其他解放区的斗争进行了有效的战略配合。

（八）华南游击队的整编

位于华南地区的人民武装，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展到27000余人。他们在粤北、赣南、海南岛等地坚持斗争，组建了东江、琼崖、韩江、珠江、南路、中区等游击纵队，活动范围80余县，并建立了拥有3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中共广东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于1945年7月即决定

东江纵队以一部北上大庾岭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以另一部东进海丰、陆丰、五华等边境地区，与韩江纵队会师。部队在行进中遭受国民党军的追击，被迫退至粤北的英德、翁源地区。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北移部队难以在五岭地区立足，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可能遭受更大的牺牲，应迅速制定分散斗争的计划。

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与截击，在粤北、赣南七个地区分散活动。为了加强领导和适应斗争的需要，1945年9月间组建了4个指挥部，至1946年6月，所属部队序列如下：江南指挥部，指挥员卢伟良（后卢伟如），政治委员黄宇，辖第1支队、第7支队和第6团；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周伯明，政治委员陈达明，辖第4支队和4个大队；粤北指挥部，指挥员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辖第3支队、第5支队、西北支队、北江支队和2个大队；东进指挥部（海陆惠紫五指挥部），指挥员卢伟良，政治委员张持平，辖第6支队、第4、第5团和2个大队。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中共广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韩江纵队、珠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亦进行了整编。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美南，辖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辖第1支队、第2支队、独立第3大队和第1、第2、第3、第4大队。原中区纵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梁鸿钧，政治委员罗范群，辖第1团、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第6团。南路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楠，辖第1团、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调动大批部队进入广东“接收”，视中共东江纵队等抗日有功部队为心腹之患。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华南各游击纵队，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保卫根据地。在坚决自卫，分散斗争，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方针指导下，与广东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政治、军事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的领导下，至日本投降后已发展到5个支队7000余人（主力部队5000余人，地方武装2000余人），解放区已占海南岛3/5的面积。该纵队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及挺进支队。

国民党为抢占海南战略要地，于1945年10月令其第46军进占该岛，以该军大部兵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岛上共军”。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共海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白沙县大举进犯，琼崖独立纵队在八所至石碌铁矿一线实施伏击，一举击毁敌军列车，歼其一部，随后又两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琼崖独立纵队进行必要的反击以后，为保存实力，就地分散坚持斗争。

二、加强民兵建设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兵，是人民群众的自卫武装组织，是中国革命武装的组成部分，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力量。“民兵和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①民兵在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战争中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集团又把内战的灾难强加给人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5年8、9月间多次指出：各战略区为应付国民党军掀起的全面内战，在实施军事战略转变，组建野战军，调整地方军的同时，“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加强民兵工作的建设，健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适应在新的形势下备战任务的需要。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强调指出：“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同时，他又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注意发动群众，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各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将巩固与发展民兵作为战略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相继召开了民兵工作会议，分析了民兵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民兵工作的重心，提出了加强民兵工作的措施，从而使民兵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

首先，各战略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加强民兵建设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晋绥解放区人民武装委员会于1946年2月提出的方针是：“巩固民兵自卫队的建设，继续坚持劳武结合”。总任务是：“巩固和平、保卫和平，实现民主、保卫民主”，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随时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来犯之敌。晋冀鲁豫解放区对民兵工作提出的方针、任务是：广泛开展接敌区、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并在深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和提高民兵。要求广大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收复城市，动员参军，消灭日伪军，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1946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关于目前人民武装工作的决定》，并在巩固民兵组织的指示中指出：“以巩固为主”，是目前民兵工作的基本方针，要实行“以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力量”，只有人民武装充分发动起来，对敌斗争分散性的优势才能建立，群众路线的建军方针才能实现，根据地建设才能巩固，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才能树立。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分别发出了《关于百倍加强民兵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目前民兵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决定》。要求民兵保卫土地改革，坚决镇压封建势力的反抗；在新解放区，要尽快将民兵组织起来，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配合地方武装进行剿匪反特斗争，以推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巩固人民的既得利益。东北解放区为建立与发展民兵武装，制定了《东北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与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人民武装自卫队，是群众性的、半军事性的武装组织；是发展培养与积蓄军事力量的源泉；是地方军与野战军的广大后备军。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群

众既得利益，严防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农业生产和民主秩序；维护地方治安；协助主力部队作战。由于各战略区对加强民兵工作都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任务，有力地推动了各级人武部门在民兵工作中从思想到组织的进一步落实。

其次，各战略区对民兵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扩充。在整顿与“重新组织民兵”的工作中，各地首先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形势教育与战备教育。使广大民兵认清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政策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看清了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但和平环境并没有到来，全面内战的乌云笼罩着祖国大地。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不能“解甲种田”或“无甲种田”，要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实行劳武结合，武装起来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只有拿起武器，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才能防止敌人的倒算，打退敌人的进犯。由于战备观念的增强和对战后时局的正确认识，民兵的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参加民兵的热情异常高涨。

在民兵中普遍开展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各解放区重点进行了组织整顿和组织落实，注意以佃农、贫农、工人为骨干，联合中农并吸收其他阶级的进步份子参加；凡一切封建势力、地痞、流氓、土匪、特务和其他反动分子一律清除出民兵队伍。各级党委还指派党委成员分管民兵工作，选拔得力党员和干部担任民兵的骨干。对参加民兵的人员既严格条件，又体现政策性与群众性，反对“关门主义”和坏分子混入民兵队伍。经过整顿，保证了党对民兵组织的坚强领导和民兵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性，纠正了民兵组织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民兵组织的整顿和发展，民兵队伍迅速壮大。至1946年6月，晋察冀解放区的民兵已占全区人口的3%以上，晋冀鲁豫和华东解放区的民兵均分别占全区人口的2%，其中太行解放区还提出在1946年内，争取新区民兵达全区人口的4%，老区民兵达全区人口的6%，实现全区民兵20万人的计划。

民兵的称谓和组织各地区不尽相同，东北解放区称人民武装

自卫队，区分为自卫队与模范自卫队两种组织。规定凡有公民权的男子青壮年均参加自卫队，优秀青年男子参加模范自卫队。3至4人为一组，3至4组为一小队，一自然村为一中队，县设大队，从中选择精干坚强的队员组成基干小队，成为民兵自卫队的骨干。晋绥解放区规定，12至15岁的男女少年组成少先队；16岁以上的青壮年组成自卫队，以村或区为单位组织基干队。晋冀鲁豫解放区，根据民兵就地保卫村庄和配合主力远征支前的不同任务，分别编为民兵警卫队和野战民兵队，每个村各编一个队，数村编成一个野战民兵中队；每县编成若干野战民兵大队，随时准备跟随主力部队远征或就地配合作战。华东解放区称子弟兵团，以县为单位编成民兵团，以区为单位编成大队，基层组织编成中队或分队。县或区还设立民兵轮训队，并兼代县、区人武部警卫连。根据作战需要，民兵团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同时，在民兵中还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分队设政治队员，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大队设教导员，团设党代表。赴前方参战的子弟兵团，建立政治处。晋察冀解放区的民兵，抗日战争胜利后统称自卫队。由每小村10人，中村20人，大村30人编成自卫队，每县组建一个自卫队团。有的解放区政权机关，在国民党暂时占领的地区或边沿地带，分别组织民兵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有公开民兵与秘密民兵两种形式，担负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任务以及除奸反特、搜集情报等项特殊任务。

在整顿与发展民兵组织中，各解放区非常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大力吸收青年妇女参加民兵队伍。1946年2月，晋察冀解放区民兵自卫队中，青年妇女约占一半。1946年1月，山东胶东解放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对妇女自卫团的工作问题专门发了指示，强调妇女参加民兵的重要性。有的解放区还单独成立了妇女民兵连等，充分发挥了妇女民兵在生产、自卫和后方支前工作中的特殊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从而培养和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妇女干部。

再次，各解放区的民兵，在全面整顿壮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练兵活动。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为此，各地党委和人武部门，均把普训民兵当作中心任务来实施。各地通过练兵，使民兵普遍掌握了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要领。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委员会采取由省开办县、区民兵干部训练队，专区开办区、村民兵干部训练队的办法，对民兵干部进行了分期分批的集训，使他们学政治、学技术、学战术，培养了一批民兵骨干。如冀南地区广平、成安、鸡泽3县共训练村干、民兵4200多人。热河省在1年多时间里，集训区、村干部3000多名，民兵骨干近万人，提高了民兵队伍的素质。

各解放区在组织民兵训练中，尤其注意利用冬季农闲季节集中时间进行训练。除组织民兵练习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技术外，还结合地区实际，增加训练内容。有的在普训的基础上，开展了训练神枪手、爆破手活动；有的则结合实地，演练伏击与夜袭战术，学习班以下的战术动作；一些新解放区，则利用冬训对民兵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把冬训与扩大民兵队伍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冬训，各解放区民兵的战斗力的均有较大提高。

各地民兵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发展，又在发展中成为剿匪反霸，保护民众利益，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民兵自卫队的支持和保卫，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等农村革命运动得以顺利推行，在火热的斗争中又使民兵得到实际的锻炼。如1946年春，江苏泰兴地区的民兵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坚决保卫土改运动，泰兴县在民兵的掩护下召开了土改会议，在国民党军据点周围开展了土地复查。该县城西民兵还破获了国民党秘密特务情报网。浙东根据地大岗乡伪乡长鲁康年、鲁明治是“大岗两虎”，在新四军北撤以后，杀害共产党人员和新四军的伤病员，

罪行累累，民愤极大。1945年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召集民兵开会，组成8人武装小分队，冲入伪乡公所，逮捕“两虎”，立即处决，将其罪行昭告乡里，群众高兴，敌人畏惧。广大民兵在同农村土匪和国民党还乡团的斗争中，还挖出了不少暗藏的武器，武装了民兵，也消除了后患。山东渤海地区的民兵在1946年夏季反特剿匪858次，消灭土匪18股，歼灭匪特600多人。1946年1月，国民党派遣特务陈保善等8人潜入山东费县境内，组织特务机关，成立“费县保安团”，同年5月陈保善等决定武装暴乱，夺取费城。6月1日，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在民兵与地方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将其一网打尽。江苏响水县南沙大白乡恶霸地主魏玉庆，组织武装暴乱，杀害共产党干部、民兵多人，抢劫银行与军用物资。中共滨海县委闻讯后，立即组织民兵前往镇压，经过激战，歼灭暴徒100多人，恢复了响水县的正常秩序，保卫了人民政权和民众利益。在边沿区的民兵，经常组织爆炸队、武工队，轮番进入敌占区，广泛开展袭击、爆炸、破击活动，使敌人东西难顾，守头失尾。民兵常以“鹰抓鸡”的战术，潜入国民党军驻地，突然袭击，夺取武器，惩治首恶，使敌惊恐自危。如山西民兵运用主动出击的办法，从阎锡山部据点内捉回地主“复仇团”团长吴道隆和反攻倒算的恶霸曹三宫等人，使敌人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在太岳区民兵中涌现出张福根、罗来福、赵元玺等民兵英雄。

由于各解放区对民兵工作的重视，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民兵组织迅速扩大。至1946年6月，民兵总数在抗日战争末期220万人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据晋冀鲁豫、陕甘宁晋绥、华东和晋察冀解放区的统计，民兵总数发展到33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民兵发展到60万人，陕甘宁晋绥解放区民兵发展到31万余人，华东解放区民兵发展到150万人，晋察冀解放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通过整顿与发展，各解放区的民兵和自卫队，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民兵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使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日趋强大，成

为实施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保证。

三、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从战争转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调兵遣将，企图从人民手中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使国内出现了国共双方边谈边打的复杂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证从思想上、组织上完成由抗日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争取和平，准备战争，已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一) 进行抗战胜利后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促进部队的思想转变

抗战胜利，人民欢欣鼓舞。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殷切地企盼和平安宁的生活。许多人对国民党当局存在“正统”观念，对蒋介石集团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对国内和平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故在部队中和平麻痹、太平无事的思想相当普遍。有人认为日本投降了，抗日保国的目的实现了，应该告别战乱、解甲归田了。当看到国民党以“受降”为名，侵占解放区，撕毁停战协定，进攻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时，有些人则又感到困惑与惊慌，对前景焦虑不安。为了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使全体指战员适应新的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革命的意志，各部队都紧紧围绕和平与战争这个中心问题，持续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促进了部队指战员的思想由抗日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保证了军事战略转变的顺利实施。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极其精辟地阐明了战后国内阶级关系，国共两党关系及其现状与前景，回答了全党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时局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与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

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各战略区以毛泽东的上述报告为指针，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各级领导亲自动员与讲课，政治机关编印授课提纲与辅导材料，采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了反复与深入的政治教育。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抗日的战火刚刚熄灭，内战的硝烟又将燃起，要制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与内战，就必须为巩固与发展革命的成果而奋起抗争。许多部队用“谁种庄稼谁收割，谁栽果树谁得果”的通俗道理，说明抗战胜利的果实是不允许任何人抢夺的。大家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们作战。……谁要想轻轻松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①通过政治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在战略转变的重要时刻，明确了战后时局与国内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了解了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坚定了斗争信心。为了和平与生存，非但不能“解甲归田”，还要奋起自卫，走向新的征程。

（二）增强战备观念，促进部队思想作风的转变

《双十协定》签订后，在部队一些人员中，产生了和平幻想，他们感到“和谈”成功了，希望回家过“三亩地一头牛”的太平生活，离队思想有所滋长。而部队中原有的游击主义习气和非组织观念还未得到克服，这些不良倾向如不消除，必将有碍于战略转变和正规作战的实施。因此，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教育就成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

各级政治机关针对部队思想实际，首先从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战备观念入手，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重庆谈判的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知》和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使部队进一步认清重庆谈判后的时局。广大指战员结合文件精神，回顾历史，分析现实，列举了国民党蒋介石过去打了10年内战，抗战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和平谈判中又施展假谈真打的诡计等一系列事实，深深感到不能轻信国民党蒋介石在和平谈判中许下的承诺。纷纷表示：要时刻牢记毛主席关于“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的教导，树立起坚强的战备观念。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级政治机关又组织部队进行增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促使部队自觉克服伴随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地方性与分散性的不良作风。并结合部队整编和作战、训练的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提高部队正规作战的意识，从而使部队指战员的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观念尽快适应正规作战的需要。

第三节 特种兵和军事院校的建设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和军事战略转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在建立野战军，调整战略部署，增加部队数量的同时，加强了特种兵与军事院校的建设，以资培训大批干部，发展技术兵种，提高部队素质，增强部队作战的能力。

一、特种兵的建设

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决定延安总部炮兵学校除一部分学员赴各战区组织炮兵部队外，大部分人员开往东北，搜集日伪军遗弃的军械与炮兵器材，作为建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的基础；炮校的各种火炮除以一部留在陕甘宁边区组成炮兵营外，另以学员第3、第10队的山炮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页。

入第358旅炮兵营。1945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在给东北炮兵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受降中所获之飞机、坦克及美帝之帮助，蒋军技术兵种已大为加强。如我们不立筹防御对策，欲进行大规模运动战，保障取得每一战役的决定胜利，将增加严重困难。我军在毫无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如不立筹地上防御、炮兵的集团使用，……将妨害我夺取大城市”。中央军委还多次指示各战略区，要把特种兵的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之一”。各解放区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充分利用在作战中缴获与搜集的敌军火炮与器材积极发展炮兵。

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945年10月，将搜集到的日军火炮组成炮兵旅，下辖2个团：第1团以原山东胶东军区独立团第3营为基础组成，辖5个炮兵连，有山炮15门，人员900余名；第2团以独立工兵营为基础组成，辖3个炮兵连，有野炮17门，人员近400名。延安总部炮校到达东北后，炮兵旅机关并入炮校，撤销炮兵旅番号，将一部分干部派赴各地搜集武器，创造条件，发展炮兵，另一部分干部派赴主力部队担任建设炮兵的骨干。至1946年6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余万发，坦克12辆，装甲车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火炮零件与器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此时，东北全区共组建炮兵6个乙种团（各辖2个营），4个丙种团（各辖3至4个连），6个独立炮兵营（各辖2至3个连）及22个炮兵连，总计各种炮兵连80个。1946年5月在牡丹江成立高射炮大队，拥有高射炮27门，这是人民解放军成立最早的一支高射炮部队。由于炮兵的建立和增多，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编设炮兵调整处，专司炮兵的协调与指挥。1946年7月份以后，民主联军总部成立炮兵司令部，由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炮兵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晋察冀军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即派干部赴张家口地区搜集火炮，经半个月努力，搜集到各种火炮52门，随即着手建立炮兵。

1945年10月，以原炮兵干部训练队为基础，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炮兵团，下辖3个炮兵营和教导队。

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在抗战胜利时，共有2个炮兵营又17个炮兵连。至1946年1月，在战斗中缴获各类火炮约50门，随即组成华中炮兵团和苏中炮兵团；各纵队共组建3个炮兵营又12个炮兵连。

晋绥军区部队在察绥、察南作战中缴获火炮8门，1946年2月，将原有炮兵营扩建为炮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原延安总部炮校留下的部分人员与火炮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炮兵营。

晋冀鲁豫军区，为贯彻中央军委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以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缴获的火炮为基础，命令各纵队与各军区扩建炮兵，并在军区军政大学中增设炮兵科，以培养炮兵干部。至1945年12月，晋冀鲁豫军区第2、第3纵队均组建了炮兵营；太岳军区第1、第2军分区将原有的炮兵连扩编为炮兵大队；太行军区组建了3个炮兵连。全区总计2个炮兵营、2个炮兵大队、4个炮兵连，共有火炮30余门。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各军区的炮兵都得到了发展，使全军炮兵发展到14个团、17个营及38个连，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攻击力量，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炮兵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炮兵部队组建以后，随即协同步兵参加了绥远战役、邯郸战役、山东讨逆战役和四平保卫战等大小战役和战斗50余次，充分展现了炮兵的威力，为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程兵是人民军队最早建立的特种兵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它既是保障兵种，又是战斗兵种。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据此，各解放区相继扩编了工兵分队，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各军区的炮兵还少，炮弹缺乏，在作战中，攻城破障等手段，多用工兵进行攻坚爆破作业。为此，1946年6月10日，中央军委指示各大军区：“望速令全军每旅团均组织工兵爆破部队，收集大量黄色炸药，造成我军攻城技术之新记录”。20日，中央军委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再次指示：“每旅须有一工兵连，专门训练爆破及坑道作业，反复练习这两门专技，其它架桥建筑及筑城均暂缓进行”。各解放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建设工兵的多次指示精神，从本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工兵的扩编与训练。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4月20日发出《使用工兵的规定》，要求所属部队和军区，组建、扩编和训练工兵爆破分队，对现有工兵干部不许改行，对工兵学校派到各部队指导工兵专业训练和实习的干部与学员，不准另派它用。至同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大多数军区、纵队和师（旅），以工兵学校分去的干部为骨干，以原有的工兵分队为基础，补充人员，组建或扩编成工兵连，多数步兵团组建了工兵排，连队组建了爆破小组。晋冀鲁豫军区为适应编组野战军的需要，将军分区的工兵连多数改编为旅工兵连，并在部分步兵团、营、连建立了工兵爆破排、班、小组。华东解放区在山东军区与新四军一部开赴东北后，所属军区、纵队（师）大部组建或扩编了工兵连（排）。1946年3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将滨海军区工兵连扩编为山东军区直属工兵营。11月，华中野战军为克服河川障碍，组建了直属工兵队，装备了渡河器材。晋察冀军区于1945年冬，将该区直属工兵连和由延安调属该区的教导第2旅工兵连合编，组成工兵训练队。1946年4月，又将工兵训练队改编为3个工兵营的架子，经过调整与补充，分别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2、第3、第4纵队的工兵营；军区司令部成立工兵室，专司全区的工兵建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5年10月，将所属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的工兵连合编，组成工兵教导营进行专业训练。1946年4月，工兵教导营撤销，3个工

兵连归建。从该营抽调部分骨干，经补充新兵后，又组建了联防军司令部炮工营工兵连、警备第1旅工兵连、新编第10旅工兵连、吕梁军区工兵连等。晋绥野战军的4个旅，亦在原有工兵连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充实与加强。

由于各军区工兵分队的扩大和专业训练的加强，部队的作战攻坚与工程保障能力有了提高。在上党战役、四平保卫战及山东泰安、德州等攻城战斗中，工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尔后工程兵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坦克大队。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奉命搜集日军遗弃的坦克和器材，着手建立坦克部队。1945年12月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修复的1辆日军坦克为基础，在沈阳市马家湾子正式成立坦克大队，全大队30余人，隶属炮兵学校建制。不久，该大队随炮兵学校移驻通化。坦克大队成立前不久，部分技术人员在四平、抚顺、铁岭等地搜集坦克4辆、汽车1辆；又接受西满军区、牡丹江军区移交的坦克15辆以及大批器材与300余桶油料。这些坦克、器材与油料为坦克大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1946年5月，坦克大队复迁黑龙江省宁安，7月中旬又移驻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县），改称战车大队。下辖3个坦克队以及汽车队、警卫连、修理厂、材料库等单位，全大队400余人，各型坦克20辆，牵引车10辆，装甲车和汽车30辆。

战车大队成立后，便投入紧张的战备训练。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教材、教员甚缺，兵多车少，油料不足，气候严寒。全体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勤学苦练，互帮互学，能者为师，逐步掌握了坦克的操作技术。在东宁、绥阳、绥芬河地区剿匪中，战车大队配合步兵参加作战，成为民主联军首次使用坦克作战的战例，为装甲部队的成长壮大培养了技术人才，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建立人民空军，于1945年8月决定在东北地区首先建立航空部队，并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由苏联学习回国的航空干部常乾坤、王弼等人。同月，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为开创人民航空事业作出成绩。刘少奇和任弼时亲自指示筹备人员，要查清东北航空方面的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

1945年9月2日，王弼、吴凯等人乘起义的汪精卫伪政权“建国号”运输机，由延安经张家口转赴东北。10月初，第二批航空干部常乾坤、刘玉堤等10余人再赴东北。他们先后在辽阳、鞍山、大石桥等地搜集日本军队遗弃的10余架飞机和有关器材，并接受日军一个航空大队约300余人投降。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在沈阳成立航空队（后迁通化）。由“建国号”机长（飞行教官）蔡云翔任队长，黄乃一任政治委员，全队300余人，拥有日式飞机46架。同月，中共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为加强对航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黄乃一为秘书长，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原日军航空大队长林弥一郎）为委员的航空委员会。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选调100余人到航空队学习和工作，并将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由朱瑞任总队长，吴溉之任政治委员。航空总队下辖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修理厂等单位。这是人民解放军第1支航空部队，为尔后空军建设与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二、军事院校的建设

为了战胜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提高部队战斗力，培养训练有素的干部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军事院校的建设。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即决定在原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及其分校的基础上，组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等各类军事院校，招收部队在职干部和社会知识青年，经过教育培养，使其掌握和提高作战指挥、战术技术水平及军事专业知识，成为部队的骨干和建设人才，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东北军政大学。其前身是抗日军政大学。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东北根据地，在派遣大批干部

与部队进军东北的同时，令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由陕北开赴东北，担负培训东北部队干部的重任。1945年10月12日，抗大总校在副校长（代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的率领下，从陕西绥德出发，向东北挺进。该校此时共5个大队，除2个大队到其他解放区外，所辖第1、第3、第4大队与校直属队共计2500多人。其中教职员750人，学员841人，战士和勤务人员988人。沿途受到当地驻军的热烈迎送，并就地分配给部队的干部与学员500多人。1946年1月到达通化市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抗日军政大学改编为东北军政大学，由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大队和由原延安总部炮兵学校改编的炮兵队。学校任务一是建校，二是帮助地方政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4月，军政大学奉命迁入长春，担任改造俘虏，接受新兵，进行教育后补充部队任务。东北民主联军撤离长春时，该校迁驻德惠，3个大队改为3个支队。5月复迁黑龙江省北安，并招收青年学生602人（其中蒙古族学员295人）入学培训，第1期于7月1日正式开学。在此期间，还在佳木斯、延吉、安东（今丹东）建立了北满、东满、南满军政大学分校。

东北炮兵学校。1945年9月23日，延安总部炮兵学校迁往东北，11月底到达抚顺，12月移驻通化，并入军政大学。1946年5月由军政大学分出，迁往牡丹江组建东北炮兵学校，由朱瑞兼任校长，邱创成任政治委员。下设山炮、野炮、迫击炮、高射炮、战车5个学员大队。此间，炮校多方收集日军遗弃的火炮和筹备教学器材，准备开学。因炮校初建，第1期招生不足百人，学校大部分干部被分配到炮兵部队，参加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和协助地方工作。同年8月，命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东北工兵学校。1945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130余人随炮校开赴东北。11月，工兵科到达辽宁抚顺后，部分人员奉命赴辽东、吉林、北满军区组建和扩编工兵；大部分人员转至通化市与山东进入东北的抗大一分校工兵队合编。

并由抗大总校调入一批军政干部，于1946年3月1日在通化建立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隶属东北军政大学领导。全校200余人，下辖2个学员队。校长李荫南，政治委员余益元。6月，唐哲明任校长，李荫南改任副校长，这是人民解放军建立的第一所工兵学校。建校初期，全体人员艰苦创业，自编教材，自制器材，以前线需要设置课程。按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广泛开展爆破运动》的指示，除派出部分人员上前线参战外，校内连续开办了两期爆破训练班及赴部队巡回训练，直接传授爆破技术，在半年时间里为东北部队培训了800余名爆破骨干，解决了当时破击铁路和部队作战的需要，提高了工兵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为今后发展工兵奠定了基础。

东北航空学校。1946年3月，由在通化成立的航空部队改编为航空学校，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王弼先后任政治委员。4月以后移驻牡丹江与东安。航校下设飞行、机械2个学员大队，附设有工厂、机务等保障单位，全校共计600余人，各种飞机46架（其中37架须经修理方能使用）。首期学员主要是由山东军区教导团及其他解放区选调的青年学生。至1948年底，共培训学员三期547人，为初建人民空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通信学校。1945年11月创建于东安，后移驻吉林。该校隶属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第三处，由张可曾任副校长。自建校至1949年4月，共举办8期（每期4个月至半年）训练班，培训报务员和通信技术干部505人，保证了东北通信部队的需要。

东北测绘学校。1946年5月创建于长春市。招收部队中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班排干部和地方知识青年，聘任地方测绘人员任教。辖2个学员大队，培训3期，为部队输送测绘人员330余人，成为参谋人员的后备力量。该校后迁合江省勃利县（现属黑龙江省），培训规模逐渐扩大。

其他战略区在抗战胜利后，均以原抗日军政大学分校为基础，先后组建各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或军政大学。

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该校于1946年2月，以原抗大第2分校为基础组建，由聂荣臻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以后该校与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一部合编为华北军政大学。

山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该校成立于抗日战争末期，由抗大第一分校和山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合编而成。抗战胜利后，该校继续兴办，由张云逸兼任校长。山东军区还成立了通讯学校。在华中地区，1945年12月，原雪枫军政大学、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及苏中公学合编为华中雪枫大学，由张爱萍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决定：将华中雪枫大学、山东军政干部学校、淮南随营学校、山东军区通信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由张云逸兼任校长。下设7个大队，为华东前线输送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

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该校于1945年10月，由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派来的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太行分校及太岳分校的干部合编而成，由滕代远兼任校长。以后该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成华北军政大学；另一部分随刘、邓野战军南征，组成中原军区军政大学。晋冀鲁豫军区还建立了医务学校。

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胜利后，到1945年底，保留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继续训练干部，由王长江任校长，杨尚高任政治委员。以后该校改编为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45年9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的基础上成立贺龙中学，这是一所初级军政干部学校，先后设有一部、二部、三部与地方干部训练班，由贺龙兼任校长，彭德、李长路任副校长。上述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贺龙中学，后来合编为西北军政大学。

特种兵和军事院校的建设与整编，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能力，为以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章 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实现国内和平

第一节 国民党以受降为名,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1945年8、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的同时,竟不顾中共的和平主张和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坚持其内战政策,以受降为名,积极策划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1945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对日军受降部署,对10个战区和4个方面军的200余万军队区分了受降任务。其中把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也纳入其第1、第2、第3、第10、第11、第12战区的受降计划。这实际上是一个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并借受降之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部署。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正在进行,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密令:“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

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①这说明国民党蒋介石“实现和平”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

1945年10月13日，亦即《双十协定》签署后的第3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发出密令：“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②这又说明，蒋介石在其同意签署的包括“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等内容在内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便急急忙忙地发动“剿共”。

一、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从1945年8月至9月中旬，国民党利用谈判作掩护，以受降为名，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0、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9月中旬至11月，特别是《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不顾共产党忠诚执行“协定”和

^① 《中共中央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蒋介石之密示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

^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年版，第174页。

言行一致、相忍为国的伟大精神，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攻益急，规模日益扩大，由9月中旬的73个师增加到11月上旬的111个师，总兵力达82万余人。如果加上正在开进和准备进攻解放区的部队，总计达100万以上。^①企图全部摧毁解放区，以达“彻底根绝匪氛”之目的。从8月下旬至11月上旬2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的基本情况是：

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倾其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关，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其中第1军之第78、第167师，第3军之第7、第32师，第16军之第22、第94、第109师进入晋南后，以第1军一部进占运城、安邑，以第3、第16两军沿同蒲路北进，经正太路东进，于10月20日进占石家庄，进而于31日占领高邑。第36军之第28师，第90军之第53、第61师，第78军之第49师和第27军之第47师、暂4师分别进入陇海路沿线之渑池、新安、洛阳、偃师、巩县、荥阳地区“清剿”。以第85军之第23、第110师，第1军一部，第38军之第177、第55师分别进入辉县、安阳等地区“清剿”。以第31集团军直属之暂66师配合第5战区第15军之第64、第65师进入伊川、嵩县、登封、郑县地区“清剿”。胡宗南将上述地区划分为七个“清剿”区，声称：“宁可枉杀一千，不让漏网一个。”^②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11战区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年版，第192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年版，第183页。

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其中第19、第23、第83军10多个师以及省防军一部于8月下旬和9月下旬进入晋东南地区；第34军之暂44、暂45、第73师和第61军一部共4个师进入浮山、翼城、夏县地区，对太岳解放区实行“清剿”；以第33、第61军各一部和骑兵第1军之骑1、骑2师共6个师分别向晋中、雁北地区进攻，其中第61军之暂48师于9月9日进占文水县城。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其5个军13个师约14万人，向浙东游击纵队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中旬，该战区第28军之第52、第80、第192师和第49军之第26、第79、第105师向浙西地区进攻，并于19日侵占德清、武康两县城。9月下旬，又以第70军之2个师和第49军之第79师在钱塘江两岸合击北撤之浙东游击纵队，使该纵队在海盐附近蒙受重大损失。之后，顾祝同又集中第28、第49军和第88军之新编第21、第62师乘浙东游击纵队撤退之机，进占浙东根据地；其第25军之第40、第108、第148师于10月4日将浙东纵队包围于澈浦地区。浙东纵队奋起自卫，在突围中伤亡惨重。

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以其5个军13个师共13.5万人向河南、鄂豫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第47军之第125、第127师、暂1师由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北出豫东，于10月5日占领太康，进而向开封以南之水东解放区进攻^①；第41军之第122、第124、第104师于10月初由湖北安陆进至河南方城、舞阳地区向河南军区部队进攻；第69军之暂编第28、第181师于10月中旬向四望山解放区进攻；第55军之第29、第74、第181师，第68军之第119、第143师，于9月下旬自许昌、新郑地区向水东解放区之逍遥镇、鄢陵、尉氏、杞县等地区猖狂进攻，并于10月6日、10日强占扶沟、通许、杞县等城。

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以其第63军之第152、第153、第

① 水东解放区指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地区。

186师，第65军之第154、第160、第187师共4.6万人向广东东江解放区大举进攻，并于9月下旬占始兴、英德、翁源、佛冈等城，继而侵占东江以北解放区全部，东江纵队被迫南撤，国民党军复渡江追击，深入东江南岸之惠阳、东莞、宝安地区，东江纵队损失惨重，处境十分险恶。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其第4军之第59、第90、第102师配合第7战区部队一部对位于粤北南雄地区之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所部实施进攻。南下支队被迫转移始兴，国民党军第4军穷追不舍，迫使该支队不得不由粤北北撤。

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以其3个军7个师共6.8万人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其第7军之第171、第172、第173师于9月上旬进抵蚌埠后，10月中旬进占石门山、冈子楼、古沛等市镇；其第48军之第138、第176师以一部进驻蚌埠，另一部伸入安庆、望江地区“清剿”；在鄂东地区，以第84军之第174、第189师向黄冈、麻城解放区进攻，并占领叶顾岩。

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以其6个军14个师10余万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在平汉路方面，以第30军之第27、第30、第67师，第40军之第39、第106师和新编第8军之第6师、暂编第29师于9月中、下旬经广武、郑州尔后北渡黄河进占新乡，其中新8军前出汲县，企图与第1战区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在津浦路方面，以第12军（该军由第10战区调来）之第111、第112、第117师，第97军之新编第29、暂编第33师和骑兵第2军之骑3师、暂编第14师分别由项城、太和、阜阳北上，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统一指挥下，企图在占领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后，进而沿津浦路及其以西地区北进。其中第12军于9月上旬进占商丘、兰封后，继续向济南地区进攻；第97军由太和经徐州进占韩庄后进而向邹县进攻；骑兵第2军进入徐州配合济南地区作战。

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以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

绥东大举进攻。其中暂编第3军之暂10、暂11、暂17师和东北挺进军之新编骑5、骑6师于8月中旬竟勾结伪蒙军以突袭手段从八路军手中夺占归绥（今呼和浩特），进而又进占武川、和林、凉城等地；其第35军之第101师、新编第31、新编第32师于9月上旬进占集宁、丰镇、陶林等地；其骑兵第1集团军（由伪军改编）挺进大同，进而进犯阳高地区。各部队占领上述地区后，9月上旬又沿平绥路东犯，其先头部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进至柴沟堡、渡口堡一线，逼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此外，傅作义还以第22军之第86师、骑61师和第67军之新编第26师进占神木，配合其主力沿平绥路东进作战。从8月18日至9月11日，傅作义部共占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县城7座。傅作义还声称要进攻察哈尔、热河和雁北解放区，“不让八路军有立足之地。”^①

国民党以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不惜出卖主权，乞求美援。而美国政府为了重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使之成为控制中国的工具，也不惜以巨大的军事援助，帮助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8月11日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军事援助目前将继续用于支持（中国）中央政府部队为收复中国战区内现在被日军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须的军事行动。”^②实际是援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魏德迈根据这一指令，组织了巨大的海空运输力量，把分布在我国大后方的国民党军迅速运到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从1945年9月至11月，即《双十协定》签订前后，美军以空运和海运方式，将国民党的7个军19个师24.4万余人，从广西、湖南、九龙和越南的海防等地运送到华北、华东各战略要点。其运送的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年版，第185页。

^② 《中华民国史纲》，河南出版社1985年版，第636页。

具体情况是：第94军（第5、第43、第121师）37700人，9至11月，由柳州空运天津；新编第6军（辖第14、第207师、新编第22师）37700人，9月由芷江空运上海；第74军先头第57师11000人，9至10月，由芷江空运南京；第92军（辖第54、第56、第42师）40500人，10月至11月，由武昌空运北平；第52军（辖第2、第25、第195师）43000人，10月至11月，由海防海运秦皇岛；第13军（辖第54、第4、第89师）37100人，10月至11月，由九龙海运秦皇岛；第8军（辖第103、第166、第91师）37700人，11月由九龙海运青岛。

由于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使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一名帮助国民党军搞运输的美国士兵说：“我们应该有勇气老老实实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①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美国又以海军军舰将国民党军第53军周福成部、第54军阙汉騫部、第60军曾泽生部、第71军陈明仁部、第93军卢浚泉部、新编第1军孙立人部共18个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及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30万人，由大后方运往华北、华东、华南、东北等战略要地。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国政府为海运、空运国民党部队共耗资6亿多美元。

美国政府除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驻华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魏德迈，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帮助国民党政府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并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给中国之国民政府。”^②于是，1945年9月7日，美国第7舰队侵入了上海港，60艘舰只进驻黄浦江及长江口，随后又在外滩设立司令部。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并入侵天津、北平、唐山地

^① 美国《花旗报》（中国版），1945年11月。

^② 《马歇尔使华》第399页。

区。10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师1.8万人在秦皇岛登陆。4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侵入烟台港海面，竟肆无忌惮地派军官上岸向八路军烟台驻军送来“通牒”，要求“接收”烟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6日，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提出强烈抗议。16日，美军军舰只好离去。10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1.5万人在青岛登陆，并占领青岛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兵第1、第2、第3大队进驻青岛、北平。1945年9至10月，美军总计在华北、华东等地登陆达5.3万余人，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扩充反共势力，竟不顾全国人民的谴责，认敌为友，与日伪合流，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一方面，从1945年8月中旬起，陆续将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将一些汉奸头目委以要职。8月12日，汪精卫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14日，汪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为北平绥靖司令。9月，又将汪伪第5集团军庞炳勋所部（辖2个师）收编为第1路军；将汪伪第3集团军孙良诚所部（辖5个师）收编为第2路军；汪伪第2集团军张岚峰所部（辖5个师）收编为第3路军；汪伪第7集团军孙殿英所部（辖2个师）收编为第4路军；汪伪第4集团军吴化文所部（辖5个师）收编为第5路军；汪伪第6集团军郝鹏举所部（辖3个师）收编为第6路军。

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利用部分投降日军进攻解放区。9至11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日军，除由八路军缴械者外，在美军和国民党军控制地区共有日军26.1万余人，除青岛日军1500人缴械外，其余日军在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令下，不仅没有缴械，反而将其冠以“护路队”、“先遣队”等名义，驱使其成为“剿共”第一线兵力。其中最突出者：一是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部、蒙疆驻屯军总部、坦克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2、第8旅团及第3、第5独立警备队等共10.6万余人，以保护铁路为名，分驻北平

以外各铁路沿线，“作有效之防御”。何应钦还命令这些部队，“坚决反击”，必要时应向中共武装“收复失地”。二是驻太原、大同侵华日军第1军军部、第114师团之独立步兵第10旅团、独立步兵第14旅团等部共4.9万人，对这些日军，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仅不令他们立即投降，反而将其中的2万余人编为“山西先遣支队”，布防于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执行所谓“护路”任务。三是山东侵华日军第43军军部、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及第9、第11、第12独立警备队等部共6.4万余人，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收复失地”的命令下，驱使其向即墨、胶县、淄博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当遭到人民军队的迎头痛击后，何思源还亲自到济南医院慰问日军受伤人员。在苏中地区，国民党方面还命令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以“剿共队”名义，重陷已解放之海门县城。

国民党此种倒行逆施，深受侵华日军欢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乘机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① 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建议十分赞赏，打算采纳。只是后来由于美国的反对，蒋介石才不得不放弃这一意图。

向解放区进攻之国民党军和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在豫西地区，国民党军第64师和暂66师以及该区之日伪军，侵占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之伊川、宜阳、登封、禹县等地区后，从9月15日至21日的7天之内枪杀八路军伤病员、地方干部、抗日军人家属以及各阶层

^① 《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454页。

进步人士 500 余人，甚至惨无人道地采用剥皮、刀砍、活埋等办法残杀无辜群众，手段十分残忍。禹县以北之盱眙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后，当场枪杀区长以下政府工作人员 22 人；该县文殊店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有 40 余名妇女被强奸，50 余头牲畜被抢掠。凡此种种，几乎遍及所有遭到进攻的解放区。向绥远以东进攻的傅作义部骑兵第 4 师师长刘万春，于 9 月 23 日给傅作义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自我军东进以来，部队骚动地方，甚至奸淫抢掠，纪律荡然，以至民怨沸腾。”^① 绥远人民普遍称傅作义部为“官土匪”，流传一首民谣：“说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由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人民血腥镇压，惨绝人寰，使得解放区广大人民莫不悲愤填膺，他们奋起呼吁：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伸张正义，立即制止国民党当局与日伪的合流，制止其残害人民、向解放区进攻的滔天罪行，以免中国在抗战胜利后重演内战惨剧。

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方针、部署

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形势，先后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艰苦抗战八年，功在国家，但国民党不让我军受降，并动员了 70 万军队在敌伪的掩护和帮助下，正向北平、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地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② 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不仅要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还要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依据中苏条约对它有利的规定，出兵占领全东北。据此，中共中央于 8 月 23 日和 26 日一再指示全党，务必认清当前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对国民党的进攻必须自卫还击。并明确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军事文集》第 1 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 年版，第 195 页。

^② 《中央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致各区党委电》（1945 年 10 月 15 日）。

指出：“蒋介石消灭我们的方针改变没有？没有改变，不会改变的，他可能赞成和平是因有种种困难条件所致，是采取暂时的和平政策，以便取得时间治好疮疤，壮大他自己的力量，准备将来消灭我们，他们就是这种方针。”还告戒全党：“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局部内战，并把他打出去，他就会得寸进尺，贻害无穷。”并指示全军：“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

中共中央基于上述分析，决心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并提出如下方针、部署：

8月13日和23日，毛泽东先后指示全党：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接着，他又就斗争策略问题向各战略区领导人指出：我们对蒋介石是采取“洗脸政策”，即：蒋攻我亦攻，蒋停我亦停，有团结有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任务，8月26日，中央军委就华北目前军事部署给各战略区发出指示电，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①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晋察冀军区应即彻底破坏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同蒲路、正太路、德石路、平古路、北宁路，迫使敌伪兵力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便于我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赵尔陆部主力^②应

① 白晋路指山西太谷的白圭经沁县、长治至晋城的铁路。

② 指晋察冀军区所辖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所指挥的部队。

即进占正太路之榆次、娘子关段，控制该路，夺取阳泉兵工厂”；“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①夺取大同，巩固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战斗，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在山西方面，须尽量消灭阎锡山部，夺取离石、汾阳、孝义、文水、交城，一时不能取得亦须造成包围封锁之势”，威迫阎锡山部内部变化。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全国的战略指导方针以后，对全国的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调整的中心内容是把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作为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心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沿线组织几个有力战役，以阻止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达到既掩护八路军、新四军一部顺利进入东北，又有利于争取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之目的。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先后多次指示各战略区：目前作战的重心应放在4条铁路线上，开展交通破击战；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迟滞顽军北上的时间至少应在两个月以上，使我军能完全控制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一线，这对于争取东北和控制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10月20日，中共中央就实现全党的中心任务又进一步向各中央局、各野战部队发出指示：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进攻，还必须注意扩大解放区，“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了这一中心而服务。”

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全军提出新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就“布置

^① 指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

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这一关键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晋冀鲁豫区，“以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进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晋察冀和晋绥区，“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夺取雁北 13 县”；“聂、贺军待绥远战役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肖、罗野战军^①限上半月（1945 年 11 月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之蒋军”。山东及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并准备“打张岚峰、郝鹏举伪军及何陈两顽^②之后梯队，控制新黄河以北，孤立何陈两顽深入徐州部队，保障与声援五师与河南军区主力之行动”。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就津浦、陇海、平汉、同蒲、正太、平绥、北宁等 7 条铁路“施行有计划的破坏和扼守”问题，给各中央局、各战略区明确的区分了任务，即：“津浦路德州至天津段，归渤海、冀中负责；德州至济南段，归冀鲁豫、渤海负责；济南至徐州段，归山东、冀鲁豫负责；徐州至浦口段，归新四军负责；陇海路归新四军、冀鲁豫负责；平汉路石家庄至新乡段，归太行、冀鲁豫负责；石家庄至天津段，归冀晋、冀中负责；正太路归冀晋、太行负责；同蒲南段归太岳负责；北段归晋绥、冀晋负责；平绥路归晋绥、晋察冀负责；北宁路归冀东负责。”中共中央在这个指示中还规定：“凡归两区共同负责者，须有一区受另一区之统一指挥，由各中央局具体指定之。”

^① 指肖克、罗瑞卿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

^② 指位于徐州地区之国民党军第 10 战区第 15 集团军何柱国部和第 19 集团军陈大庆部。

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自卫反击作战方法，特别是开展铁路破击战方法先后几次向各战略区作了明确指示，主要是：第一，“动员全党、全军及广大人民，认识目前交通作战的严重性”。务必明确：“对于各路前进顽军加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几十个师，阻止其前进，则国民党的反动计划必被我打破，我在将来长期和平阶段中的有利地位即能确立”。^①第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整批敌人。要求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3万人到5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第三，以小部队和民兵配合主力作战。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既阻止其前进，又断绝其后方接济，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使其孤军深入，补充困难，陷于被动，在其弱点暴露时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第四，发动广大群众配合野战军破击铁路。凡有强大力量足以控制铁路一段时，均应力求控制一段，布置战场，和顽军作战，求得整批消灭顽军力量，阻其前进。凡不能控制铁路一段时，则应积极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凡无正规部队地段，必须组织多数武工队、游击小组去埋设地雷、炸弹和翻车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打退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而制定的方针、部署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而奋起自卫还击的决心和信心。遵照这些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山东和华中军区，以及东北人民自治军分别和平汉路、同蒲路、平绥路、津浦路以及北宁路沿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磅礴气势，对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展开了有力的反击。

^① 《中央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上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10月15日）。

第二节 晋冀鲁豫军区举行邯郸战役， 打退国民党军沿平汉路的进攻

一、国民党军统帅部企图以第11战区孙连仲部打通平汉路

在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有半数以上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要把这众多的军队调到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是国民党军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

国民党军统帅部为实现其抢占平津、夺取东北的战略目标，除将一部分军队用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平津等处输送外，主力则加紧从陆路推进。到10月中旬，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第16两军经同蒲路、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进到闻喜以南；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共4万余人，在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40军军长）、高树勋（兼新8军军长）及参谋长宋肯堂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沿津浦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骑2军（第96军）、第12、第97军和吴化文部，其先头的2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沿平绥线进攻的国民党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则已进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兴和等地，企图夺占张家口。

上述4路向华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以平汉一路兵力最大，是其进攻的主力。国民党军统帅部赋予该路进犯军的主要任务是“接收冀省，击破奸匪囊括华北企图之目的，使三〇军及新八军等部，自丰乐镇强渡漳河，沿平汉路向北推进，击溃当面之逃匪后，迅速进出于保定、石家庄各附近地区。”^①具体进攻部署：“（1）不

^①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6页。

待三二军之到达，即以三〇军四〇军新八军各部，于十月上旬分自新乡汲县沿平汉路向安阳集结后，即在丰乐镇附近架设军桥，作北渡漳河之准备。(2)新八军及三〇军(欠二七师)为左翼兵团，应于十月二十二日先以一部自丰乐镇强渡漳河，占领北岸桥头阵地，以掩护其主力及右翼兵团四〇军(附二七师)之渡河。(3)两兵团渡过漳河后即相机攻略磁县，再沿平汉路基两侧地区向北攻击前进。(4)两兵团作战地境为赵庄、黄龙、吴村、老庄相连之线，线东属右翼兵团。”^①

二、晋冀鲁豫军区决心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保卫解放区，掩护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除以太岳部队全力展开同蒲线的作战外，集中主力坚决阻击沿平汉线北进的国民党军。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1)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为着争取时间，目前以中心区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向交通要道沿线集结，配合小部分主力于铁道、公路，对顽阻击、侧击、扭击，广泛地雷爆炸，破路拆碉，平毁城寨，迟滞、疲惫、消耗顽伪，以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伪每路一师或数师。你们主力将来是否应到冀东决战，看上述成效及时局再行决定。(2)沿同蒲北进之十六军，已集中榆次、太谷线，在敌掩护下，通过正太路，难以寻求机会歼灭其一师或一团。我对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及七师，尚未消失歼灭其部分机会，似以太岳区近五万主力与地方军对付即够，集中一万五千至二万主力，每次消灭其一两个团，有两三次这样的战斗，第三军即不能前进。十

^①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6页。

六军亦可能牵制于正太路给以部分的打击。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10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军委还指示刘、邓，要选择好歼敌战场，讲究打法。指出：“在安阳以南地区，似难寻求一次歼灭其三、四个团的有利机会，且易变为战役上的阵地持久消耗战，假若如此，于我不利。因此我必须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一次消灭其一两个师。再各个消灭之。”“我在安阳、淇县间，应采取运动防御，以不超过两团兵力，组织这一防御侦察战，相当宽正面的、轮番的节节抗击，达到迟滞、疲惫、削弱敌人，侦察其战斗力之强弱。但敌深入安阳后，再行北进时，我一般不应多从正面抗击，让其大胆前进，伸至某一于我有利之地区时，我事先应在这一地区以二至三个团，加强火力，补充弹药，布置纵深防御，坚决扼制之，不许其前进，逼迫其全部或大部展开，

我主力再从其暴露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机动战。”^①中央军委原确定调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即杨得志纵队）经冀东进入东北，为集中兵力打好平汉战役，决定暂停北调，留下参战。

晋冀鲁豫军区为坚决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予的作战任务，对双方的情况作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兵力强大，装备优良，久经训练，长于防御；但该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远离后方，供应困难，突击力弱，不善野战；其第一梯队的3个军都是西北军，除第30军已变成半嫡系外，其第40军和新8军均为“杂牌”、“圈外部队”，特别是新8军中还有一部分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民主分子，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驱使其作内战先锋，极为不满，其军长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都是他们的弱点。我军方面，在上党战役结束后编组了野战军，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主力，依次编成第1、第2、第3、第4纵队。每个纵队有1.2万人至1.5万人。第2、第3、第4纵队利用上党战役的缴获，充实了装备，并组建了炮兵营。除第4纵队使用于同蒲路方向作战外，其余均可集中使用于平汉路。这些野战纵队虽然编成不久，装备较差，且连战之后未经整训，比较疲劳；但全系胜利之师，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士气高昂，又控制了约250余公里的平汉线，可作为诱敌深入的战场，加上有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因而具备了歼灭国民党军的基本条件。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心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太行军区第1、第4、第5支队、独立支队，第17师，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以及冀南军区部队一部，共6万人，动员10万以上民兵、自卫队参战，准备以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线北犯之敌。计划诱敌第一梯队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在滏阳河套的多砂地区先打第一仗，歼其一部，然后逐次歼灭之，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实行政治瓦解，争取一部分国民

^① 中央军委关于阻顽北进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

党军起义。

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关于进行邯郸战役的命令。预定作战方案：“我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洛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箝制其第一梯队之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之左侧部队之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①

具体兵力部署：

路西军：杜义德、韦杰指挥冀南部队之南梯队及太行之第5支队为右翼队，于国民党军先头到达安阳附近后，除以有力一部与安阳敌保持接触外，主力隐蔽集结于漳河北岸彭城山地待机作战。陈锡联、曾绍山指挥第3纵队为中央队，先到武安准备适时集结于峰峰及其以北山地待机作战。秦基伟、孔庆德指挥第2纵队及太行第1支队为左翼队，于肃清临洛关、紫山地区伪军后，集结于邯郸西南适当地区待机作战。路西军以上各部队，统归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

路东军：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指挥第1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兵团之一部，于肃清安阳以东地区的伪军残余，待国民党军大部进至安阳后，即转移于临漳以西地带待机作战。

独立支队：由张廷发指挥所属3个团，在北进敌人的两侧随时给以打击，查明情况，逐次向北转移，于国民党军占领安阳后，即到丰乐、安阳线西侧，箝制北进之国民党军。

路东、路西两军分别组成后方指挥部，负责给养筹划及弹药、物资、伤员前运后送事宜。

10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向参战部队下发了《关于平汉战役

^① 《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八号基本命令》（1945年10月16日）。

战术上某些问题的指示》。这个战术指示，具体分析了国民党军的作战特点，提出了作战的基本原则，对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特种兵的战斗以及作战指挥与协同动作、纪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指战员在作战中有所遵循。

为充分准备战场，晋冀鲁豫军区于上党战役歼灭敌援兵后，即以第2纵队先行东进，配合原在平汉线作战的部队，继续肃清战场附近临漳、成安及临洛关等处的伪军，并由当地党政军民在漳河以北至邯郸之间，以及沙河以北至邢台之间大举破路平沟，拆毁碉堡围寨，使进犯之国民党军无险可守而利于进行运动战。

同时，加紧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高树勋，河北省盐山县人，字建侯，1915年开始在北洋军阀的陆军中当兵，后转入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师长，国民党第26路军第27师师长，新编第6师师长，新编第8军军长、第39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1940年，高树勋处决了大汉奸石友三，国民党当局对其“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①多年来，高树勋将军及其所指挥的新8军，经常受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在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在与八路军的接触中，深深感到只有靠近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在几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是八路军挽救了他和他的部队，直到他撤往大后方时，也是八路军专门护送他渡过黄河；他还一直把彭德怀看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良师。1945年8月1日，高树勋托他的好友、“座上客”王定南带信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当时，彭副总司令已由太行返回延安。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黎城听取了王定南的汇报。刘司令员给高树勋写了回信。为了做好高树勋及新8军的争取工作，决定由军区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和靖任秋、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制定了具

^①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体的行动计划。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随时取得联系。

为集中全力打好平汉战役，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于10月20日、24日接连向各区党委、军区、各纵队发出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平汉战役按中央指示是全国主要战线，此役关系全局重大，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亲临前线参战。”“应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作战，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为了保证继续持久作战，各个歼灭敌人，抑留更多敌人于平汉线，完成本战区的历史任务。”要求“除已计划加入平汉作战者外，必须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放松次要方向集中于决战方向”，“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首先补充野战纵队）保证继续作战。”

三、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经过

（一）把北犯的国民党军扼阻于预设战场

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进攻部署基本就绪后，即率领其司令长官部部分人员，乘飞机先到北平，进行所谓“受降”工作。其所属部队由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率领沿平汉铁路北上。9月底，第一梯队第30、第40军、新8军以及河北民军等先后到达新乡、小冀镇附近，加紧进行北犯的准备；其第32军正由湖北宜昌向新乡前进中。

10月14日，其第一梯队的3个军及河北民军分左、右翼两兵团，沿平汉路和汤阴、安阳大道北进。第40军附第27师及工兵团（欠一部）为右翼兵团；新8军及第30军（欠第27师）配属工兵一部为左翼兵团。国民党军因情况不明和惧怕途中遭到袭击，采取并列重迭配置、交互掩护的方法前进。由于沿途不断遭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打击和袭扰，行动甚为迟缓，每日行程20公里左右，于18日到达安阳。

马法五判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分布在漳河北岸，有凭借漳河进行抵抗的企图；故决定于19日先以一部在丰乐镇、以主力在

倪家新庄渡河。渡河后即沿铁路以东地域北犯，以避免铁路正面的阻击，企图从东面迂回邯郸，以便迅速进出于石家庄、保定地区。10月20日，其先头部队第40军1个团渡过漳河，占领景龙、三台、岳镇等滩头要点，掩护其主力续渡。

此时，晋冀鲁豫军区路西军主力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尚在开进途中，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还在进行肃清临洛关等伪军据点战斗，参战主力中仅路东军第1纵队已赶到临漳及南东方村地区。为了保障兵力集结，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令第1纵队先行阻击敌人，以迟滞其前进。

第1纵队是奉令进军东北的部队之一。原考虑开赴东北后可以收缴日军武器装备，接到进军东北命令后，即把原有的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器移交给兄弟部队，有的建制连只留下了4挺轻机枪和2/3的步枪。这就形成了一个装备不全的纵队，要暂时抗击总兵力超过自己3倍的国民党军的进攻。时值10月，田野里可利用的隐蔽物极少，漳河两岸又是一马平川，多系沙土地质，构筑工事极难。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扼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第1纵队根据军区的指示，于10月20日夜以一部奔袭进至景龙、三台、岳镇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在给其一定杀伤后即撤出战斗。

22日，国民党军以第40军在右、新8军在左、第30军在后开始北渡漳河，以一部占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沿东侧前进。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为不让国民党军进入邯郸，以保障主力在野战中歼敌，除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星夜赶至邯郸东南之屯庄、崔曲、小堤、夹堤、七岔道及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国民党军。翌日拂晓，第1纵队到达预定设防地区，即令第1旅进入小堤、夹堤、崔曲、屯庄之线组织防御；第2、第3旅进至北漳堡、王耳营、东向阳、西向阳、二租村地区集结待命。纵队指挥所位于七岔道。

23日上午，国民党军依仗其兵力和武器优势，不惜一切代价

继续向北推进。第30军越过已进至漳河北之新8军、第40军，主力进占滏阳河东侧之中马头、高木营以南地区，先头部队即向第1纵队第1旅阵地屯庄、崔曲至小堤之线展开攻击。第1旅一面战斗，一面加强工事，先后击退敌数次冲锋。

24日，国民党军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第30军在原地掩护，第40军和新8军又越过第30军前进，右前锋第40军进占南北文庄及秦家营地区，左前锋新8军跨滏阳河占领马头镇、南北左良至阎家浅一带。其第40军之第106师和新8军一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第1旅第7团防守的崔曲、屯庄阵地猛攻。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激战6小时，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攻击。

国民党军攻崔曲、屯庄阵地未能得手，复集中优势兵力，转向小堤、夹堤第4、第6团阵地连续进攻，重点置于小堤，反复采用侧翼迂回、集团冲锋达数小时之久，气势异常凶猛，小堤前沿的树林和村内房舍，被密集炮火所摧毁。扼守小堤、张庄的第6团第1营，利用暗地堡和各种掩体，以猛烈、短促的火力和积极的反冲锋，予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在连续作战中，守军伤亡亦较重，尤其扼守小堤的1连，班以上骨干和干部大部分伤亡，全连编为1个排，誓与阵地共存亡，继续完成阻敌任务。

24日18时，国民党军第40军第106师集中2个团猛攻一点，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阵地，后续部队亦蜂踊而上，将崔曲、屯庄阵地包围，其前锋部队进至高庄、南泊子之线。

此时，晋冀鲁豫军区参战兵团已大部赶到，第2纵队第4、第5旅及太行1支队已控制邯郸东南阵地，分3路由北向南，向阎家浅至崔曲一线国民党军进行反击；第3纵队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及太行5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国民党军已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第1纵队的顽强阻击，胜利地完成了箝制北进的国民党军于预设战场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

在邯郸西南峰峰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司令员兴奋地说：“现在的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①

(二) 以局部消灭手段，消耗疲惫和包围国民党军

当晋冀鲁豫军区参战主力大部到达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决心于10月24日夜对进入预设战场之国民党军开始出击和合围。以路西军第2纵队2个旅控制邯郸及其西南地区，阻止国民党军进入邯郸，以路东军第1纵队主力从东南，以路西军第3纵队及太行5支队从西面对国民党军实施钳击，并以独立支队从国民党军后方控制漳河渡口，力求分别割歼其一部。当夜，以第1纵队第1旅主力一部向赵横城西北200米处国民党军前沿阵地攻击，尔后向南文庄、北文庄发展进攻；以第2、第3旅向侧后第30、第40军接合部的赵横城、南横城实施主要突击。攻势进展顺利。至25日夜，第1纵队相继攻下赵横城、南横城，歼第30军第81团一部，并将第40、第30军截为两段，迫使第106师缩回崔曲。第3纵队也攻克了中马头。其他方向，因部队初到，战斗准备仓促，加上缺乏打地堡和克服鹿柴障碍的经验，故战果不大。

25日夜，马法五得悉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从各方面继续增加，感到已陷于四面包围、进退两难的不利态势。为避免被各个击破，随即调整部署，转攻为守。以第40军占领崔曲、赵庄、屯庄、阎家浅、南左良间地区；新8军占领吴庄、石桥头、王庄、马头镇等地区；第30军占领北豆公、黄龙、吴村、兴善村、小狼营、柳光营、中马头等地区，缩小正面，准备决战。同时，向蒋介石求援。

为挽救败局，10月26日1时和17时，马法五以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的名义急电第32军军长唐永良：“此间各军连日作战

^① 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二仗—平汉战役》，《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页。

激烈，希速先派一个师以最快方法向漳河挺进增援”；“此间急待来援，除已电请长官外，盼先派一个师星夜前来。”^①当时，第32军正乘火车到达新乡以南之小冀镇，该军接到要求增援的急电后，当即令第141师师长林作桢率该师（欠第421团附第417团）迅速北上。与此同时，石家庄之国民党军第16军亦奉命沿平汉路南下，准备增援被围之马法五部。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当前情况和战役发展趋势，决心继续集中主力歼击被围之马法五部，对援军则暂行箝制之。但当被围之国民党军阵脚未乱、兵力未大大耗损以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4支队及第17师等后续部队未到达前，暂不与国民党军决战，将其围困于滏阳河套沙漠地带，以局部消灭手段来实现大部消耗，最后消灭国民党军主力。10月26日，对部队作了如下部署：“（1）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必要时可加大些）不断与敌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打法，逐步歼灭其个别部队（由一两个排到一连一营，不打消耗仗），达到消耗其实力。（2）除以地方游击队分头活动外，应分派较多的精干小队（四、五十人），携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挺入敌人纵深，突袭其心脏部队，尤其各个首脑部，使其不得安息。（3）敌人可能北渡的桥梁，凡我不能控制时则破坏之，并捕灭小股出扰之部队，打沉所有船只，堵绝其逃路，使敌完全困于河套之内。（4）各部队主力应利用时间休整，注意休养及政治鼓动，研究歼灭敌之战法。”该指示还强调：上述4项任务，限定在两三天内积极进行，争取在后续部队到达后，全力击灭被围之敌。

为了准备万一不能在邯郸以南全部歼灭马法五部，晋冀鲁豫军区又指示冀南沿路东各军分区在沙河以北的铁路沿线布置游击战争，要求“抽调中心区及东面地方武装及大批民兵，位于沿平汉线沙河以北地区，如顽北进，应组织广泛的地雷战顽强的游击

^① 国民党《陆军第32军援应磁县战事战斗要报》。

战，疲困迟阻敌人，以争取时间，保证主力及时布置作战。”为制止国民党军增援，又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阻击从石家庄南下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民兵，加强安阳以南的游击战争，以扼止和箝制安阳方向的敌人。

（三）发起总攻击，争取高树勋部起义

国民党军第40军在路东军连日打击下已开始动摇；高树勋将军经过多方争取已有在战场率部起义的意向，其指挥的新8军作战不甚积极；晋冀鲁豫军区后续部队冀鲁豫独立第4旅、太行第4支队、第17师等已陆续到达预定位置。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于10月28日黄昏发起总攻，重点在消灭第40军，同时求得消灭第30军一部。在部署上，改以第1、第2纵队及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狠打第40军，并着重从西北、东南两面割歼其已遭打击且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第106师；以第3纵队、第17师、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南集团，由陈锡联指挥，积极箝制第30军，隔断其和新8军的联系，主力则由西南向东北兜击，协助北集团消灭第40军。对高树勋的新8军，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变化。

为加强政治争取工作，10月27日，刘、邓又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与高树勋见面，商议起义办法。当日，李达参谋长在靖任秋等陪同下，步行通过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阵地，在高部团长田树青的接应下，进入高树勋的指挥部。李达与高树勋会谈后，将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军委，要点是：“（1）名义我已允其为和平建国军总司令，在毛、朱之下与伯承同辈，彼甚满意。（2）他想编成两个军，并想要张岚峰反正是两个师（杜新民、魏凤楼），我们未答复。（3）驻地问题，他先提出想到热，并有意任热河主席，后又改说先想在冀南，以便吸引西北军，我们只笼统的说可以商量，须请示延安决定。（4）在政治上他要发一个宣言，

我们同意，此宣言以能用新华社发表为好。”^①

10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军区领导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伯承当即写信给高树勋，对他准备退出内战、宣布起义的行动表示欢迎。为消除高树勋后顾之忧，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转山东陈毅、罗荣桓、黎玉：“高树勋率新8军与我合作已明朗化”，“第十一战区长官部自新乡至徐州开一专列内载留守人员及眷属，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李家瑞三进徐州，将高树勋夫人等接出，脱离险境。

10月28日晚，按晋冀鲁豫军区预定部署向马法五部发起总攻击。第1纵队当夜即突入崔曲；第2纵队突入阎家浅。至29日上午，崔曲守军第40军第106师被歼灭1个多团，阎家浅守军第39师亦被歼一部。下午，崔曲、屯庄、阎家浅等处之国民党军残部，先后向南北左良逃窜，被截歼一部。10月30日，北集团继续由北向南压迫敌人，向南北左良、南北文庄等地国民党军展开攻击，先后攻克村镇20余处，第40军的第106师大部被歼，第30军也受到有力打击，马法五残部被迫进一步收缩阵地。10月30日晚上，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在马头镇起义。

10月31日中午，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偕同新华社、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朱穆之、安岗等亲去马头镇同高树勋晤面，对起义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

为了便于高部安全休整和补充棉衣，经双方商定，高部在11月1日离开战区，开往武安县伯延一带，沿途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了热诚的贺电：“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

^① 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关于与高谈判过程中几个重要问题向军委的报告》（1945年10月31日）。

莫不闻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颁戎绥。”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下辖第1、第2军。

（四）追歼突围南逃之国民党军

高树勋率部起义，使国民党军兵力骤减，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完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判断，高树勋起义后，其余国民党军必然向南突围，乃故意让开退路，将主力向漳河以北国民党军两侧转移，准备歼灭突围之敌。具体部署：以第1、第3纵队主力于30日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南移到漳河以北国民党军退路的东西两侧；第2纵队从正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后实施向心钳击，割裂其部署体系；以一部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断敌退路，并部署漳河南岸的侧击，以阻截第32军的增援。

马法五得知高树勋起义后，甚为惊慌，乃决定以大小狼营、南北豆公附近的第30军部队担任掩护，其余部队均向漳河南岸撤退。令北援的第32军（辖第139、第141师）、新四路军（辖第7师及第8师一部）星夜强渡漳河，向老庄、结庄、横山、三台发起猛攻，以掩护漳河北岸部队渡河。30日夜，第30军1个师退到西玉曹至豕王之线占领掩护阵地后，主力遂于31日黎明前采取逐村掩护撤退的方法向南突围。

当马法五残部脱离阵地以后，晋冀鲁豫军区以第1、第3纵队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以第2纵队及冀南军区部队跟踪追击，以太行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到漳河北岸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要道捕歼逃散之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近2万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包围后，又据守村落进行顽抗。

在战斗过程中，晋冀鲁豫军区侦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为加速战斗进程，争取在援军未到前将溃逃之敌歼灭，当即集中第1、第2纵队主力猛攻前旗杆樟，南集团主力则向东西玉曹、豕王地区第30军主力进攻。11月1日夜，突入其长官部，国民党军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南北集团各部奋力围歼

堵截溃逃之敌。到11月2日，向南突围的国民党军除少数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歼。

由石家庄南援的第16军和由安阳北援的第32军，得知新8军起义和第30、第40军被歼后，随即撤退，战役遂告结束。

邯郸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向华北进攻的主力孙连仲部2个军，争取其1个军起义，战役取得完全胜利。是役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弹药，其中包括反坦克炮、火箭筒等美式武器。

在这次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伤亡4700余人。消耗各种子弹40余万发，各种炮弹8000发以上，手榴弹16万枚。

四、邯郸战役的意义、影响及主要作战经验

邯郸战役是战略转变中的第二个大胜仗。邯郸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内战阴谋；打破了国民党军沿平汉线北进的计划，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特别是在这次战役中成功地争取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军1个军起义的先例，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评价。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战斗紧张之际，新八军突然起义，宣布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成立民主建国军，站在人民方面，给我军以顺利歼灭卅、四十两军的条件。高树勋十月三十日通电，已在重庆发生了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产生它的影响”。

国民党军统帅部亦不得不承认战役失败所造成的重大打击，其国防部在《漳河战斗》的检讨中说：“是役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能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区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虽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

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鉅”。^①

邯郸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继上党大捷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经验十分丰富。1945年11月9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邯郸战役的作战经验作了全面总结。这些经验是：“（1）必须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故拉了新八军，接着消灭了三十、四十军，打退了三十二军并十六军，在政治与军事上给了双重打击。（2）抓紧敌人离不开铁路的特点，先准备了战场，消灭铁路两侧伪军，大毁铁路碉堡，使敌人处于滏河与漳河河套沙漠，而无碉堡可据守。尤利用了根据地能由四面包围敌人，东西钳击敌人，而消灭之。（3）因时间仓促，作战部署尚未就绪，先头部队扼其头部不使北进，随即已到部队各组成多股坚强的分队，有重点的日夜行动，先将敌人一连一营的合击歼灭，压倒其气焰而饿困之，以压迫其脱离筑城地带，我主力借此调剂布阵，并练习必要战法。（4）估计敌人在高树勋起义明朗，必然向南突围，故我主力先行向南转移，于敌退路两侧放开退路，待其脱离筑城地带后，全军实行东西钳击，并在其退路上夹击，首先打击其指挥机关，割碎其体系，而各个击灭之。”

蒋介石于1945年11月16日，在重庆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上检讨漳河以北失败的教训时说：“这次我们在马头镇的失败，并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土匪的力量如何强大，而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此次我军抵达磁县以后，向北推进，完全采取平时行军的方式，对于后方的补给和准备，一点都没有顾到。我们六个师的兵力，同时向马头镇推进，而距马头镇不及一百公里的重要根据地——磁县，竟不留重兵据守，以至磁县一为土匪袭击，前方所有的部队，都为之动摇，这是第一个

^①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戡乱战史》第15页。

错误。此次进兵是由宋肯堂指挥的，宋肯堂亦曾参加剿匪多年，应该知道土匪的惯技，在于抄袭侧后，乃竟如此大意，实非意料所及。第二个错误是，高级将领平时对中下级干部——团营长不督察不考核，精神意志不能贯通，以致临时一部哗变，全部都受其威胁，整个的军心就为之瓦解。此次高树勋部叛变原只一个团长，但是在战线上受其牵累，以致其他各团亦为之慑伏，整个的被土匪所解决了。”^①

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军在乎汉线作战之所以遭到惨败，主要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孙连仲没有掌握“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再就是蒋介石长期排挤、歧视“杂牌”部队，处心积虑消灭他们，这些“杂牌”部队“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火并，在高树勋等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一经共军围攻”，“立刻投降”。^②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认为，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有4条：“（1）我军渡过漳河而无后续部队维护后方连络，奸匪遂乘机将漳河北岸各村庄要点占领，形成孤军深入之态势，补给断绝，又不能以飞机空运补给，以致弹尽粮绝而失战斗力。（2）内线作战首在各个击破敌人，而此次全处于被动之地位，形成挨打之态势，致坐失击破奸匪之良机。（3）指挥不灵活，部队机动性太小，不能形成局部优势，予匪以严重打击。（4）战斗方酣之际，我左方兵团指挥官高树勋率部叛变，战局急转直下，陷全军于危境，此为失败之主因。”^③

①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521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页。

③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7页。

第三节 晋察冀、晋绥军区举行绥远战役，反击傅作义部东犯

一、绥远地区概况

绥远地处我国北部边疆，东界察哈尔，西接宁夏，南界山西、陕西，北与蒙古为邻。1914年置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下辖16个县、两个设治局和两盟13旗。全省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为汉、蒙、回等民族聚居的地区。

绥远省属蒙古高原。阴山山脉横亘中部，大部分海拔1500米至2000米，为绥远省地势之脊。阴山山脉南麓为断层陷落的河套平原，相对高差达1000米。阴山北面，为乌兰察布高原，地势平缓坦荡，是我国优良的天然牧场之一。绥远省南部为鄂尔多斯高原，海拔1000米至1300米，地表呈波状起伏，中部高，岩石裸露，四周低，沙丘很多，桌子山耸立于西部黄河之畔，海拔达2149米。黄河呈马蹄形流经绥远境内，流量大，流势缓，河道分支众多。阴山以北和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区河流很少，多为时令河，一些河流在低洼地区滞水，形成许多大小湖泊。整个绥远，除河套农产较丰富外，其余地区土地贫瘠，缺粮缺水。平绥铁路自北平（今北京）经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今呼和浩特）可达黄河边上的重要城镇包头，全长800余公里，为华北通向西北的交通干线。绥远夏季温暖，秋冬交替短促，“8月而后肃霜杀草，9月即有冰雪。”^①冬季严寒，多暴风雪，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

绥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晋察冀边区的屏障，通向苏蒙的要道，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1945年8月，长期在绥远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配合

^① 廖兆骏：《绥远志略》，正中书局1937年6月出版，第158页。

晋察冀军区一部和晋绥军区主力向日伪军占据的城市、据点发起进攻，收复了铁路沿线的毕克齐、丰镇、集宁，绥西的百灵庙，绥东的兴和、商都，绥南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绥中的武川、陶林等县城，解放了绥东南大部分地区。

二、国民党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向绥远、察哈尔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控制平绥路，夺取张家口

1945年8月，国民党军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根据蒋介石的所谓“受降”命令，指挥第35军、暂编第3军、第67军、东北挺进军和新骑4师等部共5.1万余人由绥西陕坝地区星夜东开，向绥远、察哈尔解放区大举进攻，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傅作义为了抢夺包头，于8月11日派暂3军一部去包头接收。8月18日，当八路军晋绥部队攻入归绥城，与归绥敌伪进行巷战、并迫其缴械之际，傅部暂3军暂17师及伪蒙军等部3000余人，突袭晋绥部队侧背，致使该部在傅、敌、伪联合夹击下被迫撤出归绥。

傅作义部占领归绥后，即纠合伪蒙陆军部长李守信部及伪蒙绥西联军司令王英部沿平绥路东进，连续侵占八路军从日伪手中解放的武川、卓资山、陶林、清水河、凉城、集宁、丰镇、兴和、尚义等城和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傅部所到之处，联合敌伪，收容土匪，委派汉奸当“专员”、“县长”，疯狂杀害抗日干部、抗属，仅丰镇、隆盛庄一带，即被屠杀数百人。饱受日寇蹂躏的绥远人民，又陷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傅部的东进行动，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查此次日本宣布投降后，贵长官所属各部队，奉令推进，行动迅速确实足见指导有方，深堪嘉许，着即传谕嘉奖，以资激励。”^①

傅作义进攻的目标是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路，配合国民党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1951年版，第195页。

中央军控制华北，争夺东北，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9月初，傅作义之先头部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之新编骑兵第5师进到怀安县柴沟堡、渡口堡一线，伪蒙军王英部亦进至阳高附近之王官屯。晋察冀军区为保障张家口之安全，以冀察纵队将进至柴沟堡、王官屯之敌伪击溃，并乘胜追击，收复了尚义、兴和两城。傅作义东进部队受挫后，连同地方的杂牌军、伪匪军和阎锡山部驻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约9.7万余人，除以一部驻守归绥、包头外，将其主力集结于平绥路丰镇至卓资山沿线地区，其兵力分布：第35军军部率第101师、新编第31师2个团及炮25团一部位于集宁；暂编第3军之暂17师（欠1个团）位于卓资山；新编第32师位于丰镇、红沙坝；第67军军部率新编第26师位于官村；新编骑兵第4师大部和新编第31师之第91团位于隆盛庄，新编骑兵第4师另一部位于张皋镇；暂编骑兵第6师位于三水岭；暂编骑兵第5师位于凉城；暂骑1旅位于陶林。企图等待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北平、天津后，再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进攻。

三、中共中央军委决心集中晋察冀、晋绥军区主力举行绥远战役，歼灭傅作义部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全境

为了反击傅作义部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在1945年8月26日关于目前军事部署中就曾指出：“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固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战斗，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9月上旬，当傅作义从八路军手中夺取了归绥、武川、陶林、卓资山、丰镇、集宁后，又夺兴和，逼近了天镇、柴沟堡，并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态势。9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张宗逊、吕正操、林枫：“傅顽主力东进，绥境空虚，晋绥区应有夺取绥远全境、收复归绥与晋察冀军区在察省配合彻底消灭傅作义全部的任务。”

此时，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因蒋介石毫无诚意，已陷入僵局；而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4条铁路线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正在加速推进中。9月11日，中央军委给各地的指示中指

出：“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要求晋察冀、晋绥两区：“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夺取雁北十三县。为完成这一战役计划，晋察冀军区须立即集结二万五千以上兵力，除一部巩固张家口守备外，余须集结休整，充分动员。如傅作义向张家口前进，应坚决消灭该顽于张家口附近；如傅顽军暂不立即向张垣进攻，亦须准备于十天后协同晋绥军区转向傅顽进攻，夺取绥远、雁北全部。晋绥军区应以一部在绥远、雁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尽可能消灭顽伪，破坏铁路公路，分散与疲劳傅顽兵力，阻碍阎顽北援。贺亲自指挥之七个主力团，集结岢岚，积极补充，十天内完成准备，协同晋察冀区向绥远进攻。”

根据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进攻态势，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对山西的阎锡山部暂取守势，以便集中主力打击傅作义、马占山部。

晋察冀和晋绥两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发起绥远战役，并立即进行了部署和准备。确定参加绥远战役的部队有：晋察冀军区之冀察纵队（辖第6、第7、第9旅、骑兵旅）、冀晋纵队（辖第3、第4旅）和冀中纵队（辖第11、第12、第13旅）；晋绥野战军之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和绥蒙骑兵旅。两区部队共14个旅，加上晋绥军区第11分区的2个团，共41个团（内有5个骑兵团），5.3万余人。

当时，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正处在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时期。各纵队、各旅的领导机关刚刚建立起来，团以下部队正在陆续编组。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缺乏攻坚战的经验。为了完成绥远战役的重大任务，各部队加速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进行了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冀中纵队过去长期处在游击环境中，每人头上还缠着一条毛巾，不少战士身上穿着便衣。晋察冀军区在开进途中，给冀

中纵队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还以营、连为单位，对武器作了统一调配。

9月24日11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刘澜涛向中央军委报告了绥远战役的准备情况：“（一）傅顽向柴沟堡、万全出扰之10股部队，遭我消灭打击后，均已折回丰镇、集宁。现除商都、兴和附近仍有小股土匪出没骚扰外，余均在原地未动。因此我冀晋、冀察部队现在确实控制天镇、阳高、兴和、商都、尚义、柴沟堡之线于我手中。东面我军已攻克新保安、怀来两城，并可伸至南口附近。蔚县、广灵、阳原等城固守之伪军，我们已派队扫荡，使冀察、冀晋完全打成一片。平北地区如时间许可亦拟派队扫清赤城、龙关、延庆等地伪军，使冀察、冀热辽打成一片。（二）我王平部（包括陈仿仁部）约8000人，现进至天镇、阳高之神池集结，开始整训。郭天民主力至柴沟堡、西河之线。杨成武部约18000人，23日可到西河营。到后除以一部扫荡蔚县、广灵等地伪军外，余13000人即集结张垣附近整训。（三）为执行军委坚决打击胡傅顽指示，必须争取时间，乘胡未到平津前，首先打击傅顽，以便击破一面，避免胡顽到后，迫我处于胡傅夹击的不利情况。但自反攻以来，部队尚未组织与集训好，从现在起至少须有半月时间才能把所有集中部队组织成大团，并给以必要训练，同时进行周密侦察，及完成各种必要之战役准备工作。据侦察所得，傅顽亦正进行各种准备，如我不作充分准备即打，亦不易奏效。（四）我区在张家口及其周围各处集中兵力约4万人，除东面警戒、北面接防外，可以3万人使用于主攻方向进行突击。”

中央军委于9月25日批准了上述计划，指出：“同意你们24日11时电计划，积极准备在一个月內，争取胜利结束讨傅战役，以便转移兵力对付胡宗南、孙连仲两顽部。”

为便于两区部队协同作战，9月28日，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向中央军委建议：“如晋绥区指挥有人，我们提议贺龙

同志带电台及必要人员到东面来与我们共同商量组织打击傅顽战役，并可由贺聂统一指挥两区的战役行动，请考虑决定”。中央军委经与两区领导人反复商议，10月2日，正式决定：“绥远战役由聂统一指挥，贺暂不去张家口。”

9月30日，聂荣臻、肖克、罗瑞卿拟制了绥远战役计划：“（一）我们因冀中部队须由冀中临时运棉衣来，吕许^①部队亦须临时赶制，且各军区尤其大军区因精简而极不健全，现组织大规模作战十分困难，故此战役，最快须于下月16日才能开始。（二）因敌情地形不大清楚，我们提出初步作战意见，以供考虑：（1）拟以主力攻集宁，并进占集宁至大同以北铁路。（2）提议以许孙姚喆^②部攻陶林、武川，进逼归绥，贺率主力攻凉城北面逼归绥，如集宁攻下，我们主力则沿铁路西进，会攻归绥。”

此时，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部已集中新乡，开始沿平汉路向北推进；第1战区胡宗南部正由同蒲路北进，先头已抵正太路西段，拟经正太路沿平汉路北进平津；第92军已开始空运北平；第94军运天津。10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贺龙、李井泉：“时间紧迫，绥远战役准备须迅速完成，最好在二十号以前开始行动，以便十一月初转移兵力对胡孙两部十个军，过迟即影响冀热辽工作之开展以及适时进大兵于东北，请注意。”

聂荣臻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要求，针对傅作义的兵力部署，10月12日拟制了绥东战役计划，决心首先歼灭外围之敌，然后聚歼主力。具体作战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进攻，歼灭隆盛庄、三水岭、张皋镇的敌人；晋绥军区部队分别歼灭凉城、新堂、天成村和商都、陶林间的七大顷、段家村的国民党军。得手后两区部队协同向丰镇至集宁线上的各点进攻，求得歼敌主力于绥东地区。10月15日，聂荣臻向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

① 吕许即吕正操、许光达。

② 许孙姚喆即许光达、孙志远、姚喆。

命令，规定各部于10月18日晚出动，19日拂晓开始战斗。此役预定在2周内完成。

按照上述部署，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第6、第7、第9旅和骑兵旅集结于兴和、怀安一线；冀晋纵队第3、第4旅在解放阳原、浑源后，北进到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第11、第12、第13旅经过千里跋涉到达张家口以西新平堡地区。晋绥野战军第358旅、独立第1旅、独立第3旅集中于左云、右玉地区，独立第2旅、骑兵旅进到商都地区，积极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绥远战役极为关注。在绥远战役部署就绪后，10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局和晋绥局，反复阐明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并进攻沈阳、承德。而绥远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同伪军王英、李守信等所强占，并曾进占我兴和、尚义，逼近张垣。现兴和、尚义虽被我收复，其余各地仍在顽伪手中，并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平绥战役关系大局，望坚决执行。”

四、绥远战役经过

（一）出击绥东

1945年10月18日，晋察冀、晋绥部队按预定部署向绥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冀察纵队以骑兵旅从兴和地区迂回隆盛庄，冀中纵队由新平堡地区直取张皋镇、三水岭。19日3时，冀察纵队

第6旅向位于隆盛庄之新编骑兵第4师的主力和新编第31师第91团发起攻击，在攻占东西两面外围工事后，迅速突入围寨。由于守军兵力较强，攻击未果，被迫撤出阵地。当日傅作义部新编骑兵第4师主力乘机逃窜，仅留第91团和1个骑兵连据守。这时，冀中纵队已占领了张皋镇、三水岭，直插隆盛庄东北、西北，策应冀察纵队攻歼隆盛庄的国民党军。19日黄昏，冀察纵队第7旅第404团强攻隆盛庄，战至20日，歼灭1个营又1个连。傅部第91团主力向西突围，被晋察冀军区第13旅截击，歼其一部，其余逃向红沙坝。

在晋察冀部队攻歼隆盛庄之敌的同时，晋绥军区部队也分别从右玉、商都地区出击。独立第1旅进攻凉城，俘守军100余人；第358旅占领八苏木、天成村地区；独立第3旅攻占新堂，守军逃窜；独立第2旅、骑兵旅攻占商都、陶林间的七大顷、段家村，歼守军400余人。

傅作义发觉晋察冀、晋绥主力向其反击后，自感兵力分散，难以对抗。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当即“采取后退战法”，^①决心暂退归绥、包头。其指导方针是：“为确保西北重镇，以一部退守大同，主力集结于绥包有利地形，依火力摧毁敌人于阵地前，再相机转移攻势。”^②具体部署：“（一）马占山、王英部由柴沟堡、聚乐堡退守大同，牵制匪军北进。（二）六七军、三五军、新骑四师、暂骑五师退守卓资山，凭借城垣有利地形，先予匪以打击，尔后以六七军为掩护，主力逐渐向归绥转进。暂三军、暂骑四、六师及别动队担任绥包守备，并加强工事。（四）暂骑一旅由陶林退守包头以北之后口子。（五）集结于包头各部队归城防司令董其武指挥。”^③

①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戡乱战史》，第18页。

②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10页。

③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10页。

为了抓住傅作义部的主力，聂荣臻令冀晋纵队向红沙坝、丰镇进攻，以冀中纵队向官村进攻。19日，冀晋纵队一部占领了大同以东聚乐堡。20日，主力进占红沙坝，21日拂晓，进占丰镇，歼傅作义部200余人。22日，又攻克大同以北的孤山、孤店，截断了阎锡山部与傅作义部的联系。冀中纵队在21日占领官村后，傅部第67军新编第26师退向卓资山，该纵队便乘胜进占苏集、老平地泉等地，向集宁进逼。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得悉傅作义收缩主力向归绥、包头方向撤退时，提出以主力猛烈西进，截断傅作义部归路，争取在野战中歼灭其主力的作战方针。10月22日20时指示聂荣臻、肖克、贺龙、李井泉：“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不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这时，傅作义所属各部正按照其预定的撤退计划拼命西逃。集宁只留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聂荣臻决心以冀察、冀中2个纵队聚歼该部，由冀察纵队进占集宁以西的十八台，切断敌退路，以冀中纵队担任主攻。23日，冀中纵队占领集宁以南的榆树湾、脑包山，将第101师1个团击溃，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到集宁以西。集宁守军乘夜弃城西逃。24日，集宁获得解放。

为了截歼西逃的傅作义部主力，晋绥军区第358旅和独立第1旅、独立第3旅从凉城、新堂、天成村地区向卓资山疾进。24日12时，在六苏木击溃暂编骑兵第5师，15时进到卓资山附近，并迅速完成了对第67军军部和新编第26师的包围。

卓资山位于归绥城东75公里之平绥铁路线上，北靠大青山灰腾梁，地势较高，交通方便，为绥东之交通枢纽和归绥城东之屏障。贺龙决心歼灭卓资山之国民党军，即以第358旅担任主攻，独立第1旅配置于卓资山东南之大、小苏计村附近为预备队，准备

阻击从集宁撤退之国民党军，协同第358旅进行战斗；独立第3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之福生庄及其以北灰腾梁地区，截断傅部向归绥的退路，并准备阻击从三道营方向可能增援之敌。晋绥部队首长及时发出动员令，指出歼灭卓资山守军对解放绥远具有重要意义，号召全军以坚强的意志，发扬猛打猛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全歼该部，活捉何文鼎。10月24日黄昏前晋绥部队向卓资山之敌发起攻击。第67军军长何文鼎率军部特务营乘隙向白银查汗、金盘方向逃窜。新编第26师第76、第78两团大部被歼，残部数百人，猬集于卓资山高地集团工事内，企图固守待援。25日拂晓，第358旅全力向守军展开猛烈攻击，激战至上午10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时，独立第3旅也击溃了新编第32师2个团的增援，占领了福生庄。卓资山战斗，晋绥野战军毙伤国民党军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少将副师长兼政训主任以下官兵1874人，缴各种枪896支，各种炮20余门，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战果，给傅作义部以沉重打击。绥远战役前线指挥部号召全军学习第358旅勇猛顽强、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

（二）围困归绥

傅作义部在绥东经严重打击后，锐气大减。10月26日，除第67军、伪蒙骑兵第5师等残部撤至萨拉齐、包头外，其主力由三道营、旗下营、白塔等地撤至归绥城内及其外围，积极加修工事，组织防御。

为了抓住并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在晋察冀部队收复集宁后，毛泽东即指示聂荣臻、肖克：“望我绥远野战军乘胜长驱，直至五原、临河，歼灭傅部及一切参战杂牌，打通外蒙与陕北联系，并为将来在某种必要与可能时开辟占领新疆之道路。”10月27日又致电聂荣臻、贺龙：“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军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毛泽东得知蒋介石于10

月27日下令限3天将山炮第1团由重庆附近空运归绥时，再次指示聂、贺：“望你们迅速进攻归绥并占领之，迟则恐难占领。归绥飞机场，应设法首先控制。”

卓资山战斗结束后，晋察冀、晋绥两区野战军主力胜利会师。10月26日，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见面后，研究了以收复归绥为目的的第二阶段作战。经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部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①具体部署：晋绥部队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等部，在平绥铁路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区从东向西肃清什兰代、后不塔气、范家营等各点之国民党军，向归绥旧城以南逼近；晋察冀部队以冀察纵队肃清铁路以北自古楼板、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及讨速号、鹤心营子等地区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冀晋纵队以第3旅（附第4旅第6团）配属冀察纵队执行任务，其余部队担任对大同国民党军之警戒；冀中纵队集结于陶卜齐地区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进占归绥以东阵地，配合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完成对归绥之合围；以晋绥独立第1旅、绥蒙军区骑兵旅、冀察纵队骑兵第2团等部于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沿绥包路向西挺进，以截断傅作义部归绥与包头之联系。

按照上述部署，晋察冀、晋绥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10月30日、31日，晋绥部队占领了前后不塔气、陶号板、大小台石、范家营、后八里庄等地；晋察冀部队占领了鹤心营子、红山口、坝口子、西孔家营子、鸟素图等地，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

归绥，为绥远省省会，有新、旧两城。傅作义在决定退守归绥之初，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在其防御前沿挖有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有些地方还有电网。守军为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共2万余人，由傅作义亲自指挥。因新

^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城较小，有城墙，可凭坚固守，而旧城地域较大，没有城墙，城北距山较近，傅作义判断城北可能为晋察冀、晋绥部队主要突击方向，故以主力守旧城，并将防御重点置于城北，机动部队控制于新城，以地方武装活动于外围武川、托克托等地，对晋察冀、晋绥部队进行袭扰、破坏。

11月6日，中央军委就围攻归绥的战法问题指示聂荣臻、贺龙：“（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炮及十生五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取这一方针，迅取归绥。（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真攻），荫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似亦可与第一项战法联合运用。（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围困归绥，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聂荣臻、贺龙接到军委的上述指示后，对归绥的敌情进行了具体侦察，随即实施攻城。但由于归绥城防设施坚固，城周有许多大小碉堡，攻击的部队缺乏大口径火炮，也缺乏大兵团攻坚战训练和经验，攻击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在围攻归绥期间，守军为摆脱被歼的命运，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多次主动出击，进行反扑。11月1日下午，国民党军飞机2架3次轰炸白塔南北之乔家营、五路及右力半鸟素之间各村，并低空扫射陶卜齐车站。在轰炸时，新城守军3000余人向坝口子、红山口、哈拉沁方向出击，经6小时激战，被冀察纵队全部击溃。11月2日8时，傅作义又以第35军第31师3个步兵团在山炮3门、野炮2门支援下向西孔家营子独立第2旅27团2

营阵地猛攻，守备分队在敌猛烈炮火轰击下坚守阵地，激战至黄昏，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该部击溃，毙伤700余人。11月10日拂晓，傅作义再以两个师的兵力出击后八里庄、孔家营子，自早到晚，发射山、野炮弹数千发。晋察冀野战军调集3个团配合扼守阵地之部队进行反击，将傅部击退。11月12日，傅作义亲自率领一部兵力向西孔家营西北冀察纵队阵地反扑，激战至黄昏，亦被击溃。长于用兵的傅作义，虽令归绥守军固守顽抗，依坚短促突击，从11月1日至12日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扑，但由于人民军队的顽强抗击，致使反扑未成，先后伤亡3000余人，被迫转入凭坚固守。

（三）进攻包头

为孤立归绥守军，晋察冀、晋绥部队在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立即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2团沿铁路向包头推进。11月1日攻克兵州亥，歼暂编骑兵第4师1个团。2日占领毕克齐，在黄尼善旦击溃了暂编骑兵第6师。3日攻克察素齐，歼骑兵挺进纵队4个团1300多人。4日占领了陶思浩。7日又占领萨拉齐、沙尔沁，逼近包头市。

包头市系绥远省两大城市之一，人口10余万，位于平绥铁路西端，为通向黄河后套重要门户。包头城墙高5—6米，厚2—3米，城周长10公里。城外东北角禹皇庙有原日军修筑之钢筋水泥碉堡，地势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东、北两面，并有壕沟直通城内，城南电灯公司及车站，设有电网和野战工事，城周四门均筑有坚固的碉堡。日军投降后，该地囤有大量物资，设有各种仓库，是傅作义的一个重要补给基地。该城守军，原有第101师补训团、第31师补训团、第32师补训团、暂第17师1个步兵团、第12战区别动队（该队有800余人，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等部，当晋察冀、晋绥部队围攻归绥时，第67军军部及特务营、李守信骑兵第4、第5、第6师残部等，均逃聚于此，总兵力约1.2万余人。但正规战斗部队少，新兵多，建制混乱。傅作义令第67军军

长何文鼎为防区司令，暂3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各部队，组织防御。

11月9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2个团向包头外围的禹王庙、火车站、电灯公司各点发起攻击，连续攻击两昼夜，未能奏效。为加强进攻包头的兵力，将第358旅主力由归绥地区西调（该旅第716团及第715团第1营仍留归绥作战）。11月12日，晋绥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突击方向，以独立第1旅和第358旅（欠716团）进攻包头城。独立第1旅第2团及第358旅第715团（欠第1营）担任主攻，在炮火掩护下，一举登上城墙，迅速打开包头城西北门，第2团副团长彭济民率领第2团第3、第1营首先突入城内，第715团第2、第3营相继入城，与守军展开巷战，迅速扩张战果，接连攻下了西营盘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城内约1/3的地区，并将数百名俘虏带出城外。13日晨，守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连续进行反冲击。晋绥野战军突入城内的4个营的指战员同守军展开白刃战，给敌以很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弹药消耗净尽，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致使第一次攻包未获成功。在这次战斗中，晋绥野战军伤亡数百人，副团长彭济民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至11月中旬，晋察冀、晋绥部队包围归绥已近半月。守军除原有6个师的兵力外，11月6日，又空运来1个重炮团，共有2.4万人，火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进攻归绥的兵力不占绝对优势，又无足够的炮兵配合，难以在短期内将其攻克。

鉴于归绥、包头两处作战出现上述情况，11月13日，聂荣臻调整了下一步作战部署，并于15日报告了中央军委，主要是：“贺李率晋绥全部增援包头，继续进占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已于14日出发，以3日行程进抵包头附近。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主力集结麻西八保证攻包任务。如我攻占包头，并打退援敌，晋绥主力再行东转共同继续围困归绥，使归绥敌更陷孤立，但傅顽固守归绥之决心将必坚持（如退则早退包头矣，目前再退以其野战战斗力之低弱，必受严重损失，除万不得已必凭坚

固守)，因之围攻归绥之战役，将转为持久。”

11月16日午时，中共中央军委复电，下达了以主力全力西进的指示，指出：“绥远战役在突破丰镇时，我主力未及时猛烈西进，截断傅顽归路，以致失去野战歼灭敌主力机会，傅逆得集主力步兵五师，骑兵一师（共二万三千人）凭坚（归垣）固守，与我顽抗，依坚（归垣）短促出击给我以消耗。聂十五日午电改变部署，贺李率所部先取包头是好的，但为确保胜利，须集中力量，准备消灭东西可能增援包头之敌，故聂司令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适当兵力控制归垣周围要点，弹性围困，封锁袭扰，如包头能迅速攻下，应即攻占，否则贺李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聂主力控制包头、萨拉齐地区，隔断绥包傅顽联系，相机攻取包头，引敌出击，求得野战，贺李完成任务后，一部控制五原、陕坝、临河，主力回师与聂合力再攻取归垣，夺取东胜，你们如何部署望速告。”

晋察冀、晋绥两区领导人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分别进行了讨论研究。聂荣臻司令员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①11月17日20时致电中央军委，陈述了对军委16日电的意见：“十六日午电示于十七日收到，对执行这一指示经过讨论研究感到很难部署，特将困难情形及我目前部署经过报告如下：（一）对军委前示之三种方案，我们研究讨论后即对归绥城敌情具体侦察准备攻城，依据敌情及工事情形，强攻不利。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仍以与归绥之守敌均相等之兵力，继续围困归绥，并能策应贺部。如归绥敌西窜，我即能在绥、包间形成野战，因傅顽以主力据守归绥，并非单纯固守，系采取积极防御，连续主动出击，企图寻求机会，对我各个击破，但屡次出击无一次其伤亡不三四倍于我，迄未得逞，如我围城部队转为劣势，敌乘机集中力量向我

^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2页。

反击，则全部战局有恶化危险。(二)我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夺取五临，则第一，兵力更分散(我贺李两部共28个团，现有人数每团平均不过一千一百人)，如分作五临包头归绥三区作战(包头至五原三百余里，五原至临河二百余里)，互相策应困难，处处兵力薄弱。第二，归绥地区原非根据地，大兵团作战如无巩固之后方，入境后则粮食弹药不得前运，有时即有粮也磨不出，伤员后运也成问题，目前部署本不为难，但不能实现，本部现有伤员即不得后运。以上请再讨论复示。”

11月19日，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也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十六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包头失去，对傅顽是很大打击，五临再失，可能促使傅顽内部发生变化；我们完全处于主动。如攻下包头，并肃清绥包线伪顽土匪，归绥以西粮食运输是可解决的，伤员、弹药运输则较困难，坝子口若能控制则还可设法运输。我们提议晋察冀部队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个团协助攻包，则我力量更优势。并且攻下包头后，我主力可继续进行夺取五临。”

中央军委在接到聂荣臻、贺龙、李井泉的报告后，于11月22日复电，再次阐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并提出了打破僵持局面的办法。指出：“(一)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翼侧，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二)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现在只能实行以下三个办法：第一、照聂意见执行，现在办法，以冀察晋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据贺李

电攻取包头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打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第二，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队。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援队。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顽控制，我之攻包部队后方可能被顽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再打。如此我虽暂时脱离被动，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冀察晋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于执行肃清同蒲北段顽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顽将仍为我大患，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付傅顽。（三）以上三个办法，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些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击破之，但两部主力攻包头亦可能还是攻不下，五原更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聂耿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实行之。”

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3旅（欠1个团）并第4旅第6团，11月17日进到包头附近。这时，归绥守军新编骑兵第4师乘隙窜出，并会同骑兵挺进第4纵队进到了二十四顷地以南地区；宁夏骑兵第10师也经五原、临河东援。据此，贺龙、李井泉决心先打援后攻城。23日，以独立第2旅、第3旅围歼新编骑兵第4师，一经接触，该师即向托克托溃逃，仅歼其2个连。

11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贺龙：“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11月24日，聂荣臻致电贺龙、李井泉、张经武征询对攻包的意见：“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电后，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照中央二十三日电执行。”

贺龙、李井泉经过反复研究，决心再次攻包。11月26日将攻包计划报告聂荣臻和中央军委。具体部署：晋绥9个团为攻城突击部队，以包头西北及以西为主要突击方向，独立第2、第3旅在西北门与西门之间攻城，第358旅在西北门与水北门之间攻城，独立第1旅为预备队。晋察冀之冀晋纵队第3旅担任箝制任务，以5个营在包头城东南、东北两面助攻，以4个营配合晋绥骑兵旅，置于包头西北40里通安北之道沙坝子及通五原之东西达拉亥，阻击援军。预定28日晚开始攻城。

11月27日，当部队开始运动时，宁夏马其良之骑兵第10师增援到达包头城西之麻池地区，傅作义之新编骑兵第4师仍在萨拉齐县以南地区活动。贺龙、李井泉当即决心首先歼灭增援之敌，尔后再行攻包，遂以冀晋纵队第3旅一部打击新骑4师，以独立第1旅并指挥第358旅之第715团与骑兵旅前往包头城西之麻池镇，打击马其良部。29日，独立第1旅、骑兵旅及第4旅第6团在达拉亥击溃骑兵第10师，并乘胜追击，歼其3个连。将援军击溃后，立即又回师参加攻打包头。

12月2日晚，晋绥部队按原部署再攻包头。但守军已加强了包头城西北面的防御。攻击部队虽然连续发起猛攻，均未奏效。这时已临塞外严冬季节，各种补给十分困难，病员日增，战役持续下去十分不利。贺龙、李井泉当即决定停止进攻，撤出战斗。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均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晋绥军区部队撤至卓资山、福生庄及其以南地区，晋察冀军区主力转向平绥铁路东段，准备新的机动。

五、绥远战役的战果及主要经验教训

绥远战役自1945年10月18日开始至12月14日止，历时50余天，晋察冀、晋绥两区部队协同作战，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由集宁、丰镇一直打回归绥、包头，先后歼其1.2万余人，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凉城、武川、萨拉齐等城镇，再次解放了绥东、绥南的广大地区。在这次作战中，晋察冀、晋绥部队伤亡约7000人。

中共中央军委在1945年12月8日给晋察冀、晋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绥远战役虽未消灭傅顽主力，未全部完成战役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已给了傅顽以严重打击，消灭了最反动的二十六师主力，解放了绥东六县，孤立了大同敌顽，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新解放区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战役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下次战役胜利的基础，应当重视这种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作为教材。”

绥远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没有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当时晋察冀、晋绥两区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部队刚编成野战兵团，各级指挥机构很不健全，在战术思想、领导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还不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参战部队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主力未能及时西进，断敌退路，加之傅作义较善用兵，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迅速西撤，集结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致使晋察冀、晋绥参战主力失去野战歼敌机会，被迫攻坚；在攻城战中，由于火力不足和缺乏攻坚经验，久攻不下，形成对峙局面，直至严冬已到，不得不撤出战斗。这些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第四节 新四军和山东军区举行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挫败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一、山东、华中解放区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军进攻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企图和部署

在 8 年抗日战争中，坚持山东和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山东军区和新四军所属各部队，经过了长期的艰苦作战，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已建立了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以上属山东）及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浙边、皖中（以上属华中）等根据地，拥有人口 4000 多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 52 万人，其中山东军区 27 万人，新四军 25 万人（不包括新四军第 5 师），民兵也发展到近 100 万人。

1945 年 8 月，山东和华中两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整编：山东军区的主力编成了 8 个师和 11 个警备旅，新四军各师、各军区除了已集中的主力外，也迅速以地方武装升级组成了几个新的旅。同时，对境内的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在 8、9 两个月内解放了县城及重要市镇 80 余处以及广大农村，迫使日伪军困守于胶济、津浦、陇海 3 条铁路沿线和长江沿岸的较大城镇。

1945 年 9 月以后，依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新四军第 3 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分别率部开赴东北，协同兄弟部队执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任务；留置山东和华中的其余部队，则根据保卫这两个解放区的需要进行了统一调整，主动收缩阵地，集结主力，转向津浦线徐州、济南段，以准备粉碎国民党军沿津浦线的进攻。

经过上述部署调整及反攻作战之后，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基本情况是：在整个山东省内，除津浦路德州至徐州之间的若干地段，胶济路青岛周围及昌乐、潍县等地外，在苏皖边地区，除津浦路徐州、浦口段及沿长江的扬州、泰兴、泰州、南通等地外，都已成为解放区。留在这两个解放区作战的军队共约 41 万人，其中山东地区 25 万人（含北移山东的新四军部队），在苏皖边地区 16 万人。

山东和苏皖边解放区，南临长江，北近平津，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实现其迅速打通津浦铁路运兵东北和分割各解放区的联系，以便尔后实施大规模进攻的目的，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即以浙赣边之顾祝同部、大别山和皖北地区之李品仙部、豫皖边之李延年部、鄂北地区之冯治安部等，分向宁、沪、杭地区及津浦路浦口、徐州段推进，企图首先控制宁、沪、杭基本地区及津浦线浦徐段，然后以徐州为基地继续打通整个津浦线。其进攻的部署是：以原在豫皖边的骑兵第 2 军、第 12 军于 9 月初进抵徐州，继沿津浦路北上，其后续部队第 97、第 59、第 77、第 51 军等亦向徐州开进；皖西的第 7、第 48 军占领蚌埠，控制津浦路蚌埠、浦口段；第 3 方面军和新编第 6 军分别经空运进入上海、南京及宁沪路，向南通、六合之线推进；原在云南的第 8 军海运青岛，准备进攻胶东解放区。为了掩护其主力推进，国民党军统帅部除了命令日伪军向上海、南京、蚌埠、徐州、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及铁路线逐步集中，负责确保这些点线，阻止人民军队的反攻行动外，还收编了大批投靠日军的汪伪部队，令其控制华东各城市和要点，以接应国民党军主力。第 2 路军孙良诚部位于扬州、盐城；独立纵队颜秀五部位于泰州；第 6 路军郝鹏举部位于徐州及其外围；第 5 路军吴化文部在 9 月底 10 月初由蚌埠向北，拟进驻津浦线徐州、济南段，充当反共反人民的马前卒。

二、截断津浦路，坚决阻止国民党军由徐州北上

中共中央军委在判明国民党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线向北平、天津推进的作战计划后，1945年9月22日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由山东及我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集中主力兵团用纠缠扭打战法，截断津浦路，保障挺进东北和热、察两省部队的安全。

当时，山东和华中调东北的部队正在行动中，两区部队新的部署调整尚未就绪，战线长，兵力分散，能用于津浦线作战的部队比较少。中央决定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后，为加强山东的作战指挥，9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正由延安返回华中途中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取捷径直到山东”，以便接替罗荣桓的工作。

9月24日，罗荣桓、黎玉（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拟制了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线北进的作战计划：“我们决定集中第3师、第8师全部，编成野战军，组织精干指挥部及政治机关，王建安为总指挥，王麓水为政治委员，并指挥警8旅、警3旅等，沿津浦线两侧之基干兵团、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作战，主力兵团应即移置适当位置，以便随时投入战斗。”“我们对顽战法，首先要争取从正面的破坏铁路、公路，切断交通，迫使顽军徒步前进，再以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空室清野，以地方武装、民兵、小部队，在顽军前后左右，纠缠扭打，且走且打，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长期困疲与消耗之，而我之主力则窥视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坚决以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应以警8旅为主体，在滕县、临城之间，准备战场，在适当地点，屯积粮食、炸弹，组织兵站、医院，侦察地形；另以警3旅为主体，在吴村、泰安之间准备战场，便利野战军在该地寻找机会作战。”

10月4日，中央军委就山东和华中的作战任务问题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一）除向东北及冀东出动部队外，在山东及华中的任务是确实控制华中江北地区（在苏南、皖中、皖南能坚持游击亦甚好），并确实阻止顽军从徐州再向济南、天津深

入（从青岛向济南深入亦须阻止），为此任务，请你们适当部署兵力。（二）去东北、冀东部队，除胶东、渤海主力抽走外，黄克诚师亦确定北进，不要在山东迟滞，为了津浦战役的需要，在华中尚无充分部队到山东来接任务以前，山东原拟在鲁中抽调之第三批部队三个师，可暂缓北调，令其参加津浦作战。（三）顽军李延年部已开始北进，望罗、黎迅速组织这一战役，确实用主力控制津浦路一段，并令湖西、华中及泰西部队确实配合，阻顽北进。”

10月5日，山东军区决定编组5个临时纵队，分置津浦、陇海、胶济3路，坚决阻止国民党军进入济南、天津。其具体部署：

第一，位于鲁南的第8师、警备第8旅和湖西东进之2个团，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第1纵队，由王麓水、何以祥统一指挥，担任兖州、徐州段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除以一部继续彻底破坏铁路外，主力置于邹、滕、临间两侧地区，寻求有利时机，坚决歼灭北上顽军主力一部，如顽军主力已强行北上，则第8师主力应尾击其后侧，同时北进扭打，并准备配合第2纵队作战。

第二，位于鲁中的第3师主力，警备第3旅全部，第4师主力及泰西军分区靠近铁路附近的部队，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第2纵队，由王建安、邝任农统一指挥，担任济南、兖州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除以有力一部彻底破坏铁道，并控制其一段外，主力置于泰安、兖州间及泰安、济南间两侧地区，寻有利时机，坚决歼灭北上顽军主力一部，如顽军主力已通过北上，则第3师全部应尾击扭打，并准备配合第3纵队作战。

第三，位于滨海的第1师2个团（其第3团暂留诸城）迅速进至商河、德平地区，并由渤海抽出3个团，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3纵队，由袁也烈、景晓村统一指挥，担任济南、德州段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准备破路及歼灭顽军向天津深入，如顽军偷过北上，则第1师主力，第3师全部应尾击，同时北进扭打，且走且打，直到天津冀东为止。

第四，位于滨海的第2师、独立第2旅、鲁南第3军分区、滨

海第2军分区及地方武装，临时组成第4纵队，由罗华生、刘兴元统一指挥，担任沿陇海路东段之作战任务，应大力进行宽大正面的破坏铁路，主力应隐蔽于新安镇东西适当位置，寻求机动，准备坚决打击由徐州东进顽军，争取歼灭其主力一部，并掩护华中北上部队。

第五，胶东准备抽集3个团及青、潍两侧地区的地方武装，临时组成第5纵队，由胶东指定统率人员，对胶济路应继续破坏，切断东西联络，加强对青岛侦察，及时发现由青岛向济南前进之顽军，给予有力截击，争取歼灭一部。

由徐州沿津浦路北进的国民党军进展迅速，其先头部队第12军、骑2军及吴化文部1.5万人，9月30日开始北进，10月1日抵达临城（今薛城），3日，占领滕县，6日到达兖州，并在日军的掩护下继续北进。8日，与警3旅在宫村以东接触，激战1日，伤亡70余人，因警3旅兵力分散，未能有力堵击，致使该部窜入大汶口。9日，于南留村附近，复遭山东第4师截击，被俘10余人。11日，其先头部队进入济南。

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之所以能顺利北进，其原因，当时山东军区部队正在大调动，主力未能抢先切实控制铁路形成有力的阻击阵地，加之破路不彻底，致使国民党军得以顺利通过。

10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徐州、济南间创造战场问题致电陈毅、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等：“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山东军区前电组织五个临时纵队，平均分置津浦、胶济、陇海三路不甚妥当，应将鲁中、鲁南、滨海及湖西、泰西主力集中，再加新四军北上两个旅组成一强大野战军，由陈、罗、黎亲去指挥（或罗黎二人中分一人处理后方工作）担负此任务。胶济路可以不积极破坏，留一条路给敌人退走。

陇海东段只要顽军不积极封锁华中、山东联系，亦不必以重兵去破坏，而应集中力量于徐州以北。新四军除令五旅、九旅速到山东外，亦应在淮南、淮北集中力量于津浦路作战，湖西、泰西两分区部队应即归山东指挥调动，望冀鲁豫通知湖西、泰西。”

山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和当面国民党军进攻的具体情况，于10月13日7时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确定集中兵力于津浦线，选择重点，控制一段铁路，以有效地阻击国民党军北上。决以鲁中第3、第4两师，警备第3旅主力，于泰安、兖州间；鲁南第8师，于邹县、临城间；刚到达鲁南的新四军第4师第9旅，于临城、徐州间；鲁西3个团，于泰安、济南间，各选择重点，控制一段。渤海军区展开广泛而彻底的大破袭，亦于津浦北段，选择重点，控制一段，坚决截击顽军北上。

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上国民党军的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为了上述目的，各解放区亦按各区铁路情况，将自己所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及指挥机关，作有计划的配备，组成几个方面的战线，对各交通要道施行有计划的破坏和扼守，并须有重点。”“为了有力的破坏各段铁路和消灭顽军，各段均须组织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并依据野战军的具体情况和敌情条件进行作战。”“凡我有强大力量足以控制铁路一段时，均应力求控制一段，布置战场，和顽军作战，求得整批消灭顽军力量，阻止其前进。”“各区领导机关，须分为前方与后方两处办事，而将最得力的干部派到前方，去亲自组织这一交通作战。”

为切实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山东军区确定立即举行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并以进至鲁南的新四军主力一部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一部，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由刚从延安到达山东临沂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统一指挥。10月15日，陈毅、黎玉率津浦前线指挥部进至邹县香城。

动作战的有利战场。

（二）界河北伏击，歼灭伪军吴化文部主力

10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为恢复津浦路徐济段交通，以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徐良率第97军及骑8师进抵临城，另以第5路军吴化文部主力，在日军第105联队掩护下，自滕县向北进攻。以伪山东特务旅花竹荫部和日军一部自兖州向南，企图南北对进，首先打通兖州、滕县间交通。

陈毅、黎玉为切实控制津浦路邹、滕段，便于尔后主力向南机动，决心集中山东军区第8师全部，第3、第4师各2个团，新四军第9旅全部，刚到鲁南的第2师第5旅2个团，共12个团的兵力，于界河至两下店间，以伏击手段歼灭吴化文部。具体部署：以第8师主力集结于路西黄家山两侧地区，沿下看铺与保安山之间地域，由西向东突击两下店至界河间运动之敌；以第9旅主力集结于官庄、上庄、金山庄、温石庄之间地区，沿官庄至张家庄，温石庄至前圪之间地域，由东向西突击下看铺至界河间运动之敌；以第5旅一部控制龙山店，主力集结于前后枣庄，待机攻占界河，并向滕县警戒；第3、第4师除一部切实控制邹县，歼击自兖州南下的日伪军外，其主力集结于邹县以南两下店以北山地（津浦路东），阻击由界河北上之敌。

11月1日，吴化文率其所属4个师，在日军第105联队掩护下由滕县北犯。3日13时，当日军及吴化文部先头已通过下看铺接近两下店，而其主力尚运动于下看铺南北地段时，第8师、第9旅、第5旅即按预定计划分路出击，经2小时激战，即将其大部歼灭，仅吴化文率残部北窜两下店，与日军会合。4日，第5旅进攻南界河，守军突围逃跑，截歼其300余人。

界河北伏击战，歼灭吴化文总部及其第1军军部与所属第1、第2、第6师，俘第1军军长于怀安、师长徐树声以下4000余人，毙伤600余人，控制了兖州至滕县段铁路50余公里。津浦前线野战军参战部队伤亡400余人。

为便于下一步向南机动，在界河北伏击战结束后，津浦前线指挥部以山东第8师一部沿津浦路以西南下，进逼临城。11日午夜，该师第23团进攻临城以西之柏山，全歼守军第97军2个连。在这次战斗中，第23团1营3连机枪班长陈金合在临城援军将至、碉堡未攻克、守军将无法全歼的紧急情况下，毅然冲到碉堡前，一手扶住快速手雷，一手拉弦，炸毁了敌人最后1个碉堡，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取了全歼守敌的胜利。陈毅听到这个消息，甚为感动，给予高度评价，称陈金合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

（三）发展南线攻势，攻克滕县及临城外围各据点

国民党军和平绥、同蒲线尤其在平汉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于1945年11月9日在重庆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准备进行全国性反共，飞机到处出动示威，散发传单，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败类”，声称“有匪无我”。确定在津浦全线由已到达该线的6个军再增加11个军，成为其进攻解放区兵力最雄厚的一路。

沿津浦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在界河遭伏击后，进至临城、滕县之国民党军积极加修工事，企图等待援军第33集团军及第51军等部到达后再行北进。

此时，山东第3师和鲁中警备第3旅主力正在进行整顿，拟于11月中旬进军东北。山东第4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继续留置山东地区作战。新四军第2师第4旅及第7师第19旅正由淮南地区北进，预计11月下旬可到达山东参战。

为进一步扩大对津浦线的占领，11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黎玉：“（1）庆祝你们歼灭吴化文的胜利。（2）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地区的据点，广泛发动群众，给民众以物质经济利益。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滕地区尚须时间，你们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津浦前线指挥部于11月13日决定集中主力向南扩张攻势，

攻占滕县、临城，消灭位于该线的国民党第 19 集团军陈大庆部第 97 军。其作战部署：山东第 4 师，日内开兖州、泰安间，相机攻占兖州，控制兖、泰间铁路；主要作战方向，是向南攻占滕县、临城，以第 8 师和第 5、第 9 两旅担负之；以新 4 军第 4 旅及第 19 旅，迅速赶到战场，力求在国民党军大部来到前，完成滕临间的机动任务。

11 月 16 日，各部按既定计划开进。21 日，得悉国民党军第 8 军已于 14 日在青岛登陆，并开始沿胶济线西犯。津浦前线指挥部决定以第 4 师转用于胶济线，进至济南、张店段，会同胶东军区部队歼灭西进之国民党军，另以警备第 8 旅接替第 4 师监视兖州守军任务。第 8 师、警备第 9 旅、新四军第 4、第 5、第 9、第 19 旅等部用于攻击滕县、临城方向。

11 月 25 日晚，第 8 师、警备第 9 旅、新四军第 4、第 5、第 9、第 19 旅按预定部署对临（城）滕（县）、临（城）枣（庄）、临（城）韩（庄）三段铁路进行破击。至 11 月 30 日，各部分别攻克了临城北之官桥、孟家仓、狄家庄、魏家庄、辛庄，临城东之西曲柏、石格营，临城南之沙沟、官庄、顾庄、韩庄等重要据点，控制了临滕间、临徐间和临枣间各一段铁路，歼灭第 19 集团军暂 2 旅及其他伪军共 3000 余人，受降日军 2000 余人，造成了对临城守军第 19 集团军总部和第 97 军的包围态势。

12 月 1 日晚，津浦前线指挥部重新调整攻击部署，以第 5、第 9 旅进攻临城以东四里石、洪家咀、薛家庄等处之第 97 军新 29 师；以第 8 师由北向南进逼临城，准备歼击由临城东援之国民党军；以第 4、第 19 旅位于沙沟以南准备歼击可能自徐州北援之国民党军。战至 5 日，全部进占了临城外围据点，歼国民党军 1 个团。国民党军余部收缩兵力，固守临城。第 8 师等部随即紧缩对临城的包围圈。

经临城外围的 10 余天作战之后，整个津浦线兖州、韩庄段铁路，只剩下兖州、滕县、临城三个孤立据点。临枣线除枣庄、小

窑等仍为伪军王继美部和新36师所盘踞外，其余均为人民军队控制。临城守军缩据城内，凭坚固工事及炮兵、航空兵的支援固守，在短期内不易攻克。陈毅决心乘胜攻取滕县、小窑，进一步扩大对津浦线徐济段的控制。

防守滕县之国民党军为第19集团军暂1旅及山东保安第2师赵毅轩部共约9000人，统由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徐良指挥。小窑、陶庄为新36师及日军1个中队防守。

12月7日，津浦前线指挥部对进攻滕县、小窑之敌作了部署：以第8师进攻滕县；以第9旅附鲁南第3分区警17团及湖西第14团进攻小窑、陶庄；以第5旅集结临城东北，监视并打击可能自临城出援之国民党军；以第4、第19旅及警18团集结韩庄东北地区，打击可能自徐州北上或由临城南窜之国民党军。

12月12日夜，第8师对滕县守军发起攻击，经一夜战斗，扫清了外围。13日17时开始攻城。刚成立12天的山炮连首战以17发炮弹命中15发的效果，压制和摧毁了东门城楼及其两侧的火力点，并随即以游动火力压制敌人。18时20分，第22团第1营第一梯队连续爆破铁丝网、鹿砦、城门后，首先突入城内，其余各部亦相继突入，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将其全部歼灭。这次战斗，歼灭第19集团军前进指挥所及所属暂1旅与保2师全部，俘暂1旅旅长李桦以下7600人，毙伪保2师师长赵毅轩以下1000余人，缴获山炮6门。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徐良只身逃回临城。

在滕县攻坚战中，第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亲临阵地前沿观察敌情地形，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在第8师夺取滕县的同时，第9旅等部亦对小窑守军展开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歼。日军1个中队经过政治攻势，开始时采取中立态度，战斗结束后也缴械投降。16日，陶庄守军2000余人，在新36师副师长何志斌率领下宣布起义（后又逃回临城）。

至此，新四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在津浦前线歼国民党军已达2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运兵东北的计划。

(四) 沿运河线组织反击，挫败国民党军在停战前抢占战略要点的企图

津浦前线野战军攻克滕县、扫清临城外围据点后，除调整部队布置战场外，对临城继续进行围困，并以有力部队置于临城东南运河畔，以阻击由徐州和陇海路向北增援的国民党军。

此时，国民党军向山东和华中解放区推进的后续部队已陆续到达。到1946年1月初，国民党军第33集团军（辖第59、第77军）、第98军及第51军主力均先后到达徐州，第28、第58军到达徐州、宿县之间，第25军进至扬州，第71军进至南通，第21、第49军分别进到常熟、江阴、靖江、镇江地区，第100军正由湖南洞口地区向江阴、无锡前进。连同原有之第12、第96（由骑2军改编）、第97、第7、第48、第74军等部，在津浦路济南、浦口段和长江浦口、南通段两岸已达到17个军的兵力（新编第6军已由南京调往东北）。此时，国共两党关于停战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并已达成了停战协议。但蒋介石为在国共双方停战令下达前夺取有利阵地，密令所部“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以首先到达徐州之第51、第59、第77军及原驻徐州、运河车站段之第6路军郝鹏举部为第一梯队，自柳泉镇、贾汪至赵墩段向东北方向进攻，其主要突击方向指向峰县、台儿庄。第一梯队以第51军为左路，经韩庄向临城和峰县方向进攻；以第33集团军为中路，由贾汪向台儿庄和峰县方向进攻；以郝鹏举部为右路，保障第33集团军右侧安全。第二梯队以第28、第98军组成，尾第一梯队跟进。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任命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军区政治委员。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黎玉为政治委员，宋时轮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为副主任。下辖第1纵队（原定调东北，1945年12月中旬到达胶济铁路后，中央军委又决

定留置山东地区作战)、第2纵队和原新四军第7师、原山东军区第8师,共7万余人。

为挫败国民党军在停战前抢占战略要点的企图,山东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第1、第2纵队、第7、第8师和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等部,对进犯鲁南解放区之国民党军实施反击。1946年1月11日反击作战开始,以第1纵队围攻宁阳、兖州之伪军;以第6纵队配合第2纵队和第7、第8师围攻韩庄、枣庄、贾汪之国民党军,歼其2000余人,余部仓皇缩回徐州。第6路军郝鹏举部在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于1月9日率部举行战场起义。1月13日午夜国共双方停战令生效,山东野战军停止追击,津浦战役结束,各部队就地转入休整。

在津浦前线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举行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期间,华中野战军在伍佑镇歼灭伪军孙良诚部第39师,迫使盐城伪军第4军6000人投降。随后又攻克高邮、新安镇等地,共歼俘日伪军1.6万余人,拔除了日伪军在苏皖边解放区的残存据点,控制了陇海路东段,使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山东军区所属的各军区、各师、各警备旅也积极向当面之日伪军展开攻势,鲁中的第4、第9师,胶东的第5师及两军区的基干武装,攻占了淄川、博山等地,歼日伪军1700余人,并在高密、潍县间阻击了第8军由青岛西犯的行动。渤海地区的部队破击了济南、德州间的铁路,攻克了禹城,歼伪军近千人,俘日军700余人。上述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津浦线作战。

四、津浦路(徐济段)战役的战果、作用及主要经验

津浦路徐济段作战近3个月,进行大小战斗125次,攻克邹县、曲阜、宁阳、滕县县城及韩庄、沙沟、小窑、官桥、南沙河、界河、两下店、东滩庄、吴村、界首等据点87处,包围兖州、泰安两县城及枣庄、临城等重镇,控制铁路近260里,歼灭第5路军吴化文部4个师和第19集团军陈大庆部约3个师的兵力,计毙顽伪2317人,击伤2592人,俘军长于怀安以下23128人,共2.

8万余人；投降日军 3995 人。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参战部队伤团长以下 5122 人，牺牲师长王麓水以下 873 人，失踪被俘 52 人。

津浦路徐济段作战，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斗争。

战后，津浦前线指挥部对战役进行了总结，基本经验是：第一、根据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的方针，在国民党军主力尚未到达前，首先在津浦线邹、滕段打开缺口，并根据情况逐步向南扩展，逼近徐州，从而布置有利的战场，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地位。第二、贯彻了积极求战，选择薄弱之敌进攻的原则，不是单纯等待主力部队全部到齐后与敌作战，而是先尽手中可能使用的最大限度的兵力，对就近的、较为薄弱的和确有把握攻歼的国民党军实施进攻，以便逐步地取得作战经验，逐步地削弱敌人，争取时间集结主力，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第三、针对蒋、日、伪军虽已合流，但其内部矛盾很深的特点，善于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动摇敌人斗志，求得各个歼灭敌人。

第五节 同蒲路南段、北宁路榆锦段作战和承德保卫战

一、同蒲路南段作战

同蒲铁路是国民党军侵入华北腹地、进兵平津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令第 1 战区胡宗南部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总部及第 3、第 16 军先后从陕甘驻地经潼关渡过黄河，9 月初集结于晋南地区，后沿同蒲路北上，并乘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上党战役之机，顺利通过正太路，于 10 月中旬进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 1 军进至晋南闻喜以南地区，企图配合第 11 战区部队控制华北，并打通进军东北的通道。

为阻滞国民党军继续沿同蒲路北上，保障八路军、新四军一部挺进东北，并策应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5 年 9

月22日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以太行、太岳主力对付沿同蒲路北进之国民党军。9月29日规定了破路任务：“同蒲路之太谷以南，由刘邓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及控制二、三段。……必须坚决顽强进行破坏，愈彻底愈好，并必须挖毁路基使其难修复，在顽军通过前控制，以阻顽前进，在顽军通过后控制，断绝其后方接济，牵制其前进，以及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10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同蒲路作战作了部署：“胡顽部进入正太路后，在敌掩护下，我很难打到他。平汉路已为我控制近三百里，孙部不敢冒进，因此一时也难打到他。目前比较便于机动的还是同蒲路，最好是在韩侯岭山区，消灭二十二师及李文总直属队，如该师打不到，即控制灵石、介休、霍、赵、洪诸城及铁道，使李文集团截为两段，吸引其进攻，如十六军不回头即经正太前进，我太行之一、二两分区配合赵尔陆部，沿途南北不断袭击及广泛地雷爆炸，同蒲南段仍应辗转破袭。”

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0月11日飞返延安，就同蒲路作战进一步作了指示，12日午时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沿同蒲路北进之十六军，已集中榆次、太谷线，在敌掩护下，通过正太路，难以寻求机会歼灭其一师或一团，我对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及七师尚未消失歼灭其部分机会，似以太岳区近五万主力与地方军对付即够，集中一万五千至二万主力，每次消灭其一两个团，有两三次这样的战斗，第三军即不能前进。十六军亦可能牵制于正太路给以部分的打击。”10月16日，中央军委又就阻止胡宗南部北进的作战方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因上党与阎顽作战（这是必要的），胡顽之十六军得以顺利通过，第三军亦在积极北进中，如该两军能到达石家庄集中，即将力图南北打通平汉路（高邑、汤阴段），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我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除请严令赵尔陆等积极歼灭阻击十六军外，请你们务必采取一切办法，阻止第三军北进，

消灭其大部以至全部，提议太岳所有地方兵团及大部县区干队，一刻不停的有计划的向同蒲分段集结，控制同蒲一段至数段（并尽量动员民兵协助），在不能消灭该军时，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争取我主力转移与必须恢复疲劳的时间。在主力中，伤亡疲劳较轻者，抽一两个团为先遣队，协同地方兵团进行上述动作。”

此时，国民党军在同蒲铁路平遥至风陵渡防守的主要兵力有：阎锡山的第34军（3个师）及第19、第61军残部、政卫第2师、第3师、第1纵队、第3纵队、汾南纵队等约3万余人，加上胡宗南的第167师，合计4万余人，兵力分散，便于各个击破。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以太岳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共15个团3万余人，统由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王鹤峰统一指挥，发起同蒲路战役，截断同蒲路，阻止胡宗南部第1军北进，并求得控制该铁路，扫清同蒲路以东阎锡山之残余势力和据点，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战场。

10月13日，由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率第55、第57团及中条地区的地方武装首先伸至晋南，至10月20日，控制了同蒲铁路安邑至闻喜间约25公里地段。

10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你们决心大破同蒲路是很对的，但须着重中段而不是南段，望集中兵力攻占灵石、介休、霍县、赵城等县城，彻底平毁城寨，破坏该段铁道并控制之，并放手发动群众，准备有利战场，以便吸引胡宗南、阎锡山两顽部进攻（阎之主力近二万，胡一六七师均在晋南、晋西）。只要控制铁道，对方一定来攻，再打几个大胜仗配合绥远、平汉作战甚为必要。”“阎锡山三十四军高卓之部约一万二千，近日集中临汾准备北上，你们决不可错过机会，望立即破坏灵、霍、洪、赵段铁路，迫其步行通过，然后歼灭之，若让其乘车则不好打。”

担任同蒲线作战的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在上党战役结束后，于10月15日至25日分别集结于根据地腹心区沁水、安泽、

沁源一带进行短期整训，对部队进行了补充。10月下旬，太岳纵队奉命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0、第11、第13旅。太岳军区，王新亭任司令员，区党委书记王鹤峰兼政治委员。军区组建了独立旅（后改称第24旅）。

10月26日，第4纵队以旅为单位分路西进，计划以第10旅攻占赵城；第11旅攻占霍县以北之什茨、南关两车站，并相机攻占霍县；第13旅除以一部兵力攻占霍县以东之南堡外，余为纵队预备队。太岳军区第24旅在赵城以南活动，牵制洪洞、临汾之王靖国部，不使其北援。各地武装则积极对当面国民党军发动攻势，配合主力作战。10月27、28两日，第4纵队第11旅第31、第32团先后攻占了什茨、南关两车站，歼阎锡山第44师第1团全部、第45师第1团1个营及土顽一部，并乘胜由东、南、北三面包围了霍县城。30日，第10旅一举攻克赵城，全歼阎军督导第4纵队等部2000余人。第13旅一部同时占领南堡，歼守军2个连。太岳军区第24旅及各地方武装亦歼国民党军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至此，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控制了灵石至洪洞间的铁路，并在人民群众参战支援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击，将灵石以南洪洞以北的铁路全部拆毁，截断了同蒲路南段。

赵城解放、霍县被围、同蒲路被截断后，阎锡山急令驻守隰县、汾西之第44师2个团增援霍县。该援军在霍县守军接应下进入城内。此时，霍县守军已增至4个团，攻击不易成功。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基于切断同蒲路阻敌北上之目的已达到，乃终止攻占霍县之计划。

11月初，中央军委为加强东北的兵力，命令第4纵队（辖第10、第13旅，并另抽地方武装组成1个新旅；第11旅调归新组建的第8纵队），由陈赓司令员率领，待命开赴东北；12月初，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指示第4纵队仍留太岳区，于是第8纵队撤销，第11旅归建，陈赓司令员率第10、第11、第13旅立即

再出同蒲，在赵城、洪洞地区伺机歼击阎锡山部。

11月下旬，阎锡山为夺回同蒲路，以其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主力4万余人由临汾开始北犯，于29日侵占赵城，但其铁路交通则一时无法恢复。

第4纵队撤出赵城后，除以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活动外，以主力一部寻找弱点，歼灭出犯之国民党军。12月2日，第4纵队第11旅、太岳军区第24旅各一部在赵城以东侯村、沙窑地区截击由赵城东犯之第73师的1个团，歼其大部，俘副团长以下500余人。12月9日，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指挥军区部队攻占闻喜县城。12月中旬，第4纵队第13旅2个团在赵城虎头山、窑子镇一带重创王靖国部1个师，迫其猬集于临汾、洪洞、赵城之交通点线而不敢出犯。陈赓、谢富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主力乘虚向曲（沃）翼（城）地区进击。12月25日，各路部队同时由洪洞东南之苏堡、原上地区隐蔽南进。11旅一部首先包围了浮山县城，并对守军实施佯攻。28日，第11旅一举攻克翼城并全歼守军。

第4纵队主力南下攻占翼城，使曲、绛之阎军失去了重要屏障。为粉碎国民党军于停战前夕抢占战略要点的企图，1946年1月5日，中央军委指示第4纵队迅速攻占曲沃、侯马、新绛地区，控制侯马南北交通，保持已得阵地，造成有利态势。据此，第4纵队令第13旅一部和太岳军区第24旅一部直出蒙城、高显，阻止临汾之王靖国部南援；第11旅直扑晋南重镇侯马，相机攻占新绛；第10旅、第13旅主力及太岳军区第24旅另一部围攻曲沃。1月10日，各旅由翼城及以西地区分别出动。12日，第13旅一部攻占蒙城车站，第24旅攻占高显车站，各歼国民党军一部；第11旅也攻占了侯马、隘口、东镇。第10旅和第13旅主力等部先后攻占了曲沃周围据点，夺取了东、西、南三关。12日晚向曲沃城发起总攻，激战至13日23时，第10旅2个团各一部突破城垣，冲入城内，正向敌纵深发展时，因已到军委命令规定的13日24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时限，乃停止战斗行动，攻城部队撤至曲沃

城郊。

同蒲路南段作战，历时2个多月，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解放了赵城、翼城、侯马、蒙城、高显、水头等城镇及汾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破击了灵石至洪洞间的交通，控制了同蒲南段北起蒙城南至水头镇的110余公里铁路交通，切断了国民党的南北联系，制止了胡宗南部经同蒲路继续北上，配合了平汉、平绥路作战。这次作战的主要经验：寻敌弱点，掌握战机，集中兵力，突破一点。通过这次作战实践，大大提高了部队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的自觉性，加速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

二、北宁路榆锦段作战

蒋介石为争夺东北，最初的打算是：待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毫不费力地从苏军手中把东北接收过来。但当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分路进入东北，会同原在该地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同时，几条纵贯南北的主要铁路一时无法打通，难于从陆路于短期内运兵东北。于是决定依靠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从海上和空中加紧向东北运兵。继空运第92、第94两军进踞北平、天津、唐山之后，又从九龙海运第13军、从越南海运第52军，进入东北，由熊式辉、杜聿明指挥，企图乘苏军11月撤回国之前，以武力接收东北。

1945年10月，为对日大反攻而先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李运昌部，已扩大至8万人，但大部为收编的伪军和吸收的新兵，战斗力弱。从关内各战略区调入东北的主力部队，已到达指定位置的只有3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山东军区第1、第2、第3师等大部主力还在北进途中。

当蒋介石在策划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4条铁路向华北、东北进兵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曾于9月下旬计划集结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完全控制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一线，在冀

东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歼灭其北进部队，以阻绝其进入东北，并为此积极作了部署。但在国民党实现了空运、海运4个军进占北平、天津等地后，这个决战计划已无法实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已进入东北的部队，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掩护关内各解放区一部分主力进军东北，力争控制全东北。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书记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服务。”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国民党的省）^①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10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控制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10月28日，又明确指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

^①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九省，辽宁、安东为其中的二省。

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争取于十一月十五日前后办完。”

中共中央东北局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决定改变过去分散配置的部署，立即集中部队，准备作战。以位于锦州附近之冀热辽部队及晋察冀第31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从山海关或葫芦岛沿北宁路的进攻；而营口、安东方面的防守则由山东渡海前来之第6师、第5师主力及若干地方武装负责。

10月中旬，国民党军拥有美械装备的第13军，由美舰运送，开赴东北。该军原拟由大连、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未允，后改由关内秦皇岛登陆。随后，第52军亦在秦皇岛登陆。

第13、第52军登陆后，蒋介石即令其向榆锦线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发动进攻。其方针是：“我军以迅速进入东北之目的，使主力由秦皇岛附近，沿北宁路向榆关攻击前进，以有力一部迂回匪之侧后，将匪压迫于临榆滨海地区而歼灭之。”具体作战部署：“（一）以十三军为攻击兵团，沿北宁路向榆关两侧地区攻击。（二）以五二军之二五师为左侧挺进队，经义院口向榆关以东迂回，截断匪之后方连络线。（三）以五二军（欠二五师）为预备兵团，置于秦皇岛附近，尔后随攻击之进展，超越追击，使匪无喘息之余暇。”^①

此时，奉命扼守山海关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部队，仅有冀热辽第19旅（辖第46、第47团，由冀东地方武装编成）及第22旅第64团，大部都是新兵，连同刚经冀东赶到的山东军区第7师（辖第19、第20、第21团），共约万人，统由第7师师长杨国夫指挥。

11月1日，国民党军第13军一部开始向山海关作试探性进

^① 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87页。

攻，当即被击退。当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彭真：“你们速组织内线作战，后续入东北各部，如被蒋军在锦州隔断，即处在外线夹击蒋军而歼灭之。”11月2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除电令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1师和刘其人部（由渤海军区部队的3个团编成）迅速开进外，11月4日又决定增调杨得志纵队、陈赓纵队、叶飞纵队和赵尔陆部等约10万人，拟于“十二月下半月到达热河、辽宁、冀东交界地区，从外线夹击蒋军，一部尽可能进入内线。”

11月3日，彭真、程子华、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期作战部署：“拟以现有兵力，补足武装。小部队进行消耗登陆据点的顽军。以主力布于辽、沈、营口以东地区，进行歼灭战（由359旅、里怀团及山东部队担任）。以一部援葫芦岛、锦州及其以北，抗击敌人，迟滞敌进（由李运昌部及沙克团及尔后由承德开来之文年生、刘其人担任）。”11月9日，林彪、彭真、吕正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重点、军队区分和战术原则的指示，指出：“在美军协助下向东北前进之顽军，估计其主力由陆路向古北口、承德、山海关之线进犯，重点将为山海关方向。一部将由海路向葫芦岛、营口、安东之线进犯，重点将为葫芦岛。”东北人民自治军“作战重点指向山海关方向。”为便于作战指挥，成立5个前线指挥部：第一前线，以程子华、黄永胜为正副司令员，指挥黄永胜部及热河境内所有部队，与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协同，歼灭向古北口、承德进犯之敌。第二前线，以杨国夫为副司令员，指挥山东第7师、冀热辽第19旅、山东刘其人部及临榆、绥中境内所有部队，消灭向山海关、绥中进犯之敌。第三前线，以李运昌为司令员，指挥文年生、沙克所部以及兴城、锦州以西以北辽宁境内所有冀热辽之部队，坚守葫芦岛，消灭向葫芦岛、锦州进犯之敌。第四前线，以

吴克华为司令员，彭嘉庆为政治委员，指挥山东之第6师（欠第18团）、新编第25旅及直属第2支队，坚守营口海岸，消灭向该方向进犯之敌。第五前线，以肖华为司令员，指挥第3纵队及第6师之第18团，坚守安东、庄河沿岸港口，消灭向该方向进犯之敌。程世才为警备司令员，指挥第359旅及曾克林、唐凯所部（欠第24旅）位于辽阳、本溪、抚顺地区，补充整训，准备作战。新四军第3师兼程向山海关前进，赵尔陆部兼程向古北口前进，并准备配合原在该地之部队消灭敌人。

11月4日、5日，国民党军第13军一部由美军协同进攻山海关西南沙河桥人民自治军阵地，未能得逞，被人民自治军俘获美军官兵5人，长短枪7支，汽车1辆。随后，国民党军逐日增加兵力，在空军火力支援下，连续发动猛攻。人民自治军部队一面依托工事顽强坚守；一面组织军民破坏山海关至秦皇岛的铁路、公路，迟滞国民党军后续部队开进。同时，组织小分队利用夜暗适时出击，一度逼近秦皇岛，迫使国民党军调动兵力加强后方的防御。

为增强山海关的防御兵力，11月13日，东北局电令黄克诚统一指挥新四军第3师及山东第1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有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11月15日，毛泽东就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的集结和作战方针等问题致电彭真、林彪：“顽十三军、五十二军，正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曹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种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得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

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

国民党军为迅速攻下山海关，在其后续预备兵团第52军全部登陆后，即按其预定部署，以第4、第54、第2、第195师等4个师实施正面攻击；以第89、第25师分路迂回山海关侧后中前所。其第89师与东北人民自治军防御部队激战3昼夜，于15日攻占九门口，一部突入中前所以西地区。同日，第25师进占中前所，达成了对山海关的合围，并于16日实施围攻。人民自治军各阻击部队顽强战斗，班自为战，人自为战，对失守的阵地反复争夺，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16日放弃山海关，向绥中方向撤退。

国民党军在以武力进攻山海关的同时，对苏方展开外交活动。苏方允许国民党军在苏军撤退前5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苏军能回国。11月17日，即山海关失守第二天，中央军委致电黄克诚、程子华、李运昌、沙克、林彪、彭真等：“苏顽协定，苏军撤退五天前允许蒋军空运并保障其安全，十七日蒋军开始空运沈阳，蒋为陆空配合，主力必沿北宁路猛进，我必须尽量消耗、疲劳、迟滞顽军前进。在苏军走后，消灭沈、长、哈蒋之着陆部队，争取时间集结主力，再消灭其陆路主力。”“李、沙及杨国夫所部于山海关、锦州地区取积极运动防御，纵深配备，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

弃阵地，发现敌人弱点，灵活出击消灭敌小部，利用夜间分散袭扰，疲劳敌人；彻底毁坏铁道公路，破坏沿岸一切大小码头，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黄、梁两师迅速集结锦西县城以西山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求得消灭其一两个师。”11月20日，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各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黄克诚、林彪：“黄师、梁师，应在林彪命令下，坚决打击由山海关向锦州前进之顽军，力求消灭其一二个师，控制铁路一段，截断顽军后路，以煞顽军威势，阻止其前进，以掩护我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有秩序的撤退。”

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人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决心集中主力在绥中地区组织防御。以山东第7师在正面抗击和箝制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以新四军第3师、山东第1师进至绥中西北，位于敌进攻路线之侧二三十里外隐蔽，待机侧击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

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后，乘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尚未到达前，集中兵力分两路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追击前进。11月18日占领绥中，22日，又相继攻占兴城、锦西、葫芦岛。而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却远落敌后，绥中歼敌计划未能实现。

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11月21日8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彭真、罗荣桓：“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粮，缺少用费，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通畅，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

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准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华中3师及山东1师“将由我亲自指挥，极力寻求战机，在有利时即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局采纳了这个建议。11月23日，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彭真的复电中指出：“同意林彪21日8时电基本意见，但黄、梁两部应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1、2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11月23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举行一次歼灭战。令黄克诚第3师、梁兴初第1师迅速到达江家屯地区集结休整，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岬，构筑据点；令沙克部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国民党军，牵制其先头部队；扬国夫部以1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国民党军，其主力进至杨家仗子、毛家屯一带待机。

国民党军在攻占锦西后，仍继续发动进攻，24日进至高桥、塔山线，25日分三路猛攻锦州：一路以第52军之第25师为右翼，经塔山向东北进攻，26日先头部队600余人占大凌河车站，29日主力进占沟帮子；一路以第13军之89师为左翼，经虹螺岬，27日进至上下九台并继续北进，28日晨返九台、星星屯；另一路除以第52军之第195师任北宁线守备外，以第13军第4师为前卫，25日突破人民自治军女儿河阵地，当晚迫近锦州城郊，26日拂晓攻占锦州市。

当国民党军前锋占领锦州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按照预定部署，11月27日以陆续集结于锦州西南山区之山东第1师和华中第3师之一部，突然出现于高桥（锦西、锦州间）附近，拟从侧面截击东进之敌后尾部队而歼灭之。但因国民党军主力已经通过该线，未能获得预期战果。

此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即沿北宁铁路西侧跟踪前进，继续寻

机歼敌。12月1日，获悉第13军之第89师进至锦州以北上下齐台地区，当即决定向其攻击。但又因无群众援助，敌情不清，通信联络不灵，部署缺乏重点，没有切断第89师之退路，结果仅将该部击溃，未能全歼。而人民自治军却伤亡数百人，当晚撤出战斗，向义县、阜新一带转移，开始进入短期休整。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乃果断决定改变集中作战的部署，把东北工作重心放在建立根据地上，并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人12月2日的建议，部队以旅为单位，分散剿灭土匪，做群众工作，为尔后决战准备条件。原定调往东北的陈赓纵队，继续留同蒲路作战；叶飞纵队留置山东作战；杨得志纵队、赵尔陆纵队留置热河地区，担任该方向作战任务。

东北人民自治军在北宁路榆锦段作战中，以6个团的兵力扼守山海关，顽强阻击国民党2个军20余天的进攻，毙伤俘国民党军1000余人，虽未守住山海关，但拖延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时间，达到了接运干部、掩护主力部队进入东北的目的。但国民党军在突破山海关后，沿榆锦线长驱直入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在绥中、高桥以及上下齐台等地几次组织战斗，均未达成歼敌任务。其主要原因：（1）国民党军进攻的兵力集中，弱点没有暴露，人民自治军无隙可乘。（2）东北人民自治军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决战的条件。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甚弱，还不能作战；从关内调入的主力部队，远道而来，十分疲劳，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3）战区的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作依托。

三、承德保卫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原定派3个军“接收”东北，后来又决定加派2个军，一共5个军。由于苏军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营口、葫

芦岛等地登陆；从陆路进入的2个军又遭到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顽强阻击。蒋介石感到，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非常困难”，“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于是确定“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①1945年11月、12月，蒋介石和何应钦先后飞赴北平召开剿共会议，策划向热河承德发动进攻，以隔断中共领导的华北与东北两战略区的联系。

热河，是冀热辽军区经过大反攻后收复和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承德是热河省的省会，是冀热辽解放区的领导中枢所在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保卫承德极为关注。194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程子华、肖克、罗瑞卿、聂荣臻、耿飚：“热察两省是我已得基地，尤其张垣、承德，在战略上占很重要位置，我必须坚决保持两省完整，勿许国民党任何军队侵入，防止国民党军任何突然袭击，因此必须以最快最大的努力完成必要的军事准备。”12月15日，中央军委给贺龙、李井泉、聂荣臻的电报中指出：“在长春铁道及其沿线城市不能取得情况下，热察两省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坚决保卫。”1945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电告肖克、程子华、罗瑞卿、林彪、罗荣桓、刘澜涛：“恩来代表团在渝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取得中外人士赞成，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但蒋企图在被迫停战前，积极向我进攻，尤急图进占承德、张垣两战略要点，我必须坚决保卫此两城。”“蒋军进攻承德，似急于张垣，但亦不会放弃对张垣之进攻与平绥路之打通，因此，除保卫张垣之准备外，且必须确切布置保卫承德。”194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承德问题给程子华、肖克、罗瑞卿、林彪、李富春的指示中再度指出：“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近日决定。如我能给顽军以打击，迟

^①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522页。

滞顽军前进，保卫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有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卫承德，在今后数星期内失去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有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而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冀东及杨苏^①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均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为此而牺牲数千人的生命是完全值得的。”同日，中央军委对保卫承德、张垣作了部署。要求“以杨苏纵队、赵尔陆纵队、冀东主力四至六个团约三万人，组成强大突击集团，隐蔽集中于平泉附近地区，待敌进逼平泉以东适当地点，以突然动作坚决消灭西进敌之一部或大部。以李运昌部四个旅为箝制兵团，一部沿朝阳、平泉段铁道节节抗击，主力由北向南侧击，重点置于义县、凌源（建昌）段，截断西进敌之后路。”要求冀东、平北等地方武装，大力破袭平古、平津及塘沽、山海关段铁路交通，控制车站，以阻止国民党军前进。

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对保卫承德作了如下部署：以冀中纵队第1、第2旅配置在平泉以东锦承铁路沿线，担任阻击；热辽纵队第22、第27、第30旅和混成旅集结在平泉和叶柏寿地区，为第二梯队；原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即杨苏纵队）除以1个旅在遵化地区执行任务外，主力集结在承德、古北口一线，为预备队；冀晋纵队（即热河纵队）第1、第2、第3旅从永宁地区前出到古北口，并指挥冀东第14军分区部队，阻击沿平承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冀察纵队随时准备东进，配合冀晋纵队歼灭进犯古北口的国民党军。东北人民自治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集结了华中第3师第7、第10旅、独立旅、山东第1、第3、第6师等6个师（旅），准备向义县、阜新、黑山

^① 指杨得志、苏振华领导的第1纵队。

间国民党军后尾攻击，配合保卫承德作战。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分别下达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在停战令生效前后，国民党军以第11战区孙连仲部之第16、第92、第94军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部之第13、第52军总计10个师的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分路突进，企图夺取承德。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及地方武装按照原定部署，展开了热河承德保卫战。

在西线古北口方向，国民党军第16军的1个师、第92军的2个师及伪治安军的1个师，共4个师的兵力，沿平承铁路北进，企图夺取古北口，进占承德。古北口是雄踞雾灵山脊背的长城要隘，是北平至承德必经之地。在停战令下达的当天，国民党军以1个师的兵力向古北口西南的兵马营及新开岭、湘水峪进攻，遭到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部队的英勇阻击。12日，国民党军又以2个师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攻占了兵马营及新开岭，进至南台、贾家峪、王堡子一线，距古北口仅七、八里。此时，冀晋纵队第1旅，经5天急行军从永宁赶至古北口，在古北口以南的磨石山及南台东北组织防御，在民兵和人民群众支援下，连续打退国民党军10多次冲击，打死打伤国民党军3000多人，恢复了原有阵地，并乘胜一直追击到瑶亭。当冀察纵队主力赶到时，国民党军已退至密云东北的石匣。古北口保卫战遂告结束。

在东线平泉方向，国民党军第13军主力（第54、第4师）和第52军主力（第2、第195师）由阜新沿锦承路西犯热河，策应第92、第16军之古北口作战。1946年1月4日国民党军陷北票、朝阳，9日陷叶柏寿，11日陷凌源。随后以第4、第195师攻击平泉。11、12日，杨苏纵队1个旅、王兆相旅（当时称热河纵队第1旅，3000余人），冀东2个旅另1个团7000余人，先后赶到平泉五十家子附近。12日晚，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到达平泉东30里之杨树梁。平泉守军决定在13日晨，以王兆相旅及冀东的4个团全力东出迎击进犯之国民党军，求得在运动中歼其一部，以争取时

间集结部队。杨苏纵队一部奉令由黄土梁星夜赶到三十家子配合王兆相旅作战。13日，国民党军2个师猛攻平泉。出击部队与国民党军和平泉以东之三十家子及平泉近郊激战，战至16时，国民党军从阵地接合部空隙突入平泉市。后因已到停战令生效时限，杨苏纵队和热河纵队等部停止反击，于14日拂晓撤出平泉市区。

在南线喜峰口方向，国民党军第94军第5师、第43师2个团及伪军一部，在停战令下达的当天，由唐山地区出发，进攻冀东腹地，企图北出喜峰口，进攻承德。晋察冀军区冀东纵队第13旅及工人纵队、两个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抗击，迟滞其前进。从1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侵占了丰润、玉田后继续北犯。15日，冀东纵队第13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全线反击，收复了玉田城等地。18日，国民党军退回唐山。

在阻击国民党军分路进攻承德的作战中，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挫败了国民党军抢占承德的企图。但由于平泉等地的丢失，国民党军已深入热河腹地，抢占了锦承铁路的大部，这对于保卫热察两省、巩固东北与华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是不利的。

第六章 维护停战协定和 政协协议的斗争

第一节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

一、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 签订停战协定的国际、国内背景

1、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不赞成中国内战。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通过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企图受到严重挫败，美国的助蒋内战政策受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谴责。面对这种局势，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在对华政策上作形式上的调整。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是，由公开扶蒋反共改为以“中立”、“调停”的面目出现，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实现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看到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对国民党缺乏信心。美国政府的决策者认为，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相反，大规模内战却可能导致国民党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崩溃，而由“共产党控制全中国”。^① 这一点，即使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也无济于事。杜鲁门认为：“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

^① 《马歇尔使华》（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210页。

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①

第二，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而不在亚洲。他们试图保持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避免在东西两面均分精力。他们认为：只有“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失去西欧，则美国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②同时，美国限于国力，也不愿意把过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中国，或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如果能够“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地位，纳入一个政党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③争取对中国的控制，那么，便可以集中力量确保欧洲。

第三，美国人民的反对。美国的决策者认为，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令人神往”，但“这样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表达出来便会遭到美国人民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宣称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之举，在美国人民中成为众矢之的就是明证。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选择了他们所谓的“最佳方案”：“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④其目的，就是想“不战而控制全中国”。

鉴于赫尔利助蒋内战不得人心，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受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职务，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对国共进行“调处”。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给马歇尔的训令中指出，一方面要“以适当而可行的方法，运用美国的影响”，“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②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619—620页。

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第64—65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35页、第671页。

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立即帮助它将军队运到东北，并作好运往华北的准备，从而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①

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来华。同日，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基本立场。声明称：“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国家，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的机构”；美国政府不但已经协助，而且还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解放区中日军的解除武装的撤退得以实现。“自主性军队的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不但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符合，并实际上促使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的政府成立后，自主性质的军队应当取消，而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有效的编入中国的国军。”同时，声明也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召集各种主要政治力量代表会议的必要。“美国政府认为下列措施非常重要：一、为了能完成全中国复归于中国的有效的控制，包括立即撤退日军在内，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二、应召集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的办法——一种足以达成中国的团结的办法。”声明说，美国知道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的政府；同时相信，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声明陈述了美国对中国关注的原因，同时也许下了不用军事干涉中国的诺言，表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关于中国的团结的详细的必要步骤，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拟定出来，任何外国政府对这些事情干涉，都

^①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1949年7月30日）。

是不适当的。”^①

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马歇尔来华，其基本点，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一点，国民党当局及其支持者心领神会。1946年2月17日，赫尔利电复蒋介石解释其回国原因并介绍马歇尔来华时称：“今后，马歇尔将军赞助阁下统一中国之全部军队使隶属于国民政府必不致遭美国官员之反对而能获得成功。”12月21日，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说，我认为总统所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自治性军队如共军的继续存在，这是与中国政治统一不一致的，实际上使中国的政治统一不可能实现；我相信马歇尔将军同我一样充分认识到了总统声明的重要性；我们一定用尽一切政治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读过总统声明之后更加坚定的结论。

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马歇尔赴华调处，也有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一面，因为声明中提出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等建议并许下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杜鲁门声明的上述建议表示欢迎。同时指出：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中国民主主义者是欢迎的，甚至一切不愿意中国实行民主的人们口头上也不得不欢迎它，但必须预先看到，后者在实际上将进行持久的抵抗、曲解与怠工。杜鲁门总统建议的正确实现还需要在中国的美国官员，具有与这个建议相称的公正，中国人民欢迎杜鲁门总统重申“国内事务之管理，为各自主国家人民之责任”的原则，欢迎在这一公正原则下中美友谊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也曾有过相反的情形。^②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指出：“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应坚守阵地，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一切战略性的反击及一切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以免国民党作为借口来进行宣传，延长中国的内战，以便我能在全国展开和平攻势及马歇尔来华后之和平谈判。但在国民党军队来攻时，则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①

2、苏美英三国外长呼吁中国停止内战的协议。正当马歇尔抵达重庆开始“调处”活动的时候，12月27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协议说：“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三国外长重新确认，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信守不渝。协议在谈到苏美两国在中国的驻军撤军问题时说，苏联方面声明：苏军已将东北境内的日军解除武装而且遣送走了，但是苏军的撤退，应中国的邀请，已延到2月1日。美国方面则表示：美军系应中国政府的请求驻在华北，并且是和美国履行投降条款方面关于将日军解除武装并遣送走一节应负的主要责任有关。美国方面还声明说：一经尽了这种责任，或中国政府不借美军的协助就能够尽这种责任的话，美军当马上撤退。“两国外长完全一致，愿望苏军与美军都在可以实行的最早的时候，就从中国撤退，要和他们的义务及责任的履行始终符合。”^②

12月30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三国外长会议中关于中国的协议是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的，这便是：(1)中国一定要是团结和民主的中国；(2)国民政府必须改组，必须广泛地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3)中国的内战必须停止；(4)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外国军队

^① 《中共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

在最短期内撤离中国。谈话指出：国民党发言人对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表示抗拒式的沉默是值得注意的。谈话呼吁国民党，应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与三国外长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首先是立即停止内战并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决一切国家大计。

三国外长会议协议的发表，与马歇尔来华是相联系的。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开完三国外长会议返回美国后，发表谈话说：“三国政府均同意，要保证在国民政府下的一个统一、和平及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及让民主分子广泛地参加整个国民政府，三国在对华政策所获得的谅解，将协助马歇尔元帅完成其在华之任务。”

3、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蓬勃兴起。在解放区自卫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两者交相呼应，推动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公布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和平有了希望。但是这一线希望很快就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坚持内战而消失。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国统区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从10月份就开始逐步兴起。

在这一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起了积极作用。10月31日，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致函正在继续谈判的国共代表，提出停止冲突、组织调查团和召集政治会议等紧急时局处理方法。^①11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双十协定》“虽然发表了二十几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枪声，就没有停息过。到了现在，全国人民所忧虑所厌恶所畏惧的大规模的内战，已经在各地爆发起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日。

来了！”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谁要发动内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就是全国的公敌。民盟提出在10天内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刻分别明令前方的部队停止冲突等解决问题的办法。^①11月12日，中国第三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表示“愿以在野党的立场，要求当政的国民党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纠纷。”^②在反内战运动中，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各群众团体、组织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反对内战的言论、文电。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发表《为国共军事冲突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分析了内战发生的原因，提出关于制止冲突的4点实际办法，呼吁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在各地成立反内战的组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制止内战。^③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6团体紧急呼吁反对内战，要求立即停止所有一切军事进攻，使政治协商会议能在和平团结空气中迅速召开，以彻底讨论民主建国的方策。同时要求，从速解除敌伪武装，盟国军队也应即时撤退。^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发出呼吁书，指出：国共《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具有全国性的内战已经在各地爆发，并且规模日见扩大，这说明了“内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在某一方计划下造成的。”呼吁书提出，国民党军队应当先停止沿交通线的进兵和对解放区的进攻，作为停止全国各地冲突的基础；美军应迅速从中国——尤其是华北——撤退，停止帮助运兵，不要卷入内战的漩涡。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合理裁整军队，实行合于人民需要的民主政治。^⑤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全国工业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3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8日。

③ 《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0日。

④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5日。

⑤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3日。

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和《中华论坛》杂志等也发表了反内战的文告。

国统区的爱国学生运动，是反对内战的一支重要力量。11月17日成都各大学21个团体发表《制止内战宣言》。其中指出，非人民的军队、非民主的政治和官僚奸伪的挑拨，是内战的直接原因。他们提出“将军队从独夫或反人民的集团的手中交还给人民”，“争取政治协商会议的从速召开”，“从速惩办一切汉奸和伪军头领，和肃清一切贪污官僚”等三点要求，作为挽救内战危机，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①11月27日重庆大学生发表题为《内战不能再打了！》的致全国学生的公开信，更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指出：内战的严重危机，“这都因为国民党想‘剿匪’、想专政，用了二百万大兵，全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取人民的民主政权，造成清一色的天下。”信中呼吁全国的学生利用各种有效的行动制止内战，“让暴君们吃下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②

1945年11月中旬，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的出现，是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高涨的开端。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500余人，举行反内战大会，宣告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大会指出，反内战运动，是出于南北东西，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的要求。因此，有首先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之必要。同时，亦就要号召全国各地，分别成立各该地方的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最后，再成立全国各地各界反对内战联合总会。以期将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③大会的这一号召，在各大中城市中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1945年12月初，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达到了高潮。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6000余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8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7日。

^③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国民党军队实行武装包围和鸣枪恫吓。为抗议这一暴行，昆明30余所学校3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军官、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校，滥施暴行，并向师生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难，60余人受伤，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这一惨案激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在昆明、重庆、成都、遵义、上海等地，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内战，要求严惩制造惨案的祸首及特务走狗。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社会知名人士，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致痛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暴行。

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1945年12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群众大会上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这是民主统一与武力统一的斗争”。国民党当局企图仗恃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助，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不但违背人民意志，并且也绝对达不到目的。只有实行民主，经由民主的方式，才能统一中国。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的！^①

（二）中共和谈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措施。停战协定的签订及停战令的公布

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以及国际上强大的反战舆论，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为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由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

鉴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中共代表团认为，制止内战是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12月18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3日。

者招待会，就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发表谈话。周恩来在会上指出：中共代表团此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要继续国共之间的谈判。“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目前中国内战之严重，这是大家所深知的，不管用任何方法解释，武装冲突是事实，因之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用全力向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赞成，才能有效。更重要的是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一切问题”。周恩来表示，停止内战问题，在会前由国共会谈，希望能够解决，否则，在开会时首先要谈，国共会谈与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平行进行。叶剑英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或和的问题。中共领导的军队是主张和平的，不主张用打仗来解决问题。中共代表到重庆来谈判，就表示了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①

国共正式谈判开始前，中共代表团于12月19日，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口头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中共代表表示，希望在政协会议开会前，立即停止内战，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在内战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中共希望双方不提任何停战前提条件。能做到这一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内战停止下来，就可以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后，不失去他们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和信心。^②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关于停战问题的谈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12月27日到1946年1月5日，为国共双方会谈；1946年1月7日到1月10日，为国、共、美“三人会议”会谈。

12月2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举行停战谈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书面建议。其内容为：“一、双方

^① 《新华日报》，1949年12月19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0日。

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①中共代表团的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列支持。

国民党方面经过考虑并与美国特使马歇尔磋商，于12月31日国共再次会谈时对中共书面建议提出复文，内容为：“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②

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其中只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不提国共间进行的停战谈判，反而推卸内战责任，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说“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69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是事实，也是真理。”^①

为促进停战，1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谈时表示，原则上同意国民党方面的复案，但有一些修改意见。中共新的提案写道：“双方立即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各暂驻原地，限期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中共代表强调：希望军事冲突马上停止，特别是国民党军对热河的军事进攻应迅速制止；全国交通应全面恢复，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封锁。

1月5日，国共代表举行第四次会谈。双方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初步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②

1946年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从此，美国代表正式介入国共停战谈判，国共双方的停战谈判转到“三人会议”内进行。

同意美国代表为作一方参与国共谈判，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所作出的让步。在国共两方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一再提出，要邀请美方参加。在中共谈判代表与马歇尔的接触中，马歇尔表示：中国的稳定将影响世界，美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国极为关切中国的问题，故他本人愿意参加国共停战谈判。对此，中共代表团认为，马歇尔以执行杜鲁门政策为主，同时也受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约束，有利于促进停战谈判。为了向国内外表示和平诚意，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可以接受马歇尔参加停战谈判。代表团向中共中央作出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从1月7日至10日，三人会议共举行了6次。会上，三方就停战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进行了逐一磋商，其间有过激烈的争论。

中共的基本主张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政府代表则以种种借口提出“例外”。美国代表一方面支持国民党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摆出“公正”的姿态，以维护其调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既坚持原则，又作出适当让步，使谈判获得了进展。

首先，关于东北问题。国民党代表声称，根据中苏条约，国军有权开入东北接收主权，东北应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例外。美国代表表示，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声明，美国有义务帮助国民政府军队运兵进入东北。对此，中共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停止军事冲突应包括全国，但在军事调动问题上，可将东北列为“例外”，同意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同时，中共要求：（1）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只能进入东北；（2）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不得驻兵过多；（3）如果国民党军队经过中共军队驻守地区进入东北，必须经过事先协商；（4）进入东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还建议，将这一例外记在会谈记录上，而不写进停战令正文中。国民党代表不同意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需进行协商，并坚持把这一例外写进停战令。经过争论，结果为：对中共的4点要求达成默契，写入会议记录^①，但不公布；而关于东北“例外”问

^① 参见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

题，则以会议纪录的形式，附在停战令后，与停战令一道公布。

第二，关于国民党军在江南整军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按照早已制定的整军计划，政府要在扬子江（长江）以南继续整军，这就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调动，这也应列为例外。中共表示，可以同意国民党军为整军在江南调动。但要求，这种例外以在江南施行为前提，因为当时江北正在发生冲突。江南的国民党军队在国共未获一致协议的情况下，不准集中或向北方调动。

第三，关于赤峰和多伦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根据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一项协定的条款，国民政府军队应接收赤峰和多伦，并接收当时苏军占领的东北以外的其他地方。这一要求是完全无理的，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谈判夺取战略要点，控制由华北解放区通往东北的道路，以进一步扩大内战。对此，周恩来指出，赤峰、多伦等地的主权，早已被人民军队所接收，而国民党军仍然向那里推进，这势必导致敌对行动。现在的问题是讨论停战，不是根据什么条约或协定从人民军队手中接收什么地方。以此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停战令就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政府为此而不惜采取军事行动，则责任不在中共方面。^①经过激烈斗争，在马歇尔的说服下，国民党被迫同意不以这个问题为条件达成协议。

谈判中，国共还就交通问题进行了磋商。国民党政府代表强调，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其用意，是想借助铁路向解放区进犯而不受任何阻碍。中共代表认为，恢复交通应指恢复一切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轮船、电报、邮政等等。同时，还要做到恢复交通线上一切被破坏的东西和拆除交通线上所有的障碍物和工事。这些障碍物和工事，有的是日本军队建造的，有的是国民党政府建造的，对交通将形成长期的威胁。这一点，国民党无法否认。

经过4天的紧张谈判，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

^①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纪录》，《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

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包括 4 项文件：一、《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三、《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群代表国民党政府，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在第一、二两个文件上签字；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群代表国民党政府在第三、四两个文件上签字。

《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概括了双方停止军事冲突的主要内容及办法。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双方并声明下开规定，亦经同意，并载入会议记录内：

一、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

二、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三、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三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

四、兹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下之调动，应每日通知

军事调处执行部。

双方并声明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

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

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置执行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实地监察详细办法之实行。

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各别设置通讯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信。

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①

三人会谈中决定，鉴于停战命令传达至广阔地区有困难，同意有一个至1月13日（包括13日）为止的3天生效时限。国共双方均在此期间发布命令，从13日午夜起，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要求：对于停战命令及声明，“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守，不得有误。”^②

同日，蒋介石发出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电令，称：“上开命令应自即日起开始实行，迟至本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止，务必在各地完全实施，仰各遵行，不得违误为要。”^③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使内战在全国范围内（东北除外）停止了一个时期。但是，国民党仍然继续推行其内战政策。

（三）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

① 《新华日报》，1949年1月11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1987年版，第267页。

③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0页。

根据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

《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文件，对军调部的任务、组织、工作程序及协定的有效时间等事项作了详细的规定。

军调部的任务为：“实行业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本执行部为增订必需之附属协定，俾停战命令之实施更为有效，得为各种建议。此项建议，包括解除日军武装，恢复各项交通线，及配合移送日军至海岸线，以便遣返之各项措施。经三委员一致同意之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之。”以后，整军方案签订时，军调部又被规定为整军方案的执行机关。这样，军调部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各项：（1）调处全国范围内的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一切交通；（2）对解除敌伪武装，遣送日俘日侨回国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3）监督执行整军方案；（4）担负处理与停战有关的其他事项，如：交换双方被俘人员、运送救济物资等。

军调部的组织为：“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各有表决及互商权，其中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本执行部内设立一执行组为推进工作之机构，该组包括若干军官与士兵，足资实地监督履行诸协定及呈送各项报告之用，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组内，应有同等人数。”

关于军调部的工作程序，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以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执行者之地位，推动其工作。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布必要之正式命令、指示及训令。”

关于军调部存在的有效时间，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继续存在，并执行其工作，直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国共产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经向对方作适当之通知后，废止之时为止。”^①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在北平设置机构并开展工作。

军调部由重庆军事三人会议直接领导。军调部内，三委员为最高领导：国民党政府方面委员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国共产党方面委员为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方面委员为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罗伯逊被邀请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中共叶剑英委员办公室重要工作人员有：秘书长李克农，顾问饶漱石、徐冰、滕代远。军调部执行组组长，美国方面白鲁德（后戴尔伯门代理）。军调部联合参谋部三方参谋长为中层领导：国民党方面蔡文治，共产党方面罗瑞卿（后陈士榘代理），美国方面海斯凯。三方参加的业务处为基层领导，先后担任此项职务的有：行政处长，国民党方面陶浩源，共产党方面伍云甫（后高唐），美国方面罕斯克；整军处长，国民党方面董嘉端，共产党方面陈士榘，美国方面密多尔顿；执行处长，国民党方面陈瑜，共产党方面宋时轮（后陈士榘），美国方面伊里；交通处长，国民党方面陈麓华，共产党方面耿飏（后黄逸峰），美国方面布尔；新闻处长，国民党方面黄毓洪，共产党方面黄华，美国方面凯特；秘书处处长：共产党方面为冯铨。以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军调部在东北设立长春分部，国民党政府方面委员蒋宋濂，共产党方面委员饶漱石，美国方面委员白鲁德（戴尔伯门代）。分部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国民党方面周励武，共产党方面伍修权，美国方面德森乐。共产党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分部担任领导工作的还有：李立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烈，柯柏年、黄镇等。^②

军调部之下，根据各地情况需要，经过三方协商同意，设立

^① 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9年8月5日发表。

^② 参见：《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调处执行部组织系统表》（1946年7月）。

和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军调部存在期间，先后共派出36个小组，其中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具体组织实施调处工作。这些小组一般设在军事冲突比较严重的地区，有的位置随着战况变化而有所移动。

主要小组派出地点及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

关内：第1执行小组设集宁，中共代表王再兴；第2执行小组设赤峰，中共代表向仲华；第3执行小组设太原，中共代表陈赓；第4执行小组设徐州，中共代表韦国清；第5执行小组设张家口，中共代表赵尔陆；第6执行小组设沁县，中共代表刘建勋；第7执行小组设济南，中共代表邝任农；第8执行小组设广州，中共代表方方；第9执行小组设汉口，中共代表薛子正；第10执行小组设新乡，中共代表黄镇；第11执行小组设承德，中共代表段苏权；第12执行小组设石家庄，中共代表陶希晋；第13执行小组设大同，中共代表李波；第14执行小组设临沂，中共代表张子强；第15执行小组设德州，中共代表符浩；第16执行小组设泰安，中共代表华诚；第17执行小组设淮阴，中共代表韩念龙；第18小组（交通）设泊头，中共代表傅继泽；第19小组（交通）设安阳，中共代表雷任民；第20小组（交通）设南口，中共代表蒯子安；第21小组（交通）设高密，中共代表武可久；第22小组（交通）设枣庄，中共代表甘重斗（后陆渭斌）；第24小组（交通）设徐州，中共代表倪士良（后王少镛）；第25执行小组设安次，中共代表张温钰；第26执行小组设朝阳，中共代表李逸民；第31执行小组设永年，中共代表王育民；第32执行小组设光山，中共代表任士舜。

东北，长春执行部所属：第27执行小组设沈阳，中共代表饶漱石；第28执行小组设四平街，中共代表耿飏；第29执行小组设本溪，中共代表许光达；第30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张经武。在

东北，还派有第33、34、35、36等执行小组。^①

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迅即展开了工作。从2月到5月，军调部先后发布5项停战及有关停战的命令；发出7项有关停战的特别指令；达成了66项停战协议。对停战令的实施，起了一定作用。

军调工作的过程充满了斗争。由于国民党签署停战协定是被迫的，因而它把军事调处作为掩护和扩大内战的一种手段。美国在“公正”调处的幌子下，偏袒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在军事调处过程中，当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时，国、美代表就串通一气，拒绝调处；而当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派遣小组，前往调处。他们还互相配合，歪曲事实，制造假象，欺骗舆论。面对这种情况，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的指示，充分利用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同国、美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维护停战协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共产党代表全面分析了双方兵力部署和斗争态势，坚持在军事冲突最激烈、内战危机最严重的地区派遣小组，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3个月中，中共代表共向国、美方面提出备忘录、抗议书455件，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军事调处工作极其艰巨，国民党不仅破坏谈判工作，还制造了迫害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的种种暴行。2月济南小组中共组员遭拘捕；4月石家庄小组共产党方面的翻译遭扣押，高密小组共产党代表遭炮击；5月泊头小组共产党代表遭侮辱，枣庄小组共产党代表及译员遭殴打；6月晏城小组代表及全体组员遭拘留，济南小组共产党方面电台被强行没收。其他各地扣留、检查、非难、监视共产党代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为此，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小组人员；保障小组人员之生命安全及自由；严惩破坏调处制造暴行

^① 《调处执行部组织系统表》（1946年7月）；《解放日报》，1946年6月22日。

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等。^①中国共产党代表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保证了军调工作的进行。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是实施《停战协定》的一个必要步骤。尽管国民党对执行停战协定毫无诚意，但这一机构的设置及活动，对它们毕竟是一种制约。中国共产党坚决履行停战协议，在军事调处中，更加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维护和平的立场，从而进一步获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协议

（一）政协会议的召开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

1946年1月10日，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瞩目的一次会议。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有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代表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因任军调部委员，后由秦邦宪代替）、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主同盟代表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代表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社会贤达代表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力争获得有利于人民的协商结果。团结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是具备客观基础的。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等基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存有许多共同点。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代表首先提出民主同盟应作为出席党派会议的一个方面，迫使国民党方面予以认可。政协会议召开前，共产党代表与民盟代表共同认为：双方应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共同斗争。

^① 《解放日报》，1946年6月22日。

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致开幕词，首先为政协设置障碍，声称：“政府的方针，我在元旦广播词中已经详尽说明，不再重述。”而蒋介石元旦广播中所强调的方针是，召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延揽社会贤达与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军令政令统一等。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还说，政协不是人民选举的，但一定能体察人民的真正愿望，认识人民的迫切要求。“是要扶助政府，增强政府，而决不是要削弱政府。”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能不装璜民主，他在讲话中许下四项诺言“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四、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①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指出：“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军事冲突停止了，才能很好的谈到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他说：方才听到“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②

政协会议以大会讨论和分组协商两种方式进行。分组情况为：改组政府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全体大会及施政纲领组、军事组中进行。

（二）政协会议中的激烈斗争

^①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同时，虽然开会前夕签署了停战协定，下达了停战令，但内战尚未完全平息，内战的危机并没有消除。全面执行停战令，实现永久停战，仍是会议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协会议上，围绕这一问题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

1、关于停战问题。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了停战协议签署和停战令下达的消息。这一消息引起了与会代表和会外各界群众的热烈的欢呼。人们普遍关心停战令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说：十八年内战惨痛的经验，人民的痛苦，应使我们“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①民盟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和平是会议成功的先决条件，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请求。”社会贤达代表邵从恩在讲话提出，每个党派、每个人都应该对内战发生的原因进行反省，做到“诚”和“信”。在会外，各界群众强烈要求切实执行停战命令，实现永久和平。对于停战问题，国共两党代表在会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首先，怎样看待停战协定的签订，是谁真正反对内战，维护和平？如前所述，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平，制止内战进行了艰巨的努力。停战协定的签订，是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基础上，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终实现的。会上，中共代表就这一事实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国民党政府代表则说，是政府代表向中共代表提出避免冲突、恢复交通的办法；而后，中共代表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主张。政府复案“把美军在中国协助中国战区办理受降及遣送敌俘的问题，与停止军事冲突、恢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复交通，并作一事，作总的解决”，这样，才使停战谈判得以逐步实现。国民党代表还荒谬地说：“停止冲突，还未将问题真正解决，停止冲突命令发表之后，就能迅速成立三人小组，关于中共部队之整编，及其驻地之规定，从速商定具体实施办法，付诸实施，那才算是问题真正的解决。”^①显然，国民党试图把内战根源归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而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维护者。对此，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总结了停战谈判的经验教训，“供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一切问题的参考。”第一，商谈停战应该有条件，还是应该无条件？他指出：“商谈停战，必须求其成功。欲求其成功，如果要争论条件，一定得不到解决。”正是由于中共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主张，才使谈判得到了结果，发表了停战令。第二，全国急迫期待解决的问题，如内战问题，应该马上解决，还是拖延解决？中共认为应该当机立断。拖延不管是何原因，来自何方，在解决问题上是一次教训。第三，谈判方法应该公开，还是秘密？周恩来说，此次停战问题的解决，虽然由参加商谈的两方代表来订办法，最后得到马歇尔的赞助而促成，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的呼声，社会舆论的督促而成的。“凡是千万人的事情，人民的事，公之于众是有益的”。针对国民党代表关于整编中共军队即可消除内战的谬论，周恩来指出，军队整编，是全中国的军队都应该整编，中共军队也应该整编。“根本消弭内战的办法，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周恩来还提出了当前消弭内战的5点意见，供政协会议商讨。

其次，怎样理解停战令的内涵？这一问题，国共双方也存在着重要分歧。国民党代表停战令附则中关于军事调动的例外，说成为“不受停止冲突办法的限制”的例外，并称已“商得一致的同意”。周恩来强调指出：这些例外，“不是停止冲突的附加，而是关于停止移动的附加。”实行停战令，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2日。

“南到海南岛，北到内蒙，东到东北，西到绥远，凡是有冲突的地方，都应该停止下来”。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周恩来在补充发言中指出，13个省区有冲突，其中一些地区有较重大冲突。

政协会议认真讨论了停战问题。虽然各种政治力量执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在公认的停战原则上，谁也无法反对。1月12日，政协第三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本会议同人听取张岳军、周恩来两先生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之报告，具悉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以最大决心，相忍相让，使军事冲突由此终止，和平由此奠基，深感欣慰。尤盼继此协定，对于永久消弭军事冲突之方策，迅速实施，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之赞助，谨深至感佩之忱。”^①

2、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军队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在政协会议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关于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的主张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即共产党必须首先交出军队，然后国民党及其一党政府才能开放民主。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则一贯主张，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中国共产党认为，没有抽象的国家，或者是民主的国家，或者是专制的国家。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专制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必须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民主化之下，军队才能保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致成为与民众为敌的内战工具。实现军队国家化，还必须实现军队民主化。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支柱，有了军队的民主化，才会有国家民主化。因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3日。

而，中共的方案是：第一步军队民主化，第二步国家民主化，第三步军队国家化。即，首先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民主改造，清除军队中的法西斯军阀主义，把国民党军队改造成为民主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然后国共两党同时把军队交给国家，实现军队国家化。这一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取消国民党的法西斯一党专政。

尽管中共的方案，合情合理，但是，为了促进协商，推动中国迅速走上民主道路，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仍做了让步，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平行前进，归于一途”的主张。周恩来在会上说，政治民主化在先？还是军队国家化在先？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我们意见，认为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青年党在提案中承认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应“二者并重，同时实行。”而其代表在说明中则称：促进民主“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①周恩来对此表示不能同意，他说：“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末，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其次，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方法。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会上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国民党认为，把军队交给它们就是军队国家化。民盟提出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大量裁减常备军额等原则。民盟代表特别指明：全国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青年党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提出实行公平编遣、实行军民分治和军党分立等6项办法。中共代表指出，军队不仅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属于国家，而且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这样，军队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到，“军人第一”的口号是不妥当的，容易使军人感到自己超越人民。国民党代表在发言中为这句口号辩护，认为这是要唤起社会尊重军人。中共代表指出，只有愈爱护人民，才能受人民尊重与爱护。

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办法，中共代表团在关于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提案中，提出了下列主张：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使之成为各派共同领导之机构；承认一切抗日军队为国军，公平合理的分期整编全国军队；以民主精神教育军队，并以军民关系为军队奖惩的第一目标，纠正军队私有现象；大量裁兵，地方治安主要由地方保安队及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队维持；确定国家军费预算，不超过预算总额25%；一切伪军不论已否加委应一律解散，敌械限期缴清等。周恩来在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报告中，结合对有关党派主张的评论，提出了12项军事改革的建议，并指出，这些办法应包括所有军队在内，没有任何例外。

会上，中间人士曾提出，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国共两党代表都不赞同。周恩来表示：“要我们的军人脱党是作不到的。”国共两党代表都同意军人可以保有党籍，军官为两党中央委员者不解除党内职务。“军党分离”是指：在军队中不设党的组织，军人不在驻地参加党派活动。^①

会议就整军原则及办法进行了商讨。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作了关于整军设施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顾问马歇尔）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① 参见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增刊第6辑；《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

3、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这是政治协商会议斗争的核心问题。其本质在于，是保持还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它既是解决军事问题的前提，也是解决军事问题的归宿。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用“扩大”取代“改组”，以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中共、民盟代表互相配合提出方案，要求提高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以委员制取代个人独裁制。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代表认为，政协应以建国大纲、国民党六中全会政治纲领等为根据定立党派协定。中共代表坚持政协应制定施政纲领，并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主张，抗战前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其余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中共、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均认为，旧有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应该重选。后为推动商谈，中共、民盟代表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保留原有代表，同时增加足够数量的党派、地区等方面的代表，以限制国民党一党制宪。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把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作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民盟仿效欧美国家的议会制，提出了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的方案。中共代表认为，民盟所提方案虽然仍是旧民主主义的，但具有进步意义，因而积极支持。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在会外呼应，支持了会内和平民主势力的斗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民主党派，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团体组织和广大群众，纷纷向会议提出意见书或建议书，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中共、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随着会议的进展对各项问题加以评论，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发出函电，向政协会议提出国是主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对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政协五项决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 22 天，于 1946 年 1 月 31 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

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取得了重要成果。

《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部分规定主要有：“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确保军队编制之统一，与军令之统一。”“军队建制应适合国防需要，依民主政制与国情，改革军制。”“全国军队，应按照整军计划，切实缩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了“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等建军原则，“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关于实行整编办法的规定是：“军事三人小组应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中央军队应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军事委员会内应即设置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组织之。”

政协协议规定的整军原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理论原则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历来认为，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上述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决定同意，并准备施行。其主要原因是：（1）这是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需要。当时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同意上述原则有利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全局。（2）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当时，中间势力限于其认识水准，积极主张实行上述原则。同意这一方案，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3）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具有充分信心。

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自人民忠于人民，自诞生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经过整编，虽然组织形态上要发生相应的变更，但党的领导仍将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色仍将得到保持。(4) 有利于改造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当时国民党几百万所谓“国军”，实质上是国民党一党的反动党军，是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支柱。它脱离人民，派系林立，具有极大的腐朽性。实行政协会议通过的原则，有利于对国民党军实行民主改革，或促成其瓦解，或使其一部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下脱离出来。总之，同意实行上述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使一切武装都化为人民的武装，而不是要把武器交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更不是使人民武装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正如中共中央1946年2月1日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所说：“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军队。”

关于政治民主化方面，政协会议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确定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提高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2/3赞成始得议决。《和平建国纲领》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对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方面都作了相应规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增加党派、社会贤达、台湾和东北等地区以及职业代表共850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为之。”《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会议拟定的原则及各方面所提出之意见，“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宪草修改原则主要是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政协各项协议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主原则，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有利于人民。尽管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如果照着政协协议做下去，就会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政协闭幕后，周恩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次协议结果，在若干问题上与中共本来主张存有距离，但“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①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会议中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中间派的大多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民主管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的目标。正如周恩来所说：“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②在很长时间内，政协协议成了人民群众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能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协议，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再次，政协会议的召开及其协议的通过，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相对和平的局面，从而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这就有利于中国革命人民力量的进一步组织和发动。

中国共产党对政协成功给予高度评价，准备切实履行各项协议。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认为，政协的成功使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

①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

② 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页。

一指示虽然对形势估计有些过分乐观，但也看到民主化道路的艰难曲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月3日，延安2万余人热烈聚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朱德、林伯渠等发表讲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使中国从此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人民100年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民主力量25年奋斗的结果，是解放区人民和军队8年奋斗的结果。今后的任务就是要使政协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共产党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而参加。^①

三、整军方案的签订及其实施情况

（一）整军方案的签订

为了实现政协协议，1945年2月25日，军事三人会议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这一方案，是由国、共、美三方多次会谈和会外协商，经过激烈争论而产生的。首先，关于方案的标题，国民党代表建议用“改编共产党军队为国民政府军的基本方案”，并称：国军现在是合法政府的军队，不能进行与统编共产党部队同样意义的统编。中共代表主张采用“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因为军队国家化，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国家化，也包括国民党的军队；军事三人会议通过的建议曾提出应该制定一个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这一点，已得到两党领导人的批准。经过争论，达成折衷，标题定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次，关于宪兵和铁路警卫队。中共代表提出，应限定国民党宪兵的数额和职责，同时反对国民党建立由特务头目领导下的铁路警卫队的计划。国民党代表不愿在协定中涉及上述问题。经过争论，最

^①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后同意问题解决之前，仍由政府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各自区域内保护铁路线。另外，对于马歇尔提出的“现职军人禁止在任何政党的委员会中保留官职或位置”方案，国、共代表均认为无此必要。理由是，政协决议已规定了担任军队现职军官不应参加党派活动，不参加任何党派或类似组织。且两党在政协会议上对于军人党籍问题、军官在两党中央委员会为成员的问题，已达成了一致。

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或《整军方案》）在重庆签署。

《方案》规定：“本方案之目的，在于减少军费支出，俾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确立造成足以保卫国家安全之精炼国军之基础，并包括若干办法，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军队干涉。”

《方案》包括的条款主要是：统帅权、职责与权限、编组、复员、统编及配置、保安部队、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等。

关于军队的职责和权限，规定：“陆军之主要职责，在战时为保卫国家，在平时训练军队”；“陆军可用以镇压国内骚乱”，“当国内发生骚乱，经该地主席向国府委员会确证当地局势已非地方警察及保安部队所能应付时，国民政府主席以最高统帅之资格，经由国府委员会之同意，可以使用陆军，以恢复秩序。”

关于整编、统编和配置，《方案》规定，将在协定公布后的18个月内逐步完成。分前12个月和后6个月两个步骤。

第一步，前12个月的整编、统编：

全国陆军编为36个军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万人，3个师组成1个军；军配置的直属部队的人数不得超过其总兵力的15%）。其中国民党政府军队90个师，中共领导的部队编为18个师。

国民党政府和中共领导的军队先分别改编，而后逐步混合编制。除分编部队外，该阶段共编成4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包括国民党政府1个军，中共1个军。

配置：

东北共 6 个军，其中政府军 5 个军，中共 1 个军；

西北共 5 个军，全为政府军；

华北共 11 个军。其中有 4 个集团军为混合编成，包括政府、中共各 4 个军，2 个集团军总司令由政府军官充任，2 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中共军官充任，另有 3 个政府军；

华中共 10 个军，其中政府军 9 个军，中共 1 个军；

华南（包括台湾）共 4 个军，全属政府军。

第二步，后 6 个月。全国编为 20 个军 60 个师，其中政府军队 50 个师，中共军队 10 个师。

整编、统编：4 个集团军改编为独立的 6 个军，其中 4 个军各包括政府军 1 个师，中共军 2 个师；2 个军各包括政府 2 个师，中共军 1 个师，集团军即应取消。

配置：

东北共 5 个军，其中 4 个军属政府军。混编 1 个军，其中包括政府军 2 个师，中共军 1 个师，政府军官任军长；

西北共 3 个军，全属政府军；

华北共 6 个军，2 个军全属政府军。混编 3 个军，其中每个军包括政府军 1 个师，中共军 2 个师，由中共军官充任军长。混编 1 个军，其中包括政府军 2 个师，中共军 1 个师，由政府军官充任军长；

华中共 4 个军，内混编 1 个军，其中包括政府军 1 个师，中共军 2 个师，由中共官充任军长。3 个军全属政府军；

华南（包括台湾）共 2 个军，全属政府军。

关于补给，全国划为 8 个补给区，向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负责，担负补给、营舍、薪饷，武器装备的贮存、修理及分发，处理供应，并初步训练新兵等事项。“各补给区主任对于驻扎其区内之军队，并无指挥权与管辖权，尤不得干涉或借任何方式影响民政民事。”

关于复员，规定“复员应立即开始，并大致每月裁撤总复员人数十二分之一。”双方应在3至6星期内报送拟保留和复员部队表册，军事小组制成实施计划，经双方批准，呈报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

关于保安部队，规定“各省应有权维持一与其人口比例相当之保安部队，但其数额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当省内普通警察显然无法应付局势时，该省主席即有权使用此项保安部队，以镇压骚乱。”“保安部队之武装，应以手枪、步枪、自动步枪为限。”

关于执行机关，规定“根据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三人会议所签定而设立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应为本协定之执行机关。”双方要“保证各该军队对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发颁之命令，立即绝对遵行。”

此外，《方案》还规定：“本协定生效后，政府及任何政党或派系组织，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秘密性或独立性之武力。”“所有受日本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或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①

《整军方案》公布后，国、共、美三方又于2月27日，就有关指令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在3月16日以备忘录形式签署。其中作出如下规定：（1）“《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乃军事调处执行部关于复员、调防及整编的一般指令。”（2）“军事调处执行部将是执行此项基本计划的媒介。”（3）“此项基本方案规定所需呈报之报告，将成为执行部拟订的详细计划及日程的基础。”（4）“复员要求逐渐取消军部以上之军事指挥部。”（5）“伪军之遣散将于复员开始之日以后三个月内完成之。”（6）“军事调处执行部将指令政府或共产党选定所保留的各个师至其一般地区集中；并开始一个为期十二周的基本训练”。（7）“在美军临时

^①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

军事顾问团指导之下，将组织一基本训练学校，训练在最后六个月中指定作军事统编的共产党的十个师”。(8)“军事调处执行部将按照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而下令作必要的调防和统编工作。”(9)“军事调处执行部将拟订关于复员人员的补给与管理之详细计划。”^①

《整军方案》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重大让步。

《整军方案》有不利于人民军队的一面。在这个方案中，规定了国共两方军队比例为5:1，规定了国共军队在各地区的配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逐步混编，而国民党军队在编制上占绝对优势。这些，对人民军队的发展无疑都是束缚。特别是关于中国军队（包括解放区军队10个师）用美国装备的办法，对人民军队的存在与发展，更是严重的障碍。正如周恩来所说：“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来的，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尽管如此，对于具有自力更生精神的人民军队来说，这一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整军方案》也有有利于人民军队的一面。一是通过这一协定，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军平等地位。虽然方案中两军数额的比例悬殊，但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政府军已成为对应的两个方面。这既与抗战中国国民党只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不同，也与国民党完全拒绝承认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不同。周恩来说：“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

^①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147页。

方面的统帅。”^①二是《整军方案》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部分人民武装可以借助于这个原则，得到一定的保存。方案规定，要“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国家干涉”；各省有权保持一定数量的保安部队，以维护当地秩序。这就使解放区的政权和武装不受国家军队干涉。三是《整军方案》对国民党军的整编、复员和配置同样作了具体的规定，这对以“国军”自命、积极准备和策动内战的国民党来说，也将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整军方案》的签订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周恩来在整军方案签字仪式上致词说，停战协定、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等，确是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步走了。他说，这些协定和决议付诸实施的时候，是会遇到若干困难和阻碍的。但“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害此方案之实施的。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全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定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定的整军基本方案，我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在这一签定的基本方案上，规定了整编军队与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各项条款，这是包括全国范围的，无论任何地域或任何武装力量，都不能除外。”^②

（二）《整军方案》的实施

《政协协议》、《整军方案》签订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认真履行了这些协定。

还在整军谈判进行的过程中，2月24日，中共中央就发布指示，通报谈判情况和方案有关内容，要求各地开始军队整编的准备工作。整军方案签订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并制定

^① 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

《整军复员计划实施表》，要求各地切实进行整编复员。整编预定分三期进行，并按阶段、地区对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学校、后勤等方面的缩编、拟编数额，作了详细的规定。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军区于1946年4月前后，都进行了整编复员，使整军复员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不断挑起和扩大内战，在调动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同时，对关内各解放区亦不断蚕食，致使人民军队的整编复员计划无法顺利进行，不得不逐步减缓，最后被迫终断。

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反，国民党对实行《整军方案》一开始就毫无诚意。他们是想以此削弱、取消和吞并人民军队，而他们自己则在“整编复员”的幌子下积极扩军备战。

关于国民党整军的目的，政协会议上，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在报告中就公开说：在于“使现在庞大复杂之军队，调整为必要而充实之国军，换言之，整军并非消极的裁军，而乃积极的充实部队作战力量”。“抗战既经结束，本年已是复员阶段，国军兵力之保持，自应依据国防原则，衡量国家经济力量，尽最大可能缩减成最小限度之精锐部队”。^① 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整军会议，蒋介石在对与会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的讲话中充分暴露了其所谓“整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与共产党斗争了20多年，是最了解共产党的。现在只有把我们的部队整编好了，才有力量，才能打胜他。否则，不仅你们抗战功劳没有，连你们的历史都完了。甚至你们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整编部队是你们自己的事。^② 由此可见，国民党“裁军”是假，“充实作战力量”是真；“复员”是假，组编“精锐部队”是真；“整编”是假，反共、反人民是真。此外，蒋介石还试图通过整军，清除异己，吞并杂牌，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7日。

^② 参见胡临聪回忆材料：《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自我招供》，军事科学图书馆藏。

强化其嫡系的军事力量。至于其整编军队的“最小限度”，则是以其“国防原则”即内战原则的需要来决定的。

1946年3月，国民党制定了《国军整建复员计划》，其概要为：整建复员分两期，第1期12个月，将其步兵89个军242个师和骑兵2个军13个师，缩编为步兵90个师，51个兵工建设总队，骑兵10个旅。第2期6个月，编步兵50个师，40个兵工建设总队，骑兵6个旅。

国民党整编的特点是：

1、称谓缩小，人马照旧。蒋介石在向其部队发出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中要求：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尔后缩为团。这种“缩编”，只改换名称，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实施过程中，许多部队只改番号，不减人马，有的则裁减老弱，补充精壮。这样就出现了“复员”即备战、“裁军”即扩军的奇特现象。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将领会议上，所属各军竞相要求增补人员，其数目为：3军9036人；16军6958人；92军7305人；94军6922人；30军6875人；40军4932人。^①国民党第38集团军办法更为简单，5月1日，致电所部：“整编之各师军，不论其是否整编完毕，统自五月一日起军改称为整编某某师，师改称为旅。”^②国民党还违背《政协协议》、《整军方案》有关遣散伪军的规定，收编伪军，扩充实力。政协会议上，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中说：“对伪军之处理，中央决定方针，以全部编遣为基本原则”。报告称，各地伪军（东北除外），长江以南约20余万人，已编遣完毕；长江以北约40万人，除已编遣者外，尚有约20余万人，“本部预定须于四个月内处理完成。”^③而到了同年3月，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国民党政府军政部

^① 《十一战区将领会议提案》（1946年6月），军事科学图书馆藏。

^② 《国民党部队整编材料》（1946年6月），军事科学图书馆藏。

^③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7日。

的报告则称：“游击部队及自新军，受权陆军总部及各行营绥署，尽量编缩，其官兵除志愿遣散者外，余准编为建设总队，集团转业。”事实上，大量伪军就连编为建设总队，集团转业也未实行，而直接编入了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在山西，原伪省防第1军编入国民党军第19军，伪军长温怀光被委为国民党军第33军副军长；伪省防第2军编为暂40师、暂60师等部；伪省防第3军分别编入第21师、暂第46师；伪省防第4军一部编入暂40师，伪省防第5军编入第38师。^①

2、改换名目，屯兵备战。国民党军整建复员计划规定，对55万军官和150万士兵实行所谓“集团转业”；在《整军方案》规定的军队限额之外，组成数十个“兵工建设总队”，分别安置于交通、水利、垦殖、工厂、地方服务队及各种交通警卫部门。事实上，这是国民党掩人耳目、准备内战的一种屯兵方式。蒋介石在“机密甲9269号手令”中强调：“兵工建设”，要“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所谓“建设总队”，从其内部组织形式看，与军队别无二致。《秦风工商日报》揭露说：关于“建设总队”，编余军官士兵组织、工程队已有具体计划，分配在交通方面者共84万人，皆由各该属军官为工程队之各级监督员……，其组织情形与原来之军队组织无异。^②另外，从部署配置上看，国民党把百万“集团转业”军队的2/3，分置于华中、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周围。其目的，显然是以“兵工建设”为名，控制战略要地，对各解放区实行隔离封锁。更有甚者，华中“建设总队”一部还企图潜入

^① 《国民党部队整编材料》（1946年6月），军事科学图书馆藏。

^② 《秦风工商日报》，1946年4月4日。

解放区内。^①“集团转业”、“兵工建设总队”等名目，使国民党保存了大批军事力量。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谈及整军复员时称，国民党共有军队490万人，其中有军事机关、学校及海空军110万人，陆军经整编后应保留官兵180万人，预计今后12个月将“逃亡消耗”57万人，这样，“应复员转业人数”为142万人。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复员计划”，“原来是不想有一个人复员。”照国民党方面的算法，“复员计划中的‘兵工建设总队’哪里去了呢？‘应复员转业’的一百四十二万人，定会一变而为五十一个兵工建设总队的。这所谓兵工建设总队，谁都知道就是徒手兵。这样，事情就很清楚，所谓‘复员计划’是把一百四十二万加五十七万人变成徒手兵、逃兵，而真正复员回家或转业去当老百姓的，则一个也会没有。这那里符合于整军方案？”^②

3、训练官佐，更新装备。在所谓“整编复员”过程中，国民党军以设立“军官总队”、进行院校培养等各种形式，保存、选拔、训练和储备大批军官，随时准备大规模扩军，投入反革命内战。蒋介石在其密令中强调：要“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设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至各级优秀干部之挑选与训练计划，即建军各兵种官员之总数、类别，以及分班受训时期与地点，皆须同时切实计划，即作具体之决定。”^③“军官总队”是国民党以“复员”军官为名设立的，而实际上，则成为筛选军官的基地。据西安《正报》4月17日载：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在所谓“将要复员的军官”中，普遍进行“新军预备军官”考试，将其中“合格”者，重新分配到全国各军

^① 《书报简讯》第74期，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② 《新华日报》，1946年3月21日。

^③ 《蒋介石机密甲9269号手令要旨》，军事科学图书馆藏。

队。该报称：全国将考选 1 万名。西北区各部为 3000 名。西安第 15 军官总队，自 4 月 16 日起，已举行考试。凡出身军校之正期之复员军官皆可应考，合格者调全国部队服务，成绩特别优良者保送南京军校，接收新武器训练，以充实军事干部。整编过程中，国民党军还在美国支持下，更新武器装备，“充实战力”，准备内战。

4、强化警政，训练特务。国民党将部分“复员”军官安排到警宪、特务机构，强化法西斯统治。1946 年 3 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作出正式决定：将各地“复员”军官，交由南京中央警校及重庆、西安、北平、广州各分校训练。规定：将官且曾在正式军校或陆军大学毕业者，入高等研究班；中校以上，曾在国内外军校毕业者，入讲习班；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军官，曾受军事教育而有正式证件或具有中学以上程度者，入甲级警官训练班；少、中尉有中学以上程度者，入乙级训练班。^①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完成了陇海铁路以南部队的整编。据军事调处执行部政府整军处《整军工作概况报告书》称：截至本年 7 月止，国军已将 54 个军整编成师，其余 30 个军因故无法整编。此时，国民党总兵力达 430 万人，其中正规军 248 个旅（师）约 200 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 156 万人，非正规军 74 万人。有 22 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接收了 100 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并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这就是国民党“整军复员”的结果。

第二节 国民党肆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

一、国民党制造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

^① 据中央社 1946 年 3 月 23 日电。

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极度仇视。他们虽然在协定上签了字，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对政协协议“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①，但他们不仅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相反却千方百计予以破坏，制造出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就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对政协进行诋毁和攻击。蒋介石称：“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②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政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悬崖勒马，另行途径。”^③何应钦等则发出血腥叫嚣，反对政协会议，反对裁军，宣称要武力收复东北并继续“剿匪”。^④

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破坏介绍政协情况演讲会的“沧白堂事件”和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严重事件。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的反共、反民主暴行继续升级。在重庆，2月1日，国民党特务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场，打伤大会主席李公朴、郭沫若等和许多群众，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同月，国民党又在重庆及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国民党特务、歹徒乘机冲砸在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民主报》营业部，殴打两报工作人员。中共和民盟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在北平，国民党把挑衅的矛头集中对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

① 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闭幕词》，载《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②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徐咏平：《陈果夫传》，台北出版，第934页。

④ 《秦风工商日报》，1946年3月5日。

2月下旬，国民党在北平策动所谓“还乡请愿团”及地痞流氓千余人，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并在军警纵容下，冲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办公室，打人毁物，滥施暴行。事后，在中共代表坚持下，军调部三委员向蒋介石及国民党北平当局致函抗议，军调部中共方面参谋长罗瑞卿发表谈话说：“中共代表团，为了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俘之共同任务而来北平，绝不因外来阻力而停顿工作，定用一切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以实现全国人民之愿望。”^①4月，国民党北平军警宪特又以查户口为名，荷枪实弹，包围搜查军调部中共委员顾问滕代远将军公馆，并非法搜查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社，拘捕共产党方面工作人员40余人。5月，又悍然封闭了新华分社及其他报刊通讯社等77家，并在全市实行大逮捕，捕去反内战人士数百人。在西安，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第18集团军办事处，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营业部，暗杀了民盟西北负责人李敷仁，查封了《黄河晚报》。在南通，国民党特务暗杀进步青年7人，并把尸体抛入江心，造成震动一时的“南通惨案”。在东北，国民党勾结日伪特务制造通化反革命暴动，封闭在沈阳的中苏友好协会，刺杀了哈尔滨中苏友协会长、前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1946年6月，上海人民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举国震惊的“下关惨案”。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压服民主力量，相反，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本质。国统区人民和解放区军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统治集团作英勇不屈的斗争。

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对政协协议的否定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政协协议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于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举行了六届

^①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4日。

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反对政协的一切协议，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独裁面目的又一次暴露。

关于政治问题，全会全面否定政协协议中规定的一切民主原则，顽固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度。对宪法草案案，蒋介石在会上称：“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①会议决议逐一否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地方自治的修改宪草原则，称：“本案应请大会为下列各项之决议，交中央常会通令全党同志遵照：（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②关于改组政府案，会议宣布恢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其权力置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上。^③同时规定，国府委员的选任，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关于国民大会案，提出由国民政府主席“指导”国民大会，并企图用增加代表名额的办法，使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中占绝对多数，以取消各党派的否决权。

关于军事问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重申其“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和军令、政令统一的主张，以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次会议上，有的国民党要人提出《请坚持主张在宪政实施前必须先使军队国家化俾求实现真正民主之政体案》，鼓吹军队国家化是实施宪政的前提条件。有人声称：要限中共军队在3个月

① 蒋介石：《认识环境与遵行政策的必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38页。

③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会议记录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内接受统编，并在解放区停止一切“暴行”，否则所有政协协议全部宣告无效。^①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整编问题，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代表曾在政协会议上说，现有军队380万，计划减到180万。而在二中全会上，该部报告又称，现有军队及机关学校490万人，计划减到347万人，这就多了167万。全会在《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中还说：“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此次军事小组所订之‘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国共产党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即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俾全国秩序得以恢复，人民痛苦得以苏解，‘军队国家化’之障碍得以首先扫除。”^②

对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协议的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揭露和驳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商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凡所决定都切合国家的需要与人民的期望，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尤得国内外舆论一致赞美，认为非此不足以奠定国家民主化的基础。国民党的行为，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共将“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③同日，周恩来在重庆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周恩来说，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

①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会议记录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央日报》，1946年3月17日。

③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①

（二）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否定政协协议

国民党为了使其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协议的阴谋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于3月20日至4月2日，在重庆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政协协议和东北问题。4月1日，蒋介石作了长篇政治报告。

蒋介石报告的一个特点，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从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在报告中，他又一次强调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推翻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五点“意见”，并宣称，“在宪法尚未颁行之前，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果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还否认要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进行根本改组。他说：“此次扩充政府的组织，是在国民政府现有的基础之上，要求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来扩大政府的范围，而决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个政府。”^②

蒋介石报告的又一特点，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从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3月27日，军事三人会议达成东北停战协定，决定派遣执行小组调处东北内战。蒋介石公然撕毁这一协议，拒绝在东北停止内战。他说：“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蒋介石歪曲东北抗战的历史，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①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②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他捏造说，14年来，东北抗战是在国民党党员领导之下进行的，在日本占领控制东北的时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武装力量。自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才有中共部队的发现。“对于共产党所谓‘民主联军’这样阻碍接收主权的行动，和他所谓‘民主政府’的非法组织，我们政府和人民是不能承认的。”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依照政治协商会议所定方式”，协商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表示“断然的拒绝”。对东北的军事调处，声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①

对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议上制造的种种谬论，中国共产党再次予以批驳。4月4日，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政协协议实施问题时，周恩来列举国民党否定政协宪草原则、否定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改的草案、试图增加国大代表名额、宣称“训政时期约法”仍然有效、回避对政府行政机构的改组及剥夺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力等行为，指出这是国民党在动摇、修改、并企图推翻政协协议。他说：“中共是处在保护这些决议的地位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动摇、修改或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关于东北问题，周恩来批驳了所谓共产党没有在东北抗日的谬论，尖锐地指出：“究竟是谁把东北断送了？谁又在东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谁在抗战中主张恢复‘七七’事变时的国土就够了？谁又坚持主张打到鸭绿江边？中共在东北的抗战，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七年打到热河，二十八年打进辽宁，创造出冀热辽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②谁还能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针对蒋介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和政权合法性的论调，周恩

①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② 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分别指1938年、1939年。

来指出：“中共或其他抗日军队在国民党看来都不合法，但在政协与停战之后，一切都要经过协商与调处解决，因此，民主联军也无所谓非法了。”周恩来说，外交与内政是两件事，不应混为一谈，可同时进行，不应该故分先后。如果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拿武力打下东北，再谈政治”。周恩来坚定地表示：政协一切决议应适用于东北，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更应完全适用于东北。如说现在不可以，或要等到政府军队到齐了，驻满了，才能说地方自治，这就等于把东北特殊化了，其目的就是排除一切，造成独霸东北的局面。^① 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谬论再次进行了系统批驳。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民主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他们完全代表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就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为它所不容。在中国要实现和平民主，还得进行尖锐的斗争。

三、国民党违约进攻东北，以蚕食手段进攻关内解放区

国民党在否定政协协议的同时，还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继续向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停战令签署后，全国曾出现过一个短时期的相对平静，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犯并没有完全停止。在关外，他们借口东北“例外”，加紧运兵，蓄意挑起大规模内战；在关内，则以蚕食手段进攻解放区。这种局面愈演愈烈，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严重局面，并最终导致了全国内战的爆发。

对于停战协定，国共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立场和态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协定。停战令下达后，中共中央在向全国公开发布由毛泽东

^① 《新华日报》，1946年4月6日。

签署的《关于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的同时，又向党内发出通报，指出：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统限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间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方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在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进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二、停战包括对日军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三、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四、从1月13日24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的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此事，各地电台必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自1月13日24时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全部严格地执行了停战的命令。

与此相反，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则阳奉阴违，破坏停战协定，继续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到了美国的纵容和支持。美国对华“调处”的目的，是想不战而控制中国。正因为如此，它在往中国送“鸽子”的同时，继续往中国送“大炮”。美国统治者错误地认为，这样做就能加强国民党的地位，吓倒中国人民，迫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屈服，放弃解放区政权和军队；同时，他们也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支持蒋介石以武力消灭共产党。1946年春，国际和中国形势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在国际，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纲领开始形成，中国成为美苏争端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国内，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内战政策，不断制造反民主的暴行并继续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逐步抛弃“调处”外衣，对国民党政府

^① 中共中央《关于遵守停战命令坚守阵地严防敌人袭击的通报》（1946年1月12日）。

的军事经济援助，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起来。除了帮助国民党运兵、提供武器装备等外，还正式组成了陆军顾问团（包括陆军、空军顾问和供应顾问）和海军顾问团，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美国公开通过了《军事援华方案》，接着又与国民党政府订立了秘密军事协定，供给国民党飞机 1000 多架，火炮 7000 多门，以及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仅半年，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的物资即达 13.35 亿美元，相当于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 2 倍。这些都助长了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气焰。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挑动内战，首先表现在东北问题上。

如前所述，中共代表在停战谈判中曾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军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但中共代表同时还提出，既然是为了接收主权，则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就只应进入东北，并不得驻兵过多，如经过解放区需经协商，国民党调动军队每日要向军调部报告。就此，双方达成了默契。此后，中共代表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东北的例外，不是停止军事冲突的例外，而是军事调动的例外。中共代表明确提出了对东北问题的全面主张：内政与外交分开，政治与军事一起解决。外交问题，由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交涉解决；内政问题，按照政协协议确定的各项原则由各有关方面共同解决。中共的主张，体现了停战协定、政协协议的原则，充分表明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

相反，国民党则确定了武装独霸东北，挑起全国内战，南北夹击人民解放军的方针。在东北，它拒不承认中共已经取得的政治军事地位，企图利用“中苏条约”，凭借军事优势和美国援助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东北挤走或消灭。

停战协定签署前，国民党以军事、外交两种手段交替使用，试图武力控制全东北。自秦皇岛登陆后，国民党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东北内战。为制止内战，挽救和平，中共曾表示，同意国民党军队沿北宁铁路北开，接收苏军占领的中长铁路和沈阳、长春等地。但国民党军不去接收沈、长，反而西向，分路进攻热河，

直逼赤峰、承德，企图占领热河。由于国民党军在关内沿同浦、平汉、平绥、津浦诸路向解放区的进攻受挫，在关外内战攻势又受到顽强抗击，在苏军原定的1945年11月撤退前全面控制东北已无可能。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派员与苏军谈判，要求缓撤，以保持大城市和交通线的“接收”权；同时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向东北海运军队，在“接收主权”的旗号下进行内战。榆锦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重庆，作出布置：对新民以东以北苏军占领区，用外交方式接收，一面由重庆政府及长春的熊式辉根据中苏条约交涉接收；一面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直接同苏军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接收。对新民以北逐渐向解放区扫荡，并打通锦承铁路，扩大占领区，巩固北线之安全。

根据这一方针，停战协定签署前后，杜聿明部采取了一系列扩大东北内战的步骤：命第13军及第52军195师继续沿锦承铁路向西进攻，配合北平国民党军攻取承德；命第52军第25师攻占盘山、营口诸要点。1946年1月5日，杜聿明派彭壁生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赴沈阳与苏军商讨接收东北的办法。经苏方同意，国民党于1月11日派第52军第2师进驻新民；14日派第13军第89师进驻彰武；15日以火车运输第52军第25师进驻沈阳铁西区。迄1月26日，苏军从新民、彰武撤退，国民党军完全接收了新民、彰武两县防务。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继续源源不断地向东北大举运兵。美国第7舰队集中其运输舰，先后从上海、广州以及越南等地将国民党新1军、新6军、第71、第60、第93军运至秦皇岛，并转运东北各地，扩大内战。此外，属国民党北平行营的第94军也有一部进入东北。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就有7个军（第13军、第52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第60军、第71军、第93军）22个师。其中新1军与新6军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部队。另外，还有特务团、重迫击炮第11团，工兵第10团与第12团，通信兵第6团，战车第7营。通

信兵独立第11营，突击纵队，交警总队等。国民党还在东北就地组织了保安部队3个纵队，1个独立支队，7个保安支队，4个骑兵团，3个独立营等。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1月份为14.3万人，2月份达20余万人，3月份为24.7万人，4月份增至31.8万人。这不仅违反了停战谈判关于国民党不得向东北运兵过多的默契，而且超过了《整军方案》规定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限额，其军事调动也没有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每日向军调部报告。

面对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进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立即停战，并表示国民党军可以和平接收长春铁路。但国民党军借口停战令规定了东北例外，不允停战。他们不去“接收主权”，而把重点放在向人民军队的“扫荡”和进攻上。从3月初至4月，苏军按照协议从东北撤军。国民党军乘机向东北的人民军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东北内战越打越大。

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还表现在以蚕食手段进攻关内解放区上。

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在关内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般是停止了。但他们变换方式，以蚕食手段对解放区进行围攻、压缩、渗透，试图以此消耗解放区的军事、经济力量，伺机发动全面进攻，一举消灭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具体办法，除使用正规部队以城市、集镇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行军事进攻外，还利用反动的地方团队、土匪武装，袭击、夺占和封锁解放区边缘地带，残害解放区乡村干部和民兵，以扩大其统治区。他们还违反整军方案关于“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所保持之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的规定，收编大量伪军和指使一部分日军，共同向解放区进攻。从1月到5月，国民党军与日军、伪军联合向解放军进攻达467次，使用兵力共41万余人；在国民党支援纵容下，伪军单独向解放军进攻1039次，使用兵力18.1万人，指使日军单独出动兵力向解放军进攻3次，使用兵力为180人。从1月中旬到6月底，国民党军及其所指挥的各种反动武装，先后向

解放区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达 4376 次，使用兵力 279 万人次，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及解放区政权干部 3 万余人，侵占解放区城市 40 余座和村镇 2500 余处，给解放区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向解放区进攻并准备全面内战，国民党违约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调动。据统计，1946 年 1 月停战令下达到同年 6 月，国民党军违令调动共 51 个军 129 个师 131.4 万人，范围达 10 余个省。具体情况是：

华中区，10 个军 25 个师，共 28.3 万人。其中第 100 军 2 个师由南京、镇江等地移至泰县、泰兴一带；第 49 军 3 个师由镇江、江阴一带，移至靖江、泰兴、南通一带；第 25 军 1 个师由扬州移至泰县；第 73 军 3 个师由武汉移至南京、滁县、嘉山一带；第 21 军 3 个师由宁国移至昆山、苏州、崇明及扬州等地；第 99 军 3 个师由九江移至镇江、上海及南通等地；第 7 军 1 个师由蚌埠移至临淮关、明光、固镇等地；第 48 军 3 个师由安庆、宿县、桐城等地，移至桐城、合肥、高城、安庆等地；第 58 军 3 个师由徐州移驻宿县地区；第 98 军 3 个师由京沪线等地，移至徐州、东海、候集等地。

山东区，7 个军 16 个师，共 18.2 万人。其中第 28 军 3 个师由京沪线偷运徐州，后又移驻徐州以东；第 88 军 2 个师由京沪线移徐州，后又移住砀山、黄口一带；第 51 军 2 个师由徐州北柳泉移驻利国驿；第 59 军 2 个师由徐州东北贾汪移徐州；第 77 军 1 个师由徐州东北贾汪移平山子；第 12 军 3 个师由济南移晏城等地；第 8 军 3 个师由青岛、高密移潍县、昌乐等地。此外，还有宪兵一团由上海运青岛。

中原区，6 个军 16 个师，共 14.2 万人。其中第 72 军 3 个师由修水、阳新等地移长江北黄陂、黄安、麻城等地；第 66 军 3 个师由四望山转向平汉路东；第 41 军 3 个师由大洪山、四望山转向光山、息县等地；第 47 军 2 个师由大洪山转向光山、潢川等地；第 10 军 3 个师由汉中、白河、卢氏移大洪山、枣阳、南阳老河口

等地；第15军2个师由枣阳移至桐柏、固县。

豫北和陕西地区，9个军23个师，共23.6万人。其中第55军3个师由豫东太康移商邱、考城、开封一带；第68军3个师由睢县移开封、兰封一带；第38军3个师由开封移汜水、巩县一带；第32军2个师由淇县移获嘉、修武一带；第30军3个师由汲县移汤阴；第27军3个师由郑州、西安一带移黄河以北武陟地区；第90军2个师由洛阳移黄河以北孟县地区；第1军2个师由灵宝、安邑向稷山进犯；第76军2个师由枣阳移宝鸡、兴平、西安一带。

晋绥区，7个军17个师，共9万人。其中第61军2个师由晋北忻县移晋东南白晋路沿线；第19军1个师由忻县、太原、原平移祁县、榆次等地；第33军由吉县、太原、白晋线等地移新绛等地；第34军由临汾地区移介休、孝义、隰县等地；第43军1个师由原平移汾阳地区；第35军1个师由归绥移至和林、托克托一带；暂3军2个师向卓资山、凉城进攻。

冀热和东北区，10个军25个师共27.2万人。其中除新1军、第52军、第13军、新6军、第71军、第60军、第93军各3个师先后调入东北向东北民主联军进犯外；第94军2个师由唐山、天津移热河，第16军1个师由石匣移长辛店、黄村等地；第92军1个师由密云调顺义一带。

广东区，2个军6个师共7.8万人。第54军3个师由广州调大鹏半岛向游击纵队进攻；第63军3个师由河源、惠阳、海丰向大鹏半岛进犯。

新疆方向，1个骑兵旅、10个补充团及炮兵营共2万余人，由富平、豫南、西安等地经兰州进入新疆。

此外，还有部分技术军兵种违令调动：空军第2大队，由昆明调西安、宝鸡；炮兵第8团由洛阳调归绥；炮兵第9团由重庆运徐州；榴重第6团由贵阳运西安，尔后大部转运洛阳一带；装甲第2团由西安运洛阳；工兵独立第1团由广西运汉口；重炮独

立第2团由武汉运东北；炮兵营由湖南运武汉并海运东北；B25轰炸机48架由汉口飞北平转沈阳；空军1个联队由汉口移郑州；坦克30辆经蚌埠转运徐州。

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肆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关内外大举调兵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事实，充分表明了其同意停战和谈与进行民主改革的虚伪性。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的同时，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以自卫战争制止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第三节 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的斗争

一、中共中央关于力争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

自八路军、新四军以主力一部进入东北后，特别是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后，部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总兵力已由刚进入东北时的11万人增加了近2倍。但是，大批扩编的部队尚未整顿，成分复杂，很不巩固，隐藏在人民军队内部的一批坏分子及收编的一部伪军、土匪武装，煽动和组织叛变的事件时有发生。广大乡村与中小城市多为伪军和地主武装所盘踞，群众工作未及深入开展，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缺乏应有的了解，部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而且武器装备甚缺，军队补给困难，生活相当艰苦。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与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对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站稳脚跟并争取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但考虑到东北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八路军、新四军一时难以全部控制东北，同时也估

计到，苏联由于同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将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军进驻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于是提出了坚决击破国民党军进攻，力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月15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国民党现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不放弃武装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同意你们在友方谅解下，力争控制抚顺、吉林、四平街、齐齐哈尔等次要大城市。至于进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利；因为我军进入大城市无法与国民党避免冲突，尚有被消灭的危险，且将给国民党及美国以借口。……我们在东北必须击败顽军之进攻，使其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之计划失败，他们才会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和我们谈判问题。”中共中央于26日给东北局的电报又称：“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的方针，我们必归失败。……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一）在军事上避免在中长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二）切实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遵照中央的指示，调整了部署，决定将主力部队分兵东北诸省，将东北原有10个军区合并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军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裁减老

弱残疾，清理整顿内部，加强军事训练；将多数主力部队有重点的划归各军区指挥，以一部主力编为机动作战部队，有效的打击了集中与分散之敌，收复了许多中小城镇；部分地区开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分配伪满上层反动分子霸占的土地，使东北解放区初具规模。

二、东北民主联军抗击国民党军沿北宁路的进攻

1946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新1军和新6军相继进入东北。东北国民党军兵力获得增加后，更是置停战令予不顾，开始对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新的进攻，即以第52军、新6军主力和第13军一部，共6个师的兵力分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发动攻势，企图驱逐或歼灭民主联军，巩固北宁沿线，尔后进占沈阳。2月9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达了进攻命令，“这个命令的要旨是：（一）为确保北宁路交通之安全，着自2月9日起，编三个扫荡队，分向盘山、台安、辽中及公主岭、秀水河子、鳌欢池等地扫荡；（二）着新六军第二十二师为南路扫荡队，向盘山、台安、辽中等扫荡；（三）着第五十二军第二师为中路扫荡队，沿北宁路两侧向新民以东扫荡；（四）着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为北路扫荡队，分向公主岭、秀水河子、鳌欢池等地扫荡”。^①

针对东北局势，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根据这一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决心集中主力一部，箝制国民党军之进攻，并坚持自卫反击原则，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敌一路的战法，歼灭来犯之国民党军。

2月10日，国民党南路新6军第22师由沟帮子、大虎山之线指向辽阳、营口，至14日，占领盘山、台安和辽中；中路第52军

^① 《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辑，第29页。

第2师由黑山、北镇地区沿北宁路东进，其第2师占领新民，第25师推进至沈阳市郊；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入阜新东北的鹞欢池和彰武、法库之间和秀水河子。

此时，侵入秀水河子地区的国民党军计有第89师第266团、第265团之1个营及师属山炮连，他们距其主力已达一日行程以上。东北民主联军决心乘其分散的机会，力歼秀水河子地区之敌。即令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第3师第7旅和保安第1旅第1团，共7个团的优势兵力，突然将敌包围，以第1师的2个团和第7旅的2个团进行攻击，其余3个团担任打援。各级指挥员亲自侦察地形，选择主攻点，作好一切攻击准备以后，于2月13日黄昏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至14日晨，全歼该部，并击溃了第52军第2师1个团的增援。同时，国民党军第89师第267团1个营，由阜新进占鹞欢池时，被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第10旅与独立旅歼灭。以上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营。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个歼灭战，这一胜利，不仅给违约进攻的国民党军以应有的打击，而且也鼓舞了民主联军的斗志，取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南路进攻之国民党军新6军第22师进占台安、盘山和辽中等城。2月15日，民主联军令南满第4纵队第10、第11旅，将进至盘山以东沙岭地区之国民党军第22师之66团2个营及师属教导营2000余人包围；并令第3纵队第7旅于台安以南准备打敌援军；令第8、第9旅对付台安、辽中东犯之敌。16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第22师发起攻击，经过3昼夜的激战，第3纵队第9旅于辽中东之徐家屯歼灭敌第64团第3营；第8旅于台安东南六间房附近给予敌第65团第3营以重创。但是第4纵队在沙岭地区的战斗没有打好，以5个团的优势兵力围攻新6军1个团，连续3天反复冲击，终未奏效。后来国民党军2个营的增援部队赶到后，第4纵队于19日被迫撤出沙岭战斗，伤亡2000余人，攻击与打援，均未取胜。

沙岭战斗与秀水河子战斗相比是个失利的战斗。主要原因是新编部队较多，组织装备较差，指挥上未能集中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步炮协同不当，思想上急躁轻敌等，部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战后进行了整训。

3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抚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东北的形势，确定了必须依靠群众，建设根据地与作长期斗争准备的方针和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这对于东北民主联军以后的作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进行以四平地区为中心的保卫战，促进东北停战谈判

东北国民党军沿北宁路进攻受挫后，于194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其新6军、第52军、第13军位于盘山、辽中、沈阳、黑山、叶柏寿（今凌源）地区整顿，准备新的进攻。3月，随着国民党军第71军（辖第87、第88、第91师），第60军（辖暂21、第182、第184师），第94军第5师相继进入东北，使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4万余人增加到24万余人。这些情况表明，东北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东北大打势所难免。

1946年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国民党军第52军于13日乘机进占沈阳。3月22日，苏联外交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东北苏联红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离。从苏军开始撤退之时起，国民党军即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从3月18日开始，国民党军分兵3路同时向南、向东、向北推进。南路新6军主力，由台安以南之新开河向辽阳进犯；北路新1军沿中长路两侧北犯，并于3月24日占领铁岭；东路第52军从沈阳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企图首先控制辽东半岛，歼灭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巩固其后方，尔后再集中主力进攻北满。

东北内战日益扩大，已危及全国和平，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东北内战的强大声浪。在中共代表的坚持下，3月27日，国、共、

美三人军事会议（美方马歇尔回国述职，由吉伦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29日，军调部宣布将派遣4个执行小组到东北的两军冲突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4月1日，军调部发布通告，要求国共双方军队应停止在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位置。任何部队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国民党虽被迫同意停战，但军事占领东北的计划并未改变，同意停战只是伪装和平的一种姿态。原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副长官郑洞国回忆说：“我到锦州时，得知国共停战三人小组不久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了对付此事，很费一番心思。他曾召集东北行营及保安长官部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对策。我们确定的方针大致是：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

3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为抢占中长路沿线战略要地，又重新调整部署，决心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在沈阳南北两个方向沿中长路及安（东）沈（阳）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企图迅速抢占四平及本溪、鞍山、营口等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与窃据长春、哈尔滨等地之伪军、土匪武装会合。其部署是：在南线，以6个师的兵力分为两路，一路为新6军（欠207师），3月31日下午攻占鞍山后，除留小部队固守外，主力于4月1日前向辽阳集结，挺进本溪湖，归赵公武（第52军军长）指挥，协同第52军之1个师包围歼灭民主联军主力于本溪湖附近地区；第52军应以1个师于4月2日前向本溪湖挺进，与新6军1个师密切联络，于4月2日前攻占本溪后任该城守备。另一路为第71军之第88师和第94军之第5师，自沟帮子、盘山出动，务于4月5日占领海城、营口，以确保沈阳外围要点之占领。在北线，以5个师也分为两路，左路为第71军（欠第88师）由新民、彰武出动，夺取法库、康平后，向四平以西的八面城前进；右路为新1军，自铁

岭北进开原、昌图，扫除障碍，于4月2日前攻克四平并确保之。此外，在苏家屯防守之207师，当新6军、第52军一部对本溪湖发动攻势时，需向本溪湖方面严密搜索警戒。^①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东北国民党军新的攻势和苏联红军四月底即将撤退完毕的新情况，已料定在苏军撤退后，东北国民党军必然要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以便在停战前多占些地方，控制战略要地，取得优势。从3月中旬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定要在停战前打几个胜仗，控制重要城市及战略要地，争取东北停战。同时就东北的和与战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确定了在促进东北停战的同时，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线的方针。3月12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在马歇尔几次要求下，虽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东北调处停战，但附带了许多苛刻条件（如中共军不能阻拦政府军接收东北主权并须撤退；政府军有权进驻矿区；中共军撤离中长路三十公里以外，小组只能随政府军行动，并不得干涉东北的政治等），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停战。因此在苏军撤退后，东北的军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你们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之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们妥协。目前你们应即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23日又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美方急于解决东北问题，谈判进展甚速，可能于数日内成立协议。国民党必于日内向辽阳、抚顺、铁岭等地进攻，其目的在停战前多占地方。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翌日，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苏军4月底撤完，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

^① 杜聿明、郑洞国致廖耀湘、舒适存电（1946年3月30日）。

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全线（注：指当时中长路长春至哈尔滨，哈尔滨至绥芬河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目的，请速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并进行剿匪；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我南满主力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其大部不得北进；如作战的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并能抽兵北上四平与长春时，你们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与长春之间，与黄克诚、李富春及周保中部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的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3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真、林彪：“美方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专机接周（恩来）赴渝谈判，判断数日内即可谈妥，派停战小组至东北，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谈判与将来。”同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林彪：“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还须若干时日，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并指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3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林彪，指出：“我军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街以南，并给以严重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上述一系列指示，确定了在四平地区的作战方针，即：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达到对四平的保持；战役指导上，求得局部地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迟滞和挫败敌之进攻计划。同

时，还作出了如下作战部署：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阻滞、杀伤北进之敌，争取时间，掩护第1师、第2师、第7纵队、第3师第7旅、第8旅主力、独立旅等共6个师（旅）向四平地区集中，乘北进之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以辽东军区的第3、第4纵队及保安第3旅等部，担任南满方面保卫本溪等地的作战；由东满军区首长指挥第7师主力、新四军第3师2个团、东满3个旅和地方武装准备夺取长春；由松江军区首长指挥第359旅及松江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哈尔滨；由嫩江军区首长指挥新四军第3师特务第1团和嫩江军区部队，准备夺取齐齐哈尔。同时要求各军区部队继续剿匪，发动群众，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以东北军政大学一部建立补充师，以训练新兵和教育俘虏。

国民党军在沈阳地区集结完毕后，即按其部署分别向沈阳以南、以北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并按照既定部署，先后实施了保卫本溪作战，四平外围作战，解放长、哈、齐三市和四平保卫战等战役战斗。

（一）本溪保卫战

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撤兵。东北国民党军在沈阳地区完成集结后，即以新6军、第52军向辽阳、抚顺进犯；以新1军向铁岭、四平方向进犯。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兵力，策应北满主力保卫四平，进行了本溪保卫战。

3月18日，东北国民党军令新6军（欠第207师）由台安地区东进，突破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后，于21日和31日先后攻占辽阳与鞍山。第52军第25、第2师由沈阳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东北民主联军以第1师、第7纵队第19旅等部实施抗击，但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21日，第52军占领抚顺。3月28日，国民党军又以第71军第88师，第94军第5师，由盘山向海城、营口进攻。防守上述两地的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30、第31团，经过坚决的抗击之后，终因寡不抵众，于4月1日放弃营口，

随后，海城与大石桥两地也相继失守。

4月1日，国民党新6军之第14师及第52军之第25师进攻本溪。东北民主联军第3、第4纵队奋起自卫，挫败了敌之进攻。国民党军第14、第25师经调整部署后，于4月7日再犯本溪，被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击溃。第4纵队第10旅，协同第3纵队第8旅在本溪西北姚千户屯一带击退了国民党军第14师的增援，并乘胜将其追至沈阳南郊之苏家屯附近。此次本溪自卫反击作战，共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给国民党军以重创。4月20日，辽东军区第3纵队主力奉命北上参加保卫四平作战，保卫本溪的作战任务，则由第4纵队和第3纵队第9旅等部担任。国民党军趁机以第14、第22、第88、第2、第25师共5个师的兵力，于4月28日又向本溪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经过6天的鏖战，终因本溪守军兵力单薄，于5月3日主动撤离本溪，转入本溪以东以南地区抗击进攻之敌，并进行休整。历时1个多月的本溪保卫战，牵制了国民党军2个军的兵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保卫四平的作战。

本溪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占领了沈阳以南工业区的主要城市，遂将新6军、第52军第195师及第71军第88师调往四平方向。至此，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北线，企图趁苏联红军撤退和东北停战尚未实现以前，抢占重要城市与交通要道，进而控制北满。

（二）四平外围作战

四平街位于南满平原中心，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的交通枢纽，其东北部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地处要冲，故成为东北中部之战略要点。日本投降后，苏军进驻四平街，该市民众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组建了百余人的治安队。1946年3月苏军撤退时，国民党当局竟委派原伪四平省主席刘翰东及伪四平省保安司令张凯，勾结土匪“铁石部队”等4000余人窃据四平，等待国民党军主力北上“接收”。

东北民主联军为控制四平，阻止国民党军北上，乃令辽西军

区保安第1旅第1团，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28团，第7纵队第56团及辽西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共6000余人于3月18日歼灭了守敌4000余人，其中俘虏伪省主席、保安司令以下3000余人，收复四平，为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地区作战准备了有利条件。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决定以保安第1旅指挥机关组成四平街卫戍司令部，辖该旅第1团和第7纵队第56团共6000余人防守该市，阻敌北进。民主联军主力将集结于四平外围地域，进行运动防御，寻机歼敌。

3月19日，国民党军获悉四平被占后，着令新1军、第71军（欠第88师）5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熊式辉命令新1军务必在4月10日抵达长春附近，以俟苏军撤退后接管长春防务。熊式辉为准备四平决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心在运动中各个破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迟滞和挫败敌之进攻计划，以便造成尔后作战的有利条件，于是决定：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以运动防御阻滞和杀伤北进之敌，争取时间，掩护山东第1、第2师、第7纵队、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8旅主力、独立旅等部向四平地区集结。

1946年3月24日，国民党军新1军占领铁岭后，继续向北推进。3月下旬至4月上旬，民主联军第10旅在铁岭至昌图间，第7旅在昌图至四平间节节抗击，先后歼灭新1军1200余人。4月5日至11日，第7旅在四平以南泉头车站阻击了国民党军第50师的进攻。此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在第10、第7旅掩护下，已集结四平地区，并于四平西南之兴隆岭歼新1军1000余人，使号称“天下第一军”之新一军进攻受挫。

国民党军向四平地区进攻之另一路第71军（欠第88师），于4月4日占领法库、康平后，沿公路继续北进，企图经八面城向四平迂回出击。

东北民主联军查明敌情后，决心歼灭第71军前出之敌。10日，第71军先头部队第87师进至昌图以西之金家屯一带时，民主联军以第3师独立旅第3团及地方武装一部阻击该敌；以第1师、第3师、第10旅、第8旅主力与第7纵队等部迅速向西转移，布成袋形阵地；以第7旅和第2师在四平以南铁路沿线继续牵制和阻击新1军；以保安第1旅第1团和第7纵队第56团等部在四平正面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15日，第87师进至大洼以南一带，东距新1军约25公里，东北民主联军乘其立足未稳，于当日17时发起攻击。在各部协同一致的勇猛攻击下，激战至16日晨，将敌第87师大部歼灭，并击溃第91师增援部队一部。此役，共歼敌40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地区20多天的阻击战，掩护了主力部队向四平地区集结，使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受到一定打击，削弱了其有生力量，为保卫四平街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

随着苏联红军从东北撤退，国民党委派行政官员从苏军手中接管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的政权，并收编了一批伪满军警与土匪武装，仓促控制了这些城市。他们试图以这些城市为据点，策应国民党军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独占全东北。

长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为北满之三大城市和重要的战略据点。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全力控制上述三市及中东全线，而不使国民党军进驻。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5日命令民主联军首长：“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26日，东北局致电林彪：“根据中央指示，我之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完成此项任务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以便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在我手中。……西满军区以主力一部协同王明贵部（注：嫩江军区部队）准备占领齐齐哈尔。吉林军区，应抽调罗华生旅（注：第

22旅)；贺庆积旅(注：第23旅)，曹里怀部(东满吉黑纵队)兼程向长春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集中，除罗旅归林直接指挥外，贺庆积旅，曹里怀部及邓克明旅(注：警备第2旅)及第7师一部，由军区首长统一指挥准备夺取长春。北满军区，由第359旅协同松江部队准备进占哈尔滨。”中共中央于27日指示：“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铁路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而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赶时机，迟则无用。”29日，东北局指示各部队首长：“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三市，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干净消灭各该市顽匪。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望亲自负责，周密部署。”

长春市，为日本侵占东北后成立的伪满洲国政治中心，地处东北腹心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当时盘踞在长春的部队有：被国民党收编的原伪满讨伐军姜鹏飞部、保安第2纵队、第4纵队共8000余人；吉林省15个保安支队及一个骑兵支队共8000余人；被收编的原伪满警察5个大队约1700余人；还有日军残余组成的独立团(亦称特种警察大队)1500人，防守长春的总兵力2万余人。但其内部派系尤多，矛盾甚大，据守孤城，消极待援，士无斗志。

3月下旬，苏军撤离长春后，东满军区为解放长春，以总兵力约2万人实施攻城，将攻城部队编组为3路纵队：以第7师师部率第20旅全部及第21旅第61、第63团共5个团及第3师第8旅一部，共计1万余人担任主攻，由长春西南与正南实施攻击；以曹里怀部及第23旅(欠1个团)约6000余人，从长春北面与东面实施攻击；以第23旅一部、第2师第6团及永吉、敦化、延吉地方武装约4000人，从长春东南面突入。攻击重点为市中心及飞机场，占领国民党收编的长春守军指挥机关。

4月14日15时，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投入战斗，迅速控制西

郊机场，切断了敌空中逃跑的退路。15日拂晓，攻城战斗开始。各路突击部队肃清市郊据点之敌后，抵近城区。至17日，经过激烈的巷战，占领市内重要机关、广播电台、火车站及街区要点。18日，全歼龟缩在伪市政府、警察局、宪兵司令部及银行大厦之内的守军，战斗结束。此役共歼敌1.8万人，东北民主联军伤亡1700余人，长春解放。

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第19旅、第21旅第62团、嫩江军区部队及第3师特务团向驻守齐齐哈尔市的伪军发起攻击。次日凌晨歼灭守军3000余人，其中俘敌1500人。窜逃市外之敌，亦迅速就歼，齐齐哈尔市解放。

苏联军队于4月25日撤离哈尔滨后，该市各界代表130余人，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进驻该市，维持治安。东北民主联军接受各界人士的要求，着令第359旅、黑龙江军区独立第5团、第7团等部，于4月28日，向先行突入哈尔滨之土匪武装发起攻击，守军怯于抵抗，迅即溃散，5000余人就歼，3000余人逃窜，哈尔滨获得解放。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进驻该市。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之后，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地位，有利于国共谈判，有利于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和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作战。

（四）四平保卫战

1946年4月中旬，正当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以南抗击国民党新1军、第71军北进时，中共中央就坚决保卫四平，促进谈判，实现东北停战问题，向中共东北局多次发出指示。4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马歇尔有于十二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又连续致电彭真、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大战将在四平至公主岭地区打，不歼灭顽方三四个师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4月21日和22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新1军是赴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们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气势。”“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心坚守四平，并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敌人；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敌。具体部署是：以保1旅组成的四平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城防部队坚守四平；集中原山东第1、第2、第7师，原华中第3师和原陕甘宁第359旅等部实施机动防御；以南满第3纵队第7、第8旅北上，参加四平作战。

四平保卫战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6年4月18日至26日），国民党军连续猛攻，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抵抗；第二阶段（1946年4月27日至5月14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第三阶段（1946年5月15日至18日），国民党军增援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离四平。

四平以南阻击作战以后，国民党第71军（辖第87师、第91师，欠第88师）与新1军（辖第30师、第38师、第50师）完全靠拢，并形成对四平的弧形包围。其作战部署是：以新1军置于四平南面，实施正面攻击；第71军位于四平西南，担任侧翼攻击与预备队；第60军第182师保障铁路运输。

4月17日，国民党军新1军第38、第30师和第50师，分左、中、右三路，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开始向四平民主联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城部队依托工事，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一次又一次的击退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使有些阵地失而复得，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人。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加强防御，确保北山制高点，即令第3师第7旅沿北山增防。22日，国民党军猛攻北山阵地，东北民主联军保安第1团拼力抗击，双方伤亡甚

重。东北民主联军遂以第7旅一部接替北山防务。此时，国民党军由南满急调第52军之195师北上驰援四平；令第71军主力由八面城地区北进，企图迂回四平与长春之间，配合新1军形成对四平的南北夹击之势。东北民主联军为加强四平以北与以东的防御，令第3师第8、第10旅及独立旅进至喇嘛甸子地区；第2师进至大房身、胡家窝棚地区；第1师进至海清窝棚与平安堡地区；第7纵队主力转至四平东南之下三台、小红山咀地区，组成一道新的防线。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于长春解放后，南下四平，22日，其第20旅接替第3师第7旅阵地，旋即向国民党军第38师展开反击。25日，敌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又向北山阵地发起数次猛烈冲锋，均被东北民主联军击退。

在四平南的攻守战斗中，由于东北民主联军英勇抗击，不怕牺牲，坚守阵地，使国民党军未获进展。随后，第3师第7旅移防四平以东，粉碎了国民党军从东线突破的企图。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了由东到西的百里防线，以6个师（旅）的兵力，构筑了坚强的阵地，保障了四平两翼的安全，挫败了第71军迂回长春和切断守城部队退路的计划。此时，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受挫、伤亡惨重，乃转入固守待援。东北民主联军亦因后备兵力不足，消耗甚大，难以实施有效的反击。

4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败锐气，争取时间。对四平守军望传令嘉奖。”至此，四平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4月27日起，战役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为等待增援部队，重新组织进攻，以新1军就地加修工事；第71军、第52军、第60军各1个师已与新1军靠拢，并以近迫作业，逐步向民主联军阵地接近。东北民主联军为对付国民党军新的攻势，积极修筑工事，加强防御措施，增强炮兵火力，不断以小部队袭击和炮击打击敌人。至5月14日，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4月30日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控制强大的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为将来之用。目前不要向敌人举行大规模的进攻。”5月1日又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5月初，东北民主联军为争取主动和切断国民党军运输补给，乘其后方兵力薄弱之际，决定在四平以南开辟第二战场。遂令南满第3纵队之第7、第8旅和第3师独立旅等部队，分别进至昌图、开原地区，在保安第3旅的配合下，夹击四平南线之敌。5月5日，南满第3纵队主力在四平以南，双庙子以东地区与四平南援之第52军第195师遭遇，当即发起进攻，歼其一部，迫其退守泉头车站转入防御。5月10日，民主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4个旅均抵达昌图、开原地区，各自歼敌一部，并攻占数个火车站，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威胁，策应了四平守城部队的作战。

5月12日，国民党军增援四平地区的部队新6军与第71军第88师，由辽阳、本溪一带北上开原地区，并向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发起攻击。鉴于这一新的情况，第3纵队遂将开辟第二战场的部署改变为打敌援军。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将主要力量放在开原、昌图地区，切断四平敌之后路，歼灭由沈阳北上助战之敌。南满我军应积极动作，箝制本溪地区之敌五个师，使其不能调动或不能多调动。热河我军明日开始进攻十三军，得手后向辽西发展，协助你们。”国民党新6军在第3纵队的节节抗击下经威远堡、莲花街继续北进。东北民主联军令位于公主岭地区的第359旅急速南下，协同第3纵队阻击该敌。东北民主联军开辟第二战场部队的积极活动，给进攻的国民党军造成了威胁。

从5月15日开始，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此时，国民党军集结

四平地区之总兵力已达 10 个师，并有大量坦克、重炮与飞机配合作战。东北国民党军为打破僵持局面，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指挥下，调整作战部署，组成 3 个兵团：右翼兵团，为新 6 军之第 14、第 22、第 207 师，第 71 军之第 88 师及第 52 军之第 195 师，从开原分两路向四平东面包围攻击；中央兵团，为新 1 军 3 个师（第 30、第 38、第 50 师），由四平近郊发起进攻；左翼兵团为第 71 军之第 87 师与第 91 师，向八面城和旧四平以北地区包围攻击。

5 月 15 日，国民党军再次对防守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全面攻击。其中央兵团第 30 师、第 38 师在 7 架飞机和 20 门重炮的配合下，从正面猛攻三道林子北山阵地。在百米宽的山上，东北民主联军冒着每分钟百余发炮弹的轰击，坚守阵地，与逼近前沿之敌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鏖战一日，歼敌 3 个连。北山阵地屹立不动。中央兵团左翼第 50 师向四平以东、哈福以南 258 高地攻击，由于兵力 10 倍于守军，地形又极为不利，守军伤亡过半后，撤出该高地。国民党军又向东北民主联军第 7 纵队一部所扼守的 331.5 高地发起攻击，守军顽强抵抗，打退国民党军 7 次冲锋，歼其 600 余人。17 日，国民党军增调坦克再度猛攻，并以一部从侧翼迂回。331.5 高地陷落，使四平防线左翼制高点塔子山受到严重威胁。

进攻四平的左翼兵团，向坚守八面城、旧四平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 1 师迂回攻击。连续冲锋 10 余次，均被击退，至 18 日未获进展。

进攻四平的右翼兵团，与民主联军第 3 纵队和第 359 旅激战以后，攻占西丰、平岗和火石岭等地，并向四平东北迂回攻击；同时，第 195 师占领哈福屯，并配合新 1 军一部，对塔子山阵地形成三面包围。塔子山距四平 10 余公里，是四平防线的制高点，此山之得失，关系四平防守之安危。5 月 18 日，国民党军在重炮与飞机的配合下，向塔子山猛烈攻击。防守该山的东北民主联军第

3师之第7旅第19团，因山石嶙峋，工事难筑，即堆石为垒，英勇抗击，反复争夺，拼命死守，终因伤亡过大，无力继续增援，于当日下午，塔子山阵地被敌占领。

由于塔子山陷落，四平防线被突破，造成进攻的国民党军由此迂回侧后，封闭守军退路的严重情况。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在1个多月的防御作战中，已伤亡8000余人，损失重大，倘继续坚守，实属不利。为摆脱被动，保持战力，乃于5月18日晚主动撤出四平地区。除保安第1旅撤回辽西地区外，其他参战部队均沿中长路东侧向吉林、长春方向转移，持续1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以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而告结束。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以后，5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应采取“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向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的方针。23日，又指示，“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个月的苦战，部队已极度疲劳，战斗力受到很大损伤。在北撤中，昼夜行军，大量减员，加之国民党军跟踪猛追，分兵疾进，企图捕歼东北民主联军于吉林、长春以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与当时的作战形势，认为：公主岭南北地区，均系平原地带，不宜防守；在大踏步的进行战略撤退的同时，国民党新1军、新6军尾随东北民主联军各部，连续占领公主岭、东丰、西丰、伊通等地，逼进长春；我若继续防守，需大量军队，敌若集中兵力攻城，东北民主联军实难抗御，且又失去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故决定放弃该市。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又相继占领双阳、梅河口、海龙、盘石、农安、德惠、吉林等19座重要城市，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此时，国民党军在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无援兵，亟需巩固和休整的情况下，停止攻势，未向松花江以北冒进。民主联军在北撤中，一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追击，一面进行有组织的转移。5月下旬至6月初，安全地转移到松花江以北，其中华中第3师第10旅集结于大赉地区，

第8旅集结于郑家屯以北地区；山东第7师、华中第3师第7旅、第359旅集结于双城、哈尔滨地区；山东第1、第2师及第7纵队集结于蛟河、敦化地区；第3纵队及华中3师独立旅集结于柳河地区。一面整补，一面沿松花江布防，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为配合与国民党谈判斗争，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军事进攻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在此次战役中，东北民主联军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依托工事，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轮番疯狂的进攻，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显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这对于配合东北的和平谈判，推迟国民党军的北进计划，开辟与巩固北满根据地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5月19日致林彪、彭真的电报中指出的：“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在此役中，民主联军有生力量消耗甚大，伤亡达8000人，而且大部分是骨干力量，因此5月27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五）鞍海战役和桦甸战斗

位于南满与东满地区的民主联军，乘敌兵力分散，后方空虚之际，发起鞍（山）海（城）战役。5月22日，民主联军第4纵队2个师及辽东军区一部，进攻鞍山之敌第60军一部。经过激战，至25日全歼第60军第184师之第551团，收复鞍山，并击溃由沈阳、海城向鞍山增援之的部队。海城守军第184师师部及第552团3800余人，在东北民主联军包围和政治争取下，5月30日，由潘朔端师长率部起义，海城光复。该部起义后，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朱德总司令致电嘉勉。东北民主联军于6月3日又乘胜占大石桥，歼灭第184师第550团。

国民党军为夺回失地，保住南满，急令新1军由北满回援，调第60军第182师及第93军暂编第20师等部向南满民主联军部

队反扑，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鞍山、海城等地。5月31日，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于转进途中，在桦甸西南之黑石镇歼灭新6军第207师1个加强营。6月6日，又攻克桦甸，歼其一部。

东北民主联军在以四平保卫战为中心的各次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集团独占东北的狂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取得了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

四、东北休战 15 天，国共双方继续谈判

自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调处东北停战协议后，国民党军违反协议，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4月1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命令：“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住（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

4月2日，为执行《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的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耿飏、张经武、许光达及随员40余人由北平飞抵沈阳。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借口耿飏等未带军调部护照，将其非法扣留在机场达3小时。次日，陈诚继张治中任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不久，又由军令部长徐永昌接替陈诚任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双方继续进行谈判。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发展成为内战状态，再度抗议美国往东北运送国民党军。并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力接受东北主权。希望东北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能够同时解决，并表明东北民主联军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武力进攻。30日，周恩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根据目前形势，东北的前途有下面两种趋向：一、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的内战，这是人民绝对不许可的。二、立即停战，这是唯一好的前途。”5月3日，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后，重申中国共产党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即首先实现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

5月23日，蒋介石自南京飞抵沈阳，亲自策划与部署东北的

内战，并在沈阳致函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提出东北和与战问题的意见，即必须以承认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和恢复交通为前提条件。熊式辉和杜聿明联署致电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无理要求中共军队自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退出，并撤离东北铁路沿线。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坚决予以驳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指出：目前是中国形势发展的转折点，如果东北国民党军继续进攻，内战必然波及关内。“我之做法一贯愿中国和平民主与马使命相合，我们愿其成功，勿失败。但蒋若全面打来，我必全面抵抗。”^①

在中共代表多次提议和敦促之下，6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6日，国共双方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7日正午起，东北休战15天，以便就有关问题继续谈判。

北平军调部为执行东北停战命令，特派执行组主任白鲁德飞往长春，调处停火，但是国民党军对停战协议阳奉阴违，缺乏诚意，杜聿明电令各部，要继续在东北实行大规模的“追击进攻”。东北停战令发布后，国民党第71军之第88师第263团和第264团1个营，由吉林出击，攻占新站与拉法，7日下午又进攻蛟河。东北民主联军为执行停战协议，打击进犯之敌，即令第1、第2师和东满警备第2旅一部进行反击，经过激战，全歼敌第88师4个营1800余人，收复新站与拉法。

6月16日，南京中共代表团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力主东北问题以政治协商解决。是日，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就东北目前形势对驻哈尔滨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此次宣布15天停战，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结果，但就国民党的企图来说，可能是暂时无法进攻的停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的停战。目前他们在局部地区仍未放弃进攻，他们于目前占领法库后，从9日至12日，还在蛟河等地轰炸与进攻。因此，这次暂时停战，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并叶剑英、罗瑞卿的电报》（1946年6月3日）。

在国民党方面是为了等待援军，巩固占领的阵地，修复道路，夺取被我解放的诸城市，镇压滇军的反内战起义。我们希望和平，我们一再提出和平民主的要求，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他们想以武力消灭人民力量，我们不得不自卫。但战争打下去对人民不利，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任何时候都主张实现和平。

翌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提出，东北民主联军退出哈尔滨、安东（今丹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等地，由国民党军进驻。周恩来复函予以反驳，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

在东北停战协议已到时限之际，中共政协代表，于6月21日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陈蒋介石，提出东北长期停战的四项建议：“（1）由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2）停战令下后由三人会议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并首先修复重要铁路。（3）由三人会议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并立即付诸实施。（4）由政府经协商定期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及各项政治问题。”^①

为继续谈判，双方商定，宣布东北停战延长8天，至6月30日止。然而延长停战期满以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整军谈判仍无结果，实际上东北停战延续了4个月。

第四节 关内各解放区军民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

一、关内各解放区开展反蚕食斗争

在关内，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蚕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一方面积极维护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由中共代表通过与美、蒋谈判揭露其阴谋，制止其向解放区

^①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5页。

的进攻和蚕食，尽量争取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那怕是时间很短也对人民有利；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军民联防自卫与控制机动兵力于适当位置视机反击相结合的办法，给进犯者以坚决打击。为此，中共中央向各大区多次发出指示。194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的方针问题向各大军区作了如下指示：“我对停战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向对方作任何军事进攻；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但必须提高警惕性，防止对方突然袭击。坚持自卫原则，坚决打击破坏和平向我进攻之敌。”凡停战令生效以后对方侵占我之地方，“应据理抗议，应先礼而后兵，要求迅速撤还，否则我必驱逐出境。”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指出：（1）如不歼灭进攻和蚕食的顽伪军，收复1月13日以后的失地，反动派的蚕食阴谋是决不会自动停止的，伪军亦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下动摇分化与瓦解，我解放区边缘地带的群众难以迅速发展起来，减租减息即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提高，边缘地带不易巩固，解放区将日益缩小。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采取积极的防御，寸步不让，坚持保卫解放区，给进攻者以打击，并配合停战小组的调处，反动派的蚕食可以打退与停止。（2）为反对蚕食，确保边缘地带民众的利益，应动员群众自卫联防，实行村、区联防，边缘区戒严，封锁消息，组织各种群众性侦察、通信联络，一村遇袭，各村支援，发扬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互助精神。选择要地构筑防御工事，备好粮水弹药，据守待援，掩护主力部队歼敌。（3）积极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一般的伪军官兵，采取宽大政策，保护其生命财产；对罪大恶极、坚持与人民为敌的份子严厉打击，公审处决；对改恶从善者不咎既往，予以自新之路；对俘虏与投诚者分别给予优待。5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对于蒋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或在其他适当地区采取某些报复行动，但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在外交上预先有充分的准备。中共中央上述指

示表明，在反蚕食斗争中，军事斗争必须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在政治上配合停战小组的调处，开展充分说理的斗争，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在军事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给进攻者以打击，以保卫解放区的安全。

（一）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反蚕食斗争

国民党军在停战以后，除令正规军侵占解放区边缘地带以外，还使用收编的伪军、地方团队进行蚕食与袭击。1946年1月至4月，对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达927次，每日平均近8次，其中万人以上的4次，千人以上的40次，百人以上的达112次，总兵力达5万人。同时在冀南、晋南地区周围修筑碉堡2104座。晋冀鲁豫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除将主力部队大部集结于机动位置进行训练与战备以外，以部分主力与地方武装广泛开展了反蚕食、反袭击的斗争。

1月14日，即停战令生效的第2天，国民党郑州绥署第90军3000余人，袭占豫北孟县，晋冀鲁豫军区坚决实施反击，重创其1个团后，国民党军被迫撤退。19日，阎锡山部第13集团军司令官王靖国部又以3个师进犯晋南侯马。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于22日进行反击，一举歼其1个师，俘师长以下3000余人。军调部临汾执行小组迫使王靖国停止进攻，与陈赓订立晋南停战协定。2月，阎锡山背信弃义，又令第7集团军司令官赵承绶亲率第62师等共8个师，并纠集日军第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少将）及伪军段烈昌部（原伪军第12集团军副司令）共计25000余人，自4日起沿白晋路南犯。先后攻占子洪口侯家庄、南坪、吴镇及沁县等地，企图巩固沁县，俟机南进。26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致电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呼吁迅速有效的制止山西阎锡山部和日伪军的大举进犯，监督其回复1月13日24时前之位置。电报指出：阎氏利用大量日伪军守备铁路沿线，并在临汾、大同停战协议方成，即沿同蒲路南北两段集结重兵于白晋线，执行全面进攻上党区的作战计划，

实属违背停战协定的行径。28日，刘伯承司令员接见军调部平汉执行小组美国代表柯尔时称：“我们对于三人小组委员会一切命令是忠实执行的，停战命令是一个基本的命令，双方尤应信守勿渝。但是国民党内少数主战阴谋分子，想制造冲突，继续挑动内战，致使障碍丛生。”

3月，阎锡山一意孤行，又令第38师、第42师、第33师、第44师、第36师、第62师、工兵师及日军第14旅团以保护铁路为名，向白晋路南段两侧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太岳军区、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奉命实施白晋战役，打击南犯之国民党军。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在人烟稀少、供给困难的山区和大雪严寒的条件下，对依托交通线和装备优势的敌人作战。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战斗，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切断了白晋线，给进攻者以沉重打击。23日，军调部执行小组到达来远，对此次军事冲突，进行调处。经过谈判，决定立即休战，双方互派联络官进行监督，战役遂告结束。

在山西的同蒲路南段，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6日至3月7日，阎部向解放区进攻达30余次，使用兵力7420余人，使当地驻军阵亡营长以下指战员13人，负伤86人。在平汉线，2月14日，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由洛阳飞抵安阳，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剿共”，实行所谓“外干中强”的谋略，即指使伪军为进攻的先锋，国民党军继后，从而达到分割和缩小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目的，希图掀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军令伪军驻安阳李英部2000余人，以各种方式潜入解放区边缘地带，进行袭扰、破坏，暗杀当地干部与群众36人，仅2月份伪军进攻10余次，给解放区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当地军民的坚决反击，2月5日，国共双方签订豫北停战协定，议定开辟新乡、焦作重要通道，以供煤炭货物正常运输。

为了加强晋冀鲁豫区的反蚕食斗争，3月22日，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就时局与任务问题指示各部队：加强思想动员，反对麻

痹和右倾思想的滋长，强调增强斗争观念，提高斗争勇气。4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关于提高警惕，严防反动派新进攻的命令》，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对我解放区作不断的袭击与蚕食，布置特务内奸与暴动，准备作更大的进攻；国民党军常以奔袭手段，袭击边地疏于戒备的小部队，如3月31日，顽伪1700余人消灭我封邱大队及打击我增援部队，4月4日，国民党军3300余人分路合击孟县西北乌寨的驻军，均使解放区军民遭严重的损失。指示还要求各地区各纵队应大力加强侦察工作，在边缘地带组织联防，以灵活的战术打击来犯之敌。

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55师、第68师各一部，连同河南省保安团队共2万余人，向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东睢县、杞县、太康等为中心的水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水东军区部队英勇地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自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10余次战斗中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5月15日，国民党军第38军副军长孔从周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率第55师在河南巩县毅然起义，开赴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与1945年7月起义的第17师等部一道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任军长，张邦英任政治委员。为了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冀鲁豫和冀南地区部队，对蚕食进犯之敌奋起反击。5月23日，解放山东东明、平阴两城。东明守军杜淑率部3000余人投诚。接着乘胜对永年、聊城等地国民党军予严重打击。在晋南地区，第4纵队先后解放了闻喜、绛县两城，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驻守晋南地区的阎锡山部3个保安团与特务团，举行反内战起义，该部改编为汾南人民自救军。

在晋绥解放区，1946年1月14日，国民党军第12战区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侵占绥远省重镇集宁。16日，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对进犯之国民党军发起反击，次日收复集宁，歼国民党军1200余人。晋北地区，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置停战协定于不顾，指使其第19、第43军等部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为制止国民党军的进犯，切断太原、大同间国民党军联系，于6月中旬以晋绥军区独立第2、第4旅和晋察冀军区第11旅等部，对国民党军发起反击。至7月初，先后攻占朔县、繁峙、山阴等城，歼国民党军数百人，并控制铁路一段，打击了阎锡山部的进攻气焰。

为使反蚕食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自卫还击作战的同时，晋绥和晋冀鲁豫军区还及时揭露国民党军违约进攻真象。6月13日，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就阎锡山继续调遣军队并勾结日伪军大举进犯晋中平川解放区发表声明。指出：“阎日伪联军于‘扫荡’蚕食我清源、太原、徐沟解放区后，继续由南北两面向晋中平川增调军队，自本月6日起，复向我文水、交城解放区大举进攻”；阎锡山动员的兵力番号，计有阎军第71、第49、第44、第46、第37师各一部共5个团和由伪军改编之1个纵队及日军数百人，占领我村镇20余处；阎军第70师连日向我汾阳城西解放区猛攻，并对我军施放毒气；自停战命令迄今，阎军从未停止向我解放区进攻、出扰、打劫，我方曾屡次提出警告，并致电太原执行小组和北平执行部予以制止，迄无效果。声明警告阎锡山部：“我方容忍已至最大限度，如果还不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所有侵占地区，我方为保护边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土地之安全，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并防止内战继续扩大起见，定将坚决实行反击。”6月18日，阎锡山部及伪军段炳昌部在武乡制造了“青修惨案”，拘捕青修群众、民兵220人，惨杀民兵干部29人，晋冀鲁豫军区及时揭露了事件真象，激起了太行全区军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控诉国民党军队勾结日伪军违令进攻和残害人民的罪行。这就从政治上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使其更加孤立，也使全区军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挑起内战的真实面目，从而丢掉幻想，提高警惕，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二）晋察冀解放区的反蚕食斗争

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大规模的进攻虽有所收敛，但对解放区边缘地带的蚕食与进犯却有增无减。

在热河方面，国民党军冀东绥靖区第94军第5师由冀东调往热河，2月25日，突然向承德与平泉之间的大石桥、盆窑沟解放区阵地发动进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即令冀东纵队（第12、第13、第14旅）、热河纵队（第1、第2、第3旅）、热辽纵队（第22、第27、第30旅、混成旅）歼灭来犯之第5师。27日，冀东、热辽纵队全线破击平泉至朝阳间的铁路，以第14旅在承德、平泉之间扼守阵地；以第12旅及第2、第3、第27旅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并将其四面包围。经过3天激战，歼国民党军1300余人。30日，各纵队正部署全歼残敌之际，军调部承德小组到达战场，在美蒋代表的袒护下，国民党军第5师侥幸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狼狈撤回平泉城。

5月中旬，国民党军驻热河的部队不断向热河解放区挑衅与进犯。5月14日，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军违背停战协定，大规模调动军队向热河解放区发动进攻。为反击进犯之国民党军，5月12日，冀热辽军区发起辽西、热东破击战。以冀东军区部队和辽西支队等地方武装，破袭山海关至锦州段的铁路，以热河军区独立第1旅、第2旅及热中、热辽、热东各军分区部队，向赤峰至叶柏寿铁路南段及凌源至义县间铁路线出击；以第1纵队和热河军区独立第3旅，向平泉至八里罕甸子一线出击。到19日，在辽西地区，摧毁了山海关至锦州一段铁路的大部桥梁，占领了小松岭、沙河、石河桥、高岭等车站与据点，使北宁铁路一度中断。在热河东部，热河军区部队控制了赤峰至叶柏寿间铁路130公里，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第162团以及炮兵营2个连，使热东铁路和公路交通陷于瘫痪，迟滞了国民党军向东北地区的增援，打击了热辽地区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冀中和冀晋地区，由于地处华北中心，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和铁路运输大动脉，故国民党军对冀中、冀晋

地区的进攻和蚕食十分频繁，1946年1月至6月，对冀晋解放区进攻达749次；对冀中平原的进攻更是有增无减，先后侵占冀中解放区县城11座，村镇2000余个。其进攻规模也逐渐扩大，3月以前，国民党军主要是利用伪军、还乡团、义勇队等地主土匪武装，向解放区边缘进犯骚扰；4月以后，就以正规军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和蚕食，并摧毁解放区基层的民主政府，建立保甲联座，组织反动武装，向农民反攻倒算，使解放区边缘民众遭受巨大损失。

冀中军区和冀晋军区为加强反蚕食斗争，在解放区边缘地带，实行军政一元化领导，以武装力量为主，各种斗争方式相结合，向国民党军展开“合力斗争”。即从野战部队抽调部分骨干加强地方主力部队，协同县区武装与民兵向蚕食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有力反击；对伪军及地方匪特，实行宽大与镇压、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政策，给进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反蚕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位于冀南津浦路沿线的伪军徐春霖部，被国民党收编以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作恶多端，曾于1945年秋在运河掘堤放水，使青县、沧县、交河三县顿成泽国；1946年春，又几次扒堤放水，使交河7万亩麦田变成汪洋，广大农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5月初徐部又袭击交河县保安中队，将俘获60余人尽皆枪毙，尸体投入运河。为讨伐该部，冀中军区2个团和回民支队在山东渤海军区部队的配合下，于5月5日对徐春霖部实施反击，经过激战，歼其1100余人，解放了泊镇、冯口及其周围地区，使冀中与渤海解放区联成一片。当冀中军区部队进入泊镇、冯口时，军调部执行小组也前往调查，美蒋代表目睹群众受害的惨状和对徐匪罪行的悲愤控诉，狼狈不堪，只好承认罪恶的现实。

5月中旬，国民党第16、第94、第92军各一部近万人，又向冀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和蚕食。一路向永定河以北进犯，一路约5000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津西重镇胜芳进犯。25日，进攻的国民党军向胜芳阵地打炮千余发，进攻10多次，均被冀中

军区第14旅第38团和第10军分区第75团击退。当晚，第38团等部实施反击，歼敌600余人。26日至29日，国民党军又数次冲击，均被挫败。为保卫胜芳，冀中军区于27日着调第11旅由高阳驰援胜芳。此时，国民党军2个团由得胜口向信安镇、王庄子迂回，企图占领胜芳外围大清河北堤，实施对胜芳的包围，并切断胜芳守军与后方的联系。冀中军区第38团等部在王庄子设伏，给上述迂回之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迫其慌乱溃退。并乘胜占领信安镇后，向冯家柳国民党军指挥所进击。国民党军慑于被歼，于30日被迫撤回平津铁路沿线。在9昼夜的胜芳保卫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5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大批武器，给蚕食进犯之国民党军以有力打击，冀中军区参战部队受到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晋察冀军区在反蚕食斗争中，由于党政军齐心协力，一齐动手，有力地遏止了国民党军的蚕食行动。这一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和平谈判，且保卫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安全。特别是胜芳保卫战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冀中、冀东解放区的进犯。

（三）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反蚕食斗争

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华东地区国民党军总兵力为17个正规军47个师，但在停战后的半年中，又陆续增加了第65、第99、第5、第73、第88、第54军等6个军约10万人。这样，国民党军在华东解放区周围总兵力已达23个军63个师约52万余人，并设立了徐州绥靖公署及第1绥靖司令部（南通）、第2绥靖司令部（济南）和第3绥靖司令部（贾汪）。国民党军为了扩大其占领区和进攻基地，有计划逐步地对华东解放区进行蚕食袭扰。据统计，自停战令生效至6月底，国民党军向山东、华中解放区的蚕食达977次，出动兵力78万人次，侵占村庄、城镇400余个，杀害民众万余人。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甚至在高密、枣庄、德州等地殴打停战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代表。中共华东局和

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十分警觉地注视着国民党军的蚕食行动，在争取时间进行整编、复员、练兵与开展形势教育的同时，坚持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政治上给予充分揭露，在军事上予以坚决回击。

2月2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执行小组美国代表雷克抵山东临沂，会晤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陈司令员表示：“有话当面说，背后无文章，执行停战，决无问题，但须公平”。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违约进攻、蚕食、袭扰解放区的种种罪行。9日，军调部德州执行小组与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会商，签订德州地区临时停战协定。14日，济南执行小组三方达成全省停止军事冲突五项协议。3月2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与国民党方面王耀武（绥区司令官）、何思源（省主席），中共方面陈毅、叶飞、黎玉等会谈，听取了停战情况的汇报。中共代表又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破坏停战的阴谋。

4月11日，济南国民党第2绥靖区第12军2个团约2000余人，违背停战协议，向济南以南兴隆庄、大涧沟与中宫一线进攻，13日占领上述地区，并修筑工事，大肆掠夺。为反击国民党军违约进犯，山东军区第1师主力，在历城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18日将国民党军击退；渤海军区警备第7旅一部于17日攻击济南以东明水之国民党军，激战3夜，占领该地；鲁中军区警卫团攻占明水以西龙山镇，歼国民党军400余人。18日，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分赴中宫、龙山等地视察，国民党代表提出以所占之大涧沟换回明水、龙山车站，要山东军区放回俘虏，交还武器，谈判未获结果。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在答记者问时，就山东与华中地区双方停战情况问题作答时揭露了国民党军多次违约进攻的行径，从而在反蚕食斗争中，使山东解放区军民保持了政治上的主动。

5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山东军区，对敌人的进攻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采取惩罚行动。指出：国民党军“清

剿”淮南路西解放区，军调处执行部不派小组调查，如不给予报复，即不能阻止敌人之进攻；你们立即准备破坏津浦路或打下六合、沱河或其他地点，以迫使执行小组前来调处，停止国民党军对定远地区的进攻，退出侵占地区；对山东枣庄伪军的进攻，也可向执行部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伪军，否则即打击之；对国民党军的违约进攻要向北平执行部和淮阴、济南执行小组及时发出照会，说明国民党军违约进攻情况、解放区方面的损失，请求调处；对方如不退还侵占区，你们即采取报复，并由对方承担全部责任；如执行小组前来调处，条件是“彼停我停”，“彼退我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及时指示所属部队：要以积极防御的姿态，作长期的反蚕食斗争准备，加强对边缘区的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进行合法斗争；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作好敌军的瓦解工作，使反蚕食斗争多样化，深刻化。

山东伪军是日寇残害人民的帮凶。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收编加委，非但没有认罪自责，反而效忠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其中除被山东军民消灭一部外，尚有5万人左右盘踞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充当国民党军发动内战的马前卒。停战协定签订后，这些日伪军不断违反停战协议，屡次进犯解放区，使山东地区军事冲突日益扩大。

山东军区为制止伪军的进犯，决心集中兵力发起讨逆战役，以讨伐人民深切痛恨的伪逆军。战役任务的区分是：以胶东军区主力歼灭盘踞在胶济线东段之高密、胶县地区之敌；以鲁中军区主力歼灭胶济路中段周村、张店（现淄博市）地区之敌；以渤海军区主力在晋冀鲁豫军区第11军分区部队的协同下，歼灭津浦线北段德州地区之敌；以鲁南军区部队配合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歼灭枣庄与泰安地区之敌，其中第1纵队攻占泰安，鲁南军区部队夺取

枣庄；得手后视情况机动作战。^①

讨逆战役于6月7日开始，先后经历了胶、高地区作战，张店、周村地区作战，泰安地区作战，枣庄作战和德州作战。

在胶县、高密地区，计有汉奸赵保元部，被国民党军第2绥区收编为第96军暂编第12师；伪国民自卫军张步云、赵步离部约2个团，以及伪军蔡缙康、李德元部，总兵力约15000人。6月8日，上述伪军向胶县以西莫家庄至山庄一线人民军队阵地发动进攻。胶东军区部队在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当晚攻克胶县城外大部据点，一部突入城内，一部攻占南桑、藐西2车站。激战至9日，全歼胶县地区之敌2700余人，击毙少将师长赵保元，少将参谋长牟俊峰以及蔡缙康、李德元部全部解除武装。胶东军区部队乘胜进击，13日攻占高密城，全歼伪军张步云、王豫民部2个团。由于胶县、高密相继解放，位于即墨之暂12师一部，闻风丧胆，无力抵抗，16日下午，弃城而逃，在城南被胶东军区部队歼其一部，并收复即墨。此次战斗，前后共歼灭伪军万余人。6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部在青岛登陆，宣布青岛美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联防，直接出兵守城。美蒋合流反共，昭然若揭。

在胶济线中段的张店、周村地区，系原伪军第3方面军第6军张景月、周胜芳、王砚田等部共9000余人驻守，被收编为第2绥区保安第2师及国民党军第12军新编第36师。山东军区鲁中、渤海军区部队共5个旅13个团，在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指挥下，于6月7日至8日对上述地区之伪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歼灭伪军8000余人，俘虏少将指挥官刘宗彦，张店、周村遂告光复。

泰安地区伪军宁春霖部，有3个团又1个特务营，共4000余人。该部原系伪第3方面军的旧部。日寇投降后，由安徽开赴泰安，不断配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及鲁

^① 参见《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反顽作战命令》（1946年6月6日）。

南军区地方武装，在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的指挥下，于7日晚发起攻击，在人民军队猛烈的攻势下，宁春霖部纷纷瓦解，连同城北铁路沿线张夏、固山之敌大部被歼，仅宁春霖率残部400余人逃遁。10日，第1纵队等部进驻泰安。在此次战斗中，第1纵队第1旅参谋长邱玉权光荣牺牲。

位于泰安以南的枣庄矿区伪军王继美部，原为伪保安大队，被国民党收编为枣庄矿区守备队，共4000余人。该部在停战以后，对解放区屡犯不止，反动气焰十分嚣张。8日，山东军区当地驻军政治委员曾勉为揭露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送泰安停战执行小组备忘录一份，敦请执行小组前往查处。伪逆王继美执迷不悟，遂即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并在战斗中穷凶极恶地施放毒气，致使若干人中毒，一位营长牺牲。10日，停战执行小组到此调查，国民党军代表拒不出席谈判，山东军区出于自卫，以鲁南地区的第7、第8师、第2纵队及鲁南军区地方武装共计20个团的兵力，在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指挥下，于6月9日至10日坚决予以还击，全歼伪军3300余人，王继美被击毙。

猬集于津浦、德石路交汇处的鲁北重镇德州地区伪军，是伪山东省长杨毓洵部和伪治安军王继祥部，总计5000余人。该部被国民党收编为山东“先遣军”和“绥靖军”。停战以后，该部不断向解放区出犯、袭扰，扩大地盘，杀害解放区干部与群众400余人，罪行累累。山东军区的渤海军区及晋冀鲁豫军区第11军分区部队，在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治委员景晓村的统一指挥下，于7日晚向德州之伪军发起反击。是日，攻占飞机场与辛庄等要点，翌日攻占德州铁桥和部分工业区。伪军顽抗不支，焚烧民房，烧毁大批房舍，军民死伤甚重。渤海军区参战部队一面救火，保护群众；一面与伪军开展激烈巷战，至10日，全歼伪军5000余人，中将司令官王继祥缴械投降，德州解放。

讨逆战役于6月16日结束。山东军区参战部队共毙、伤、俘伪军3万余人，攻克了长期在人民军队围困下的泰安、枣庄、德

州、张店、胶县等重要城镇及大小据点 30 余处；控制了胶济线东段（城阳至太保庄）100 余公里，西段（谭家坊子至郭店）150 公里；津浦线北段（晏城至砖河）150 公里，南段（崮山至徐州以北之韩庄）250 公里的路段；沟通了渤海、鲁中、胶东三区的联系，从而使山东国民党军孤悬于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等战略要点，削弱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力量。

在华中地区，国民党军凭借其优势兵力，于停战令公布后频频向华中解放区蚕食袭扰。首先，令第 49 军侵占苏北南通观音山等地。4 至 5 月，国民党军第 88 军攻占淮北解放区萧县和夏邑；第 7 军、第 48 军进攻淮南解放区，侵占津浦路西定远等重要城镇 25 处。4 月 16 日，华中军区部队进行反击，歼其 1000 余人。6 月 18 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发表谈话，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蚕食袭扰华中解放区真象，他说：目前华中形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军在皖南、淮北、苏中、苏北各地部署 20 余师准备进攻，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4 个月来进犯达数百次，侵占华中解放区重要城镇数十座，人民损失难以数计；5 月以来，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等先后来往于徐州、扬州、南通之间，调兵遣将，部署进攻。张鼎丞严正表示：“我们正式警告那批反动分子好战分子，你们决心破坏和平民主的华中解放区，我们也一定要坚决保卫华中解放区。你们从那里进攻，我们就从那里进行坚决的自卫反击。”

此外，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在派出干部参加徐州、济南、淮阴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的工作中，与小组中的美蒋代表也进行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军违约向华东解放区进行蚕食、侵犯的种种罪行，伸张了山东、华中军民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性。

二、中原地区的谈判斗争

中原解放区，位于鄂、豫、皖、湘、赣 5 省交界的地区，范围达 60 余县。该区是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新四军第 5 师、河南军区部队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由新四军第 5 师、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拥有

兵力6万余人。由于该地区位居华中，是国民党军自西南大后方陆路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枢纽地带，故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与障碍。因此，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在郑州设立绥靖公署，调集整编第3、第15、第47、第41、第48、第66、第11、第72、第75、第26师共10个整编师22个旅20余万兵力，在解放区周围构筑碉堡6000座以上，并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先后侵占鄂中、鄂东、鄂南、襄西、襄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企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解除对武汉地区的军事威胁，控制平汉路，打通向华东、华北与东北进军的通道。中原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的蚕食进犯奋起反击，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但由于兵力悬殊，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194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停战命令公布后，斗争形势将更复杂，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瓦解对方的内战意谋；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的原则，防止与打击对方的突然袭击。”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郑位三：“（1）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周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的环境，国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2）如果你们只能养活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但留的部队仍须准备在国民党军袭击下进行游击战争。”

停战命令公布后，随着国民党军不断向中原解放区进犯，解放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于1月23日特派第9执行小组抵达汉口，制止中原战争。经过调处，由国民党代表宋

瑞珂（第66军军长）、中共方面代表王震（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及美国代表福尔德在河南罗山县就中原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签订了“罗山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但是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并未停止，特别是对平汉路西面的进攻更为激烈。2月3日，军调部武汉执行小组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在吕王城又一次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并取得国民党军当地驻军的同意。3月5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飞抵汉口，就中原日益加剧的军事冲突听取汇报与视察调处。但国民党军仍然拒不执行停战协定，对军事三人小组、军调部执行小组的调处也阳奉阴违。3月中旬，驻鄂北应山县之国民党第66军第13师连续南犯，先后侵占中原解放区应山以南之张杨店、刘家店、陈家店、吉羊山、闵家冲等地。3月28日，汉口第9执行小组特赴应山调处，并签订“应山协议”，双方停战。

4月，国民党军20多万重兵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并于花园、潢川、商城等地设立指挥所，加强作战指挥。第一线部队均已作好全面战斗的准备。并决定5月4日至9日发起总攻，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歼灭。5月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国民党密令“围歼”中原军区李先念部事，在重庆会晤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军令部部长），指出：国民党军包围中原部队准备发起进攻以后发动全国性内战，要加以制止，否则全部责任由国民党方面负。同时电告美国代表马歇尔。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南京，周恩来立即发表谈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全国内战。”5日，中原军区司令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已久的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歼计划，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最近向边缘地区进攻的部队已达7个师；3个多月以来，各种事件的发展，已证明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三大协议的继续，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声明说：他们所以妄图歼灭中原军区部队，主要是为

了尔后便于抽出更多兵力，去进攻其他解放区。我们始终竭诚拥护和平，当我们还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保卫和平与争取生存的时候，我们决不想动用武器；但是，一旦刀枪架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将毫不犹豫的拿起武器来。声明要求国民党当局，要顾全大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军事进攻。但是，国民党军对停战协议拒不执行，对中共方面的屡次警告置若罔闻，却步步为营，继续进攻，将中原军区部队压缩在鄂豫边界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解放区的面积已仅有原先的 1/10。在中共方面的建议与督促下，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于 5 月 5 日自南京飞抵汉口进行调处。8 日，周恩来、白鲁德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等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经视察后，分别向国共双方部队下达停战命令。10 日，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就停止中原军事冲突问题签订《汉口协议》，协议规定：“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凡违反原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但是，国民党军仍不执行“汉口协议”，复于 5 月 13 日发动局部进攻，使中原军区部队处境愈益险恶。

中原地区的斗争情况说明，自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从未放弃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计划，对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执行小组先后达成的“罗山协定”、“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毫无诚意，一意孤行。据统计，自 1946 年 1 月 11 日至 6 月 25 日的停战期间，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达 1000 余次，侵占城市及村镇 1100 余处。其中规模较大的进攻有 200 余次，中原军区部队伤亡、失踪达 4000 余人。国民党军除军事围攻中原军区外，还在经济上严密封锁，使解放区军民生活极度困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正如周恩来 1946 年 5 月 12 日在南京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的：“内战继续不辍，以及政协决议，军调部努力之不能实现，完全是由于国民党中好战分子之破坏与阻挠造成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应付中原地区的严重局势，决定中原

军区部队于适当时机进行战略转移。据此，中原军区从各方面积极准备，一部分老弱人员就地复员，将 800 余名伤病员和妇女工作人员送往晋冀鲁豫解放区，主力部队则准备突破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实行战略转移。

三、华南地区的斗争

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敌后战场之一。华南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坚持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血与火的锻炼，人民武装得到了成长壮大。日本投降时，广东已建立了东江、琼崖、北江、珠江、韩江等游击根据地，同时也建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军等人民武装，总兵力 2 万余人。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为了发动内战，便调集大批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和华南人民武装发动疯狂的进攻，企图消灭华南各解放区以及各游击纵队。1945 年 9 月，正当重庆谈判进行之际，国民党军先后在东江、北江、潮汕、琼崖等地制造了一连串流血事件，迫使华南地区各游击纵队不得不转入分散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广东国民党当局对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置若罔闻，仍然决意消灭分散于广东各地的人民军队。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根据蒋介石旨意，于 1945 年 10 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决定调集新 1 军、第 54、第 63、第 46 军和第 12 集团军一部总计约 7 万人，计划在 2 个月内消灭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南各游击纵队。

华南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党委关于“分散坚持、保存力量”、“进行自卫斗争”的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国民党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西江地区，1946 年 1 月停战协定签订前后，国民党军即以第 131 师和保安第 4 团等部 2000 余人，对活动于桂山地区的人民军队珠江纵队进行“围剿”。珠江纵队在与国民党军兵力相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分兵活动、划区经营，巩固发展”的方针，

避开了国民党军进攻锋芒，以小部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1、2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并使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

在粤中地区，《双十协定》刚一签订，国民党军即以第64军一部和交警大队共3000余人，于1945年10月中旬，分兵6路，向驻守恩平地区之粤中解放区人民武装800余人发动进攻，企图“一网打尽”。粤中区人民军奋起反击，给对方以重大杀伤后突出重围，转入恩平、新兴、云浮、高鹤等边境地区分散活动。

东江地区，是华南游击队主力东江纵队驻守之地，也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1945年11月底，国民党军调集了第30、第38、第50、第36、第154、第253师和保安部队一部总计6万余人，向东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重点指向博罗、增城、龙门、宝安、东莞等地，企图一举摧毁东江纵队的生存基础。

面对东江地区的严重局势，东江纵队在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率领下，采取分散坚持斗争的方针，将东江纵队分散于南雄、翁源、从化、增城、九连山、海陆丰、云浮山、南路区等11个区域，依靠群众，利用地形分散活动，伺机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先后在粤赣边地区、仁化长江圩、南雄白云圩以及黄村、宁山等地，运用袭击、伏击手段，歼灭了小股国民党军，终于打破了国民党军歼灭东江纵队企图，使自己求得了生存和发展。停战协定签订后，东江纵队又根据《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的规定，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政治斗争。1946年1月25日，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争取和敦促下，北平军调部第8小组抵达广州，就东江地区武装冲突进行调处。但张发奎却声称：“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土匪”，强调停战令不包括广东。2月中旬，国民党军以第115、第30、第33师和保安第12团，在海空军配合下，向大鹏半岛发动进攻，并抢占了葵涌、沙渔港、坝岗港、大鹏圩等。2月1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张发奎否认广东有中共部队的谈话和阻挠第8执行小组执行任务

是“违抗军令军纪，破坏停战命令与北平执行部尊严的错误行动”，希望三人委员会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迅速采取必要步骤，纠正广东国民党当局此种错误言行，停止对华南各游击纵队的进攻与污蔑，使停战命令在广东迅速实现，以保障国内和平。3月9日，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抵达重庆，11日，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东江纵队自成立以来，与日寇浴血奋战，战功显赫，受到国内外人士赞扬；现在该部已拥有10余个支队的武装，活动范围遍及广东全境；但广东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否认部队存在，甚至动用大批军队向该部进攻。林平呼吁各界人士主持公道，迫使广东当局执行停战命令。由于中共代表和东江纵队领导人的揭露及说理斗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改变态度，确认东江纵队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

4月2日，军事三人会议代表达成了“广东东江问题协议”，该协议规定：“广东省内之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之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应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同时，“协议”还就登船地点、时间、国民党军撤离登船地区、安全保障、购粮供款等具体事项作了规定。随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8小组与东江纵队代表、广州行营代表就东江纵队北撤进行了商讨。6月30日，东江纵队约2600人在司令员曾生率领下，北撤山东烟台。该纵队留广东的少部分人，除复员者外，就地分散，进行隐蔽斗争。

东江纵队的北撤，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而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消灭广东人民武装的罪恶阴谋，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内和平的诚意。

在海南岛地区，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已发展到拥有5个支队总兵力约7000余人的人民武装，并成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在10多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国民党为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于1945年9月，令第46军（辖第

175、第188师和新编第19师)进驻琼崖,企图消灭琼崖独立纵队。该军进驻琼崖后,以“清剿奸匪”为名,抢修公路,强占战略要点。至1945年底,其第175师控制了澄迈、临高一线;第188师进驻加积、万宁地区;新编第19师占领昌江、感恩一线。从而形成了对琼崖独立纵队的包围。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于2月令第46军和地方保安部队一部共3万余人,分兵三路向白沙解放区发动进攻,矛头直指琼崖独立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挺进支队。

琼崖独立纵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优势敌人面前,采取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的方针,迅速向澄迈六芹山转移。3月,第46军又向六芹山发动进攻,琼崖独立纵队被迫以主力转入外线,与国民党军四处周旋,并“乘敌后方空虚,寻机破敌”,使其进攻计划没有得逞。5月,张发奎亲临琼崖督战,令第46军分成多路,分别向儋县、临高、澄迈、万宁、安定、文昌、琼山、陵水、昌感等地实行“清剿”。琼崖独立纵队则乘其兵力分散之机采取“适当集中兵力,攻歼分散之敌”的战法,以伏击、袭击、拔据点等手段,先后在琼西北新盈港、昌感、文昌、万宁等地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迫其首尾难顾,到处挨打。琼崖独立纵队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抗役抗丁、反清乡、反征粮活动,终于使国民党军的“清剿”流于破产。1946年9月,第46军调往山东战场。琼崖独立纵队又乘其调动之机,多次袭击、伏击敌人,并收复据点多处,从而恢复和扩大了解放区。据统计,琼崖独立纵队在1946年1月至10月的自卫作战中,作战近300多次,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攻克村镇据点40余个,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消灭琼崖独立纵队的阴谋。

第七章 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与方针

1946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肆意破坏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时局的变化适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制定了相应的方针，采取了应变措施。

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中共中央曾估计全国将出现和平民主新阶段。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颁布的停战令中指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月1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说：“国共停战协定，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是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

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由于政协“决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

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还要求各解放区准备将人民军队“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做好整编军队、精兵简政和吸收其他党派人士参加解放区政权工作的各项准备；号召各界人士促使国民党当局履行诺言，遵守协议，力争和平、民主的实现。

同时，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还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中国革命的前进，均将依赖于我们党，善于去组织与指导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和这些工作”；要求人民军队“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保持与提高我们的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并提出了“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

但是，蒋介石集团对签订的三个协议，口是心非，拒不执行，特别是违反停战命令，非法调动百万大军，向各解放区进行蚕食与进攻，使军事冲突日渐升级。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推翻了政协决议后，使国内形势更加恶化，大规模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

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不断逆转极为关注，并对形势的发展做了客观与正确的估计，及时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并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从3月15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先后就时局及对策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阐明了对时局的新估计和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增兵东北，扩大

东北内战，和召开六届二中全会等情况，于3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企图制造新的内战局面，全党全军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并于同日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出：（1）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为了和平，我方代表曾极力向蒋介石、马歇尔提议在东北停战，但蒋、马商议后提出5条，作为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作为派遣小组去东北的先决条件。规定执行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但对东北政治问题及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则没有提及亦不愿讨论。在此条件下，我方当然不能接受，停战小组亦暂不能派出，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2）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除以CC（注：指陈立夫、陈果夫）为主干的少壮派所进行之反苏、反共、反政协运动外，还有以何应钦、白崇禧为首的军人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为此，何、白已电召孙连仲、王耀武、傅作义等到渝，并在全会宣读阎锡山反共电报，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所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3）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何、白军人派之阴谋挑衅，除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提高警觉，密切注意蒋方动态，并在军事上做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4）恢复交通及北平执行部一切合理命令仍应主动照常执行。北平执行部及各地执行小组中我方人员，须加强工作。（5）切实具体地开展统战工作，以分化与争取国民党军，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6）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

成，以减少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 1/3 左右，时间 3 个月左右完成。(7) 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纠正偏向，奖励成绩，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缺点，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即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8) 不论反动派的破坏如何猖獗，甚至再打一个时期的内战，不论全世界、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我们应当有此坚信。在时局估计与党的政策等项问题上，党内过“左”过右偏向，希望随时解释与纠正。

3月18日，即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向各战略区通报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指示》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五条决议，“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此种阴谋必须坚决反对，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章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如国方因我坚持政协决议并利用东北问题实行分裂，发动全国内战，我亦不应惧怕，即是再打内战，我虽可能受些损失，但大势所趋，仍将归于和平，而那时反动派的阴谋必将更加暴露，他们的气焰亦将大为降落，人民再受一次教育，和平、民

主的前途更有保障。”“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同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政协决议，图谋挑起新的内战的行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周恩来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3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目的，是为了置国家民主化事业于死地，置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于死地，是为了进一步满足法西斯分子对于官僚主义官僚资本统治的野心，是为了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对这一阴谋，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人民抱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要粉碎一切法西斯分子的一切反动阴谋，以维护中国的和平民主，维护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

4月1日，蒋介石在为中共代表所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推翻了政协全部决议，并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地位。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驳蒋介石》的社论，揭露了蒋介石报告的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议，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社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的百分之百实现……

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

4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战略区的指示中指出：“蒋表面愿意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得离开队伍。”

4月23日，《新华日报》在《论时局》的社论中回顾了政协会议召开后的国内局势，深刻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图谋发动全国内战的罪恶行径。社论明确指出：“就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反动派已经在进行破坏”，“政协会议闭幕后，法西斯反动派即大举进攻了”。“三月一日起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就更进一步公然用国民党的名义，来破坏政协决议和刚才签订的整军方案。政协决议无一不被破坏，整军方案变成了一兵也不裁的‘复员计划’，暴行发展到新的高度，而且遍于全国”。“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与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四月一日国参会演说，于是一切推翻三大协议的行为都公开成为合法的了，东北大规模的内战爆发起来了。”社论指出，“今天的局面，与一月间完全不同。四月一日蒋介石演说之后，一切协议都被破坏了，中国进入了部分的内战局面。反动派正在把它发展成全国的内战。”“中国人民是在大灾难中，而且面临着可能更大的灾难。”社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以一切努力，停止东北的内战，并严防它发展到关内来。必须要求通盘解决一切政协以来已经发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1946年5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明确提出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练兵的指示，告诫全党全军：“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在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为了力争和平，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就目前局势及对策，向各中央局与中共和谈代表团发出指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现政策除在东北扶蒋及助蒋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都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针对这一情况，《指示》指出，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1）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2）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的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即使对国方代表及国方长官，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3）东北方面，一方面是坚决作战，另一方面，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加以破击，一俟告一段落，即应转入调整。（4）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6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望各地抓紧目前3个月的工作，切勿麻痹松懈。（5）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的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

派。

随着形势的发展，5月21日，中共中央就目前局势的基本方针，又进一步向各地中央局及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作了如下指示：（1）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除在宣传上大造谣言，鼓吹讨伐外，蒋军已向我豫东区及淮北、淮南之铁路西侧地区进攻，并占领冀中安次及其它地区，向我挑战，企图激动我们急忙的大举报复，以便彼方有借口发动全国内战。现在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3个月2个月以至1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2）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这种打击还不能停止顽军进攻，不能使顽军退出侵占我之地区，我在其它适当地区采取某些报复行动是有必要的。但必须有理、有利、有节。（3）对于顽军的进攻，各区必须经过调处执行小组与北平执行部以及三人会议提出抗议，迅速供给充分情报，要求调查与调处。如顽军拒绝调查与调处，或不服从调处，我即应相机提出警告，申明我将采取必要行动，并申明由此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结果，均由顽方负起全责。

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中共中央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曾一度偏于乐观，但并没有陷入对和平民主的幻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估计，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可避免，带领全党全军逐步将注意力转到应付全面内战上来。各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粉碎国民党军蚕食、进攻的同时，从各方面认真进行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因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除在个别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外，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的影响。

第二节 全面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力量。当国民党肆意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并积极准备发动全国内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带领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蚕食、进攻的同时，从精简整编入手，着眼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人民军队各方面的建设，并将其作为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一项根本措施。

一、部队精简整编

1945年秋，全军开始实行战略转变以后，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起了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机关庞大、重叠，编制不尽合理，非战斗人员增多，老弱人员和伤残人员不少，使机关和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比例失调，有的单位的战斗人员不及全体人员的一半，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负担，使得本已比较困难的财政经济情况更加困难，财政赤字增加，引起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军队的生活改善，不利于支持长期战争。为此，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兵贵精不贵多”，强调：“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须重新调整，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材的训练。”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战略区作好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的精神准备，待命实施。2月25日，国共双方整军方案签字以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首先执行整军方案，进行缩编复员。3月6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晋察冀、晋绥军区领导人的指示中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要求他们准

备在3个月内精简现有兵员的1/3。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精简整编的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相继召开了复员整编会议，制定了详细的精简整编计划，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精简整编取得很大进展。只是由于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整军方案的实施被迫中断。1946年3月至6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共复员、转业23.3万余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动员了一部分青年农民参军入伍。在此基础上，各战略区对部队的编制序列进行了调整。各战略区精简整编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整编后的序列是：

（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王世泰任代司令员，习仲勋任代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区、警备第3旅兼陇东警备区、新编第11旅兼三边警备区、绥德警备区。

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部队由原5个团缩编为第1、第2团。第1团由原第1团与回民支队合编组成，第2团由原第9团、第34团和骑兵团合编组成。

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部队由原3个团缩编为第771、第16团。第771团由原第771团与第25团的1个营合编组成，第16团由原第16团与第25团主力合编组成。

警备第3旅与第385旅合编为警备第3旅，并兼陇东警备区，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合邦，部队由原5个团缩编为第5、第7、第8团。第5团由原第385旅之第4、第5团合编组成，第7团由原警备第3旅第7、第9团合编组成，第8团由原警备第3旅第8团和三边保安团合编组成。

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区，旅长兼政治委员高锦纯，部队由原3个团缩编为第1、第2团。第1团由原第1、第2团合编组成，

第2团由原第3团与旅直5个连合编组成。

新编第11旅兼三边警备区，旅长曹义参，政治委员高峰，所辖部队不变。

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峰，政治委员自治民。

同时，将原三边骑兵团改编为联防军直属骑兵营，原联防军炮兵营由1个连扩大为3个连。整编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约2.8万人。

（二）晋绥军区

晋绥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续范亭、周士第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任副主任。下辖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和第1军分区。

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辖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魏怀礼；第8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9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独立第4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原第4、第7、第10军分区撤销。

雁门军区，司令员张经武，政治委员朱明。辖第2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傅子和；第5军分区，司令员王赤军，政治委员李登瀛；第6军分区，司令员唐子奇，政治委员梁仁芥。

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治委员高克林。辖第11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张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

晋绥军区直属第1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

晋绥野战军，贺龙兼司令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兼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许光达任代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冼恒汉兼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独立第2旅，旅长许光达（兼），政治委员孙志远（兼）；独立第3旅，

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

1946年6月，为应付国民党军的进攻，组成了晋北野战军，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绍南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副主任，统一指挥在晋北地区的部队。

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共5万余人。

（三）晋冀鲁豫军区

晋冀鲁豫军区仍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分别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分别任第一、第二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2、第4纵队，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各部队的序列是：

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辖第4旅，旅长孔庆德，政治委员刘明辉；第5旅，旅长雷绍康，政治委员寇庆延；第6旅，旅长王天祥，政治委员刘华清。

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旅，旅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忠（兼）；第11旅，旅长李成芳，政治委员刘有光（兼）；第13旅，旅长陈康，政治委员廖冠贤。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霖芝、张玺。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申云甫；第2军分区，司令员张刚剑，政治委员万里；第3军分区，司令员郭影秋，政治委员郝中士；第4军分区，司令员李静宜，政治委员赵紫阳；第5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政治委员刘星；第6军分区，司令员金绍山，政治委员袁振。1946年1月，以第29团、第2军分区独立团组成独立旅，旅长马宗凯。

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辖独立第4旅，旅长孙仁道，政治委员杨树根；第1军分区，司令员白云，政治委员许梦侠；第2军分区，司令员李定灼，政治委员赵一民；第3军分区，司令员张维翰，政治委员李福祥；第4军分区，司令员

王蕴瑞，政治委员乔晓光；第5军分区，司令员刘福胜，政治委员陈登昆。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将原太岳军区第23旅拨归其建制，旅长贾定基，政治委员车敏瞧；第1军分区，司令员胡震，政治委员冷楚；原第2、第3军分区合并称第2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刘建勋；原第4、第5军分区合并称第3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政治委员陶鲁笳；原第6军分区改称第4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兼），政治委员刘毅。

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治委员王鹤峰。辖第24旅，旅长刘金轩，政治委员李耀；第1军分区，司令员刘聚奎，政治委员刘植岩；第2军分区，司令员张祖谅，政治委员刘尚志；第3军分区，司令员王墉，政治委员柴泽民；第4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政治委员薛迅。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下辖第1军，军长范龙章。辖第1师，师长阎济民，政治委员张杰轩；第2师，师长田树青，政治委员苏俊山。第2军，军长乔明礼。辖第4师，师长商正夏；第5师，师长聂志超。

1946年9月，将第17师和于1946年5月在河南巩县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55师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孔从洲，政治委员汪锋。辖第17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梁励生；第55师，师长杨健，政治委员薛涛。

1946年6月成立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张际春兼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下辖第3、第6、第7纵队。

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辖第7旅，旅长赵兰田，政治委员曾庆梅；第8旅，旅长马忠全，政治委员卢南樵；第9旅，旅长郑国仲，政治委员秦传厚。

第6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兼），政治委员段君毅。辖第16旅，旅长韦杰（兼），政治委员张国传；第17旅，旅长石志本，政治

委员何柱成；第18旅，旅长肖永银，政治委员李震。

第7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辖第19旅，旅长吴大明，政治委员谢富林；第20旅，旅长匡斌，政治委员石新安；第21旅，旅长况玉纯，政治委员刘振国。

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部队共27万余人。

（四）新四军兼山东军区

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1945年12月3日指示精神，正式兼山东军区，并组成山东野战军。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由陈毅任军长兼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第一副军长兼第一副司令员，罗炳辉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二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副主任。至1946年6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下辖独立旅和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各部队的序列是：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兼），政治委员唐亮（兼）。辖第2军分区，司令员王建青，政治委员谷牧；第3军分区，司令员王德贵，政治委员田海山；4月，原警备第10、第11旅合编为警备旅，旅长覃士冕，政治委员刘伟。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于得水，政治委员梁辑卿；第2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政治委员刘仲华；第3军分区，司令员陈华堂，政治委员李华；第4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滨北军分区，司令员黎有章，政治委员张彦。6月，原警备第5旅改称第5师，师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原警备第4旅改称第6师，师长刘涌，政治委员仲曦东。

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治委员景晓村。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治委员李广文；第2军分区兼警备第6旅，司令员李发，政治委员曾旭清；第3军分区兼警备第7旅，司令员赵寄舟；第4军分区，司令员程绪润，政治委员岳拙元；7月，以

特务第1、第2团和警7旅第13团组成第7师，师长袁也烈（兼），政治委员李曼村。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辖第4师，师长孙继先，政治委员王一平；第9师，师长钱钧，政治委员李耀文；独立第1旅，旅长王道；独立第4旅，旅长韩寿臣；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1旅，司令员陈奇，政治委员林乎加；第2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政治委员王涛；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霍士廉；7月，以山东军区特务团之第2、第3营，鲁中军区警备第7、第3团组成警备旅，旅长周长胜，政治委员陈美藻。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傅秋涛。辖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8旅，司令员贺健，政治委员杨士法；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雄；第3军分区兼警备第9旅，司令员胡大荣，政治委员李青。

山东军区独立旅，旅长张俊升，政治委员王仲良。

7月，长期在华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海运抵达胶东，归山东军区建制，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

山东野战军由陈毅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兼政治部主任，张凯任副主任。下辖第1、第2纵队和第7、第8师。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辖第1旅，旅长廖政国，政治委员阮英平；第2旅，旅长刘飞，政治委员彭林；第3旅，旅长张翼翔，政治委员何克希。

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4旅，旅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高志荣；第9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该纵队第5旅于6月调归淮南军区建制。

第7师，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辖第19旅，旅长熊应堂，政治委员黄火星；第20旅，旅长梁金华，政治委员黄耀南；第21旅，旅长马长炎，政治委员黄先。

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

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第2、第5、第6、第7、第8、第9军分区，淮南军区、淮北军区，苏中军区、苏北军区和海防总队。

第1军分区，司令员段焕竞，政治委员钟民；第2军分区，司令员韦永义，政治委员金柯；第5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治委员曹荻秋；第6军分区，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万众一；第7军分区，司令员张震球，政治委员赖毅；第8军分区，司令员张太生，政治委员吴芝圃；第9军分区于1946年8月组建，司令员梁灵光，政治委员洪泽。

淮南军区兼新四军第2师，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辖第5旅，旅长成钧（兼），政治委员赵启民（兼）；第3军分区兼独立旅，司令员罗占云，政治委员李世炎；第4军分区兼第6旅，司令员陈庆先，政治委员黄岩。

淮北军区由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兼，苏中军区由第7纵队兼，苏北军区由第10纵队兼。海防总队，政治委员吕炳奎。

华中野战军，粟裕兼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刘先胜兼参谋长，钟期光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3月，部队开始整编，将第5军分区各县独立营整编为第82、第84、第86团，将解放第4军缩编为第87、第88、第89团，上述6个团组成第10纵队。5月，将第8、第6纵队分别扩编为第1、第6师。整编后的华中野战军，辖第1、第6师，第7、第9、第10纵队。

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粟裕。辖第1、第3旅。第1旅，旅长张震东，政治委员卢胜，该旅以原第1军分区特务第1、第2团合编为第1团，以原第7纵队第61团改编为第2团，以原第68团改为第3团；第3旅，旅长彭德清，政治委员伍洪祥，该旅以原第64、第66团分别改称第7、第8团，原第70、第72团合编为第9团。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辖第16、第18旅。以原第6纵队主力改编为第16旅，旅长钟国楚，其第46团番号不变，第48、第50团改番号为第47、第48团。以原苏中独立旅改编为第18旅，旅长饶守坤，政治委员刘文学，其第11、第12、第14团分别改番号为第52、第53、第54团。原第6纵队之第52、第54团番号撤销，部队分别编入第16、第18旅。

1946年4月，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以第59、第61团和第2军分区第5团组成第21旅，第63团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第5、第59团，第55、第57团不变。5月，第21旅番号撤销，第61团调归第1师。6月，第57、第5两团调归第10纵队，并改番号为第87、第89团，将第10纵队，之第87、第88、第89团调归第7纵队，并缩编为第57、第61团。整编后，第7纵队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吉洛，辖第55、第57、第59、第61团和特务营。

第9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辖第73、第75、第77、第79、第81团。

第10纵队，司令员谢祥珏，政治委员刘培善，下辖第82、第84、第86、第87、第89团。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共42万人。

（五）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1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将原有的10个军区重新划分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个二级军区，对部队的编制作了部分调整。除原山东第1师、新四军第3师和第359旅外，原山东第7师、刘其人师和冀热辽军区第19旅合编组成第7师，第19旅番号不变，原山东第7师改称第20旅，刘其人师改称第21旅；原龙江军区第1、第2、第3支队分别改编为警备第1、第2、第3旅；原山东第3师、鲁中警备第3旅、冀热辽第16分区第21、第23旅合编为第3纵队，其中第3师改编为第7旅，第21旅改编为第8旅，警备第3旅与23旅合编为第9旅；原第2、第3纵队合编为第4纵队，其中第2纵队之第1、第

2旅改编为第10、第11旅，第3纵队改编为第12旅；东北挺进纵队改编为第7纵队，其第1、第2支队分别改编为第19、第20旅；山东第2师改编为第22旅，并以吉林军区地方武装组成第23、第24旅（5月，第23旅番号撤销，所属3个团分别拨归第22、第24旅）；通化支队改称杨靖宇支队，朝鲜义勇军改编为警备第1旅，原冀鲁豫第21团扩编的第25旅改编为警2旅；同时成立了炮兵旅。6月，调整了民主联军领导人员，并将北满军区撤销，其所属军区归民主联军总部直辖。

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任副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肖劲光兼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副主任，叶季壮任后勤部部长，杨至诚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下辖炮兵旅、第359旅、第1、第3、第7师和西满、南满、东满等3个二级军区以及合江、松江、牡丹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等4个三级军区。各部队的序列是：

炮兵旅，旅长贾陶。

第359旅，旅长刘转连，政治委员晏福生。

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辖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郭成柱；第8旅，旅长张天云，政治委员李雪三；第10旅，旅长钟伟，政治委员王凤梧；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

第7师，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刘其人。辖第19旅，旅长张鹤鸣，政治委员袁克服；第20旅，旅长刘子奇，政治委员孙正；第21旅，旅长王兆相，政治委员陈德。

西满军区，亦称辽热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治委员李富春。下辖嫩江军区，辽吉军区，龙江军区。

嫩江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刘锡五。辖第1军分区，司令员王化一，政治委员吴富善；第2军分区，司令员金钟，政治委员王文；第3军分区，司令员张汉承，政治委员尹士炎；第

4 军分区，司令员沈启贤，政治委员王建中。另辖警备第 1、第 2 旅。

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辖第 1 军分区，司令员田维扬，政治委员孔原；第 2 军分区，司令员赵东寰，政治委员杨易辰；第 3 军分区，司令员于文清，政治委员罗杰；保安第 1 旅兼第 4 军分区，旅长马仁兴，政治委员邓东哲；通鲁联合司令部，司令员高体乾，政治委员傅玉田。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治委员王鹤寿。辖警备第 1 旅，旅长蔡明，政治委员陈雷；警备第 2 旅，旅长张光迪，政治委员徐明；警备第 3 旅，旅长廖仲符，政治委员史梓明。

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华。下辖第 3 纵队、第 4 纵队，辽宁军区，辽南军区和直辖第 2、第 3、第 4 军分区。

第 3 纵队，司令员程世才、张学思，政治委员罗舜初。辖第 7 师，师长曾国华，政治委员李伯秋；第 8 师，师长杨树元，政治委员刘光涛；第 9 师，师长宁贤文，政治委员谭开云，第二政治委员赵正洪。

第 4 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彭嘉庆。辖第 10 师，师长杜光华，政治委员葛燕璋；第 11 师，师长蔡正国，政治委员李丙令；第 12 师，师长江燮元，政治委员潘寿才。

辽宁军区，领导人由第 3 纵队领导人兼任。辖保安第 3 旅兼第 3 军分区，旅长彭龙飞；第 4 军分区，司令员王叙坤，政治委员焦若愚；杨靖宇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刘西元；李红光支队，司令员金明。

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林一山。辖独立师，师长吴瑞林（兼），政治委员林一山（兼）；第 1、第 5 军分区。

南满军区直属第 2 军分区，司令员祝顺鹏，政治委员吕其恩；第 3 军分区，司令员王振祥，政治委员王一伦；第 4 军分区，司令员李弗畏，政治委员罗其南。

东满军区，亦称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陈正人。下辖第 22、第 24 旅、第 7 纵队、延边、吉敦、吉南、吉北军分区。

第 22 旅，旅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第 24 旅，旅长王效明，政治委员袁任远，第二政治委员邓飞。

第 7 纵队，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 19 旅，旅长彭景文，政治委员钟民；第 20 旅，旅长管松涛，政治委员何善远。

延边军分区，政治委员孔原。辖警备第 1 旅，政治委员谢扶民（兼）；吉敦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政治委员袁克服，辖警备第 2 旅，旅长邓克明（兼），政治委员袁克服（兼）；吉南军分区，司令员王效明，政治委员邓飞；吉北军分区，司令员曹里怀，政治委员伍晋南。

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张秀山。辖第 1 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政治委员董浩然；第 2 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政治委员李建平。

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方强。辖第 1 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政治委员陈伯材；第 2 军分区，司令员谭文邦，政治委员吴亮平；第 3 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政治委员王旭；第 4 军分区。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政治委员李大章。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司令员阿思根，政治委员哈丰何。辖骑兵第 1 师，师长王海山；骑兵第 2 师；骑兵第 4 师，师长何自章，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骑兵第 11 旅和骑兵第 4 支队。

东北民主联军共 30 余万人。

（六）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军区部队于 1946 年 3、4 月间进行第一次整编，撤销了野战军指挥机构，原第 1 纵队缩编为 3 个旅 6 个团，第 1 旅第 1 团由原第 7 团和基干团编成，第 2 团由原第 4、第 6 团编成；第 2 旅第 4 团由原第 3、第 10 团编成，第 5 团由原第 12 团和热河独立团主力编成；第 3 旅第 7 团由原第 2、第 20 团编成，第 8 团由

原第 16 团和热河独立团一部编成。

冀察郭天民、刘道生 2 个纵队合编为冀察纵队，辖第 6、第 7、第 8 旅。原第 9、第 10 旅和骑兵旅番号撤销，第 10 旅第 27、第 28 团分别编入第 6 旅第 16、第 17、第 18 团，该旅第 20 团编入第 7 旅第 19、第 21 团；第 9 旅第 25、第 26 团编为第 7 旅第 20 团。原第 8 旅第 29 团编入该旅第 22、第 24 团。第 7 旅第 23 团拨归第 8 旅建制，骑兵旅 3 个团调归冀察军区建制。

冀中杨成武、黄寿发 2 个纵队合编为冀中纵队，下辖第 11、第 12、第 13 旅。原第 1、第 2 旅番号撤销，以教 2 旅第 5 团、原第 2 旅第 81 团和暂 40 团合编为第 11 旅第 31 团，暂 41 团、教 2 旅独立团编入第 32 团，原第 31 团编入第 33 团；原第 12 旅第 36 团和原第 2 旅独立总队编入第 12 旅第 34、第 35 团，原第 1 旅第 73 团编入第 13 旅第 37 团，原第 2 旅第 76 团编入第 13 旅第 38、第 39 团，原第 1 旅旅部及所属第 62、第 71 团编入冀热辽军区。

冀晋陈正湘、赵尔陆 2 个纵队合编为冀晋纵队，下辖第 3、第 4 旅。第 3 旅由原陈正湘纵队第 3 旅第 1、第 10 团和第 1 旅第 3 团组成，第 4 旅建制未变；原第 1 旅旅部及所属第 1、第 2 团与教导师合编为晋察冀军区教导旅，原第 2 旅第 6 团、原第 3 旅第 12 团调归冀晋军区建制，原第 2 旅第 4、第 5 团和冀中第 1 旅组成冀热辽军区独立第 2 旅，赵尔陆纵队第 3 旅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 3 旅。

热辽纵队番号撤销，第 22、第 30 旅合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 1 旅，第 27 旅番号不变。冀东纵队番号撤销，所属第 12、第 13、第 14 旅调归冀东军区建制。

1946 年 5、6 月间，进行第二次整编。冀察纵队第 8 旅番号撤销，所属第 22、第 24 团组成冀察军区独立第 5 旅，第 23 团调归第 6 旅改称第 18 团，原 18 团与第 11 军分区独立团组成独立第 4 旅。

冀中纵队第 11 旅番号撤销，第 31、第 32 团分别调归第 12、

第13旅，旅部及33团和第11军分区第72团、第9军分区第79团组成冀中军区独立第11旅，第13旅第38团和特务团、第9军分区第38、第46团组成独立第14旅，7月，独立第14、第11旅分别改称独立第7、第8旅。

冀晋军区以第6团及第2军分区独立第11团组成独立第1旅，以第12团、第3军分区独立第5团及第4军分区独立第8、9团组成独立第2旅。

冀东军区第12、第14旅主力合编为独立第10旅，第13旅改称独立第11旅；以第14旅一部及第14军分区第16、第53团组成独立第12旅。

冀热辽军区独立第2旅改称独立第13旅，独立第3旅改称独立第14旅；独立第1旅改称独立第16旅，第27旅改称独立第17旅。

7月，冀察纵队改称第2纵队，原第6、第7旅改称第4、第5旅，各团依次改称第10至第15团；冀中纵队改称第3纵队，原第12、第13旅改称第7、第8旅，各团改称第19至第24团；冀晋纵队改为第4纵队，原第3、第4旅改称第10、第11旅，各团依次改称第28至第33团。

整编后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克任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任副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罗瑞卿兼政治部主任，耿飏、曾涌泉任副参谋长，潘自力、蔡树藩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第2、第3、第4纵队和教导旅、炮兵团，以及冀热辽二级军区，冀中、冀晋、冀察、冀东、热河、热辽6个三级军区。各部队的序列是：

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1旅，旅长杨俊生，政治委员邓存伦；第2旅，旅长尹先炳，政治委员戴润生；第3旅，旅长李东潮，政治委员陈云开。

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辖第4旅，旅长肖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第5旅，旅长肖文玖。

第3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辖第7旅，旅长周彪，政治委员漆远溼；第8旅，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王道邦。

第4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辖第10旅，旅长邱蔚，政治委员傅崇碧；第11旅，旅长陈仿仁，政治委员黄文明。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独立第7旅，旅长肖新槐，政治委员马泽迎；独立第8旅，旅长魏洪亮，政治委员帅荣；第8军分区，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陈鹏；第9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政治委员张庆春；第10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治委员旷伏兆；第11军分区，司令员杜文达，政治委员魏震。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辖独立第1旅，旅长曾美，政治委员金行生；独立第2旅，旅长马龙，政治委员齐文俭（兼）；第1军分区，司令员盛治华，政治委员田萍；第2军分区，司令员罗文坊，政治委员丁莱夫；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少甫，政治委员齐文俭。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辖独立第4旅，旅长马辉，政治委员黄连秋；独立第5旅，旅长詹大南，政治委员刘国梁；第4军分区，司令员熊奎，政治委员周小舟；第5军分区，司令员钟辉琨，政治委员马天水；第6军分区，司令员纪亭榭，政治委员杨世杰；第7军分区，司令员陈宗坤，政治委员梁振中。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陈奇涵、黄永胜，副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刘随春。下辖冀东军区、热河军区和热辽军区。

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楚离。辖独立第10旅，旅长袁渊，政治委员徐光华；独立第11旅，旅长肖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独立第12旅，旅长曾雍雅（兼）；第12军分区，司令

员李道之，政治委员刘亦如；第13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政治委员王世煜；第14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政治委员方治平；第15军分区，司令员任昌辉，政治委员杨文翰。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黄火青。辖独立第13旅，旅长周仁杰，政治委员覃国翰；独立第14旅，旅长黄方刚；第16军分区，司令员钟辉，政治委员谢明；第17军分区，司令员吴烈，政治委员刘君达；第18军分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

热辽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吴锡奎。辖独立第16旅，旅长张德发，政治委员黄志勇；独立第17旅，旅长欧致富（兼），政治委员谢堂忠（兼）；第19军分区，司令员欧致富，政治委员谢堂忠；第20军分区，司令员欧阳家祥，政治委员李东冶。

晋察冀军区和野战部队共计约20万人。

（七）中原军区

中原军区仍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1、第2纵队、干部旅和河南、江汉、鄂东3个军区。至1946年6月，部队的序列是：

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辖第1旅，旅长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第2旅，旅长杨秀坤，政治委员刘健挺，第3旅，旅长闵学胜，政治委员张力雄。

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辖第13旅，旅长吴世安，政治委员杨焕民；第15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陈先瑞；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委员张成台、韩东山。

江汉军区，司令员罗厚福，政治委员文敏生。辖独立第1旅，旅长王才贵；襄南军分区，政治委员吴云鹏；襄北军分区，司令员张洪卿，政治委员张谦光；鄂中军分区，司令员蔡松荣，政治委员李人林；洪山军分区，政治委员文敏生。

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辖独立第2旅，旅长吴诚忠，政治委员张体学（兼）。

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林。辖独立第3旅，旅长黄林（兼）；第1军分区，司令员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第2军分区，司令员陈刚；第3军分区，司令员孔令甫，政治委员王其梅；第4军分区，司令员陈润庵，政治委员肖新春；第5军分区，司令员黄林（兼），政治委员栗在山。

中原军区和野战部队共5万余人。

经过整编，截至1946年6月，全军共有野战军24个纵队和相当纵队的师，11个旅和相当于旅的师。地方军划分了34个三级军区，113个军分区（其中11个由独立旅或警备旅兼），51个独立旅（师）或警备旅（其中11个兼军分区），5个骑兵师（旅），同时建立了1个炮兵旅、14个炮兵团、17个炮兵营、38个炮兵连；有的纵队建立了工兵连，东北民主联军还组建了高炮部队和坦克部队。全军整编后总计130余万人，但在整编基本就绪时，华东、华北、晋绥等解放区仍战斗频繁，因此整编后各战略区人数尚有变化，至全面内战爆发前，全军共127万余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军66万人。

二、开展军事练兵运动

随着由抗日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实现，和大量翻身农民参军补入部队，部队的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特别是战、技术水平，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军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对练兵的内容、方法等作了明确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并指示要继续办理军事学校，

“着重技术人材的训练”。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又进一步强调：“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全军各部队普遍开展了“春季练兵”或“百日练兵”运动，这次练兵运动，主要是以政治练兵为主。在军事练兵方面，主要是进行了整顿纪律和军容风纪，加强行政管理，贯彻一日生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正规作风教育，提高部队的正规化水平，并进行了初步的战、技术训练。由于忙于精简整编，应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致使军事练兵活动开展得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热潮。

根据前一段练兵的情况和全国的局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1日又专门发出了《关于练兵的指示》，强调指出：“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各地“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又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全国内战，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半年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21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练兵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下发了练兵工作指示。如晋绥军区明确提出练兵内容以熟练掌握手中现有武器为主，战士以射击、刺杀、

投弹三大技术为主，干部除领导战士学习三大技术外，应进行战术训练，要研究阎锡山、傅作义部的战术，检讨绥远等战役中的经验教训和战术动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专门召开练兵工作会议，并于5月26日下发了《全区三个月练兵的指示》，具体规定了练兵的内容和方法。练兵内容以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技术为主，战术为辅。部队的战术训练，着重于单人到班的战斗动作，多练夜战及利用地形地物，以及守城、守阵地及野战村落战斗动作。连以上干部，除亲身担任部属技术、战术教授与学习外，由旅团专门组织他们学习，提高指挥能力，着重培养提高干部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四方面的能力。对练兵实施方法，指示强调要实行首长负责制，首长亲自动手与群众练兵热潮相结合，各级军政首长要放手研究教练法。要开办各级轮训队，轮训所有干部，提高干部的技术基础及教练能力；应实行学用一致、战教合一，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路线。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区练兵活动的开展，刘伯承司令员在6月2日的军区《人民的军队》报上发表了“大家发愤整军练兵”的专题文章。指出，我们的练兵时间是在与反动派斗争，保卫边区的各种岗位上抽出时间，轮番训练，而不是离开斗争岗位，放弃掩护人民翻身运动、麦收、下种等任务，大家关起门来练兵的。练兵的课目应有的放矢，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力求适合于今后保卫边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各种不同任务的需要”。目前练兵的课目，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与掩蔽工作，即利用地形地物、夜间动作、土工作业等四大技术，这些课目应占全部练兵时间的3/4，其次是适应敌情的战术训练，占1/4的时间。刘伯承指出：“只有从技术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战术才会有物质的基础，只有战术适应可能的敌情，以发挥自己主动，才能消灭敌人”。在练兵中，“必须消除贪多无得，大而晃之，舍本逐末，光训不练的办法”。“整军练兵任务，只有各级军政首长，尤其是指挥员亲自动手，以与所造成

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广大群众的练兵热潮相结合而行动，才能完成。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担起练兵责任，鼓起练兵热情，亲自定出练兵进度表，研究课目内容、教材、教授法，尤其是亲自带头到轮训队与部队中去在实物实地上去教授、学习、检查，以及总结与发扬经验教训，切不可怕自己对练兵不熟练而单委之于训练参谋，与下级指挥员来敷衍塞责，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的用兵，犹之乎人没有积蓄得钱，就无钱可用。”最后，刘伯承要求每个指挥员，在这次整军练兵中，学会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四项本领。

新四军军部在5月29日的指示中，号召全军为保卫与巩固和平民主事业，为保卫解放区的人民而抓紧时间以战备姿态加紧练兵。规定练兵内容以投弹、射击、刺杀为主，以土工作业、爆破作业、攻防演习为辅，并应根据各部自身的情况、任务及地形，而区别不同的重点。同时应加强防空，反坦克战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进行以阵地战、运动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训练，着重进行近战、夜战的训练和协同动作的训练。指示要求各部队正确掌握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干部以身作则，掀起练兵热潮，提高全军战斗力。晋察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等也相继发出开展练兵运动的指示。

根据各战略区的部署，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提高各级干部本身的军事技术水平、战术素养和组织领导军事练兵的能力，各战略区相继举办了各种轮训队，如晋冀鲁豫军区专门集训了炮兵、工程兵等特种兵干部，各纵队、各三级军区开办了排以上干部轮训队。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中军区的各野战纵队、各军区开办了连以上干部轮训队，各师、旅举办排以下干部和战士骨干轮训队，每期抽调部队中1/3或1/4的干部参加轮训。晋察冀军区各纵队普遍集训了营以上干部。为了解决练兵、生产、战备值勤之间的矛盾，有些战略区采取了轮流抽调部队集中时间练兵的方法，如晋绥军区规定每个旅抽调1

个团集中练兵，另外2个团除担任生产、值勤任务外，抽调1个营集中练兵，轮流调换。担任生产、值勤任务的部队，则利用间隙时间进行练兵。为了使练兵运动得以深入进行，形成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有些战略区在连以上建制单位成立了以行政首长为首的整训委员会或练兵委员会，负责制定练兵计划，督促检查练兵执行情形，随时总结经验，克服偏向。为了贯彻“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许多部队还在班排建立了互助小组，在新、老战士之间，翻身农民入伍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之间开展技术互助活动。在开展这一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制定计划，亲自授课，带头练兵，培养典型，如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不仅亲自给高级干部讲授战术课，而且亲自走上练兵场，带领高级干部进行实弹射击，李达参谋长还为机关干部作示范刺杀动作。通过广泛、深入的练兵运动，提高了全军的战技术水平。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干部和特种兵技术人员的培养和训练，各战略区还充分利用已开办的学校、轮流训练各类干部。其中，东北民主联军、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华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军政大学或军政干校，都分批分期训练了各级军政干部。有些战略区还利用航空学校、工兵学校、通讯学校、医务学校、供给大学等技术学校，训练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院校的培养，提高了各级干部的军政素质，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这对于提高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和健全各级后勤保障体制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形式由抗日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抗日战争时期的后勤供应保障体制已不适应大兵团机动作战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军委在1945年9月21日《关于补充与扩大兵员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战略区编组之机动兵团，须组织自己的司政供卫机关。遵此，各战略区在编组野战兵团过程中，均开始建立各自的后勤保障部门。但由于忙于应付国

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时间又比较匆促，因此，各级后勤保障部门仍不够健全和充实，编制也不尽合理。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1945年12月15日明确指出：“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须重新调整”。据此，各战略区在精简整编军队的过程中，调整和充实、健全了各级后勤机构，使之成为适应机动作战的后勤，全军和各战略区经调整、充实后的后勤体制的基本情况是：

中央军委仍设供给部和总卫生部。供给部部长邓典桃，负责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的供给；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设后勤部，部长徐林。晋绥军区设后勤部，部长陈希云。

晋冀鲁豫军区设后勤部与后方总指挥部。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副部长周玉成，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和政治部。供给部副部长李发南，副政治委员余述生；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钱信忠；军工部部长刘鹏，政治委员赖际发；政治部主任康庄。后方总指挥部司令员王光华，政治委员王任重。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设后勤部，部长宋裕和。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和兵站。供给部部长宋裕和（兼），政治委员彭显龙；卫生部部长崔义田；军工部部长程望，政治委员罗湘涛；兵站站长黄若华。

华中军区设供给部，部长骆耕模。下辖军工部、卫生部。军工部部长孙象涵，政治委员罗云贵；卫生部部长齐仲桓。

东北民主联军设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政治委员杨至诚。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工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总行。供给部部长高志洁；卫生部部长贺诚；兵站部部长李长伟；军工部部长王逢源；铁路管理局局长郭洪涛；东北银行总行行长叶季壮（兼）。

晋察冀军区设后勤部，部长查国桢。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工业部、兵站部。供给部部长封永顺，政治委员吴先恩；卫生部部长殷希彭，政治委员姜齐贤；工业部部长刘再生，政治委员杨城；

兵站部部长张西帆，政治委员尚英。

中原军区分设供给部、卫生部。供给部部长吴先元，卫生部部长叶果。

野战部队的后勤保障机构和人员是按照纵队、师（旅）、团、营、连层次设置的。纵队一般设供给部和卫生部。在供给部下设财务、粮秣、军需、运输、管理等科和监护、辎重连等分队；卫生部下设医务、药材、防保、管理等科，以及野战医疗所、担架连等分队。师（旅）设供给处和卫生处，下设与纵队供卫机关中的科相对应的股，供给处还设监护连和大车连，卫生处设野战医疗所和担架排等分队。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供给处主任直接领导会计、出纳、粮秣员、军实员、军械员和大车排；卫生队有医生、医助、司药人员若干名，并设卫生排和担架排。营设供给员和医助及卫生班、大车班等。连设司务长、上士、卫生员。这些后勤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使后勤保障体制逐步趋于正规统一，师以下各级均有较强的独立保障能力。

四、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军工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各战略区在贯彻取之于敌的方针的前提下，相继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企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各战略区十分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后勤部门设置了军工部或工业部，领导和部署各地的军工生产。各战略区除对原有军工企业进行整顿、调整和组织继续生产外，还克服各种困难，利用接收的日军生产设备，组建了新的军工企业，扩大军工生产。

东北地区曾经是侵华日军的后方基地，该地区有较多的军工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从延安、晋西北等地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随军挺进东北，相继进入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接管和收集军工生产设备、技术人员和军工原材料。至1946年4月，在南满的沈阳、鞍山、辽阳等地即收集到各类制造枪械、弹药的机器200余部，利用这些设备，在

通化相继建起了修理厂、子弹厂、造枪厂和炼铁厂，这些工厂建立不久，即生产出掷弹筒 20 余门，子弹 30 万发，手榴弹 12 万枚。东满地区也利用收集到的机器设备在珲春、图门等地建立了炮弹厂、子弹厂、手榴弹厂和炼钢厂。北满方面，利用哈尔滨运出的 400 余部机器及百余车物资器材，在鸡西建起了弹药厂，生产手榴弹和炮弹；在佳木斯建起了修械厂、翻砂厂和手榴弹厂，在哈尔滨建立了弹药装配厂和实验总厂。西满地区，利用从阜新、八面城、齐齐哈尔等地接收的部分机器设备，建立了子弹厂、手榴弹厂、六 0 炮弹厂、修械厂。这些军事工业，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但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为刚进入东北不久的民主联军生产了一批急需的武器、弹药，也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的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

关内各战略区也新建了一些军工厂、被服厂，并对原有的工厂进行了扩建、调整，至 1946 年 7 月，仅据晋冀鲁豫、山东、晋察冀、晋绥地区的不完全统计，拥有各类兵工厂 69 个，工人 4300 余人，月产迫击炮 2 门，步枪 1030 支，机枪 15 挺，手榴弹 28 万枚，迫击炮弹 4710 发，步机枪子弹 103 万余发，枪榴筒 10600 具，枪榴弹 4.7 万余发。又据晋冀鲁豫、山东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被服厂 32 个，月产军衣 6.7 万余套。

五、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的达成，以及在精简整编、练兵运动中，部队中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和思想问题。为此，各战略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战备观念，保证了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树立必胜信心

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广大指战员基本上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蒋介石可能发动全面内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

也出现一些新的思想问题，有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有少数人甚至产生害怕艰苦、贪图享受的思想。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有预见，及时告诫全党全军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停战令后宣传重点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停战，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教育全党全军和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介石会真正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的企图，要做好粉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政协决议达成后，党中央在2月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告诫全党全军，应严加警惕国民党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应利用目前时机，抓紧练兵，从思想上组织上均做好一切准备。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多项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后，党中央于3月18日发出了《关于蒋介石反对革命的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告诫全党全军，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企图推翻政协决议，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在反分裂反内战的同时，必须有不惧分裂，不惧内战的精神准备，才能立于主动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1946年1月中旬开始，全军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各战略区领导十分重视这次教育，相继下发了各种文件和宣传提纲，召开各级干部会议。2月22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出《关于三个月的政治整训》的训令，明确提出政治整训的“重点放在时事和思想教育上面。”指出：要深入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使全体官兵正确认识新阶段中的新形势与任务，澄清存在着的糊涂思想，克服部队中的松懈倦怠情绪，积极参加新形势下新的斗争。其次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保持党与毛泽东思想在部队中的领导，时时为人民服务，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为此必须贯彻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关心人民利益，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党关系、军事政治工作关系、官兵关系，实行拥政爱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使我军在和平民主斗争中成为坚强的支柱。4月23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又发出《关于政治整训与自卫战争准备相结合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政治整训，必须与迎击反动派的袭击及可能的新的军事进攻的作战准备密切结合起来。要根据延安广播、中央指示、报纸材料，针对当面情况及时传达讨论，使大家认识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不打破，和平民主是没有的，从而克服少数同志的坐等复员与转业的松懈情绪。军区还决定，在政治整训中，军区首长要利用每星期一早晨的会操时间，轮流到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作时事讲话。邓小平在第一个月的讲话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全部决议及整军方案。因此，大规模的内战危机严重存在。必须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丝毫不应有幻想和平会自行到来的错误思想。要从斗争中取得和平，怕斗争就是自己放下武器，自取灭亡，我们要紧张起来，积极斗争，克服不安心工作的情绪。邓小平还称赞前方坚持斗争的一切部队，指出“这种坚决的斗争，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也批评了个别因麻痹而吃亏的部队，号召大家要警惕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从各方面打败敢于侵犯解放区的敌人。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和平停战问题对部队教育材料》，分别就“和平停战是怎样来的”，“怎样才能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平停战后我们要作些什么”，“纠正和克服思想上的偏向”等4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华东局宣传部、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在《关于停战协定公布后宣传工作指示》中指出：今后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应围绕着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这一中心任务。应揭露国民党八年来在敌后的军事溃败和政治腐败，随时揭穿各种反动言论及谣言；应加强对部队的时事教育和阶级教育，认清形势，为巩固和平和肃清对蒋介石的任何幻想而斗争；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放松了思想教育，必然造成革命工作的很大损失，小则普遍影响工作，松懈斗志，大则组织涣散，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华东局还要求各部队在政治练兵中

防止松懈麻痹现象的发生，克服和纠正各种怕艰苦，贪图享受，考虑个人前途，要求复员、结婚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树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的决心。

在政治教育中，各部队十分注意组织指战员学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中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论述，以及中央的有关指示，进一步认清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翻身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在此基础上，通过回顾抗日战争胜利后几个月来的斗争形势，揭露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在美国帮助下加紧调动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向关内各解放区不断蚕食进攻的事实，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自己的责任，提高了觉悟，克服了贪图安逸，和平麻痹思想，增强了斗志。不少曾向领导要求请假回家、要求复员转业、要求结婚的同志主动放弃了这种要求和打算，纷纷表示要安心工作。这次教育，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而且为部队精简整编，开展练兵运动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为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作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二) 认真做好精简整编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军队精简整编工作开始后，部队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再过军队的艰苦生活，想到地方工作；另一方面，一些需要裁减的老弱病残人员怕复员后生活没有着落，存在着不愿离队的心理；有些精减对象因长期在军队中生活，对军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而也不愿离开军队。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十分强调要做好精简整编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同时要解决转业复员人员的实际困难。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在进行精简整编工作中要首先作好各项准备，特别是思想准备工作，要克服以往精简中所发生的弊病。3月15日的指示

中又指出：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员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主要负责同志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人员自己讨论，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充分注意安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动员各方面及各界把他们当作有功劳于国家的光荣战士看待，使他们各得其所；如果还未解释好和准备好的地方，便不要仓促复员，如果对此点疏忽，定会造成恶果，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

为了进一步做好复员工作，中共中央还于1946年4月28日发出《关于处理复员问题的规定给各中央局、各分局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军复员人员，经过革命战争锻炼，乃为光荣的革命战士，必须认识此点。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为此，对复员、转业人员的待遇作了统一规定。其中包括：复员人员按军龄的长短，发给生产补助金，入伍1年以内者发小米250斤（此系张家口、晋东南标准，其他地区可以此比率折合），2年以内者发小米350斤，3年内者发小米450斤，并按以上比例推算至抗战初年入伍者为止。8年以上战士及老弱疾病退伍还乡者斟酌情形，加以特殊照顾；复员人员不论入伍时间长短，一律发给单衣一套或两套，鞋子一双或两双，毛巾一条，并准其带走旧的衣服被子。转业到政府或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员，不得享受上述优待，但有特殊情况者，可酌予补助，但不能超过上述平均数的1/2；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如个别干部因特殊情形要求复员，除照上述优待外，排级至少加发小米50斤，连级加发小米100斤，营级加发小米150斤，团级以上加发小米200斤。部队应将复员人员送至县，并将其关系介绍给县委或县政府。然后以村为单位进行欢迎，帮助解决问题，如找房子，拨给土地，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复员人员回到各地以后，当地党与政府，可斟酌本地情形，吸收其参加各种工作；各县复员委员会，应热情招待帮助过往复员人员，

有疾病者须给以医治，生活予以照顾；荣誉军人回到任何一个解放区时，可按残废证领取残废金；凡战士干部其家不在解放区者，应暂时尽可能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

各战略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相继发出指示，制定复员条例。精简整编工作开始后，各部队首先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说明精简整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忠实执行《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也是为了节省解放区的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使军队更加精干，更有战斗力；复员和转业人员到地方后，可增加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解放区的经济实力，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总之，这一工作对加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建设，对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针对一部分留队指战员要求离队，到地方工作的倾向，结合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着重使他们认清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严重形势，人民军队所负的历史责任，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去留问题。在此基础上，发动党员骨干深入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然后有针对性地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党中央和上级有关精简整编的指示，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什么人可以复员转业，什么人应该继续留队，进而表明每个人的态度。接着上级反复研究，确定具体方案，再交大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确定具体名单，并采取大会动员，个别谈话，思想互助等方式，做好不同人员的思想工作。通过上上下下的反复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转业到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工作以及复员回家参加农业劳动的同志，纷纷表示，要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各项经济建设，为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作好精神准备，一旦和平被破坏，内战爆发，应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一声令下，立即归队。继续留队的同志，也向组织表示，要进一步认清形势，

安心工作，积极参加练兵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军事技能，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可能发动的进攻。从而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转业复员人员确定后，军队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转业复员人员到地方后，立即组织群众欢迎，及时召开转业复员人员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安置工作的意见，尽快解决他们的生活、生产问题，对于能参加生产的，很快给予适当安排，帮助其解决土地问题，生产工具问题，没有房子的帮助解决房子，房屋破旧的及时修理，本人有结婚条件的帮助解决婚姻问题，并在工作、生产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对于不能参加农业劳动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也及时给予妥善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

（三）做好练兵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保证练兵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各战略区十分重视练兵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战略区专门发了练兵政治工作的指示。首先，各部队结合形势任务和阶级教育，联系部队的思想实际，组织指战员学习讨论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练兵的指示，提高指战员对练兵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热情，把思想集中到练兵上来。其次，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深入到练兵运动中去，及时发现练兵中的思想问题，帮助基层连队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向，使练兵运动健康发展。再次，根据不同人员的思想状况，采取不同的思想工作，如对老战士，主要教育他们要在练兵中发挥骨干作用，带动新战士；对翻身农民参军入伍的新战士，教育他们要虚心向老同志和解放战士学习军事技能，刻苦训练，尽快掌握手中武器和四大技术；对解放战士则主要教育他们克服雇佣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并充分发挥他们军事技能比较好的优势，帮助新战士提高军事技术，教育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向老战士和从解放区入伍的新战士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其四，充分发挥

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连队党支部的工作，在练兵期间，一切围绕练兵进行，以练兵为中心。同时，充分发挥连队士兵委员会、俱乐部等的作用，采取练兵比武、讲演、晚会、墙报、板报、快报等各种方式，及时表扬先进，培养典型，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练兵的积极性。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在练兵中士气饱满，斗志高昂，较好地保证了练兵任务的完成。

第三节 加强解放区建设，巩固战略后方

解放区（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生存、发展、作战的依托。有巩固的解放区，就有了可靠的后方，有了依托的阵地，有了支持战争的保障。毛泽东在论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时指出：根据地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① 战争之伟力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占全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② 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要实行人民战争，就必须领导农民反对土地封建占有制度，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真正的翻身解放，革命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才有牢固的基础。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加强解放区建设，把它作为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一项重要准备。

一、在关内新老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4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1078页。

中国共产党经过8年抗战，在关内已建立起19个解放区，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行署23个，专署90个，县（市）政权590个，控制县城280座。^①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才收复的新解放区。无论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都面临着一个进一步发动群众的问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群众，过去长期处于日伪及反动封建势力的压榨下，过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生活，他们都迫切希望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要求报仇、伸冤，要求改善生活。但这些地区在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后，只进行了一些反汉奸斗争，没有形成群众性的控诉清算运动；有的地区建立了一些群众性组织，但是没有认真地发动群众，以致这些组织流于形式，还没有在群众中生根；还有些地区清算运动做得比较圆满，但没有及时引导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在老解放区，群众工作虽有基础，但也有不少地区减租减息不彻底，如山西临县600余个村庄，减租不彻底的即有200余个，占1/3；太岳老区7个县，群众发动不充分的村庄占43%。

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危机面前，抓紧一切时机，进一步发动群众，十倍百倍地壮大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已成为保护解放区和应付全面内战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多次发出指示，强调加强解放区建设。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

^① 中共中央关于我军实力及解放区面积人口政权情况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6年9月26日）。

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要求各地不失时机地“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指示》强调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按照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一九四六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之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

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指出：减租、生产两件大事，务必在年内获得巨大成绩。“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强注意力，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1945年冬至1946年上半年，解放

区建设着重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①进一步巩固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军区、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精神，对本地区的减租减息和查减工作迅速作出部署。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于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县的峰峰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于冬春两季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查减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巩固晋冀鲁豫解放区，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热河省委于1945年12月2日发出《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发动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控诉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应当通过这一运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组织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并准备在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后转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必须首先发动工人，使工人在清算汉奸、特务的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46年1月10月下发《关于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群众的指示》，规定：“减租减息与减租减息后的生产运动是全党在今年经常的中心任务。为了正确的实现这一任务，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必须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密切配合中心任务，从各方面造成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党政军民机关更须在一定时期以主要精力放在关心与实际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抽出大批干部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并注意转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当时各战略区都担负着繁重的作战任务，为了抓好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人除了作直接支援前线的工作外，以主要精力抓解放区的减租和生产。各中央局、分局抽调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分赴各地进行

^① 指解放区复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有的解放区称复查运动。

发动群众工作。各部队也积极参加这一斗争，为群众撑腰，鼓舞和支持群众的斗志。

中共中央针对部分地区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方针认识不足、领导不力问题，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了《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再论放手发动群众》和《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的指导性社论，反复阐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要求以最大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在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有些地区曾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其表现是，完全不去发动群众，或表面上是积极发动群众，实际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第二种是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过分的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中共中央发现上述“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后，于1946年4月11日发出关于如何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的指示，具体分析了错误的性质，提出了纠正的时机和办法。4月15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推广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的经验，使各解放区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区发动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华北、华中的广大新解放区，对汉奸、特务的控诉、清算运动迅猛开展，成千上万群众参加了这个运动，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若干罪大恶极的大汉奸、伪军头子，经过群众的公审，依法进行了惩办，把8年来压榨群众的敌伪统治基础基本摧垮；许多胁从分子，在群众的压力与教育下，承认了错误，吐出了从人民身上掠夺的不义之财；在控诉清算运动告一段落后，即及时转入到减租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开展查减运动，对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进一步发动群众复查。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和查

减运动，有力地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通过诉苦、算账，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自己贫穷困苦的根源，实际体会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提高了阶级觉悟，进一步消除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在“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保卫翻身利益”的口号下，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会等群众组织。改造了基层政权，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

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为了有效地对付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全面战争，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其基本精神是，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的颁布，标志着解放区在土地问题上，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过渡，赋予了同国民党斗争明确的土地革命的内容，在广大解放区农村开始动摇和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中共中央在这个指示中强调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进一步发动群众，逐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巩固解放区，极大地增加我们反对国民党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的力量。”^①随着土地问题的解决，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仅到1946年10

^① 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5月13日）。

月，各地就有30万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有三四百万人参加民兵和游击队。^①

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积极参加了解放区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及土地改革运动。各战略区相继发出指示，晋绥军区在《关于恢复三大任务，军队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说：军队做群众工作，解决土地问题，搞群众翻身，作为建军思想的中心一环，因此，军队必须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晋冀鲁豫军区在《一九四六年部队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中，要求部队必须恢复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应普遍地协助地方开展减租运动。华中军区在《关于恢复部队做群众工作与健全各级民运部门的训令》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作战、生产、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军队最光荣的三大任务，目前应在地方党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下，积极参加驻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工作，如惩办汉奸，查减增租增资运动等，特别注意协助地方党进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关于全军参加乡村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训令》中，要求把发动群众工作，看成自己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看成是拥政爱民的中心工作，在全军除进行这一政策教育外，应组织全体指战员积极地参加乡村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斗争。根据各战略区的指示，全军各部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指战员在驻地向群众广泛宣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政治热情，推动运动深入、健康的进行。驻老解放区的部队，组织成连、成营的小部队，由干部带领，直接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为群众撑腰。驻新解放区部队则派出干部组成工作队或民运小组，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并参与组织群众团体，建立人民政权和自卫武装。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地方，部队自动派出武装，打击敌人的袭扰和破坏，保

^① 《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页。

护群众斗争；帮助政府逮捕武装特务，镇压黑枪手，保卫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

第二，开展大生产运动，恢复与发展城镇经济，增强解放区的经济力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各解放区在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1946年的大生产运动。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级民主政府对生产运动十分重视，分别作出生产的规划和部署。晋察冀中央局号召全区军民进行大生产，贯彻农业为主方针，大力抓好粮食和棉花的生产，计划全区植棉350万亩，争取边区军民用布自给；同时，有重点的发展机器工矿业。华中分局发出关于生产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农村以发展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业为辅；在城市以发展手工业为主，商业及运输业为辅。晋绥分局要求在经营规模上、生产组织上、耕作技术上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并强调要组织好新解放区的生产。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于1945年12月16日召开会议，部署1946年的大生产，计划增加种植水稻8000亩，植棉20万亩。发展纺织业，恢复旧有的工厂作坊，大力整顿公营厂矿。

为抓好农业生产，各中央局、分局和各民主政府不遗余力领导人民推进各项政策的实施，及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西北局召开农业技术座谈会，专题研究如何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拨出14.1亿元农贷资金，帮助群众解决缺乏农具、牲畜、种子等困难。山东省人民政府对全省的手工业和其他各种农副业生产采取扶助与奖励的政策，各地区建立了生产推进社和合作指导所，解决群众兴办合作业务的困难，以推动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春耕前，各地的民主政权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变工队、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等组织，解决劳动力缺少困难。组织群众填平抗日战争时期挖掘的抗日路沟，扩大耕地面积。各解放区以极大的力量兴修水利，受益田地达3000余万亩。在动员民力支援自卫反击作战时，尽量做到不违农时，减少误工，爱惜人力、物力，以利于发展生产。各部队、机关、学校

也规定了生产任务，在不妨碍作战、工作和学习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以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山东解放区为例，194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斤，平均亩产271斤，每人平均拥有粮食445斤；棉花总产量达5983万斤，平均每人拥有棉花2.1斤。出现了“村村织布，家家纺纱”的生动局面。1946年全省有纺车250多万辆，比1945年增加135%。全年生产大布（长40码，宽1码）523万余匹，按全省人口分配，每人可分18.9尺。^①

在农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以增强解放区的经济力量。过去在敌伪统治下，城镇工商业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商店倒闭，工厂、矿山停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恢复与发展城镇经济。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材，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办法，非常必要。”1946年2月5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负责人邓子恢的指示中指出：“我们是奖励私人企业，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对保护和发发展解放区的私人企业提出十项具体政策规定。2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要求选派可靠党员学做生意，以商人面目到敌占区经营商业，为繁荣和发展解放区经济服务。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提出：“各解放区输出贸易，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以便发展生产。”“目前须着重输入纺织工具。”“现在国民党区的自由工业家备受官僚资本的压迫，不能立足，很多技术人员失业。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

^①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与他们谈判，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和工作。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则，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技术人员待遇从优。”“各解放区，特别是产棉区，原来的民间纺织业，必须尽力恢复，并鼓励合作，提倡私人投资。各地公私机械工厂和铁工厂，除了制造农具之外，应该努力试造各种纺织机，帮助民间手工纺织业逐渐改变为半机械化的纺织业。”“各解放区所接受的敌伪工业，为着适应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具体需要，可以进行必要的改造。恢复公路交通的事业，首先也须以适应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原则。”“各地党与政府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负责组织经济的工作，根据当地的条件，拟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计划，以达到丰衣足食为第一步。”“复员的许多干部，可转入生产部门工作。各地必须组织生产训练班或研究班，动员大批干部，初步学习当地实用的经济常识和技术。”“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各地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山东省人民政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工矿业生产，成立了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领导全省的工矿业生产。同时，还大量吸收私人资本，合资开发全省的矿业。对工厂也采取了吸收私人资本，拨款增加工厂的生产资金，帮助解决技术设备，增加工人工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全省的有色工业、化学工业、矿山采掘工业以及纺织工业等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1946年10月，全省已建立公私合营大小工厂657个，煤矿、金矿、铝矿等20个。^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为加强解放区经济建设，相继颁发优待技术干部、奖励技术发明等暂行条例，除鼓励边区人民从事技术发明创造外，欢迎各种工矿、农林、医药等专家及技术人才前来边区从事工作或技术的研究，除受政治上尊重外，薪金从优。凡有发明和技术改造者，政府颁发奖章及奖金予以奖励。这些措施极

^①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大地激发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为便于各区经济交流与调剂，决定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政区的货币实行统一发行、统一管理、等值流通，促进了各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解放区实行自由贸易。被敌伪没收吞并的一切私有工厂、商店，均如数归还原主，并拨发大批工商业贷款，支持恢复经营，使新解放区多年来枯竭衰落的市场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山东烟台，在3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的商号即由原来的3116家，发展到5742家，增加56%。冀鲁豫区为加强对城市经济工作的领导，各专署、县都建立健全银行和工商管理局，较大的集镇都建立区一级的工商事务所，管理集市贸易，仅1946年全年税收总额即达20亿元，按当时的物价折成实物，可买麦子6700万斤，可买布4000万尺，能做军装200万套。^①

与此同时，各战略区的部队也积极开展了生产运动。为了使生产运动健康、深入的开展，各大军区相继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在指示中指出：为了更好的支持与巩固解放区，及进一步进行解放区的各种建设。部队除了捍卫解放区与教育练兵任务外，应以最大的努力组织部队的生产，增加解放区的财富。并规定了1946年部队的生产任务：应达到全年供给标准的5%至15%。山东、华中军区明确规定部队的生产主要是经营工业、手工业、渔业和畜牧业，要开垦荒地，建立小型农场，开盐田等。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部队充分利用作战、训练的间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华中军区以师、纵队、分区为单位，相继建立了油坊、磨坊，以及生产小日用工业品的工厂，仅第6师即建立了1个油坊、3个米厂及卷烟厂。山东军区所属胶东军区1946年上半年开荒1900余亩，种菜1500余亩，达到平均每20人左右1亩菜地。并开办了

^①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纺织厂、铁厂、木厂、皮厂、肥皂厂、牙粉厂、帽厂、鞋厂等工厂。部队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了解放区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后勤保障能力。

大生产运动普遍、深入的开展，使各解放区的经济得到逐步恢复与发展，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为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和支持长期战争，打下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在建设和巩固关内解放区的同时，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同原在该地区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创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东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才收复的一个新区，多种矛盾并存，各种势力交错斗争，形势极为复杂：（1）日本投降后，日伪在东北的各级政权已全部瓦解，但苏军占领东北后，为维护社会秩序，直接出面组织或默许一大批以敌伪旧人员为基础组成的“维持会”临时政权。昔日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官吏、伪警、伪宪等，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权的工作人员，把持各级政权，继续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2）苏联红军占领和控制着东北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苏军控制的城市及附近地区，不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公开活动，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准备把这些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政府。（3）东北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多为日伪满残余和地主封建势力以及土匪武装所盘踞。东北土匪是日伪残余和地主封建势力紧密结合的反动武装。日本投降后，各地的土匪乘机蜂起，攻城掠地，各霸一方，其活动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危害之大，是东北历史上罕见的。（4）国民党为全面劫收东北主权，向东北派遣大批“中统”、“军统”人员，在各地开设特务活动网点，并利用人民群众向往祖国的高涨情绪和对蒋介石存在的幻想，到处招兵买马，收编游杂武装，编建名目繁多的所谓“先遣军”、“挺进军”、“救国军”等，他们到处打家劫舍，残害人民，社会秩序非常混乱。（5）先期进

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之 5000 人，到 1945 年 10 月底已扩大到 8 万人。这是创立东北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因主要采用“收编”和“招募”方法扩编，新兵成分复杂，内部极不巩固。

1945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争取东北之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指出：我发展东北决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依照上述指示，从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除少数调往北满、东满地区配合原东北抗日联军重建部队、开辟根据地外，主要分散于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西满各地，着手发动群众，镇压汉奸，清剿土匪，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收集兵器资材等。但由于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到达，东北地区广大，加之情况复杂，时间紧迫，这一时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工作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

1945 年 10 月中旬，为拒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分散发动群众的部署，集中主力于北宁路榆锦段作战，节节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夺占山海关，26 日又夺占锦州。此时，苏联红军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退出这些地区。

鉴于上述形势，中共中央又果断地改变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部署，于 1945 年 11 月下旬提出将东北军队从中长铁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在东满、北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基地，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作持久打算。据此，中共中央东北局放弃北宁路沿线作战的计划，改变部署，分兵各地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并于 12 月 24 日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在东北建立我党巩固的根据地，……各级党与军队必须不失时机，雷厉风行的进行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

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立后方等六项工作。”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

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上述指示发出3天以后，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又就东北局12月24日指示复电：“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很好，望切实督促全党全军迅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12月28日指示，制定了在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措施，提出：“现在我之主要力量（干部兵力），应使用于创造长春路两侧及北宁路北侧之根据地，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的巩固根据地”，“目前关于创造根据地工作之中心一环，是首先肃清土匪，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进一步减租。”在重新划分军区、军分区的同时，实行新老部队合编，主力部队大部划归各军区指挥，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于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新四军第3师第8、第10旅和独立旅，分散于西满洮南、通辽、彰武、库伦地区；山东第7师分散于北满肇州、肇源、肇东地区；陕甘宁第359旅进至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地区；山东第2师、第25旅进到东满磐石、双阳、海龙、敦化地区；位于南满地区的山东第3、第6师、第5师一部仍留置该地，继续清剿土匪，发动群众。新四军第3师第7旅和山东第1师为机动作战部队，由东北民主联军“前总”直接指挥，在法库、康平地区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并相机打击进犯之敌，以掩护根据地的创建。各部队根据上述部署，首先对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截至1946年3月的不完全统计，在东北全区内进行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212次，共歼灭土匪78459人，缴获步枪25500支，

短枪 911 支，轻重机枪 565 挺，马 3056 匹，南满、西满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

在清剿土匪的同时，还发动群众向日伪统治时期欺压人民的官吏、汉奸、特务、恶霸分子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打击了日伪残余及封建势力，瓦解了国民党在东北的社会基础。在发动群众反奸清算的基础上，部分地区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和分配日伪反动势力霸占的土地。城市和农村分别成立了工会、农会以及青年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彻底摧毁了敌伪残余势力把持的反动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权，通过召开临时参议会或代表会等形式，选出了省长、市长和县长。至 1946 年 5 月，东北解放区在各省先后建立近 30 个专区和盟、200 个县和旗的人民政权。

1946 年 3 月下旬和 4 月初，国民党军在其精锐部队新 1 军和新 6 军相继调入东北后，即大举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和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长铁路满州里至绥芬河段，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东北的交通枢纽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据此，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又集中分散各地的主力部队，进行历时月余的四平保卫战。5 月 18 日撤出四平，一部分主力于 6 月初到达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移到东满、西满地区创建根据地。

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进行四平保卫战和从四平、长春、吉林撤退的一段时间里，潜伏东北各地的 3 万土匪乘机复起，袭击民主联军地方部队，杀害地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佳木斯、牡丹江地区的股匪，袭占东北民主联军后方机关，破坏后方设施，气焰甚为嚣张。根据当时东北形势，北满地区已成为最基本的战略后方。为了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并支持长期斗争，就必须首先于最短期间将该地区的大股土匪彻底消灭，以便迅速开展群众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6 月 3 日指示东北局，继续“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 月 12 日，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重新部署力量，

确定以 1/3 的主力部队及所有地方武装执行剿匪任务。7 月初，东北局于哈尔滨召开党的扩大会议，总结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暂时难继续大举进攻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东北根据地。《决议》强调把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工作。

担任剿匪任务的部队，遵照东北局的指示，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从 6 月下旬开始对大股土匪展开积极进剿，至 8 月底，全区共歼匪万人，北满地区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并收复了东宁、密山、虎林、饶河、宝清等县城。9 月至 12 月，剿灭小股流窜土匪。1947 年 1 月至 4 月，肃清残匪和深挖匪首。经过一年的反复搜剿，东北匪患基本肃清，为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七七决议”精神，东北局动员了 1.2 万名干部，组成若干群众工作团，奔赴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东北民主联军也紧缩、精简后方机关、部队、学校，抽调大批干部，经过“土改”政策学习，分别参加群众工作团，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从事发动群众工作。经过 4 个月的群众运动，农村面貌已初步改观，封建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土地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至 1946 年 11 月，已将 3000 余万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深入开展，东北根据地逐步趋于巩固。

东北根据地是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经过反复争夺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开辟和创立东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采取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的战略行动。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对于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节 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工作 开展“高树勋运动”

瓦解敌军，优待俘虏，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①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民党蒋介石图谋挑起全国内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端重视加强国民党军工作，把这一工作作为应付全面内战爆发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成为解放区军民应付全面内战准备工作中一项战略任务。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民党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自恃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图谋发动新的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然而，这一图谋是极不得人心的。不仅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国、发动全面内战的最重要支柱的国民党军队，也并非都愿跟随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广大士兵和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即使在高级将领中也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是不赞成内战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特别是蒋介石重用嫡系、吞并杂牌军队的做法，更引起了非嫡系部队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此外，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侮辱人格的腐败现象，更普遍引起了官兵之间的严重对立。这些情况表明，在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军，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织领导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379页。

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争取工作。

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分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开展工作，“以便将来更有力的进行民主运动”。10月20日又指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过程中，要“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0月25日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依靠近二百万军队，作为他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支柱，我们必须在这一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的工作，方才能够达到战胜他的目的。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和分局之下设立国军工作部（对外秘密），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并强调指出：“为着使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开展，除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主持这个部门工作外，并应调选一批与国民党各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之中，长期埋伏，交结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的谨慎的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按照工作需要，在国民党军队集中地区或重要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要派出有力干部，必要时配以秘密电台，就近指导这一工作。为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拨出一定的经费。”“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并指定王世英同志为部长。”“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今后应经常与军委国军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导关系。”11月9日，军委国军工作部要求各战略区迅速成立国军工作部，“并挑选有社会经验及秘密工作经验之同志担任此项工作。”

10月30日，在晋冀鲁豫军区举行的邯郸战役中，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在解放区军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率所部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并通电全国，主张实现国内和平、反对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抓住这一具

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乘势把政治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引向深入。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出：“高树勋十月三十日通电，已在重庆发生了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产生它的影响。国民党不可能动员与团结在它自己指挥下的士兵和广大军官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更不可能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内战，这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最大与最基本的弱点。高树勋新八军起义，及其在全国获得深刻影响，就是明证。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业。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1）召开部队和群众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新8军起义的意义，由各地民众团体和军队的负责人致电高树勋及其将士，表示慰问和庆祝。（2）将邯郸战役和新8军起义消息，高树勋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并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口头宣传，扩大邯郸起义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和人民中扩大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新8军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战场上实行怠工，和八路军、新四军联欢，到解放区来、回家去。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军事打击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这一指示为全面开展政治争取国民党军工作确立了基本的方针，即：

政治争取以军事打击为后盾，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密切结合。

针对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大规模地调动军队至解放区周围，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2日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给各地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作好一切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包括，应“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实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把加强对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列为解放区十项工作的第二项，发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的号召，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并强调指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达成后，国民党即背信弃义，继续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行蚕食和进攻，并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为了应付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22日发出了《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指示：“全国性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以便能配合军事上的自卫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又电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唐延杰、贺龙、李井泉：“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应认真进行顽伪军内线工作，派得力干部专门主持此项工作。”⁶

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晋冀鲁豫局、晋察冀局、晋绥分局，要求“加强对阎部政治攻势，特别内线工作”。1946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致电华东、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山东方面对济南、徐州、开封等地开展高树勋运动万分迫切，应针对高级负责人做工作，应有专门机关派赴当地主持，应收罗与工作对象有历史关系的人员给以工作任务；请刘邓薄商高树勋同志在高领导下设立一兵运机关，由高派人员写信分途进行；亦请高写信送陈舒转交。总之除我们自有办法外，应使高发挥其作用，至要至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出加强敌军工作指示的同时，制定了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和起义部队的政策。颁布了《战俘处理办法》，提出了优待、教育、释放俘虏的政策，严禁虐待乃至杀害俘虏的现象。1945年11月12日，针对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成立民主建国军的情况，提出了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造为人民军队的政策。并强调指出：“晋冀鲁豫应努力协助民主建国军的建设，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在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事业中建立功勋。”根据国民党军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国民党军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在争取和平民主阶段中，第一步争取杂牌军中立（特别是西北军），是我军日前主要任务”^①，“如能联络西北军各部对目前时局有所主张，反对内战，则对蒋介石之内战政策将成为决定性之打击”^②。为争取西北军，周恩来、刘少奇等专门电示晋冀鲁豫、华东解放区刘邓、陈饶，通报西北军情况，指示由申伯纯、边章五、苏进等，带电台到开封、徐州附近去做工作，必要时刘邓亲去处理一切，以便能促成西北军起义，影响全国形势。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又在《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

① 《中共中央军委国军工作部致刘邓陈饶电》（1945年12月7日）。

②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饶电（1945年12月6日）。

中，全面系统的规定了开展国民党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出：“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使之知难而止外，更重要的，须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对一般伪军官兵，应采取宽大政策，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邻，号召他们回家，允从宽免究，保护其生命财产，至于过去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深恶痛恨，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民主者，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给以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至公审处决；但一经反悔，申明不继续作恶者，应不咎既往，予以自新之路。”“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应坚决消灭之，尽量多击毙，特别是军官。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均分别给以优待，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以同等公民看待。对于伪军政策，必须宽严适当，宽大与镇压，必须密切联系，才能申张正义，动摇与分化伪军。”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军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瓦解敌军”原则的新发展，成为人民军队作战指导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广泛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国民党军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军政治争取的指示，各战略区结合本地区情况，相应地成立了国军工作机构（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机构），制定了开展国军工作（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的措施，广泛地开展了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民党军工作。

（一）成立各级国军工作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成立国军工作机构的指示，从1945年底至1946年上半年，各战略区相继建立了国军工作机构。各战略区建立国军工作机构的具体情况是：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国军工作由统战部负责，张德生任部长。在统战部下专设统战处，范明任处长，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开展对国民党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统战处下设秘书科、联络科、俘虏科、派

遣科、情报科、敌军科。此外，还下辖 1 个民主剧团，协助做俘虏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由王世英兼任部长，金城为副部长。晋绥军区城市工作部部长由金城兼任。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国军工作部由薄一波兼任部长，申伯纯为副部长。下辖 4 个室：第一室负责城市工作，由陶希晋任主任；第二室负责西北军工作，由边章五任主任，苏进任副主任；第三室负责山西阎锡山部和绥远军工作，由雷任民任主任；第四室负责中央军工作，由任靖秋任主任。另设一俘虏军官教导团。

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由舒同任部长，刘贯一为第一副部长，黄远为第二副部长。另在华中分局社会部下设立联络部，陈同生、吴宪先后任部长。

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军工作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络部，由李立三兼任部长。

中共中央南京局（原重庆局）成立地下工作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李维汉任副书记。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开展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吴德峰任部长，康建生任副部长（兼任晋察冀军区联络部部长）。下设 3 个科：一科负责组织派遣工作；二科负责宣传工作；三科负责调查研究。3 个国军工作站：保定站、石家庄站和安阳站。1 个俘虏军官教导团。

各战略区下属单位也建立了国军工作机构。中共西北局国军工作机构自 1945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青海、新疆、宁夏 8 省开设了 108 个工作点。并给这些工作点规定了四大任务：（1）搜集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情报；（2）组织宣传运动；（3）开展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4）准备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1945 年 11 月 18 日，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在靠近国民党军占领之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地委、各分区党委，成立国军工作部，负

责对国民党军的调查争取工作。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了基层国军工作机构：(1) 各区党委、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并由中央局直接领导；(2) 各纵队设敌工部，旅设科，团设股或干事，统由各级政治部领导；(3) 在敌大据点附近，设立敌工站，进行派遣与联络工作。

1946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军工作部规定：凡没有建立国军工作机构的单位，应即建立起来，区党委级建立国军工作部或国军工作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党的秘密工作部分，并指导联络部工作，在不影响秘密工作原则下，联络部应当成为国军工作部的公开组织，并可按实际需要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如西北军工作委员会等），所有过去开辟的日伪工作站均可改变成以瓦解国民党军为主的联络站或办事处，并抽调具有一定经验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机构中去。

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军工作部规定：在组织上，各地国军工作由分局和省委统一领导，各分局与省委建立国军工作部门（无顽军地区除外），首长亲自领导；各地根据本地区情况，抽调适当的干部，特别是有国军工作经验和与国民党军军官有私人关系的干部，在国民党军兵力集中的交通要道周围（或其内部）建立在一定职业掩护下的秘密工作站，或组成专门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

国军工作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为迅速有效地开展对国民党军的政治争取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也为尔后进一步加强对国民党军瓦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开展国军工作的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均制定了开展国军工作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解放区党政军民各系统中，普遍调查、登记同国民党军有各种关系的人，从中找出适合做敌军工作的干部、群众，经适当训练后，以一部分担任各级敌军工作机构的领导，组织开展和研究敌军工作；一部分通过各种关系或利用国民党军抓兵、招

考军校学生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长期埋伏，结交朋友，积蓄力量，发展力量，准备在关键时刻策动、组织国民党军战场起义。二是教育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把已经解除武装的俘虏同持枪和人民军队作战的敌人严格区别开来，克服单纯的仇恨观念，坚决执行人民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切实做到不加伤害、不搜腰包、不打骂侮辱人格，并对伤病者给予治疗，不愿意留者，予以释放，用事实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所谓中共“残杀俘虏”的谎言，争取更多的蒋军官兵在战场上放下武器。三是对居住在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加以教育，并给以适当照顾和优待（如贫困者给以一定的救济；地主采取不斗争方式；自国民党统治区返回解放区，重务正业或参加工作者，不咎既往，是农民分给土地及财产），组织他们通过书信、喊话、捎口信等方式，劝导其亲属实行息战、罢战，脱离国民党军。四是奖励起义、投诚的有功人员。自动退出内战者，予以奖励。携枪投诚者，按规定发给奖金。五是大胆使用国民党军俘虏官兵。将经过一定教育培训的俘虏官兵，有组织有计划地释放回去，因人、因才、因事地给予适当任务，争取其在国民党军内部为人民军队工作。六是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坚决从军事上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政治争取，而且一有可能就立即转到以政治争取为主。开展敌军工作的基本手段是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恩威并施。七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瓦解敌军攻势。在解放区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队、民兵、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地方干部、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驻地及其周围以及国民党军可能进占的城镇，交通要道，以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组织喊话、写信等方式，号召国民党军官兵退出内战，反对内战，举行战场起义。八是实行各项工作的有机配合。把内线工作与外线工作、上层的联络工作与下层的具体工作、做军官的工作和做士兵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九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利用其同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旧有关系亲自出面做工作，晓之以理，促其放弃内战立场。十是拨出专

项经费。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指出：“做敌军这个工作是要用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有些同志怕赔本，希望同志们不要怕，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花上几十万来一个‘高树勋运动’，整团整师的搞过来，那就不知赚了多少钱！所以，在用钱方面，军区、军分区首长要大方一点，多用几个钱不要紧，我们给你们报销。”^①各战略区都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拨出一定经费，用于开展敌军工作。

（三）各战略区广泛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敌军工作。各中央局、分局、各解放区、各大军区在制定具体措施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区国民党军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敌军工作，使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民党军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且形式多样、各有特色。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依据陕甘宁解放区的情况，集中力量做陕甘宁边区北面国民党军的工作。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加强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较大的回旋余地。据此，西北局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到横山波罗堡会见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争取其起义。长期与中共有联系、思想进步的胡景铎表示：“不吃国民党的饭了，跟共产党走，坚决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并要求西北局尽快派人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习仲勋听取师源汇报后，立即和绥德地委共同研究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至6月底，西北局先后派30多人到胡部工作，并向其提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进入胡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士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侧面，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为尔后胡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 《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针对阎锡山军队中一部分军官做生意的特点，派敌军工作人员与其合伙做生意，使相互关系“由浅而深”，使其政治倾向“由渐变而突变”。国军工作部还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歌谣运动”，揭露阎锡山反动统治的黑暗，宣传解放区的民主自由、人民军队的宽大政策等。这种歌谣短小生动，唱起来很适合群众的口味。如揭露阎军黑暗，名为《苦难当》的民谣写道：“当了阎军遭了殃，挨打受气苦难当，半年发了一次饷，四盒纸烟花个光。”揭露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的歌谣是：“兵农合一好？！满地长青草，男的当了兵，土地充了公，女人跟了人，全家落了空。”宣传人民军队宽大政策的歌谣是：“八路军政策真宽大，不打不骂更不杀，只要你把枪放下，送你回家还把路费发。”过年时节鼓动阎军开小差的“歌谣”是：“家乡锣鼓响叮当，战场上炮火连天响，敲锣打鼓为什么？庆贺新年乐洋洋。炮火连天为什么？阎锡山发动打内战。私心话，对你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为老阎把命丧。有钱回家过新年，全家大小喜洋洋。”这些歌谣，有的印成传单或贺年片，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国民党军中去，有的则口头传播，大人教给小孩，干部传给群众，群众传给阎军家属，阎军家属传给阎军，很快就在阎军中传播开来。由于它符合实际，生动活泼，短小精悍，易于记忆，所以，对瓦解敌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组织开展“耳语运动”，即动员居住在阎军驻地附近的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机会，向阎军士兵宣传八路军的宽大政策，争取阎军成群的开小差回家或者携枪投诚。这一运动首先由太原分区发起，该分区为了更好地开展敌军工作，向县干部、区干部、村干部及各村群众以及阎军的家属、亲属等，布置了“耳语运动”。如1946年初，一位有经验的老太太被布置到太原县（现晋源）城邻近的某镇上，开设饼子铺，利用顽军士兵到铺子吃饭的机会，策动阎军士兵开小差回家或到解放区参加八路军，仅半年时间，该镇阎军1个营即被瓦解。这一运动，方法对，效果佳，1946年4

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向全区推广了这一成功经验。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军区的敌军工作部门根据上党、邯郸两次战役中俘获大批国民党军官兵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教育、改造、释放俘虏的经验，成立了俘虏军官教导团；并在俘虏中开展“诉苦运动”，使教育改造俘虏方式，由“集中整训”，“单一说教”，发展成为“以俘教俘”的新的群众性改造方式。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士兵是被抓来的，出身贫苦，都有一肚子的辛酸泪，都有悲惨的历史，控拆运动为这些士兵提供了诉苦道苦的好场所好机会。这种以国民党军士兵自己悲惨的历史教育自己的诉苦运动，被毛泽东称为：“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在教育、改造的基础上，将其有组织有计划的释放回国民党军队之中，做国民党军瓦解工作。1946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释放了邯郸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及第40军副军长刘世荣等5名高级将领；随后又释放了上党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1500余人。这一举动不仅戳穿了蒋介石制造的八路军、新四军“见俘虏就杀”的谎言，并且通过他们的宣传，促使国民党军内部分化。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乜庭宾经教育争取后被释放回郝鹏举部，即广为宣传人民军队的好处，并经过他，华东局敌工部又派人打入郝部，争取了郝部5个师长中的3个，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郝部的地下支部，展开了对郝部的争取工作，并最终争取了郝鹏举起义。

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根据地处解放区前哨的特点，号召全区军民深入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促使新的“高树勋连续出现”，要求“各级党委（区、地、县三级），各部队（师、旅、团）应当拿出一切力量，做到不放松一个可用的干部，一个可开展的关系，去全面的向周围顽伪开展工作”。从此，一个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运动在全区普遍开展起来。首先，对已被包围的敌军据点，加强火线瓦解攻势。其次，恢复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组织，每队由30—50人（也有60—100人）组成，在各

级敌军工作机构的领导下，到国民党军驻地周围开展宣传攻势。其三，释放俘虏，将有作用的俘虏，不论官兵一律放回作瓦解工作。其四，派干部打入国民党军，作长期打算。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刘贯一在总结做打入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打入工作是国军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打入对象，首先是国民党正规军，其次是地方保安部队，再次是顽政权及各种军事团体。打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精干和隐蔽。打入工作的方式分为五种：（1）直接打入（利用敌军和敌政权中的熟人关系打入）。（2）转移打入（先打入敌外围组织，然后再打入内部组织）。（3）自然打入（利用敌军抓丁拉夫机会打入）。（4）桥梁打入（利用敌军或其他团体招考学员的机会，设法前往投考）。（5）打入后再转移打入（先打入敌军一般组织，然后再设法转入原计划打入的敌军中）。其五，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开明士绅），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如开展“擦黑点运动”、“择路运动”、“一封信运动”、“贴标语运动”、“夜广播喊话运动”、“陈殿文瓦敌运动”等等。其中，“陈殿文瓦敌运动”是由胶东地区翻身农民陈殿文提出来的，他提出“咱村不能有当顽军的”号召，并召集顽属座谈，动员他们索子、唤夫。通过家属劝降，先后将全村10多个顽伪军全部争取回来。胶东区敌军工作部门，随即把这一群众自发的瓦敌活动加以推广，给以正确指导，并要求对争取回来的国民党士兵进行登记自首，办训练班。教育改造后，壮健的参加人民军队，体弱的给以优待回家，有些派回去做瓦解工作。

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的敌军工部门，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加强对滇军的工作。滇军是一支具有历史传统的军队，曾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同时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好的合作，部队中有地下党的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从越南的海防船运至东北内战前线，滇军的高级将领深知这是蒋介石企图以共产党的力量消灭异己的又一阴谋。因而深为不满。为了争取滇军，1946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抽调在延安工作、学习的刘浩等云南籍人员到东北工作，并将滇军中地下党员张士明、杨重、宁坚、王立中、杨守沫、黄致平的名单和联系办法交给刘浩。刘少奇、朱德还亲自向刘浩等布置了任务，指示他们从三个方面开展滇军工作：一是依靠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从滇军内部做工作；二是依靠东北民主联军的威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断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将领接触，对他们进行策反。朱德总司令还亲笔给滇军将领卢浚泉、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信，对他们晓以大义，施加影响。刘浩到滇军后，用少校军需官的身份掩护，以办理公务或做生意的名义，频繁来往于第60军和第93军，联络各部队中的地下党员，积极发展组织，开展策反工作。1946年5月30日，冀热辽分局成立滇军工作委员会，由程子华、肖克、黄欧东、欧阳钦、刘浩5人组成，程子华任书记。东北局国军工作部还在滇军驻防周围地区建立敌工站，专门调查滇军的动向，并不断组织打入工作。滇军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的一些关键时刻毅然举行反内战起义，与这个时期所开展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南京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瓦解国民党军的工作。一方面通过工人、农民、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动摇国民党军心，瓦解其士气。另一方面，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做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高级将领邓钊、萨空了、蔡廷锴、蒋光鼐等：“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扭转危局，为当前急务。吾人谋取和平民主方针确定不移，急待各方一致合作，力挽狂澜，望号召社会人士、旧友、部下共同反战，在南方主持言论中密切配合。”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接见了国民党军第3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向他指出：“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特别是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们要打，我们也就打，我们不但要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

要争取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张克侠听后异常激动地说：“我与部队相处日久，在作战中，他们肯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国民党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党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行动。”同时，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会见国民党军将领、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张治中的助手郭汝瑰。此后，由地下党员任廉儒与郭建立单线联系。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

三、开展“高树勋运动”的作用及其影响

随着“高树勋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国各地的一些国民党爱国军人，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纷纷高举义旗，退出内战，与解放区军民共同携手，为争取中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

在山东和华中地区，国民党第3路先遣军第4军军长赵云祥、第40师师长戴心宽，经中共地下党和苏中军区做工作后，于1945年11月10日率1万余人在江苏盐城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苏中解放第4军，赵云祥任军长，戴心宽任副军长，下辖第11、第12师。1946年1月9日，国民党第6路军总司令郝鹏举率4个师1万余人在山东台儿庄马兰屯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任总司令。同年5月23日，国民党军第4路军独立师师长杜淑率3000余人在山东东明县投诚。

在晋冀鲁豫地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军区国军工作部加强了对国民党军原西北军和阎锡山部的争取工作。1946年5月15日，驻河南巩县国民党军第38军副军长孔从洲将军（中共地下党员），同刘威诚、王汝昭一起率第55师起义。9月13日，起义部队与早在1945年7月17日起义的第38军第17师，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1946年8月15日，国民党河南省夏邑、永城、虞城联防总指挥蒋嘉宾率5000余人在虞城南楼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豫北支队。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军3个保安团在山西晋南起义；6月2日，阎锡山部汾南特务团3000余人在少将王海青、团长雷文清率领下通电起义，改编为汾南人民自

救军。1945年12月23日，山西省防第4军第12师第34团第3营200余人在襄陵县史村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支队。

在晋绥地区，1945年10月27日，国民党军驻绥远察素齐的第10路军第9师起义；11月6日，绥远第10路军伊克昭盟暂编保安师第2旅在包头郊外起义；11月11日，国民党绥蒙保安队在绥东卓资山起义。上述起义部队分别改编为内蒙人民自卫军第1、第2、第3支队。1946年8月14日，国民党军原东北军骑兵第15团300余人在山西大同白马城起义。同年11月该部又1个连在神池县起义。

在陕甘宁地区，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邓宝珊部第11旅旅部和第1团共2000余人，在陕北安边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11旅；1946年10月13日，国民党第22军第86师、新11旅及保安第9团等部官兵2000余人，在胡景铎率领下，分别在石湾、高镇、波罗堡、海流兔庙起义。并迫使临近的王龙山、韩家岔、横山城等地守军起义，使起义部队扩大到5000余人，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攻克镇川、武镇、鱼河堡、万佛洞等地，解放了无定河以南2万多平方公里、12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并于11月4日在武镇召开成立大会。12月初全师南调延安整编，12月24日，在枣园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世泰等出席大会。毛泽东在热烈掌声中同骑6师营以上干部一一握手。毛泽东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骑6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并用两只船作比喻说：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起义部队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横山起义无论是对西北战场还是对全国战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东北地区，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将军率师直和1个团，在辽宁省海城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起义的先例。这一行动不仅对蒋介石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解放战争中后期的长春起义及和平解放云南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众多国民党起义部队中，还包括被蒋介石称为嫡系之嫡系的空军、交警部队。1946年6月26日，即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当天，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首举义旗，驾B-24飞机飞到延安，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6月29日，毛泽东、朱德接见刘善本机组全体成员，并出席了延安军民召开的欢迎大会。7月9日，刘善本在延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们驾机起义，号召国民党空军人员反对内战。1946年8月10日，国民党交警第15总队第1大队长王一蕃率部400余人在胶济铁路东段南泉车站起义。

在“高树勋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的1年时间里，国民党军大小起义30余起，8万余人，占国民党军总兵力的2%。1946年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的文章，从革命战争规律上分析了高树勋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反动军队的许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是近代中国军队历史上的一种“规律”。“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他还分析了高树勋运动发展的“特别重要的历史基础”：其一，“今天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战争，是特别不义的战争。”其“实质乃是替美帝国主义打的亡国仗、汉奸仗。”其二，国民党军队内“大多数都刚刚经历过光荣的抗战”，现在却“又和伪军一起”，“戴起美国帽子，拿起

美国武器，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来杀中国人，这种污点是太令人痛心了。”其三，国民党军官兵在“内战才一开始就不断遇到重大的歼灭、打击，迫使他们必须在将要毁灭的命运面前决定自己的出路。”其四，“反动派利用内战来吞并和消灭杂牌军的政策，使约占半数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觉悟得更快。”其五，“国民党军队在与解放区军队接触以后，他们就发现国民党当局给他们进行的反共宣传完全是欺骗。”使其“马上失掉作用而产生反作用。”这一深刻分析，为人民解放军瓦解国民党军官兵，提供了思想武器，使“高树勋运动”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有了更大的发展。

本卷结语

(一)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饱尝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独立反对卖国。二是久经战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广阔的革命根据地，这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进步力量，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顺乎民心，主张实行和平、民主、团结，通过和平途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把中国建立成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三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自恃有强大的军队和美国的支持，继续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热衷于挑起内战；但它还存在许多困难，尤其是它的大部分兵力还在后方，调动军队、部署进攻需要时间，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尚不可能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渴求和平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以便重新实现其独裁统治。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主张，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四是苏、美、英等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亦不赞成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这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上述特点表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既有内战爆发的危险，又有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这两种可能性的存在，又决定了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

爆发之间，必然会出现一个过渡阶段，也决定了过渡阶段国共双方的斗争必然是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

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笼络人心，推行假谈和平，蓄谋挑起内战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实行在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同时，保持应有警惕，准备应付全面内战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种新形势下的斗争特点，使国共双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也就是说，以国共谈判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和企图挑起内战与反对内战的军事斗争交错进行，谈中有打，打中有谈，边谈边打。这一斗争特点，给人民军队的作战和建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作战必须受国共谈判政治斗争的制约，军事服从政治，作战配合和谈。因而在军事斗争中出现了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人民军队的建设则在军事、政治斗争交错进行中，边打边建，自始至终从最困难处着想，把军队建设的基点放在应付可能发生的全面内战上面，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阶段的斗争，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方针指引下，八路军、新四这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巨大努力，为维护《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其主张已为国际国内人民所瞩目，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一切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就无从谈起，这一点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已不像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自卫反击作战的正义行动，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教育了人民，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凝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253页。

聚力。与此相反，国民党则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中丧失了民心，开始陷入孤立。在军事上，八路军、新四军及南方游击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从1945年9月起的10个月里，共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个军22个师共145518人，非正规军400396人，共计歼敌545914人（内有起义42200人），从而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时间。此外，八路军、新四军还利用作战间隙，抓紧进行了自身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顺利地实现了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应付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指导过渡阶段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时局的发展作了科学的预测。在处理战争与和平两者的关系上，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策略上，在人民军队建设的措施上，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这些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过渡阶段的具体体现，是指导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本历史经验。

一、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保持应有的警惕，把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在争取和、准备打、立足于应付全面内战爆发的基点上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一方企图挑起内战，一方力争实现和平，因此，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首要问题。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①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普遍真理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实现国

^① 列宁：《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7年1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915页。

内和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政治方针，不能消除战争，但它对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有利，对改变落后的旧中国，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有利。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从人民的愿望出发，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基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和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本质的分析，对内战危险保持了高度警惕。在过渡阶段形势变化的几个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全军，既不要忽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又不要忽视战争的危险性。毛泽东在应邀赴重庆谈判前夕，就告诉全党全军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绝对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善心”；《双十协定》签订后，他又明确指出：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局部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绝对不可松懈”。这就使全党全军在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既具有斗争的灵活性，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协议达成后，中共中央虽然一度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份乐观，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但没有陷入和平幻想，提出了“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任务”，要求全军“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当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后，中共中央立即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的估计，并把工作重心迅速转到准备应付全面内战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正确处理了争取和平与准备战争的辩证关系，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的头脑，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在争取和，准备打，立足于应付全面内战爆发上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这就为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做了最重要的准备。

二、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八路军、新四军把作战的目的放在制止全面内战爆发、实现国内和平上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客观上存在着制约战争的因素，并不

等于和平民主就有了保障，取得这种保障，一是依靠力量，二是依靠人心。在政治斗争的同时，必须以正义的自卫反击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使之成为政治谈判的辅助。正如列宁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正确处理国共谈判和军事斗争的关系，在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中，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通过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谈判中妥协。因此，过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始终是围绕国共谈判而展开的。在重度谈判期间，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为保卫解放区而战，通过收复失地，打退国民党军向上党地区的进攻，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促进了重庆和平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人民军队又为维护《双十协定》而战，通过邯郸、平绥、津浦、同蒲诸战役的胜利，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阴谋，使其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而且还迫使其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以后，人民军队又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而战，坚决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和向关内解放区的进攻和蚕食。这一斗争的胜利，既捍卫了神圣的解放区，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在东北停战协定上签字。总之，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的全过程，是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共谈判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努力制止内战爆发的全过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科学论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实践证明，不怕内战，不怕分裂，坚决的胜利的自卫战争，是配合谈判推迟内战爆发的有效手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三、加速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适应新形势下大规模正规战争的作战需要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作战对象的不同以及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决定军事战略转变的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长达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适时的进行了几次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面临着国民党企图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实行一党专政的严峻形势。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所面临的任 务，既要向日伪占领区进军，扩大解放区，又要反击拥有强大正规兵团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制止内战爆发。要实现这一任务，仅以过去分散环境下的游击战争办法，是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只有把分散的游击战争转变为集中兵力进行较大规模正规战争，才能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否则，就会束缚手脚，影响革命进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据此作出了加速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中心内容是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使作战形式由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正规兵团打运动战为主。为达此目的，中央军委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形势教育入手，首先实现思想上的转变，要求全军明确认识：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各部队各地区之间的协同配合，与敌人进行正规战争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战胜敌人制止内战的主要手段；必须克服游击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习气，树立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二是迅速集中约 3/5 的主力，于全面内战爆发前组建了 24 个野战纵队和相当于纵队的师，使之成为实施广泛机动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同时，还以约 2/5 的兵力组成 51 个独立旅（师）的地方兵团，并大力发展民兵，以配合主力作战。三是各战略区和野战纵队均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机构和适应大兵团作战的供应体制。四是确立以打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根本指导思想，开展军政大练兵，提高军政素质。五是逐步改善部队特别是野战部队的装备。随着上述问题的逐步解决，至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全军已从思想上、体制上和组织上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健

全。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反对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作了积极的准备。

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及时调整战略部署，形成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过渡阶段国内的形势尽管存在着实现和平民主的可能性，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国共谈判不断出现僵局，内战爆发危险不能排除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军事战略布局尽可能形成应付全面内战的有利态势，就成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有可能控制热、察和争取东北三省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部署，撤出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南方几个解放区的部队，抽调大批主力进入东北。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正确而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它使得人民军队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三省的先机，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良好条件，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和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随着长江以南几个解放区部队的北撤，使人民军队收紧了阵地，集中了兵力，加强了华北、华东的军事力量，这既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争得了主动，又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在总体战略布局上，使各解放区互为犄角，形成了以东北解放区为战略基地，以华东、晋冀鲁豫、陕甘宁、晋绥、晋察冀解放区互为依托的有利态势。这对于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为尔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五、加强根据地建设，把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建立在打人民战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 军事力量物质基础的重要方面是经济力量，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经济力量看成是战争“本源的东西”^②，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和毛泽东依据这一科学论断，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历来把根据地作为进行革命战争的后方依托和战略基地。依靠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使人民军队赖以生存、发展并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而十分重视加强根据地建设。这一基本思想在过渡阶段所体现出的显著特点，就是党政军一齐动手，把加强根据地建设作为应付全面内战准备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等一系列指示，这些指示所贯穿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在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和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加强根据地的综合实力。据此，在一切新解放区，特别是东北解放区，人民军队派出了大批主力部队，在地方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全面开展反奸反特、剿灭土匪、建立新政权、扩大人民武装和成立农、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政治斗争，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在此基础上转入减租减息和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使东北根据地在1946年头3个月内已初具规模，这对落实“向北发展”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在老解放区，普遍开展以复查减租减息法令贯彻情况为中心的“复查运动”，其中群众基础较好的腹心地区，还将减租减息政策发展为“耕者有其田”政策，使数千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无论新解放区还是老根据地，在减租减息和土改的基础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3页。

上，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变工队、互助组、小型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实力有显著增强。

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强，不仅增强了支援战争的能力，为粉碎国民党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从获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中，激发了保卫根据地的政治热情，增强了参军参战，从各方面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这样，就使八路军、新四军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牢牢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使自卫战争成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

附录 中共中央军委及各军区各野战军序列

一、中共中央军委及各军区各野战军序列 (1945. 12)

中共中央军委序列

主	席	毛泽东	
副	主	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 参 谋 长		彭德怀 (兼)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刘少奇 (兼)	
副 总 参 谋 长		叶剑英	
总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程子华	
军 委 秘 书 长		杨尚昆	
总 后 勤 部 部 长		杨立三	

中共中央军委下辖：

总 参 谋 部	
总 政 治 部	
总 后 勤 部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晋察冀军区
晋 绥 军 区	东北人民自治军
晋 冀 鲁 豫 军 区	中原军区
山 东 军 区	华南各游击纵队
华 中 军 区	

(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序列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司 令 员	王世泰 (代)
副 司 令 员	徐向前
副 政 治 委 员	谭 政
参 谋 长	阎揆要
政治部副主任	张仲良

教导旅

旅 长	罗元发
政治委员	罗元发 (兼)
副 旅 长	邱 蔚
副政治委员	饶正锡
参 谋 长	陈海涵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 (兼)

新编第 4 旅

旅 长	张贤约
政治委员	徐立清
副政治委员	黄振棠

第 385 旅 (兼陇东警备区)

旅 长	王维舟
政治委员	马文瑞
副 旅 长	黄罗斌

警备第 1 旅 (兼关中警备区)

旅 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张德生
副 旅 长	杨拯民
	汪 锋
参 谋 长	汪 锋 (兼)
政治部主任	牛书申

警备第 3 旅 (兼三边警备区)

旅 长	贺晋年
副 旅 长	吴岱峰
参 谋 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郭炳坤

绥德警备区

司 令 员	王季龙
政 治 委 员	王季龙 (兼)
副政治委员	白治民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 谋 长 胡登高
政治部主任 张汉民（代）

新编第 11 旅

旅 长 曹又参

晋绥军区

政 治 委 员 李井泉
副 司 令 员 续范亭 周士第
参 谋 长 陈漫远
政 治 部 主 任 张平化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冼恒汉
后 勤 部 部 长 陈希云

吕梁军区

司 令 员 张宗逊 政 治 委 员 张宗逊（兼）
副政治委员 罗贵波 解学恭 参 谋 长 张希钦
政治部主任 罗贵波（兼）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 刚 高士一（后）
政 治 委 员 秦力生 张国声（后）
副 司 令 员 慕生中
副政治委员 李梦龄
参 谋 长 朱玉庭
政 治 部 主 任 贺翼章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杨秀山
政 治 委 员 刘文珍
副 司 令 员 张新华
政 治 部 主 任 颜龙茂

第 7 军分区

司 令 员 马佩勋

第 8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长江

政治委员 谷志标 (后)
马佩勋

政治部主任 陈远波

第9军分区

司令员 黄忠学
政治委员 黄忠学 (兼)

独立第4旅

旅长 顿星云
政治委员 杨秀山

雁门军区

政治委员 高克林
朱明 (后)
副政治委员 孙志远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李文清
政治委员 傅子和
副政治委员 罗毅
参谋长 刘华香
政治部主任 田麟勋

第6军分区

司令员 唐子奇
政治委员 梁仁芥

侯俊岩 (后)
政治委员 甘一飞
张永清 (后)
参谋长 杨文安
政治部主任 曹光琳

第10军分区

司令员 陈国栋

副司令员 许光达 孙超群
政治部主任 孙志远 (兼)

第5军分区

司令员 王赤军
政治委员 李登瀛
副司令员 范忠祥
参谋长 周智高
政治部主任 沈新发

副政治委员 景明远 龙福才
参 谋 长 王兰麟
政治部主任 龙福才（兼）

绥蒙军区

司令员 姚 喆 政治委员 张达志 高克林（后）
参谋长 邓家泰 政治部主任 饶 兴

骑兵旅

旅 长 康健民
政治委员 王再兴
副政治委员 李佐玉
参 谋 长 王 智
政治部主任 王弼臣

第 11 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立清
政 治 委 员 张毅忱
副政治委员 袁 光
参 谋 长 曾 征
政治部主任 袁 光（兼）

绥东军分区

司令员 李甫良

直属第一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漫远
政治委员 刘长亮

晋绥野战军

司 令 员 贺 龙
政 治 委 员 关向应
副政治委员 李井泉
参 谋 长 张经武
政 治 部 主 任 甘泗淇 孙志远（后）
副 参 谋 长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冼恒汉

第 358 旅

旅 长 黄新廷
政治委员 余秋里
副 旅 长 唐金龙
参 谋 长 方复生
政治部主任 余秋里 (兼)

独立第 1 旅

旅 长 王尚荣
政治委员 朱辉照
副 旅 长 傅传作
参 谋 长 贾 陶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独立第 2 旅

旅 长 许光达 (兼)
政治委员 孙志远 (兼)
参 谋 长 李 硕
政治部主任 李健良

独立第 3 旅

旅 长 杨嘉瑞
政治委员 金如柏
参 谋 长 樊哲祥
政治部主任 贺翼章

(二) 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司 令 员 刘伯承
政 治 委 员 邓小平
第一副司令员 滕代远
第二副司令员 王宏坤
第一副政治委员 薄一波
第二副政治委员 张际春
参 谋 长 李 达
政 治 部 主 任 张际春 (兼)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王新亭
后 勤 部 部 长 周文龙

第 1 纵队 (1945 年 10 月组建后开赴东北, 后改属晋察冀军区建制)

第 2 纵队

司令员 陈再道 政治委员 宋任穷
副司令员 范朝利 参谋长 范朝利（兼）
政治部主任 钟汉华

第4旅

旅长 孔庆德
政治委员 刘明辉
副旅长 赵鹤亭
副政治委员 崔子明
参谋长 赵晓舟
政治部主任 姚克祐

第5旅

旅长 雷绍康
政治委员 寇庆延
副旅长 牟海秀
副政治委员 汪洪青
参谋长 陈中民
政治部主任 王进前

第6旅

旅长 王天祥
政治委员 刘华清
副旅长 周发田
副政治委员 彭学桂
参谋长 王明坤
政治部主任 曹中南

第3纵队

司令员 陈锡联
副司令员 曾绍山 阎红彦
参谋长 曾绍山（兼）

政治委员 彭涛
政治部主任 卢仁灿

第7旅

旅长 赵兰田
政治委员 曾庆梅
副政治委员 周维

第8旅

旅长 马忠全
政治委员 卢南樵
参谋长 史景班

参 谋 长 曹更修
政治部主任 高厚祖

政治部主任 刘文勇

第 9 旅

旅 长 郑国仲
政 治 委 员 秦传厚
副政治委员 高治国
参 谋 长 朱 光
政治部主任 张恒业

第 4 纵队

司 令 员 陈 赓
副 司 令 员 韩 钧
政治部主任 杨奇清 (兼)

政 治 委 员 谢富治
副政治委员 杨奇清

第 10 旅

旅 长 周希汉
政 治 委 员 刘 忠 (兼)
副 旅 长 楚大明
政治部主任 雷起云

第 11 旅

旅 长 李成芳
政 治 委 员 刘有光
副 旅 长 蔡爱卿
政治部主任 胡荣贵

第 13 旅

旅 长 陈 康
政 治 委 员 廖冠贤
副 旅 长 黎锡福
副政治委员 张 明
政治部主任 张 明 (兼)

第 6 纵队

司 令 员 王宏坤 (兼)
副 司 令 员 王近山 韦 杰
参 谋 长 张廷发

政 治 委 员 段君毅
政 治 部 主 任 鲍先志

第 16 旅

旅 长 韦 杰 (兼)
政 治 委 员 张国传
副 旅 长 宗凤州
参 谋 长 邢荣杰
政 治 部 主 任 冷裕光

第 17 旅

旅 长 石志本
政 治 委 员 何柱成
副 旅 长 尤太忠
副 政 治 委 员 韩 明
参 谋 长 赖光勋
政 治 部 主 任 段大明

第 18 旅

旅 长 肖永银
政 治 委 员 李 震
副 旅 长 向守志
参 谋 长 刘鹏旭
政 治 部 主 任 刘 昌

第 7 纵队

司 令 员 杨 勇
副 司 令 员 赵基梅
参 谋 长 昌炳桂
政 治 委 员 张霖芝
副 政 治 委 员 张国华
政 治 部 主 任 王辉球

第 19 旅

旅 长 吴大明
政 治 委 员 谢富林
副 旅 长 傅春早
政 治 部 主 任 罗 英

第 20 旅

旅 长 匡 斌
政 治 委 员 石新安
副 旅 长 汪家道
副 政 治 委 员 李士才

政治部主任 匡根山

第21旅

旅 长 况玉纯
政治委员 刘振国
副旅长 程绍祥
副政治委员 余非
参谋长 魏文建
政治部主任 姜思毅

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王秉璋	政治委员	张玺
副司令员	刘志远	副政治委员	赵健民
参谋长	潘焱	副政治委员	潘复生
政治部主任	王幼平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周桂生
政治委员 申云甫
副司令员 朱子伟
副政治委员 彭天琦
参谋长 朱子伟 (兼)
政治部主任 李文甫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郭影秋
政治委员 郝中士
副司令员 戴元仁
参谋长 朱尽乡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何光宇
政治委员 万里
副司令员 张刚剑
副政治委员 范阳春
参谋长 杨昆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李静宜
政治委员 赵紫阳
副司令员 赵遵康
副政治委员 王焕如

参 谋 长 杨育才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兼)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朱属华
政 治 委 员 刘 星
副 司 令 员 宋励华 江海山
副政治委员 刘德海 戴晓东
参 谋 长 周桂安

第 6 军分区

司 令 员 金绍山
政 治 委 员 袁 振
副 司 令 员 孙子植
副政治委员 郑 华
参 谋 长 孙子植(兼)

独立旅

旅 长 马宗凯
副政治委员 胡正平
参 谋 长 阎海清
政治部主任 屈兴栋

冀南军区

司 令 员 杜义德 政 治 委 员 李菁玉
副 司 令 员 王光华 副 政 治 委 员 刘志坚 马国瑞
参 谋 长 陈明义 政 治 部 主 任 刘志坚 (兼)

独立第 4 旅

旅 长 孙仁道
政 治 委 员 杨树根
副 旅 长 田厚义
参 谋 长 王树棠
政治部主任 李福尧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白 云
政 治 委 员 许梦侠
副 司 令 员 胡超伦
副政治委员 张希才 杨新一
参 谋 长 刘始明
政治部主任 张希才 (兼)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李定灼
 政治委员 赵一民
 副司令员 赵彩银
 副政治委员 王贵德
 政治部主任 王贵德 (兼)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张维翰
 政治委员 李福祥
 副司令员 高厚良 李大磊
 副政治委员 甘思和 赵海枫
 政治部主任 王谦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王蕴瑞
 政治委员 江明
 副司令员 何济林 李所庵
 副政治委员 乔晓光 贺亦然
 政治部主任 贺亦然 (兼)

第5军分区

司令员 刘福胜
 政治委员 陈登昆
 副司令员 黄光霞 贾殿阁
 副政治委员 陈伯禄
 参谋长 姚凤林

太行军区

司令员 秦基伟
 副司令员 黄新友 赵辉楼
 参谋长 何正文

政治委员 李雪峰
 副政治委员 黄镇
 政治部主任 袁子钦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胡震
 政治委员 冷楚
 副司令员 王远芬
 参谋长 王远芬 (兼)
 政治部主任 胡立信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鲁瑞林
 政治委员 刘建勋
 副司令员 周善芳
 副政治委员 张慧如 池必卿
 参谋长 吴仕洪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韩卫民
 政治委员 于一川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黄新友 (兼)
 政治委员 刘毅

参 谋 长 信俊杰

副 司 令 员 安中原
副 政 治 委 员 宋子春
参 谋 长 陈 皓
政 治 部 主 任 孔俊彪

第 5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崔建功
政 治 委 员 谷景生
副 司 令 员 黄以仁
副 政 治 委 员 张警玲
参 谋 长 黄以仁 (兼)
政 治 部 主 任 曾宪池

第 6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陶国清
政 治 委 员 陶鲁笏
副 司 令 员 张锡珩
副 政 治 委 员 吕鸿安 赵时真

太 岳 军 区

司 令 员 王新亭 (兼)
副 司 令 员 孙定国
参 谋 长 邓仕俊

政 治 委 员 王鹤峰
副 政 治 委 员 裴孟飞
政 治 部 主 任 桂绍彬

第 1 军 分 区

政 治 委 员 刘植岩
副 司 令 员 苏 鲁
参 谋 长 张希英
政 治 部 主 任 梁文英

第 2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张祖谅
政 治 委 员 刘尚志
副 司 令 员 景仙洲 涂则生
副 政 治 委 员 杨玉屏
参 谋 长 王清川

第 3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王 墉
政 治 委 员 柴泽民
副 司 令 员 李明如

第 4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郭庆祥
政 治 委 员 薛 迅
副 政 治 委 员 贺崇升

副政治委员 王观潮
参 谋 长 樊执中
政治部主任 王观潮（兼）

参 谋 长 常仲连

第 23 旅

旅 长 黄定基
政 治 委 员 车敏瞧
参 谋 长 张振华
政治部主任 孙灏正

第 24 旅（亦称独立旅）

旅 长 刘金轩
政 治 委 员 李 耀
副 旅 长 查玉升

民主建国军

总司令 高树勋 副总司令 廖安邦
参谋长 肖秉钧

第 1 军

军 长 范龙章
参谋长 许静凡

第 1 师

师 长 阎济民
政治委员 张杰轩

第 2 师

师 长 田树青
政治委员 苏俊山

第 2 军

军 长 乔明礼
参谋长 孙嗣同

第 4 师

师 长 商正夏
参谋长 乔廷居

第 5 师

师 长 聂志超
参谋长 杨 敏

军区直属第 17 师（起义部队改编）

师 长 张复振
政治委员 刘威诚
副 师 长 梁励生
参 谋 长 李幕愚
政治部主任 张西鼎

（三）山东军区序列

司 令 员 罗荣桓
政 治 委 员 罗荣桓（兼）
副政治委员 黎 玉
政治部主任 肖 华

第 1 师

师 长 梁兴初
政 治 委 员 梁必业
参 谋 长 李梓斌
政治部主任 刘西元

第 2 师

师 长 罗华生
政 治 委 员 刘兴元
参 谋 长 贺东生
政治部主任 王树君

第 3 师

师 长 王建安
政 治 委 员 周赤萍
副 师 长 胡奇才
参 谋 长 李福泽
政治部主任 王文轩

第 4 师

师 长 廖容标
政 治 委 员 王一平
副 师 长 周长胜
参 谋 长 周长胜（兼）
政治部主任 欧阳平

第 5 师

师 长 吴克华

第 6 师

师 长 聂凤智

政治委员 彭嘉庆
参谋长 卜才
政治部主任 刘浩天

政治委员 李丙令
副师长 蔡正国
参谋长 蔡正国（兼）
政治部主任 李冠元

★ 第7师

师长 杨国夫
政治委员 周贯五
副师长 龙书金
参谋长 阎捷三
政治部主任 徐斌州

第8师

师长 王麓水
政治委员 王麓水（兼）
副师长 何以祥
参谋长 马冠三
政治部主任 曾明桃

独立第1旅

旅长 王道
参谋长 赵凌实
政治部主任 郭卓辛

独立第2旅

旅长 莫正民
副旅长 陈笏卿
参谋长 马骥
政治部主任 王东年

独立第3旅

旅长 张希贤
参谋长 张建斋
政治部主任 王崇礼

独立第4旅

旅长 韩寿臣
参谋长 韩顾三
政治部主任 王芳

鲁中军区

司令员 王建安
副司令员 邝任农

政治委员 罗舜初
政治部主任 李培南

警备第1旅

旅长 孙继先

警备第2旅

旅长 吴瑞林

政治委员 孔繁彬

警备第3旅

旅 长 胡奇才

第1军分区

司 令 员 钱 钧

政 治 委 员 林乎加

副政治委员 李伯秋

参 谋 处 长 刘国柱

第2军分区

司 令 员 吴瑞林

政 治 委 员 王 涛

副司令员 封振武

副政治委员 孔繁彬

政治部主任 孔繁彬 (兼)

参 谋 主 任 王全珍

第3军分区

司 令 员 胡奇才

政 治 委 员 刘莱夫

副司令员 单 洪

政治部主任 张开云

第4军分区

司 令 员 孙继先 (兼)

政 治 委 员 霍士廉

副政治委员 李耀文

参 谋 长 张耀辉

第5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 奇

鲁南军区

司 令 员 张光中

副司令员 万春圃

参 谋 处 长 来光祖

政 治 委 员 王麓水

政治部主任 丁秋生

警备第8旅

旅 长 贺 健

警备第9旅

旅 长 胡大荣

政治委员 杨士法
副政治委员 刘春

副旅长 王献庭
副政治委员 李青
参谋长 陈士发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贺健
政治委员 杨士法
副政治委员 刘春
参谋长 蔺毅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张雄
政治委员 张雄(兼)
参谋长 阎超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胡大荣
副司令员 王献庭
副政治委员 李青
参谋长 陈士发

独立支队

政治委员 张洪仪

滨海军区

司令员 陈士渠
副司令员 万毅
参谋长 张仁初

政治委员 唐亮
政治部主任 赖可可

警备第10旅

旅长 赵杰

警备第11旅

旅长 覃士冕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黎有章
政治委员 王众音
副司令员 侯世奎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覃士冕(兼)
政治委员 谷牧
参谋长 严似海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赵杰
政治委员 田海山
副政治委员 王建青
政治部主任 黄玉昆

滨海支队

支队长 万毅（兼）
政治委员 王维平
副支队长 彭景文
参谋长 管松涛
政治部主任 王维平（兼）

胶东军区

司令员 许世友
副司令员 袁仲贤
参谋长 袁仲贤（兼）

政治委员 林浩
政治部主任 彭嘉庆

警备第4旅

旅长 刘涌

警备第5旅

旅长 贾若瑜
政治委员 刘浩天（代）
参谋长 卜才

东海军分区

司令员 刘涌（兼）
政治委员 仲曦东
副司令员 于得水
参谋长 张怀忠
政治部主任 张少虹

北海军分区

司令员 孙端夫
政治委员 刘仲华
副政治委员 张英勃
参谋长 刘云鹏

西海军分区

司令员 陈华堂
政治委员 吕明仁（代）
副政治委员 李华
参谋长 毕永之

南海军分区

司令员 贾若瑜（兼）
政治委员 廖海光
参谋长 杨介人

政治部主任 邓龙翔

中海军分区

渤海军区

司令员 杨国夫

副司令员 袁也烈

政治部主任 周贯五

政治委员 景晓村

副政治委员 刘其人

警备第6旅

旅长 刘贤权

政治委员 陈德

副旅长 郑大林

警备第7旅

旅长 赵寄舟

政治委员 李曼村

副旅长 许云轩

政治部主任 丁士采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傅继泽

政治委员 李广文

副司令员 仇鸿印

副政治委员 李雪炎

政治部主任 辛易之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刘贤权

政治委员 曾旭清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许云轩

政治委员 李曼村

政治部主任 克明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王兆相

政治委员 徐斌洲

副司令员 程绪润

参谋处长 胡兰芝

第5军分区

司 令 员 赵寄舟
政 治 委 员 岳拙元
副 司 令 员 石潇江
副政治委员 苏 杰

(四) 华中军区序列

司 令 员 张鼎丞
政 治 委 员 邓子恢
副 司 令 员 粟 裕 张爱萍
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
政 治 部 主 任 谭震林 (兼)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钟期光

苏中军区

司 令 员 管文蔚 政 治 委 员 陈丕显
参 谋 长 胡炳云 政 治 部 主 任 陈时夫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震东
政 治 委 员 钟 民
副 司 令 员 梅嘉生
副政治委员 许家屯
参 谋 长 梅嘉生 (兼)
政 治 部 主 任 许家屯 (兼)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钟国楚
政 治 委 员 金 柯
副 司 令 员 杨洪才
副政治委员 韦永义
参 谋 长 吴光明
政 治 部 主 任 张潮夫

独立旅

旅 长 陈玉生
政 治 委 员 李干辉
副 旅 长 饶守坤

副政治委员 张闳初
参 谋 长 罗桂华
政治部主任 童炎生

淮南军区

司 令 员 周骏鸣
副司令员 梁从学 成 钧
参 谋 长 梁从学 (兼)

政治委员 肖望东
副政治委员 赵启民
政治部主任 余立金

第 3 军分区 (兼独立旅)

司 令 员 罗占云
政治委员 李世炎
副司令员 谭知耕
参 谋 长 谭知耕 (兼)
政治部主任 刘求须

第 4 军分区 (兼警备第 6 旅)

司 令 员 陈庆先
政治委员 黄 岩
副政治委员 刘毓标

直属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谢祥军
政治委员 曹荻秋
副司令员 常玉清
副政治委员 杨光池
参 谋 处 长 陈克天

直属第 6 军分区

司 令 员 覃 健
政治委员 万众一
副司令员 张克辛
副政治委员 谢振华
参 谋 长 张克辛 (兼)
政治部主任 陶 励

直属第 7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震球
政治委员 赖 毅
副司令员 赵汇川
副政治委员 刘玉柱

直属第 8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太生
政治委员 吴芝圃
副政治委员 何明光

参 谋 长 黄元庆
参 谋 处 长 孙靖宇
政 治 部 主 任 刘作孚

解放第 1 军

军 长 钟剑魂
参 谋 长 徐楚光
政 治 部 主 任 汪大漠

第 1 师

师 长 廖洪学
政 治 委 员 徐楚光 (兼)

解放第 2 军

军 长 杜新民
参 谋 长 冯文华

副 军 长 张若禧
政 治 部 主 任 王子光

第 1 旅

旅 长 邢剑五

第 2 旅

旅 长 李福元

第 3 旅

旅 长 韩守泽
政 治 部 主 任 顾天池

第 4 旅

旅 长 赵汝泮

解放第 4 军

军 长 戴心宽
参 谋 长 张伟农

政 治 部 主 任 薛向宝

第 11 师

第 12 师

师 长 戴心宽（兼）
副 师 长 李文林
参 谋 长 杨 进

师 长 彭干卿
副 师 长 王发祥

海防总队

政 治 委 员 王治平
副 司 令 员 吴福海 陆洲舫 袁国祥
副 政 治 委 员 吕炳奎

华中野战军

司 令 员 粟 裕
政 治 委 员 谭震林
参 谋 长 刘先胜
政 治 部 主 任 钟期光

第 6 纵队

司 令 员 王必成
政 治 委 员 江渭清
副 司 令 员 段焕竟
参 谋 长 陈铁君
政 治 部 主 任 刘文学

第 7 纵队

司 令 员 吉 洛
政 治 委 员 吉 洛（兼）
副 司 令 员 张 藩
参 谋 长 杜 屏
政 治 部 主 任 卢 胜

第 8 纵队

司 令 员 陶 勇
政 治 委 员 陶 勇（兼）
副 司 令 员 彭德清
副 政 治 委 员 伍洪祥
政 治 部 主 任 韩念龙

第 9 纵队

司 令 员 张 震
政 治 委 员 张 震（兼）
副 司 令 员 饶子健
参 谋 长 姚运良
政 治 部 主 任 王学武

(五) 晋察冀军区序列

司 令 员	聂荣臻	
政 治 委 员	聂荣臻 (兼)	
副 司 令 员	肖 克	
副 政 治 委 员	刘澜涛	罗瑞卿
参 谋 长	唐延杰	
政 治 部 主 任	朱良才	
副 参 谋 长	耿 飏	曾涌泉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潘自力	蔡树藩

第 1 野战军

司 令 员 聂荣臻
政 治 委 员 聂荣臻 (兼)
副 参 谋 长 耿 飏

冀晋 (陈正湘) 纵队

司 令 员 陈正湘 政 治 委 员 王 平
参 谋 长 唐子安

第 3 旅

旅 长 马 龙
政 治 委 员 傅崇碧
参 谋 长 钟天法
政 治 部 主 任 边 疆

第 4 旅

旅 长 陈仿仁
政 治 委 员 黄文明
参 谋 长 杜喻华
政 治 部 主 任 蔡长元

冀察 (郭天民) 纵队

司 令 员 郭天民 副 政 治 委 员 李天焕
参 谋 长 易耀彩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天焕 (兼)

第6旅

旅 长 肖应棠
政治委员 龙道权

第7旅

旅 长 肖文玖
副 旅 长 晨 光
副政治委员 李水清
参 谋 长 晨 光 (兼)

第9旅

旅 长 熊 奎
副政治委员 黄连秋

骑兵旅

旅 长 陈宗坤

冀察（刘道生）纵队

政治委员 刘道生 参 谋 长 肖思明

第8旅

旅 长 詹大南
政治委员 刘国梁

第10旅

旅 长 马 辉
政治委员 严庆堤

冀中（杨成武）纵队

司 令 员 杨成武 政 治 委 员 林 铁
副政治委员 李志民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志民 (兼)

第11旅

旅 长 杜文达
副 旅 长 黄光明
副政治委员 廖鼎琳

第12旅

旅 长 贾士珍
政 治 委 员 周 彪
政 治 部 主 任 张迈君

第13旅

旅 长 王道邦
政 治 委 员 王道邦 (兼)

副 旅 长 宋玉琳
政治部主任 刘光裕

第2野战军

司 令 员 肖 克 (兼)
政治委员 罗瑞卿 (兼)
参 谋 长 彭寿生

第1纵队

司 令 员 杨得志 政 治 委 员 苏振华
副 司 令 员 曾思玉 参 谋 长 卢绍武
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第1旅

旅 长 杨俊生
政 治 委 员 邓存伦
副 旅 长 齐丁根
参 谋 长 李 觉
政治部主任 任国章

第2旅

旅 长 尹先炳
政 治 委 员 戴润生
副 旅 长 郑统一
参 谋 长 王 晓
政治部主任 裴志耕

第3旅

旅 长 李东潮
政 治 委 员 陈云开
副 旅 长 温先星
副政治委员 郑思群
参 谋 长 詹世彬

热辽 (黄永胜) 纵队

司 令 员 黄永胜 政 治 委 员 朱涤新

副 司 令 员 文年生

第 22 旅

旅 长 欧致富
政 治 委 员 陈志彬
副 旅 长 周家美 加国祥
副政治委员 吴宗鹏
参 谋 长 赵黎平
政治部主任 龙标桂

第 30 旅

旅 长 张德发
政 治 委 员 谢堂忠
副 旅 长 张 甦
副政治委员 韦世修
参 谋 长 徐乃斌
政治部主任 曹德连

冀东（詹才芳）纵队

司令员 詹才芳

第 12 旅

旅 长 任昌辉
政 治 委 员 林茂源
副政治委员 刘随春
参 谋 长 李子钧
政治部主任 何兰阶

第 14 旅

第 27 旅

旅 长 丁 盛
政 治 委 员 韦祖珍
副政治委员 孔瑞云
参 谋 长 陈运春
政治部主任 李 勃

混成旅

旅 长 王 衍
政 治 委 员 李志明
参 谋 长 任宪东

第 13 旅

旅 长 肖全夫
政 治 委 员 李振声
副政治委员 向仲华
参 谋 长 赵甫臣
政治部主任 周华彪

旅 长 何能彬
政治委员 徐光华
副 旅 长 李道之
副政治委员 黄志勇
参 谋 长 李风阁
政治部主任 程露天

冀晋（赵尔陆）纵队

司令员 赵尔陆 副司令员 韩 伟 杨梅生
参谋长 张开荆 政治部主任 张平凯

第 1 旅

旅 长 李 湘
政治委员 曾 美
副 旅 长 贺礼保 曾保堂
参 谋 长 周 宏
政治部主任 袁佩爵

第 2 旅

旅 长 黄方刚
政治委员 覃国翰
副 旅 长 黄鹤显 陈云中
副政治委员 刘 汉 王 文
参 谋 长 陈云中（兼）
政治部主任 王 文（兼）

第 3 旅

旅 长 赵文进
政治委员 陈仁麒
副 旅 长 杨思禄
副政治委员 孙文彩
参 谋 长 赵兰舟
政治部主任 刘禄长

冀中（黄寿发）纵队

副司令员 黄寿发 副政治委员 帅 荣

参 谋 长 刘秉彦 政治部主任 谭冠三

第 1 旅

旅 长 周仁杰
政 治 委 员 漆远渥
政治部主任 翁积初

第 2 旅

旅 长 肖新槐
政 治 委 员 张如三
副政治委员 张明河
参 谋 长 甘若彬
政治部主任 李兆炳

冀中军区

司 令 员 孙 毅 (代)
副政治委员 李志民

政 治 委 员 林 铁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志民 (兼)

第 6 军分区

政 治 委 员 邓可运

第 7 军分区

司 令 员 于权伸
政 治 委 员 张庆春
副政治委员 甘春雷

第 8 军分区

司 令 员 贾士珍
政 治 委 员 周 彪
参 谋 长 唐应光
政治部主任 谢继友

第 9 军分区

司 令 员 魏洪亮
政 治 委 员 陈 鹏

第 10 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秉彦
政 治 委 员 旷伏兆
参 谋 长 路 遐

冀晋军区

司令员 赵尔陆（兼）
副司令员 陈正湘
参谋长 唐子安

政治委员 王平
副政治委员 刘秀峰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曾美
政治委员 张连奎
副政治委员 金行生
参谋长 葛秀峰
政治部主任 杨世明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李湘
政治委员 黄文明
副政治委员 陈宜贵
参谋长 李棠绩
政治部主任 陈宜贵（兼）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马龙
政治委员 丁莱夫
参谋长 盛治华
政治部主任 燕 菁

第5军分区

司令员 陈仿仁
政治委员 马天水
副司令员 罗执文
副政治委员 赵国威
参谋长 罗执文（兼）
政治部主任 赵国威（兼）

冀察军区

司令员 郭天民
副政治委员 刘杰 李天焕
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兼）

政治委员 刘道生
参谋长 易耀彩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肖应棠
政治委员 杨世杰
参谋长 宋晓飞

第11军分区

司令员 肖文玖
政治委员 高鹏先
参谋长 张承

第12军分区

司令员 詹大南
政治委员 陆平
政治部主任 吴涛

第13军分区

司令员 熊奎
政治委员 吴光
参谋长 唐家礼
政治部主任 郑枢

第19军分区

司令员 陈宗坤
副司令员 赖富

冀热辽军区

司令员 肖克
第一政治委员 程子华
第二政治委员 罗瑞卿
副司令员 李运昌
参谋长 李聚奎

冀东军区

司令员 陈伯钧
政治委员 李楚离
副司令员 詹才芳
政治部主任 李中汉

第14军分区

司令员 曾雍雅
政治委员 方治平
副司令员 王智涛
副政治委员 李孔亮

第15军分区

司令员 曹致富
政治委员 杨文翰
政治部主任 杨春卡

政治部主任 李孔亮（兼）

第16军分区

司令员 李道之
政治委员 刘亦如
副司令员 田周春
副政治委员 唐凯
参谋长 王衍
政治部主任 唐凯（兼）

第17军分区

司令员 曾辉
政治委员 王世煜

第18军分区

司令员 田心
政治委员 田心（兼）
副司令员 李兴
参谋长 曹诚

第11旅

旅长 曾雍雅（兼）
政治委员 李雪瑞
副政治委员 王功贵
政治部主任 王功贵（兼）

热河军区

司令员 段苏权 政治委员 黄火青
副司令员 杨梅生 参谋长 舒行
政治部主任 苏启胜

热西军分区

司令员 钟辉琨
政治委员 谢明
政治部主任 谢金山

热中军分区

司令员 赵福兴
政治委员 黄文
副司令员 何庭一
参谋长 何庭一（兼）

热东军分区

司令员 刘兴隆

热北军分区

司令员 俞仁杰

政治委员 段德彰
政治部主任 吴振刚

政治委员 王一伦
副司令员 卜云龙
参谋长 师军
政治部主任 邱英华

晋察冀军区直属教导师

师长 李湘 政治委员 张明河

(六) 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

总司令 林彪
第一政治委员 彭真
第二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一副司令员 吕正操
第二副司令员 李运昌
第三副司令员 周保中
第四副司令员 肖劲光
副政治委员 程子华
第一参谋长 肖劲光 (兼)
第二参谋长 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 陈正人
政治部副主任 周桓
总后勤部部长 叶季壮

锦热军区 (11月归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建制)

辽东军区

司令员 肖华
政治委员 肖华 (兼)
参谋长 吴瑞林

政治部主任 莫文骅

第2纵队

司令员 吴克华 政治委员 彭嘉庆

第1旅

旅 长 杜光华
政治委员 李冠元

第2旅

旅 长 李福泽
政治委员 李丙令
副旅长 周 光

第3纵队

司令员 胡奇才 政治委员 欧阳文

第11支队

支队长 侯世奎

第12支队

支队长 江燮元

军区直属第1支队

支队长 翟梅仁

军区直属第2支队（通化支队）

支队长 刘西元

军区直属第3支队

支队长 王奎先
政治委员 吕其恩

宽甸警备司令部

司令员 刘振祥

辽宁军区

司令员 张学思
政治委员 白 坚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赵承金

第2军分区

政治委员 陈一凡

政治委员 卓 雄

副司令员 吕 昌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王振祥

政治委员 饶 斌

保安第3旅

辽西军区

司令员 邓 华

政治委员 陶 铸

保安第1旅

旅 长 马仁兴

政治委员 邓东哲

工人纵队

军区直属第1军分区

军区直属第2军分区

军区直属第5军分区

辽北军区

司令员 倪志亮

政治委员 郭述申

副政治委员 李海涛

参谋长 朱子修

吉林军区

司令员 周保中

政治委员 林 枫

副司令员 万 毅

副政治委员 张启龙

东北挺进纵队

司令员 万 毅(兼)

政治委员 周赤萍

参谋长 关靖寰

政治部主任 王振乾

第1支队

支队长 彭景文

政治委员 李欣

第2支队

支队长 管松涛

政治委员 黄明清

周保中部（辖23个保安团）

洮东军区（吉黑纵队）

司令员 曹里怀 政治委员 郭峰

松江军区

司令员 卢东生 聂鹤亭（后）

政治委员 张秀山

副司令员 李寿轩

副政治委员 李兆麟

参谋长 李寿轩（兼）

政治部主任 张池明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温玉成

政治委员 董浩然

副司令员 马克正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王奎先

副政治委员 何运洪

政治部主任 李道之

参谋处长 姚克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刘子奇

政治委员 王建中

政治部主任 齐渭川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谭友林

政治委员 李建平

副司令员 李亚田

参 谋 长 王正平
政治部主任 蔡炳臣

第 5 军分区

嫩江军区

司 令 员 王明贵
政 治 委 员 刘锡五
副政治委员 朱 光
参 谋 长 王化一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平洋
政 治 委 员 尹士炎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任德福
政 治 委 员 金 钟

第 3 军分区 (兼警卫第 1 旅)

司 令 员 张汉承

第 4 军分区 (兼警卫第 2 旅)

司 令 员 夏尚志
副政治委员 任志远

北安军区

司 令 员 叶长庚
副 司 令 员 王 钧
副政治委员 范式人

第 1 支队

支 队 长 蔡 明
政 治 委 员 陈 雷

第 2 支队

支 队 长 张光迪
政 治 委 员 徐 明
副支队长 康步云

第3支队

支队长 廖仲符
政治委员 史梓明

三江军区

司令员 孙景宇
政治委员 李范五
副司令员 戴洪宾
政治部主任 吕清

北满军区

司令员 高岗
政治委员 陈云

西满军区

司令员 吕正操（兼）
政治委员 李富春

东北人民自治军直属部队

山东军区第1师

师长 梁兴初
政治委员 梁必业
参谋长 李兴斌

山东军区第3师

政治委员 罗舜初
副师长 曾国华

山东军区第2师

师长 罗华生
政治委员 刘兴元
参谋长 贺东生
政治部主任 王树君

山东军区第7师

师长 杨国夫
政治委员 杨国夫（兼）

副政治委员 李伯秋
政治部主任 李伯秋（兼）

副 师 长 龙书金
参 谋 长 陶捷三
政治部主任 徐斌洲

鲁中警备第3旅

旅 长 李福泽

第25旅

旅 长 邓克明
政治委员 袁克服

第359旅

旅 长 刘转连
政治委员 晏福生

新四军第3师

师 长 黄克诚
副师长 刘 震 洪学智
参谋长 洪学智（兼）

政治委员 黄克诚（兼）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

第7旅

旅 长 彭明治
政治委员 郭成柱

第8旅

旅 长 张天云
政治委员 李雪三

第10旅

旅 长 钟 伟
政治委员 王凤梧

独立旅

旅 长 吴信泉
政治委员 吴信泉（兼）

第16军分区

司令员 曾克林
参谋长 谢甫生

副政治委员 唐 凯
政治部主任 唐 凯（兼）

第21旅

旅 长 杨树元
政治委员 刘光涛

第 23 旅
旅 长 宁贤文
政治委员 谭开云

第 24 旅
旅 长 马 骥
政 治 委 员 陈金钰
副 旅 长 邓忠仁
副政治委员 贾其敏
参 谋 长 石世良
政治部主任 江腾蛟

(七) 中原军区

司 令 员
政 治 委 员
副 司 令 员
副 政 治 委 员
参 谋 长
政 治 部 主 任
副 参 谋 长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李先念
郑位三
王树声 王 震
王首道
王 震 (兼)
王首道 (兼)
朱早观
刘 型

第 1 纵队

司 令 员 王树声 (兼)
副政治委员 刘子久
政治部主任 吕振球

政 治 委 员 戴季英
参 谋 长 熊伯涛

第 1 旅
旅 长 皮定钧
政 治 委 员 徐子荣

第 2 旅
旅 长 张才千
政 治 委 员 刘健挺

副 旅 长 方升普
副政治委员 郭林祥
参 谋 长 张介民
政治部主任 郭林祥 (兼)

副 旅 长 杨秀昆
副政治委员 王其梅
参 谋 长 黄朝天
政治部主任 余品轩

第 3 旅

旅 长 刘昌毅
政 治 委 员 张力雄
副 旅 长 闵学胜
参 谋 长 胡鹏飞
政治部主任 陈文祺

第 2 纵队

司 令 员 文建武
副司令员 周志坚 程耀德
参 谋 长 方正平

政 治 委 员 任质斌
政治部主任 张树才

第 13 旅

旅 长 吴世安
政 治 委 员 周志刚
副 旅 长 汪乃贵
副政治委员 肖元礼
参 谋 长 魏国运
政治部主任 陈一震

第 14 旅

旅 长 程耀德 (兼)
政 治 委 员 杨焕民
副 旅 长 邹国厚
参 谋 长 黄德魁
政治部主任 刘友海

第 15 旅

旅 长 王海山
政 治 委 员 汤成功
参 谋 长 周明国

第 359 旅

旅 长 郭 鹏
政 治 委 员 王恩茂
副 旅 长 陈外欧 徐国贤

政治部主任 岳 林

副政治委员 李 铨

参 谋 长 李国华

政治部主任 廖 明

江汉军区

司 令 员 贺炳炎 政治委员 郑绍文

副司令员 罗厚福 副政治委员 廖汉生

参 谋 长 王绍南 政治部主任 侯 政

独立第 1 旅

旅 长 贺炳炎（兼）

政治委员 郑绍文（兼）

鄂东军区

司 令 员 张体学 政治委员 聂鸿钧

副政治委员 熊作芳 参 谋 长 罗 通

政治部主任 周干民

独立第 2 旅

旅 长 吴诚忠

政治委员 张体学（兼）

河南军区

司 令 员 韩东山 政治委员 刘子久

副司令员 陈先瑞 黄 林 副政治委员 曾传六

参 谋 长 李迎希 政治部主任 曾传六（兼）

独立第 3 旅

旅 长 陈先瑞（兼）

政治委员 傅忠海

(八) 华南游击队

东江纵队

司令员 曾生
副司令员 王作尧
参谋长 王作尧 (兼)

政治委员 林平
政治部主任 杨康华

江南指挥部

指挥员 卢伟如
政治委员 黄宇
参谋长 高健
政治部主任 黄高扬

江北指挥部

指挥员 周伯明
政治委员 陈达明
参谋长 罗章友
政治部主任 饶璜湘

粤北指挥部

指挥员 林锵云
王作尧
杨康华

东进指挥部

指挥员 卢伟良
政治委员 张持平
参谋长 黄布
政治部主任 李征

韩江纵队

司令员 林美南 政治委员 林美南 (兼)
古关贤 (后) 林川 (后)
副司令员 汪硕 参谋长 谢育才

珠江纵队

司令员 林铿云 政治委员 梁嘉
副司令员 谢斌 参谋长 周伯明 谢海龙 (后)

政治部主任 刘向东

中区纵队

司令员 梁鸿钧 政治委员 罗范群
副司令员 谢礼泉 政治部主任 刘田夫 刘铁山（后）
参谋长 谢礼泉（兼）

南路纵队

司令员 周楠 政治委员 周楠（兼）
参谋长 李筱峰 政治部主任 温焯华

琼崖独立纵队

司令员 冯白驹 政治委员 冯白驹（兼）
副司令员 庄田 参谋长 李振亚
政治部主任 王白伦

第1支队

支队长 吴克之
政治委员 林豪
副支队长 陈武英
参谋长 郑章
政治处主任 黄一峰

第2支队

支队长 符振中
副支队长 陈求光
政治处主任 符树义

第3支队

支队长 符哥洛
政治委员 莫逊
副支队长 林和平
参谋长 符中权
政治处主任 祝菊芬

第4支队

支队长 马白山
政治委员 吴文龙
副支队长 潘江汉
政治处主任 江田

挺进支队

支 队 长 李振亚（兼）

政 治 委 员 符荣鼎

副 支 队 长 张世英

政 治 处 主 任 王卓群

说明：①山东军区序列中第1至第8师于1945年8月组建后，大部挺进东北，故同一部队番号有的在山东军区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中同时出现。

②华南游击队序列中琼崖独立纵队系1945年8月序列。

二、中共中央军委和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序列 (1946. 6)

中共中央军委

主 席	毛泽东
副 主 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 参 谋 长	彭德怀 (兼)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刘少奇 (兼)
副 总 参 谋 长	叶剑英
总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傅 钟
军 委 秘 书 长	杨尚昆
总 后 勤 部 部 长	杨立三

中共中央军委下辖：

参 谋 部	
总 政 治 部	
总 后 勤 部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
晋 绥 军 区	东北民主联军
晋冀鲁豫军区	晋察冀军区
	中原军区

(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司 令 员	王世泰 (代)
政 治 委 员	习仲勋 (代)
副 司 令 员	王维舟 阎揆要
副 政 治 委 员	张仲良

参 谋 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

旅 长 罗元发
政 治 委 员 罗元发（兼）
副政治委员 李景膺 饶正锡
参 谋 长 陈海涵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兼）

新编第 4 旅

旅 长 张贤约
政 治 委 员 徐立清（兼）
副政治委员 黄振棠
参 谋 长 程悦长
政治部主任 赵光远

警备第 3 旅（兼陇东警备区）

旅 长 黄罗斌
政 治 委 员 李合邦
副政治委员 郭炳坤
政治部主任 高维嵩

警备第 1 旅（兼关中警备区）

旅 长 高锦纯
政 治 委 员 高锦纯（兼）
副 旅 长 陈国栋
副政治委员 牛书申
参 谋 长 刘懋功
政治部主任 李宗贵

新编第 11 旅（兼三边警备区）

司 令 员 曹又参
政 治 委 员 高 峰
副司令员 郭宝珊 牛化东
参 谋 长 白寿康
政治部主任 杨 林

绥德警备区

司 令 员 吴岱峰
政 治 委 员 自治民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 谋 长 李治洲
政治部主任 高朗亭（兼）

（二）晋绥军区

司 令 员 贺 龙
政 治 委 员 李井泉

副 司 令 员	续范亭	周士第
参 谋 长	陈漫远	
政 治 部 主 任	甘泗淇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冼恒汉	
后 勤 部 部 长	陈希云	

吕梁军区

司 令 员	张宗逊	政 治 委 员	张宗逊 (兼)
副 司 令 员	彭绍辉 马佩勋	副 政 治 委 员	罗贵波 解学恭
参 谋 长	张希钦	政 治 部 主 任	罗贵波 (兼)

第 3 军分区

政 治 委 员	魏怀礼
副 司 令 员	张新华
政 治 部 主 任	颜龙茂

第 8 军分区

司 令 员	侯俊岩
政 治 委 员	甘一飞
副 司 令 员	范忠祥
参 谋 长	杨文安
政 治 部 主 任	曹光琳

第 9 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忠学
政 治 委 员	贾长明
副 司 令 员	周智高

独立第 4 旅

旅 长	顿星云
政 治 委 员	杨秀山
参 谋 长	谷志标
政 治 部 主 任	彭 德

雁门军区

司 令 员	张经武	政 治 委 员	朱 明
副 司 令 员	孙超群	参 谋 长	王兰麟

第 2 军分区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文清
政 治 委 员 傅子和

司 令 员 王赤军
政 治 委 员 李登瀛
副 司 令 员 刘华香
参 谋 长 刘华香 (兼)
政 治 部 主 任 沈新发

第 6 军分区

司 令 员 唐子奇
政 治 委 员 梁仁芥
副 司 令 员 苏 鳌
副 政 治 委 员 景明远 龙福才
参 谋 长 张全忠
政 治 部 主 任 龙福才 (兼)

绥蒙军区

司 令 员 姚 喆 政治委员 高克林
副 政 治 委 员 张达志 参 谋 长 樊哲祥
政 治 部 主 任 饶 兴

第 11 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立清
政 治 委 员 张毅忱
副 政 治 委 员 袁 光
参 谋 长 曾 征
政 治 部 主 任 袁 光 (兼)

骑兵旅

旅 长 康健民
政 治 委 员 李佐玉
参 谋 长 王 智

晋绥军区直属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漫远 政治委员 刘长亮

晋绥野战军

司令员 贺龙（兼）
副司令员 张宗逊
副政治委员 李井泉（兼）
参谋长 张经武 许光达（代）
政治部主任 孙志远
副参谋长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洗恒汉（兼）

第358旅

旅长 黄新廷
政治委员 余秋里
参谋长 何辉燕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独立第1旅

旅长 王尚荣
政治委员 朱辉照
副旅长 傅传作
参谋长 李书茂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独立第2旅

旅长 许光达（兼）
政治委员 孙志远（兼）
副旅长 唐金龙
副政治委员 罗志敏
参谋长 廖述云
政治部主任 李健良

独立第3旅

旅长 杨嘉瑞
政治委员 金如柏
政治部主任 贺翼章

（三）晋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第一副司令员	滕代远
第二副司令员	王宏坤

第一副政治委员	薄一波
第二副政治委员	张际春
参 谋 长	李 达
政 治 部 主 任	张际春 (兼)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王新亭
后 勤 部 部 长	周文龙

第2纵队

司 令 员	陈再道	政治委员	宋任穷
副 司 令 员	范朝利	参 谋 长	范朝利 (兼)
政治部主任	钟汉华		

第4旅

旅 长	孔庆德
政 治 委 员	刘明辉
副 旅 长	赵鹤亭
副政治委员	崔子明
参 谋 长	赵晓舟
政治部主任	姚克祐

第5旅

旅 长	雷绍康
政 治 委 员	寇庆延
副 旅 长	牟海秀
副政治委员	汪洪清
参 谋 长	陈中民
政治部主任	王进前

第6旅

旅 长	王天祥
政 治 委 员	刘华清
副 旅 长	周发田
副政治委员	彭学桂
参 谋 长	王明坤
政治部主任	曹中南

第4纵队

司令员 陈 赓 政治委员 谢富治
副司令员 韩 钧 副政治委员 杨奇清
参谋长 刘 忠 政治部主任 刘有光

第 10 旅

旅 长 周希汉
政治委员 刘 忠 (兼)
副 旅 长 楚大明
政治部主任 雷起云

第 11 旅

旅 长 李成芳
政治委员 刘有光 (兼)
副 旅 长 蔡爱卿
政治部主任 胡荣贵

第 13 旅

旅 长 陈 康
政治委员 廖冠贤
副政治委员 张 明
政治部主任 张 明 (兼)

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王秉璋 政治委员 张霖芝 张 玺
副司令员 刘志远 副政治委员 赵健民 潘复生
参谋长 潘 焱 政治部主任 王幼平

第 1 军分区

司令员 周桂生
政治委员 申云甫
副政治委员 彭天琦
参 谋 长 朱子伟
政治部主任 李文甫

第 2 军分区

司令员 张刚剑
政治委员 万 里
副司令员 王培根
参 谋 长 杨 昆
政治部主任 顾汉臣

第 3 军分区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郭影秋
政 治 委 员 郝中士
副 司 令 员 戴元仁
副政治委员 廖享禄
政治部主任 杨玉成

司 令 员 李静宜
政 治 委 员 赵紫阳
副 司 令 员 赵遵康
副政治委员 王焕如
参 谋 长 杨育才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 (兼)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余克勤
政 治 委 员 刘 星
副 司 令 员 宋励华 江海山
副政治委员 戴晓东 刘德海
参 谋 长 周桂安
政治部主任 解长林

第 6 军分区

司 令 员 金绍山
政 治 委 员 袁 振
副 司 令 员 孙子植
副政治委员 李中一 郑 华
参 谋 长 孙子植 (兼)
政治部主任 李中一 (兼)

独立旅

旅 长 马宗凯
副政治委员 胡正平
参 谋 长 阎海清
政治部主任 屈兴栋

冀南军区

司 令 员 杜义德 政治委员 李菁玉
副 司 令 员 王光华 副政治委员 刘志坚 马国瑞
参 谋 长 陈明义 政治部主任 胥光义

独立第 4 旅

旅 长 孙仁道
政 治 委 员 杨树根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白 云
政 治 委 员 许梦侠

副 旅 长 田厚义
参 谋 长 王树棠
政治部主任 李福尧

副 司 令 员 胡超伦
副政治委员 张希才 杨新一
参 谋 长 刘始明
政治部主任 张希才 (兼)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定灼
政 治 委 员 赵一民
副 司 令 员 赵彩银
副政治委员 王贵德
政治部主任 王贵德 (兼)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维翰
政 治 委 员 李福祥
副 司 令 员 高厚良 李大磊
副政治委员 甘思和 赵海枫
政治部主任 王 谦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蕴瑞
政 治 委 员 乔晓光
副 司 令 员 何济林 李所庵
副政治委员 贺亦然
政治部主任 贺亦然 (兼)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福胜
政 治 委 员 陈登昆
副 司 令 员 黄光霞 贾殿阁
副政治委员 陈伯禄
参 谋 长 姚凤林
政治部主任 臂修林

太行军区

司 令 员 秦基伟
副司令员 黄新友 赵辉楼
参 谋 长 何正文

政 治 委 员 李雪峰
副政治委员 黄 镇 王维纲
政治部主任 袁子钦

第 23 旅

旅 长 贾定基
政 治 委 员 车敏瞧
参 谋 长 张振华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胡 震
政 治 委 员 冷 楚
副 司 令 员 王远芬

政治部主任 孙灏正

副政治委员 马芳廷 赵武成
参 谋 长 张蕴钰
政治部主任 胡立信

第2军分区

司 令 员 鲁瑞林
政 治 委 员 刘建勋
副 司 令 员 韩卫民
副政治委员 于一川 张慧如
政治部主任 王大仁

第3军分区

司 令 员 陶国清
政 治 委 员 陶鲁笳
副 司 令 员 崔建功
副政治委员 谷景生 吕鸿安
参 谋 长 李承尧
政治部主任 王银山

第4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新友 (兼)
政 治 委 员 刘 毅
副 司 令 员 安中原
副政治委员 刘 刚 孔俊彪
参 谋 长 陈 皓
政治部主任 孔俊彪 (兼)

太岳军区

司 令 员 王新亭 (兼)
副司令员 孙定国
参 谋 长 邓士俊
政 治 委 员 王鹤峰
副政治委员 裴孟飞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第24旅

旅 长 刘金轩
政 治 委 员 李 耀
副 旅 长 查玉升

第1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聚奎
政 治 委 员 刘植岩
副 司 令 员 苏 鲁

副政治委员 朱佩瑄
参 谋 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朱佩瑄 (兼)

副政治委员 梁文英
参 谋 长 张希英
政治部主任 梁文英 (兼)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祖谅
政 治 委 员 刘尚志
副 司 令 员 景仙洲 涂则生
副政治委员 杨玉屏
参 谋 长 王清川
政治部主任 王中青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 塘
政 治 委 员 柴泽民
副 司 令 员 李明如
副政治委员 王观潮
参 谋 长 樊执中
政治部主任 王观潮 (兼)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郭庆祥
政 治 委 员 薛 迅
副政治委员 贺崇升
参 谋 长 常仲连
政治部主任 钟 芬

民主建国军

总司令 高树勋 副总司令 廖安邦
参谋长 肖秉钧

第 1 军

军 长 范龙章 参谋长 许静凡

第 1 师

师 长 阎济民
政治委员 张杰轩

第 2 师

师 长 田树青
政治委员 苏俊山

副 旅 长 刘文勇
副政治委员 周 维
参 谋 长 曹更修
政治部主任 高厚祖

参 谋 长 史景班
政治部主任 彭宗珠

第 9 旅

旅 长 郑国仲
政 治 委 员 秦传厚
副政治委员 高治国
参 谋 长 朱 光
政治部主任 张恒业

第 6 纵队

司 令 员 王宏坤（兼）
副司令员 王近山
韦 杰

政 治 委 员 段君毅
参 谋 长 张廷发
政治部主任 鲍先志

第 16 旅

旅 长 韦 杰（兼）
政 治 委 员 张国传
副 旅 长 宗风洲
参 谋 长 邢荣杰
政治部主任 冷裕光

第 17 旅

旅 长 石志本
政 治 委 员 何柱成
副 旅 长 尤太忠
副政治委员 韩 明
参 谋 长 赖光勋
政治部主任 段大明

第 18 旅

旅 长 肖永银
政 治 委 员 李 震
副 旅 长 向守志

参 谋 长 刘鹏旭
政治部主任 刘 昌

第 7 纵队

司 令 员 杨 勇 政治委员 张霖芝
副司令员 赵基梅 副政治委员 张国华
参 谋 长 昌炳桂 政治部主任 王辉球

第 19 旅

旅 长 吴大明
政 治 委 员 谢富林
副 旅 长 傅春早
政治部主任 罗 英

第 20 旅

旅 长 匡 斌
政 治 委 员 石新安
副 旅 长 汪家道
副政治委员 李士才
参 谋 长 王正南
政治部主任 匡根山

第 21 旅

旅 长 况玉纯
政 治 委 员 刘振国
副 旅 长 程绍祥
副政治委员 余 非
参 谋 长 魏文建
政治部主任 姜思毅

(四)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

军 长 兼 军 区 司 令 员	陈 毅
政 治 委 员	饶漱石
第一副军长兼第一副司令员	张云逸
第二副军长兼第二副司令员	罗炳辉

副	政	治	委	员	黎	玉
参		谋		长	陈	士
政	治	部	主	任	舒	同
副		参	谋	长	袁	仲
政	治	部	副	主	唐	亮

独立旅

旅 长 张俊升
 政治委员 王仲良
 政治部主任 朱人俊

滨海军区

司令员	陈士榘 (兼)	政治委员	唐 亮 (兼)
参谋长	伊 文	政治部主任	赖可可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建青
 政 治 委 员 谷 牧
 政 治 部 主 任 赵 昭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德贵
 政 治 委 员 汪海山
 副司令员 张希贤

警备旅

旅 长 覃上冕
 政 治 委 员 刘 伟
 副 旅 长 郭廷万
 参 谋 长 王 晓
 政 治 部 主 任 王 耕

胶东军区

司 令 员	许世友	政 治 委 员	林 浩
-------	-----	---------	-----

副司令员 王 彬
政治部主任 赖可可（后）

副政治委员 金 明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于得水
政治委员 梁辑卿
参 谋 长 胡铁成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孙端夫
政 治 委 员 刘仲华
参 谋 长 刘云鹏
政治部主任 张英勃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华堂
政治委员 李 华
参 谋 长 丛容滋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贾若瑜
政 治 委 员 廖海光
参 谋 长 杨介人
政治部主任 朱开印

滨北军分区

司 令 员 黎有章
政治委员 张 彦

第 5 师

师 长 聂凤智
政 治 委 员 刘浩天
参 谋 长 肖镜海
政治部主任 刘浩天（兼）

第 6 师

师 长 刘 涌
政 治 委 员 仲曦东
参 谋 长 张怀忠
政治部主任 张少虹

渤海军区

司 令 员 袁也烈

政 治 委 员 景晓村

副司令员 廖容标
政治部主任 周贯五（兼）

副政治委员 周贯五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傅继泽
政治委员 李广文
副司令员 倪鸿印

第2军分区（兼警备第6旅）

司令员 李发
政治委员 曾旭清
政治部主任 辛国治

第3军分区（兼警备第7旅）

司令员 赵寄舟
参谋长 庄中一
政治部主任 黄魁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程绪润
政治委员 岳拙元
参谋长 胡兰芝
政治部主任 朱春和

鲁中军区

司令员 王建安
副司令员 邝任农
参谋长 张仁初
副政治委员 高克亭 李培南
政治部主任 李培南（兼）

第4师

师长 孙继先
政治委员 王一平
政治部主任 欧阳平

第9师

师长 钱钧
政治委员 李耀文
副师长 陈宏
参谋长 陈宏（兼）

独立第1旅

旅长 王道
参谋长 赵凌实

独立第4旅

旅长 韩寿臣
参谋长 韩顾三
政治部主任 王芳

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1旅）

司令员 陈奇
政治委员 林乎加
参谋长 张耀辉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封振武
政治委员 王涛
参谋长 吴奎文

第3军分区

政治委员 霍士廉

警备旅

旅长 周长胜
政治委员 陈美藻

鲁南军区

司令员 张光中
副司令员 万春圃 何以祥
参谋长 赵一萍

政治委员 傅秋涛
副政治委员 张雨帆
政治部主任 丁秋生

第1军分区（兼警备第8旅）

司令员 贺健
政治委员 杨士法
政治部主任 侯建如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张雄
政治委员 张雄（兼）
副政治委员 张劲夫
参谋长 阎超
政治部主任 李萍

第3军分区（兼警备第9旅）

司令员 胡大荣
政治委员 李青
副政治委员 王献庭
政治部主任 张岗

山东野战军

司 令 员 陈 毅
政 治 委 员 陈 毅 (兼)
参 谋 长 宋时轮
政 治 部 主 任 唐 亮 (兼)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张 凯

第 1 纵队

司 令 员	叶 飞	政 治 委 员	赖传珠
副 政 治 委 员	谭启龙	参 谋 长	贺敏学
政 治 部 主 任	谭启龙 (兼)		

第 1 旅

旅 长 廖政国
政 治 委 员 阮英平
副 政 治 委 员 曾如清
参 谋 长 邱玉权
政 治 部 主 任 陈伟达

第 2 旅

旅 长 刘 飞
政 治 委 员 彭 林
参 谋 长 洪 隆

第 3 旅

旅 长 张翼翔
政 治 委 员 何克希
副 旅 长 刘亨云
副 政 治 委 员 张文碧
参 谋 长 谢忠良
政 治 部 主 任 杨思一

第 2 纵队

司 令 员	韦国清	政 治 委 员	韦国清 (兼)
参 谋 长	詹化雨	政 治 部 主 任	邓逸凡

第4旅

旅 长 朱绍清
政治委员 高志荣
副 旅 长 秦贤安
政治部主任 徐海珊

第9旅

旅 长 滕海清
政治委员 康志强
参 谋 长 刘清明

第7师

师 长 谭希林
副政治委员 李步新
政治部主任 李步新（兼）

政治委员 曾希圣
参 谋 长 林维先

第19旅

旅 长 熊应堂
政治委员 黄火星
参 谋 长 张铨秀

第20旅

旅 长 梁金华
政治委员 黄耀南
参 谋 长 周绍昆
政治部主任 高立忠

第21旅

旅 长 马长炎
政治委员 黄 先
副政治委员 何志远
参 谋 长 陈仁洪
政治部主任 杨汉林

第8师

师 长 何以祥 政治委员 丁秋生
副师长 王吉文 政治部主任 刘 春

华中军区

司 令 员 张鼎丞
政 治 委 员 邓子恢
副 司 令 员 粟 裕 张爱萍
副 政 治 委 员 谭震林
参 谋 长 刘先胜
政 治 部 主 任 谭震林 (兼)
副 参 谋 长 张元寿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钟期光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段焕竞
政 治 委 员 钟 民
副 司 令 员 梅嘉生
副 政 治 委 员 许家屯
参 谋 长 沈仲彝
政 治 部 主 任 许家屯 (兼)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谢祥军
政 治 委 员 曹获秋
副 政 治 委 员 杨光池
参 谋 长 陈克天

第 7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震球
政 治 委 员 赖 毅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韦永义
政 治 委 员 金 柯
副 司 令 员 杨洪才
参 谋 长 吴光明

第 6 军分区

司 令 员 覃 健
政 治 委 员 万众一
副 司 令 员 张克辛
副 政 治 委 员 谢振华
参 谋 长 张克辛 (兼)
政 治 部 主 任 陶 励

第 8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太生
政 治 委 员 吴芝圃

副司令员 赵汇川
参谋长 黄元庆
政治部主任 刘作孚

副政治委员 何明光

淮南军区（兼新四军第2师）

司令员 周骏鸣
副司令员 梁从学 成 钧
参谋长 梁从学（兼）

政治委员 肖望东
副政治委员 赵启民
政治部主任 余立金

第5旅

旅 长 成 钧（兼）
政治委员 赵启民（兼）
政治部主任 肖学林

第3军分区（兼独立旅）

司令员 罗占云
政治委员 李世炎
政治部主任 刘求须

第4军分区（兼第6旅）

司令员 陈庆先
政治委员 黄 岩
副政治委员 刘毓标

海防总队

政治委员 吕炳奎
副司令员 吴福海
陆洲舫
袁国祥

华中野战军

司令员 粟 裕（兼）
政治委员 谭震林（兼）
参谋长 刘先胜（兼）
政治部主任 钟期光（兼）

第1师

师 长 粟 裕（兼）
副师长 陶 勇

政治委员 粟 裕（兼）
副政治委员 王集成

参谋长 梅嘉生

政治部主任 韩念龙

第1旅

旅 长 张震东
政治委员 卢 胜
副 旅 长 谭知耕
参 谋 长 谭知耕 (兼)
政治部主任 张日清

第3旅

旅 长 彭德清
政治委员 伍洪祥
副 旅 长 张云龙
参 谋 长 张云龙 (兼)
政治部主任 李彬山

第6师

师 长 谭震林 政治委员 谭震林 (兼)
副师长 王必成 副政治委员 江渭清
参谋长 张闯初 政治部主任 李干辉

第16旅

旅 长 钟国楚
副政治委员 罗维道
参 谋 长 饶维潭
政治主任 王 直

第18旅

旅 长 饶守坤
政治委员 刘文学

第7纵队

司 令 员 管文蔚 政治委员 吉 洛
副司令员 戴心宽 胡炳云 参 谋 长 胡炳云 (兼)

第9纵队

司 令 员 张 震 政治委员 张 震 (兼)
副司令员 饶子健 杜新民 参 谋 长 姚运良
政治部主任 王学武

第10纵队

司令员	谢祥军	政治委员	刘培善
副司令员	常玉清	参谋长	吴肃
政治部主任	孙克骥		

(五) 东北民主联军

总司令	林彪
政治委员	林彪(兼)
副总司令	周保中 吕正操 肖劲光
副政治委员	彭真 罗荣桓 高岗 陈云
第一参谋长	肖劲光(兼)
第二参谋长	伍修权
参谋长	聂鹤亭
政治部主任	谭政
政治部副主任	周桓
后勤部部长	叶季壮
后勤部政治委员	杨至诚

炮兵旅

旅长 贾陶

第359旅

旅长	刘转连
政治委员	晏福生
副旅长	贺庆积
副政治委员	李信
政治部主任	何太宣

第1师

师长	梁兴初	政治委员	梁必业
副师长	江拥辉	参谋长	江拥辉(兼)

政治部主任 方国安

第3师

师 长 黄克诚

副师长 刘 震 洪学智

政治委员 黄克诚（兼）

参 谋 长 洪学智（兼）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

第7旅

旅 长 彭明治

政治委员 郭成柱

副 旅 长 王东保

参 谋 长 黄炜华

政治部主任 刘锦屏

第8旅

旅 长 张天云

政治委员 李雪三

副 旅 长 胡继成

参 谋 长 庄 林

政治部主任 陈志芳

第10旅

旅 长 钟 伟

政治委员 王凤梧

参 谋 长 王良太

政治部主任 贺大增

独立旅

旅 长 吴信泉

政治委员 吴信泉

副 旅 长 冯志湘

参 谋 长 张克辛

政治部主任 石 瑛

第7师

师 长 杨国夫

副政治委员 徐斌洲

政治委员 刘其人

政治部主任 徐斌洲（兼）

第19旅

旅 长 张鹤鸣

政治委员 袁克服

副 旅 长 靳 虎

第20旅

旅 长 刘子奇

政治委员 孙 正

第一副旅长 郑大林

参 谋 长 宋维藩
政治部主任 相 炜

第二副旅长 赖金池
参 谋 长 陈乙斋
政治部主任 齐渭川

第 21 旅

旅 长 王兆相
政 治 委 员 陈 德
副 旅 长 黄德海
参 谋 长 陈 钦
政治部主任 康伯明

西满军区

司 令 员 黄克诚
政治委员 李富春

嫩江军区

司 令 员 倪志亮
副 司 令 员 王明贵
政治部主任 薛少卿

政 治 委 员 刘锡五
副政治委员 邵式平

第 1 军分区

司 令 员 王化一
政 治 委 员 吴富善
副 司 令 员 宋 康
副政治委员 余建亭
政治部主任 余建亭 (兼)

第 2 军分区

司 令 员 金 钟
政 治 委 员 王 文
副 司 令 员 任德福
参 谋 长 王仁兴

第 3 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汉承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沈启贤

政治委员 尹士炎
副司令员 厉男

政治委员 王建中
副司令员 杨春
政治部主任 张志勇

辽吉军区

司令员 邓华
政治委员 陶铸
参谋长 高鹏
政治部主任 袁升平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田维扬
政治委员 孔原
副司令员 曾明谦
副政治委员 黄永辉
政治部主任 黄永辉 (兼)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赵东寰 马骥(后)
政治委员 杨易辰
副司令员 邓忠仁
副政治委员 贾其敏
参谋长 黄忠诚
政治部主任 江腾蛟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于文清
政治委员 罗杰

保安第1旅 (兼第4军分区)

旅长 马仁兴
政治委员 邓东哲
副旅长 李化民

通鲁联合司令部

司令员 高体乾
政治委员 傅玉田
副司令员 孙兴华
参谋长 赵国治

龙江军区

司令员 叶长庚

副司令员 于天放 王 钧

政治委员 王鹤寿

副政治委员 范式人

警备第1旅

旅 长 蔡 明

政治委员 陈 雷

警备第2旅

旅 长 张光迪

政治委员 徐 明

警备第3旅

旅 长 廖仲符

政治委员 史梓明

南满军区

司令员 肖 华

政治委员 肖 华 (兼)

副司令员 吴克华 曾克林

副政治委员 江 华 莫文骅

参 谋 长 沙 克

政治部主任 莫文骅 (兼)

第3纵队

司令员 程世才 张学思

副司令员 解 方

参 谋 长 解 方 (兼)

政治委员 罗舜初

副政治委员 唐 凯

政治部主任 唐 凯 (兼)

第7师

师 长 曾国华

政治委员 李伯秋

第8师

师 长 杨树元

政治委员 刘光涛

副 师 长 邓 岳
参 谋 长 王全珍
政治部主任 李 改

参 谋 长 叶荫庭
政治部主任 何 英

第 9 师

师 长 宁贤文
政 治 委 员 谭开云
第二政治委员 赵正洪
副 师 长 徐国夫
政 治 部 主 任 郑维之
参 谋 处 长 刘诚谟

第 4 纵队

司 令 员 胡奇才 政 治 委 员 彭嘉庆
副司令员 韩先楚 副政治委员 欧阳文
参 谋 长 李福泽 政 治 部 主 任 欧阳文（兼）

第 10 师

师 长 杜光华
政 治 委 员 葛燕璋
副 师 长 侯世奎
参 谋 长 寇奎甫
政 治 部 主 任 曹广化

第 11 师

师 长 蔡正国
政 治 委 员 李丙令
副 师 长 周 光
参 谋 长 杜 彪
政 治 部 主 任 吴保山

第 12 师

师 长 江燮元
政 治 委 员 潘寿才
参 谋 长 李洪茂
政 治 部 主 任 曹传赞

辽宁军区

司令员 程世才(兼)
张学思(兼)

副司令员 解方(兼)

参谋长 解方(兼)

政治委员 罗舜初(兼)

副政治委员 唐凯(兼)

政治部主任 唐凯(兼)

保安第3旅(兼第3军分区)

旅长 彭龙飞

副旅长 南品

副政治委员 刘扇华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王叙坤

政治委员 焦若愚

副司令员 夏德胜

副政治委员 崔岳南

政治部主任 崔岳南(兼)

杨靖宇支队

支队长 刘西元

政治委员 刘西元(兼)

副政治委员 谢凤山

李红光支队

司令员 金明

副司令员 方虎山

辽南军区

司令员 吴瑞林

副政治委员 陈一凡 李辉

政治部主任 张秀川

政治委员 林一山

参谋长 金振钟

独立师

师长 吴瑞林(兼)

政治委员 林一山(兼)

第1军分区

第5军分区

南满军区直属第2军分区

南满军区直属第3军分区

司 令 员 祝顺鹏
政 治 委 员 吕其恩
副 司 令 员 徐恩荣
副政治委员 李荣彩
参 谋 长 陆 云

司 令 员 王振祥
政 治 委 员 王一伦
参 谋 长 李 飞
政治部主任 丁铁石

南满军区直属第4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弗畏
政 治 委 员 罗其南
副 司 令 员 周 辉
参 谋 长 宋付费
政治部主任 段辉良

东满军区

司 令 员 周保中
政 治 委 员 陈正人
副 司 令 员 陈 光
副政治委员 张启龙
参 谋 长 陈 光(兼)
政治部主任 唐天际

第22旅

旅 长 罗华生
政 治 委 员 刘兴元
副 旅 长 贺东生
参 谋 长 贺东生(兼)
政治部主任 王树君

第24旅

旅 长 王效明
政 治 委 员 袁任远
第二政治委员 邓 飞
副 旅 长 蒋克诚
参 谋 长 康干生
政治部主任 宋景华

第7纵队

司令员 万毅 政治委员 周赤萍
副司令员 黄一平 参谋长 黄一平（兼）
政治部主任 王振乾

第19旅

旅长 彭景文
政治委员 钟民
副旅长 杨尚儒
副政治委员 黄玉昆
政治部主任 李欣

延边军分区

政治委员 孔原
副政治委员 谢扶民

吉敦军分区

司令员 邓克明
政治委员 袁克服

警备第2旅

旅长 邓克明（兼）
政治委员 袁克服（兼）
副旅长 邱会魁 刘建平
参谋长 吴恒夫
政治部主任 陈发洪

第20旅

旅长 管松涛
政治委员 何善远

警备第1旅

政治委员 谢扶民（兼）
副旅长 许绍华
参谋长 许绍华（兼）
政治部主任 祝世风

吉南军分区

司令员 王效明
政治委员 邓 飞

吉北军分区

司令员 曹里怀
政治委员 伍晋南
参谋长 雷 震
政治部主任 李俭珠

东北民主联军直属 4 个三级军区：

松江军区

司令员	李天佑	政治委员	张秀山
副司令员	李寿轩	副政治委员	钟子云
参谋长	李寿轩（兼）		

第 1 军分区

司令员 温玉成
政治委员 董浩然
副司令员 马克正

第 2 军分区

司令员 王奎先
政治委员 李建平
副司令员 李亚田

合江军区

司令员 贺晋年 政治委员 方 强
参谋长 李英武

第 1 军分区

司令员 谭友林
政治委员 陈伯材

第 2 军分区

司令员 谭文邦
政治委员 吴亮平

副司令员 肖荣华
参谋长 肖荣华（兼）

副司令员 杜国平
副政治委员 肖前
参谋长 周明国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刘贤权
政治委员 王旭
副司令员 蔡久
参谋长 孙为
政治部主任 吴涛

第4军分区

副司令员 程启光
副政治委员 吕清
参谋长 赵黎平

牡丹江军区

司令员 李荆璞
副司令员 刘贤权 田松

政治委员 李大章
参谋长 王波
政治部主任 李伟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

司令员 阿思根 政治委员 哈丰何
副政治委员 张策 政治部主任 张策（兼）

骑兵第1师

师长 王海山

骑兵第4师

师长 何自章
政治委员 乌力吉那仁
政治部主任 孟和乌力吉

骑兵第2师

（六）晋察冀军区

司令员 聂荣臻

政治委员	聂荣臻（兼）
副司令员	肖克
副政治委员	刘澜涛 罗瑞卿
参谋长	唐延杰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兼）
副参谋长	耿飏 曾涌泉
政治部副主任	潘自力 蔡树藩
后勤部部长	查国桢

第1纵队

司令员	杨得志	政治委员	苏振华
参谋长	卢绍武	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第1旅

旅长	杨俊生
政治委员	邓存伦

第2旅

旅长	尹先炳
政治委员	戴润生

第3旅

旅长	李东潮
政治委员	陈云开

第2纵队

司令员	郭天民	政治委员	郭天民（兼）
副司令员	韩伟	参谋长	韩伟（兼）
政治部主任	向仲华（后）		

第4旅

旅长	肖应棠
政治委员	龙道权

第5旅

旅长	肖文玖
副政治委员	李水清

第3纵队

司令员 杨成武
政治部主任 谭冠三

政治委员 李志民

第7旅

旅长 周彪
政治委员 漆远渥
副政治委员 李呈瑞
政治部主任 李呈瑞（兼）

第8旅

旅长 易耀彩
政治委员 王道邦
副旅长 宋玉琳
政治部主任 刘光裕

第4纵队

司令员 陈正湘 政治委员 胡耀邦
参谋长 唐子安 政治部主任 李昌

第10旅

旅长 邱蔚
政治委员 傅崇碧

第11旅

旅长 陈仿仁
政治委员 黄文明

冀中军区

司令员 孙毅 政治委员 林铁
参谋长 黄寿发 政治部主任 王奇才

独立第7旅

旅长 肖新槐
政治委员 马泽迎
副旅长 甘炎林
副政治委员 甘春雷

独立第8旅

旅长 魏洪亮
政治委员 帅荣
副旅长 黄光明
副政治委员 韩庄
参谋长 苏锦章

第8军分区

司令员 徐德操
 政治委员 陈鹏
 副司令员 张鸿烈
 贾桂荣
 副政治委员 谢继友

第9军分区

司令员 孟庆山
 政治委员 张庆春
 副司令员 贾士珍
 副政治委员 李志远

第10军分区

司令员 刘秉彦
 政治委员 旷伏兆
 副司令员 谢国仪
 副政治委员 方国南

第11军分区

司令员 杜文达
 政治委员 魏震
 副司令员 叶楚屏
 副政治委员 钟华农

冀晋军区

司令员 赵尔陆 政治委员 王平
 参谋长 张开荆 政治部主任 张连奎

独立第1旅

旅长 曾美
 政治委员 金行生
 副旅长 黄永山
 副政治委员 李兆炳
 参谋长 李克林
 政治部主任 王卓

独立第2旅

旅长 马龙
 政治委员 齐文俭
 副旅长 阮平
 副政治委员 许诚
 政治部主任 许诚 (兼)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盛治华
 政治委员 田萍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罗文坊
 政治委员 丁莱夫

副司令员 刘 苏
副政治委员 张 华
政治部主任 范富山

副司令员 刘东记
副政治委员 杨世明
政治部主任 杨世明（兼）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成少甫
政治委员 齐文俭（兼）
副政治委员 陈宜贵
政治部主任 钟炳昌

冀察军区

司令员 郭天明（兼）
副司令员 曾思玉
参谋长 肖思明

政治委员 刘道生
副政治委员 李天焕
政治部主任 陆 平

独立第4旅

旅 长 马 辉
政治委员 黄连秋
副旅长 王茂全
副政治委员 严庆堤
参 谋 长 徐月波
政治部主任 李君彦

独立第5旅

旅 长 詹大南
政治委员 刘国梁

第4军分区

司令员 熊 奎
政治委员 周小舟

第5军分区

司令员 钟辉琨
政治委员 马天水

第6军分区

司令员 纪亭榭

第7军分区

司令员 陈宗坤

政治委员 杨世杰

政治委员 梁振中

冀热辽军区

司令员 程子华

政治委员 程子华（兼）

副司令员 李运昌 陈奇涵 黄永胜

副政治委员 黄火青

参谋长 李聚奎

政治部主任 刘随春

冀东军区

司令员 詹才芳

政治委员 李楚离

副司令员 毕占云

参谋长 王智涛

政治部主任 李中权

独立第10旅

旅长 袁渊

政治委员 徐光华

参谋长 李子钧

政治部主任 何兰阶

独立第11旅

旅长 肖全夫

政治委员 李振声

副政治委员 向仲华

政治部主任 周华彪

独立第12旅

旅长 曾雍雅（兼）

第12军分区

司令员 李道之

政治委员 刘亦如

第13军分区

司令员 李雪瑞

政治委员 王世煜

第14军分区

司令员 曾雍雅

政治委员 方治平

第 15 军分区

司令员 任昌辉
政治委员 杨文翰

热河军区

司令员 段苏权
副司令员 杨梅生
政治部主任 苏启胜
政治委员 黄火青
参谋长 舒行

独立第 13 旅

旅长 周仁杰
政治委员 覃国翰

独立第 14 旅

旅长 黄方刚

第 16 军分区

司令员 钟辉
政治委员 谢明

第 17 军分区

司令员 吴烈
政治委员 刘君达

第 18 军分区

司令员 丁盛
政治委员 韦祖珍

热辽军区

司令员 黄永胜
副司令员 文年生
参谋长 朱军
政治委员 胡锡奎
副政治委员 朱涤新

独立第 16 旅

旅长 张德发
政治委员 黄志勇

独立第 17 旅

旅长 欧致富 (兼)
政治委员 谢堂忠 (兼)

第19军分区

司令员 欧致富
政治委员 谢堂忠

第20军分区

司令员 欧阳家祥
政治委员 李东治

七、中原军区

司令员	李先念
政治委员	郑位三
副司令员	王树声 王震
副政治委员	王首道
参谋长	王震(兼)
政治部主任	王首道(兼)
副参谋长	朱早观
政治部副主任	刘型

第1纵队

司令员	王树声	政治委员	戴季英
副司令员	刘昌毅	副政治委员	刘子久
参谋长	张才千	政治部主任	吕振球

第1旅

旅长 皮定钧
政治委员 徐子荣

第2旅

旅长 杨秀坤
政治委员 刘健挺

第3旅

旅长 闵学胜
政治委员 张力雄

第2纵队

司令员 文健武
副司令员 周志坚 程耀德
政治部主任 张树才

政治委员 任质斌
参谋长 方正平

第13旅

旅长 吴世安
政治委员 杨焕民

第15旅

旅长 王海山
政治委员 陈先瑞

第359旅

旅长 郭鹏
政治委员 王恩茂

干部旅

旅长 张文津
政治委员 张成台 韩东山

江汉军区

司令员 罗厚福
副政治委员 廖汉生
政治部主任 侯政

政治委员 文敏生
参谋长 王绍南

独立第1旅

旅长 王才贵
副旅长 张秀龙
参谋长 李连生
政治部主任 邝铁

襄南军分区

政治委员 吴云鹏
参谋长 陈菊生
政治部主任 朱绍田

襄北军分区

司令员 张洪卿
政治委员 张谦光
参谋长 王遵义
政治部主任 王文中

鄂中军分区

司令员 蔡松荣
政治委员 李人林
副司令员 蒋树
参谋长 吴昌炽
政治部主任 冷新华

洪山军分区

政治委员 文敏生（兼）

鄂东军区

司令员 张体学 政治委员 聂鸿钧
参谋长 罗 通

独立第2旅

旅 长 吴诚忠
政治委员 张体学

河南军区

司令员 黄 林 政治委员 黄 林（兼）
副司令员 张水泉 参 谋 长 张水泉（兼）
政治部主任 张 难

独立第3旅

旅 长 黄 林（兼）

第1军分区

司令员 张仲瀚
政治委员 曾 涤
副司令员 苏 鳌
副政治委员 熊 晃
参 谋 长 苏 鳌（兼）
政治部主任 熊 晃（兼）

第2军分区

司令员 陈 刚
副司令员 何耀榜
政治部主任 蒋 立

第3军分区

司令员 孔令甫
政治委员 王其梅
副司令员 窦尚初

参 谋 长 窦尚初（兼）

第 4 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润庵
政 治 委 员 肖新春
副 司 令 员 周庆鸣
参 谋 长 周庆鸣（兼）
政 治 部 主 任 吴剑统

第 5 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 林（兼）
政 治 委 员 栗在山（兼）

说明：

本序列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1945 年 8 月至 12 月，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编组野战兵团时，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序列；第二部分是 1946 年月以前，各军区各野战军经过再次整编后的序列。这两次变动之间各军区部队序列的变化未作全面反映。由于当时情况复杂，部队序列和干部变动频繁，加之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全，遗漏错误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后 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五卷本)是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领导下编写的。参加第一卷撰写的是：毕建忠第1章；李力第2章第1节，第3章第2节，第4章，第6章第3、第4节和第7章第1节；黎连荣第2章第2节，第5章第2至第5节，第7章第3节；唐义路第3章第1节，第5章第1节及前言和本卷结语；华国富第7章第2节；江英第6章第1、第2节；何仁学第7章第4节和本卷末附录。初稿几经修改后，在军事历史研究部林登泉副部长主持下，邀请莫阳、沈宗洪、姚杰、毕建忠等军事历史专家进行了评审，同时还访问了当年参加战争的一些负责人。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随后对全书再次作了修改，由唐义路修改第1、第2章和第3章第1节，李力修改第3章第2节和第4章，黎连荣修改第5章，江英修改第6章，华国富修改第7章。全书由主编唐义路统稿。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姜思毅、军事历史研究部原部长王道平、副部长林登泉、研究室主任刘国语指导了本书的编写；毕建忠同志在本卷编写前期担任过主编工作；林登泉、刘国语最后作了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事博物馆、总政联络部、广州军区有关部门以及许多当年参加斗争的老同志为本书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